

郭恩慈

探索東京、  
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

# 東亞城市 空間生產

郭恩慈經由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理論閱讀作為她的寫作起點。哈維以空間生產重構馬克斯理論的空間向度。他分析資本積累的擴張力量，同時整合空間，以時間消滅空間，以及，以自身形象創造地景，然後，為積累的飢渴所催逼，以便為進一步的積累開闢道路，建構出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創造性破壞過程。

這是潛藏在工業化、都市化、資本主義化、全球化、甚至西方化的背後，最重要的力量。

這是現代性建構，也是現代建築的空間文化形式所表現的意義。

郭恩慈以此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在全球化年代所開啟的新生活方式。這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卻是一個揭露在地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的必要研究。

夏鑄九／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ISBN 9789866204227  
定價 420元

# 東亞城市空間生產

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

| 作者 郭恩慈 | 企劃編輯 劉佳旻 | 美術設計 李莉君

| ISBN 978-986-6204-22-7 | 定價 420元 | 初版一刷 2011年6月 (平裝)

| 發行人 陳炳樸 | 發行所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登記證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314號

| 地址 104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72巷6號 | 電話 886-2-2531-9081 | 傳真 886-2-2531-9085

| 郵政劃撥 19091744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部落格 gardenct.pixnet.net/blog | 電子信箱 gardenct@ms14.hinet.net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Garden City Publishers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郭恩慈 著

初版一刷。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11.06

368面；17x23公分 ISBN 978-986-6204-22-7 (平裝)

1.都市社會學 2.文化都市 3.日本東京都 4.上海市 5.香港特別行政區

545.1015 100008093

郭恩慈

探索東京、  
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

# 東亞城市 空間生產

郭恩慈經由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理論閱讀作為她的寫作起點。哈維以空間生產重構馬克斯理論的空間向度。他分析資本積累的擴張力量，同時整合空間，以時間消滅空間，以及，以自身形象創造地景，然後，為積累的飢渴所催逼，以便為進一步的積累開闢道路，建構出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創造性破壞過程。

這是潛藏在工業化、都市化、資本主義化、全球化、甚至西方化的背後，最重要的力量。

這是現代性建構，也是現代建築的空間文化形式所表現的意義。

郭恩慈以此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在全球化年代所開啟的新生活方式。這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卻是一個揭露在地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的必要研究。

夏鑄九／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ISBN 9789866204227  
定價 420元

原书空白

原书空白

# 東亞城市 空間生產

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  
郭恩慈



# 有自我批判意識的批判者

呂大樂 / 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

一直有注意郭恩慈的分析與評論，原因有二。一是她長期關注一些在城市裡被忽視的群體——尤其是高齡人口——的生活與福利。二是她寫文章，作評論，不會只求別人的認同或所謂的「政治正確」而將自己的意見、觀點收藏起來；她有話直說，文字爽朗。

讀郭恩慈寫Lefebvre、Harvey等理論家的批判城市分析，始於十多年前。她編著的《香港空間製造》是結合批判城市分析與香港城市研究的重要著作，推動了有關城市空間的研究和討論。她對城市理論的理解、選用，份外小心謹慎，絕不是順手拿來，隨意挪用。今次讀她的新作《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不單只可以見到她的研究範圍有所擴充，更覺她很努力的探索城市發展的不同可能性。

而在探討城市發展的不同可能性的過程之中，郭恩慈要求提出批判的論者與參與行動的人士，同樣需要保持自我批判。於是，她提醒我們：「……Harvey清醒的批判，的確十分值得我們深思。Harvey警告我們，如果把『人民』抽象化，或『社區』或『社區／本土文化』過度神聖化，誤解為一件物件（a thing），或自然而然地孕育滋長的『物』，並且企圖將這『物件』（即社區）孤立在全球化的大勢以外，無限上綱地推崇，甚至膜拜，同時排斥不屬於『社區』或『本土』的任何事物（例如西方中古時期樂或中國宋明山水畫）或

思想（例如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嚴謹科學地反省），這種思維行徑，與所有排他主義甚至乎族群沙文主義，根本完全沒有分別。」

她又再引用Harvey的分析，指出：「無論在香港或台灣的文化界，甚至本土文化的倡議團體中，David Harvey都備受推崇。但是，可能大家都沒有細心閱讀Harvey的作品。例如，在《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1996）的最後一章：〈Possible Urban World〉（可能的都市世界）確切地提出：在一方面，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強權，當然阻止了自主性的都市發展，或某特殊城市去界定本身獨特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烏托邦式的社區主義（communitarianism），基本上是在建立迷思性的社會團體。Harvey認為，社區主義對全球化的反抗是幼稚的，他們幻想本土政治可以孤立起來，街坊街里的社區鄰舍感情，被表象為發自內心的精神，並成為動力去團結坊眾，自成一國，可獨立於資本主義經濟作持續發展，更可以藉此來對抗在『區外』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侵略，以及種種的都市病態現象（頁425）。於此點烏托邦主義者正正忽略了草根階層本身之形成，實為不平均地理空間的發展而衍生的階級。」

我敢肯定，一定有人會認為郭恩慈對Harvey的理解有所偏差。又或者基於政治上的考慮，認為這是搞分裂的言論。可以想像，一定有人會想出各種不同的理由，來否定她所提出的疑問與批評。但這些對她的批評都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作為主張批判城市分析的論者和實踐者，更需要有多一份自省，多一點自我批判的能力。這正是郭恩慈的著作值得參考的地方。

說到這裡，或者需要補充一點，就是嚴格來說我並不熟識郭恩慈本人。多年來應有過數面之緣，但交談對話恐怕至今還未超過三十個句子。她說我們是通過閱讀文章而認識的朋友。在我這方面，我是她的長期讀者。作為讀者而有機會為她的新書寫序，實在令人興奮。

# 東亞城市空間生產

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

序 有自我批判意識的批判者／呂大樂

## 第 1 部

壹、導論	14
貳、資本主義的空間運籌——David Harvey 理論總述	24
參、城市文化——日常生活的發現和完結	58

## 第 2 部

## 東京

引言：回歸亞洲——東京城市空間發展的轉向	95
一、藝術消費、消費藝術——六本木新城	102
六本木地區之背景歷史	103
六本木新城——Artelligent city的誕生	107
六本木新城發展概念	107
1. 文化與藝術：消費空間的襯托物	
2. 商業購物空間設計	
3. 公共空間設計	
4. 虛擬的學術文化空間：Academyhills	
5. 高檔次的住宅及辦公大樓	
6. 程式化的區內連繫網：「六本木藝術三角」	
結論	121
1. 藝術虛擬化、生活消費化	
2. 城市最後也不過是一個超巨型的商場	
二、從傳統到地方認同——神樂坂之町營造	126
所謂町營造	126
神樂坂之町營造	133
1. 神樂坂的所在地	
2. 神樂坂的歷史	
3. 神樂坂的「路地」	
4. 文化傳承：從古蹟到生活空間	
5. 神樂坂社區生活	
結論	153

## 香 港

引言：赤裸裸的「雙元城市」——香港城市發展的危機	159
一、社區營造還是社群主義 ——香港灣仔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的觀察	172
導言：利東街重建與反拆除——從爭取合理賠償到反拆除	172
市區重建的理論背景：仕紳化 (gentrification)	174
灣仔利東街重建個案	185
1. 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的過程	
2. 「地方」論述的成形	
3. 從「向迪士尼學習」到喜帖街文化論述的建構	
4. 文化大眾的文化仕紳化的進程	
結論	203
二、「嘉年華式狂歡之軀體」的鬥爭 ——屯門公園長者之空間創造	212
屯門公園事件簿	214
1. 屯門在哪裡	
2. 屯門公園環境的描述	
3. 唱歌跳舞要把命拼？——研究起因	
4. 研究方法	
5. 研究的設定	
6. 觀察與發現	
生活空間的意義	228
1. 載歌載舞、免費娛樂	
2. 建立社交網路，締造身份認同	
3. 表演歌舞，掌聲中贏取賞識與認同	
4. 嘉年華式的狂歌熱舞，高齡人士的生命歡愉與活力	
結論	237
1. 長者歌舞活動創造了城市新意義	
2. 官辦藝術的矛盾與暴力	

## 上 海

引言：文化創意之城？邁向全球化之城？ ——上海發展的迷思、虛擬與真實	247
一、歷史與藝術的商品化 ——論上海浦西重建所營造的城市文化	257
歷史地標還是消費地標？概論城市重建中的上海外灘	259
1. 上海新天地——販賣最新穎的懷舊	
2. 多倫路文化名人街——展示衰落的「老上海」	
品味空間的消費還是藝術空間的創造？泛論創意產業園區	283
1. 「每個週末玩膩了普通娛樂場所的都市消費者」的新去處：創意產業園區	
結論：在城市中，讓我們重新彰顯「人」的課題	298
二、從上海到全球化	308
西方「全球城市」強勢論述對上海的「分類」及「收編」	310
從中國整體發展出發——中國學者對上海發展的論述	318
結論：上海是否為一個（邁向）全球化的城市？	326

## 第 3 部

結論：全球化的脈絡中的東亞城市	334
後記	350
謝誌	354
參考書目	356



## 第1部

### 壹、導論

貳、資本主義的空間運籌——David Harvey 理論總述

參、城市文化——日常生活的發現和完結



## 導論篇——

Deborah Stevenson的著作《Cities and Urban Cultures》（2003）一書的第一章〈Cities Cultures〉，正以911事件作為開始。位於紐約曼哈頓的世界貿易中心南北大樓，被恐怖份子的自殺式飛機毀滅。由於進步的資訊科技，全世界電視觀眾在同步時間的情況下目睹了這場大災難。先進的電子傳播科技佐證了我們正處於全球化的生存環境中。於2009年，我們再一次身體力行地感受到全球化的生存環境的真實性及震撼性——我們再次被紐約曼哈頓傳來的災難所侵襲。這次不單是美國人自身受到恐怖主義軍事襲擊，世界其他地方間接感受到牽連；這一次是由美國金融界直接引發之次按危機，繼而給全球帶來廣而深的金融海嘯之經濟災難。在金融風暴水深火熱期中以致今時今日，世界上所有先進的國家以及城市，都無一倖免地陷於衰退的邊緣，每一個政府都在掙扎挽救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這完全負面的情況，迫使我們要深刻的審視，「甚麼是全球化？」以及「甚麼是全球化城市？」這等課題。

著名學者Saskia Sassen多年來集中研究城市在全球化經濟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在2005年所出版的文章〈The Global City：Introducing a Concept〉

中，清晰地界定了「全球化城市」（Global City）的特質。她認為，全球化城市就是跨國企業設立大本營／總公司的所在城市。跨國企業在全世界作分散投資，於此同時也在全球化城市中設置總公司。總公司控制著投資資本的各個運作程序，也外派某部份程序給專業人士或機構去處理。這等專業人士或機構並不一定和跨國企業的總公司位於同一個城市。由此，跨國企業的運作，乃是一個龐大的跨境管理、生產及物流的網絡。城市與城市之間因此必須超越國境的界限而作出緊密的聯繫。城市環境本身也要考慮這等跨國的經濟運籌，而在各種基礎建設及資訊科技上作出對應的建設。Sassen在此文之結論中，清晰地指出市中心區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一級辦公大樓、娛樂場所及高級住宅佔去，因而令本土居民、基層階級失去其既有的棲身之所；並且，所有利益都被有能力為跨國企業服務的專業人士所掠奪，城市由此而變成貧富極度懸殊的階級鬥爭、此消彼長的矛盾及衝突場域。但是，當我們細心地閱讀此文，會發覺Sassen對於全球化城市的闡釋重點在於全球資本流動、跨國企業及資訊科技的發展，以致影響到城市的規畫及各個城市之間的連結。也由於全球化城市跨國企業在推進經濟增長過程中所扮演的主導地位，國家政府所擔當的角色也因而被削弱。在諸多著作中，Sassen不斷重覆地用「增長」、「擴張」去勾劃及強調全球城市的高度專業化、高科技化、高效率及資本不斷流動、膨脹的特質。

儘管亞洲經濟復甦的步伐較歐美快速，但在全球層面而言，很多地區還是陷於金融海嘯的後遺困厄當中。人們也因而被逼迫從另一個負面的角度去審視全球化的進程。那些被Sassen形容為在全球化城市的跨國企業管理投資系統中從事高度專門化工作的專業人士（highly specialized professionals），正正就是現在釀成金融海嘯大災難的罪魁禍首。「蓋特納稱美國過往『借得太多』，又容許金融系統承受『不負責任的高風險』，都是導致當前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sup>1</sup>。」美國總統歐巴馬剛上任便大罵在華爾街呼風喚雨的金融界精英不負責任及貪得無厭，並對他們感到羞恥。相信這是認定金融業為主導力量、將全球化城市的霸權經營得蒸蒸日上的Sassen（2005：6），所始料未及的。

從2007／08年金融風暴延續至今，所有先進國家所要面對的，就是出口嚴重萎縮、銀行缺乏信心借貸，銀行需要國家注資因而變成國有化，甚至國家保護主義漸漸抬頭的經濟危機。雖然我們是經濟學的外行，也能理解到這種現象皆與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相反。看來，就算全球化的經濟運作步伐不會停下來，全世界人們也不會以過份樂觀及正面的方向去理解及接受全球化，以此作為當今世代的價值依歸及文化取向了。

在這個充滿危機動盪的時勢，我們該如何看待城市的發展？

二十多年前，正當世界越來越全球化，金融界方興未艾，正蓄勢待發席捲天下之際，John Friedmann的舊著《Life Space and Economic Space》（1981），已冷靜而且義正辭嚴地指出「經濟空間」對「生活／生命空間」的侵略及侵吞。

Friedmann指出，人類所處的空間，可分為「經濟空間」及「生活／生命空間」。「生活／生命空間」就是人們開展其在世生命的場所，某時某地某族群的人們營造「生活／生命空間」的內容及形式，也同時是這族群的人們對生命開展的具體表達。亦即是說，「生活／生命空間」的營造，是人們存在於世的價值及意義的具體表達。人們在其中，意識到其生命在世界上有一個位置，並與世界上所有的人、物與事產生關係。人們在「生活／生命空間」度過其日常生活，由近至遠，與其他人相交，產生由私人、親密擴展到公共、社會的重重關係。故此，對人來說，「生活／生命空間」是有範圍，並且有秩序地一環扣一環地擴展出去：由家居空間推展至鄰里空間，乃至城市空間、區域空間以及國家空間。於此，《大學》中所言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好說明了Friedmann所言之人與外在空間相互地界定對方的本質及其內在的關係。Friedmann以現代及簡明的語言，指出了人對空間投放及貫注了歷史及政治向度的關懷、價值及意義。反過來，一個地方也給予人們其身份及生命的向度。

自古至今，無分中外，當人作「自我」介紹時，也必然提及自己來自何處，或籍貫為何等。人們對其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產生了不可代替的感情，也在必要時為其負起自己最大的責任。

在另一向度，人們當然要從事謀生活動（livelihood）賺取金錢，使生命得以維持下去。但是，今時今日，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已整體地控制了經濟空間，全球化的資本流動，使得世界的地域單位及網絡聯繫已有基礎上及本質性的改變。人們漸漸從經濟角度去衡量及定位國家、區域及城市的價值。

在Manuel Castells的著作《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2000）<sup>2</sup>中，全球化資本主義已將經濟空間轉化為流動的空間——現今世界上先進城市的營構往往是依隨著科技的演進，及市場向著全球化膨脹而變更其管治組織及發展策略。同時，那些被冠上「全球化城市」稱號的城市已不是一個「地方」，而是已變成一個流程（process），在這個流程中，一切都在流動：資本、資訊、科技、組織之間的往來、甚至影像、音響，以及符號（2000：412）。在全球化城市中，各個先進的生產及專業服務中心與附屬的地方都被聯繫在一起，形成了全球化網絡的各個環節。以資本主義的擴張為目標的城市對生命／生活不會有尊敬，為了建造更多做生意的空間，歷史鄰里空間很輕易就被移平。空間因而失去了其人文、歷史及政治的凝聚能力及意義。

Castells也說，在流動空間中，建築物與社會間充滿意義的關係愈漸變得模糊……全球化主流的利益考量，不單只要將全球空間變得一體化，更將其勢力伸展到地方的文化及歷史脈絡裡去（2000：418）。於是，在城市的市中心區，紀錄或表達著本地人生活經驗、歷史及文化的建築物社區統統要連根拔起，讓出空間來建築那些去歷史及去文化、但有當下投資價值的建築物。人們無法再以「生活／生命空間」去界定其在世生存的空間，謀生活動的重要性完全蓋過生命／生活文化的創造，生命歷程也只被貶低為經濟運算的其中一個環

節：在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中，生命的內容只是消費。也由於此，豐厚的金錢收入及強勁的消費能力往往等同於生命的滿足及快樂。人們失去了「生活／生命空間」，使得日常生活空間完全被全球化城市的功能性邏輯控制（2000：426）；生命質素只能夠以其經濟向度去界定——人只能作為一個工人或總經理去界定其（作為人）的本質，或只能作為一個消費者去參與及展現其生命的歷程。

從1980年代開始，世界就持續依著資本主義全速席捲全球的步伐來變動。世界上大部份的民族傳統及文化，皆要順著全球化資本主義／消費主義所開展的路向去作改變及發展：文化徹底地變成了工業，成為不斷生產及推銷各個層次的象徵（物或事件）的企業運作。人們於當中存在的空間，當然不會例外——把空間包裝為商品，當然就是旅遊業的主要策略。Friedmann所強調的，「生活／生命空間」及其對人們在世存在的價值及意義，已被忘記得差不多了。

我們這本書，從開始研究繼而書寫，少說也經歷了五年時間。我們從開始提問到完稿為止，也秉持著批判的立場，審視身處於的東亞地理空間，思考它如何在此複雜的經濟大方向導航下，一方面順著主流，全速開發適合全球化的營商經濟環境？另一方面，在這個同時擁有豐富歷史文化的東方，究竟作為東方人的我們，還有沒有空間讓我們的文化持續下去、讓含蘊東方文化意義的「生活／生命空間」繼續存在？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發展的城市文化，應從空間及時間兩個向度去作理解及剖釋，我們因此一方面深入研讀了David Harvey的理論，以總覽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空間的歷史及策略，另一方面，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具體化為消費主義，無孔不入地注進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故此，我們也參考了Featherstone、Baudrillard以及Bourdieu的理論，以圖詳細地展述及反省日常

生活這時間向度被消費主義營構的過程。這兩方面的基本理論研究，成為本書的第一及第二。

Rowe (2005) 在其書《East Asia Modern : Shaping the Contemporary City》中，詳細分析了7個東亞城市的「現代化」發展概況。簡單地說，Rowe 認為過去50年東亞城市的都市化發展在很多方面都是頗為相似的。這些城市首先是依照源於西方所界定的「現代化」指標去發展：對超高層的建築物趨之若鶩，也都以擁有象徵最先進科技的建築物自豪，例如獲選為全球最佳機場的香港國際機場、上海的磁浮列車等。據Rowe所言，這等城市都是由強勢政府由上至下地頒布城市規畫政策，督導所有發展。「現代化」發展之餘，就是不斷加快步伐，以求在「全球化」經濟運作中佔一位置。然而，Rowe 亦很明確地指出，正當21世紀初，東亞城市還方興未艾地比較著「誰最現代化？」之時，西方早在20世紀70年代已理解到：「『現代城市』這概念已經到了盡頭」（2005：160）。他指出，在西方，於70年代，隨著社區權益訴求不斷壯大，在城市建設層面「使用者與市民的參與運動」（user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逐漸茁壯成長。市民都強烈關注在都市規畫及重建過程中，是否照顧到本土歷史、文化、社區生活，以及環境與生活文化的持續發展可能性等重要課題。到了80年代，全球化經濟全速發展，Rowe卻認為，在西方，隨著資訊科技發達以及網路的發展，廣泛來說，個人及集體社會運動因著此一群眾自發聯繫及組織的科技而獲得更大的力量。在此書中他不斷強調，東亞城市為求與世界已發展先進地區看齊，熱切地期望「現代化」，並且認定全速推行「現代化」是最高指標，因此，這些城市在強勢中央集權的政府主導下，必然強烈堅持社會的穩定性及凝聚性，以求經濟能順暢發展及進步。Rowe認為東亞城市的現代化只為狹窄的經濟「增長主義」（growism）所主導，然而西方先進城市所經驗到的「公民社會」、集體參與力量的擴展及壯大，在這些東亞城市卻尚未出現、或只是剛剛起步而已（2005：165）。Rowe更進一步批評，近年在東亞城市儘管以藝術及某些稱之為「後現代」的建築物去點綴，

但其實離正規的「後現代」城市很遠，因為於西方已十分興旺的民間本土化（indigenous）多元化（pluralism）的文化發展，在此等城市卻見不到什麼實質的滋長（2005：168）。

Rowe的立場，可說是十分概括的：他將世界東西方二分，認為首先發起對空間政治的反省、並付諸於市民參與城市環境規畫社會行動的西方已進入後（於）現代的時期，也由此切入，貶斥東亞地區自東京到新加坡等7個城市，以為在科技上能與西方城市看齊，就是現代化；然後狹窄地發展經濟便等如全球化。這些評語，的確是表面及偏頗的。尤其是現今處在金融海嘯災難當頭的情勢中，西方的民主／民間參與運動曾幾何時顯示過力量，有效地抗衡資本主義全球化對空間的規畫、營造及商品化？——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乃是美國的次按危機，這正正就是美國的投資機構不斷膨脹房地產業使之成為泡沫、繼而爆破所釀成的大災難。然而，Rowe所開展的討論也給我們一個平台，去細心審視我們身處的東亞地區，究竟是否真的是在科技上先進，卻在文化上落後。

本文集包括了我們這5年來對3個城市：東京、上海及香港的研究。這3個在東亞地區有著重要代表性的城市，自19世紀中葉「開埠」以來，依著不同速度「西化」、「現代化」；到了20世紀80年代，也依著不同速度「全球化」。我們企圖去理解分析及批判這3個城市自80年代以降的發展政策及策略，當中所涵蓋的意識型態。

面對著全球化資本主義強權地散播的一體化價值取向，這3個城市，在其文化實踐上，都逃不過來勢洶洶地將文化包裝、重整的全球化消費主義；於是城市文化愈漸趨向功能化、商品化、策略化。我們這本書的首要任務，便是審視這3個城市在不斷重構的過程中，文化的基本要素（歷史、藝術、日常生活文化）如何在消費主義的強勢下被整理、包裝成為經濟策略。

現今佔據主流地位的城市文化論述，皆集中於「全球消費文化」及「後現代本土普眾文化」兩個方向。全球消費文化倚仗了「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在後現代批判中的崩壞，那追求純粹及本質、秉持超日常文化觀、超經濟價值觀的「高檔藝術」，備受「普眾文化」（common culture）（Featherstone, 2007: 131）的攻擊，以國家民族為單位的傳統歷史及藝術思維不斷受到「在地／本土文化」論述的反抗之局面中，消費活動借勢偷龍轉鳳化裝為普眾文化活動，從而將商品轉化為文化品銷售，也將商業行為混充為「普眾」文化行為，讓人們誤以為凡是群眾集體從事某種行為便是文化，便是值得肯定，亦即是值得消費。不單如此，消費文化更撤銷正統歷史、傳統藝術的儀式價值（cult value），將歷史事蹟、紀念場所、藝術空間、行為及藝術品平民大眾化，讓人們在普通的空間、日常的時間隨處隨便與它們接觸（例如電視播放歷史連續劇、商場展覽藝術品），使它們根本地成為消費過程的其中環節。於此，我們只有悲觀地下定言：於此普眾文化戰勝了貴族文化之世代，亦即是「消費」統攝人類整體文明的時期。

憑著對Harvey、Lefebvre、Baudrillard、Bourdieu、Featherstone等人理論的深入研讀，我們不再單純，而漸能理解到資本主義及消費主義侵吞人類精神生活、日常生活、物質生活的強大野心。這本文集，正是以東京、上海及香港這3個城市為個案，去揭示資本主義及消費主義對該地歷史、藝術、人民生活的侵吞及殖民過程。除此，我們更企圖理解，這3個城市的居民的傳統價值取向、生活習性及方式，是否不能抵擋消費主義的大勢，因而被透切地侵吞及「殖民」？當我們儘量避開主流對城市文化的論述、深入調查後會漸漸發現，在這些城市中的某些地區或角落，市民們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去防衛及持續某些蘊含傳統的、藝術的及地域性的活動努力地維持其所住居的地方的固有面貌及文化、其所追求的生活意義及精神價值。這等富文化意義的日常生活實踐，可能與Rowe所言在西方出現之完全由市民自發的「使用者與市民的參與運動」那類富有政治性質的激進程度或實踐成功度很不一樣，



但我們不可能不將其視之為全球一體化之對立面的某個方向。於此陷入全球化資本主義過度膨脹以致爆破的災難之時刻，我們熱切期待重新掌握資本主義以外的價值取向。也由於此，我們應面對本土固有文化作深入反省，要求自己深徹理解及批判何謂文化、何謂本土；人民可能以何種方式去組織行動，去演繹、體現何種模式的文化。

自狄更斯而降，很多人都重覆過「這是一個最壞的時刻，也是一個最好的時刻」這句名言，全球的金融體系瀕臨崩潰，過速過貪的經濟活動進程讓人們見到其中的錯失與腐敗。於此金融發展緩慢下來的時刻，人們似乎稍有空隙，開始反省身處時代的精神與文明的方向及意義。金錢以外的意義及價值系統，也由此獲得彰顯的可能性。於這時刻我們將有關現代人的居住環境——都市之文化的研究結集成書及完稿，實在有重要的意義。

過去20、30年以來，許多著名學者殷切地展述當今世界正勢不可擋地邁向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並設立標準，點石成金地將某些城市高舉為全球化城市。有權威的學者，更迫不及待地組織成世界城市的「排行榜」，論盡哪個城市正在迎頭趕上（例如：《Shanghai Rising》）。各地市政府也爭先恐後地不斷依全球化城市的規模把城市重建，力圖躋身在全球化經濟體之中……全球時空在急速運籌，充滿繁榮喧譁……但願我們能藉著這個全球化運籌漩渦暫且遲疑鬆懈的一刻，稍稍退下來，回歸到原基狀態，讓人作為人，讓空間只為空間，反省一下人與空間究竟是何種關係？人居住於大地之上意義為何？我們這本文集，正是透過研習城市空間理論，以及對3個城市個案的批判及分析，企圖邁向更根本的對人對空間本質的理解。

## 注釋

1：〈25對沖基金經理狂賺900億〉·明報。(2009年3月26日)。<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325/4/bcuu.html>

2：中文譯《網絡社會之崛起》。

# 資本主義的空間運籌

——David Harvey理論總述

## 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空間分析

David Harvey是英美著名的地理學理論家。在《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的中譯本<sup>1</sup>（2007）作者介紹欄中，稱譽Harvey為「世界知名的批判性知識分子」。研讀都市研究、空間理論的學者文化人，無不精讀過他最出名的著作《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sup>2</sup>（1989，以下簡稱：《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在其著作《Space of Capital》<sup>3</sup>所收錄的一篇訪問稿中，Harvey稱《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受歡迎的一本。此書中對「後現代性」全面、細緻且具體的分析，的確使讀者清楚地明白到資本主義在空間的全面涵蓋。本文筆者讀了《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之後，對Harvey的理論產生極濃厚的興趣，由此而企圖追蹤Harvey整個理論架構，因而發現，此書的立論背後，有著全面性的理論支撐脈絡。本章節的主旨，就是要把Harvey在1969至1972年以後以馬克思理論為基礎脈絡的整個理論架構陳述出來。

藉著研讀Harvey的歷史地理空間理論，我們可基礎性的理解到全球地理空間的佈局，及衍生佈局的前因後果。Harvey除了給予我們資本主義在地理上的歷史發展脈絡，更鉅細靡遺地分析了當下全球化經濟運作及後現代思維兩者之平行發展。當我們聚焦於城市建構及從中衍生的文化發展之分析時，此宏大的理論架構正好作為我們分析所倚賴的嚴密而且堅實的參照系統。

Harvey幾乎在所有著作中，都明確界定自己是馬克思理論的忠實追隨者。Soja在《Postmodern Geography》<sup>4</sup>一書中，評價Harvey是所有地理學家之中，對馬克思地理學最投入及持續不斷的研究者。Harvey認為馬克思理論教導我們認識到地理空間的營造建構及轉化，其實是與資本的累積過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要解釋地理空間時，必定要清楚知悉其背後構成的經濟以及政治歷史演化過程。由此觀點，Harvey展開其歷史—地理學之論述。

根據Harvey的自述，1969年他接受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教職、從英國移居到美國時，開始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對馬克思的見解十分獨特，一般人都將馬克思主義和（前）蘇聯或中國這些社會主義國家聯繫在一起，但Harvey認為，實際上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分析資本主義，所以馬克思主義是分析批判美國歐洲這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最有效工具，而不是強化共產主義的寶典。

Harvey明言，這兩百年來，資本主義高速地改變了全球的面貌。資本主義在全球地理空間滾動、累積、膨脹，也製造了不少危機——甚至是毀滅性的戰爭。隨著世界局勢的變更，資本主義也不斷地改變全球地理空間的面貌。

對Harvey來說，整個世界的空間結構，可說是資本（capital）的空間展現。其所論著的不同著作，皆是重覆又重覆地表述「資本」如何在空間中體現。他的理論發展，正是企圖不斷深化對「資本流動」的嚴謹分析。整體上，

他確認資本為空間製造及（再）生產的原動力。

在2000年8月的《New Left Review》中，刊登了Harvey的訪問稿。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整體地了解Harvey的思想歷程，以及其「歷史—地理」學的發展過程。Harvey的研究從傳統的地理學，進入到都市規畫的研究，漸漸發展到以跨學科的進程來進行對空間環境的研究。在1970年代，Harvey開始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由此而奠定了他的「歷史—地理學」。

到了1980年代，Harvey出版《The Limits to Capital》<sup>5</sup>（1982）一書，企圖以此書龐大的理論架構，描述並詮釋馬克思對資本運行所建構的宏大脈絡，並進而涵蓋現代工業社會生產時間及資本運籌所營構之空間的結構。Eric Sheppard（2004）認為，Harvey的工作，乃是要「空間化」（spatialize）資本論，資本融進了、體現成為地理空間本質；以馬克思的龐大資本理論，詮釋全球空間的組織與演變過程。因此，Eric Sheppard將Harvey的理論稱為「資本論的空間化」。

在《Space of Hope》<sup>6</sup>（2000）的其中一章〈The Geography of the Manifesto〉中，Harvey基本上是把馬克思所陳述的資本主義運作，在地理空間脈絡上重新演繹一次。封建社會中的貴族領主之權力，受領地範圍所限制的情況，被資本主義徹底地改變了。資本家在所屬國土之內促使了工廠的建造，聚合勞動力，使得都市化高速進行，也由此而使國際化大城市紛紛成形。在國外，資本家無遠弗屆，不僅掠奪全世界各地的資源，同時在世界各地設立生產線及市場。在對全世界各地的資源及物質挪用、生產、運輸、交換以達成資本累積的同時，資本主義更使所有國家嚐盡瀕臨殲滅的苦痛，因為它強迫所有國家接納並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將資本主義文明強加於所有國家及民族：即把所有國家變成資本主義國家。Harvey直接引用馬克思的說法，指出資本主義的最大野心：「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正是依照自身的影像去創造世界。」

在本篇文章中，我們將針對Harvey的各個基本概念，以及由它們組織起來的理論架構進行詳細分析。透過這樣的分析、表述過程，我們獲得了一堅實的立論點，進而宏觀的對我們所研究的3個城市的文化作出尖銳的反省批判。

### 1. 「空間修補」 (Spatialfix)

資本展現為空間的組織／生產、再組織／再生產的動力，因此資本的流動、累積、增長，或由此而產生的危機皆構成了「全球化」、「都市化」的動力；在Harvey的觀點中，資本的累積也產生了「不均衡地理發展」的現象。從宏觀視點來審視，Harvey建立了「空間修補」這個普遍概念來涵蓋資本在空間上組織／再組織的過程。在《New Imperialism》<sup>7</sup>第三章中，Harvey扼要地說明「空間修補」(Spatialfix)／「空間——時間修補」(spatial-temporalfix)的兩種涵義：第一是「固定附著」的意義，這概念是指在某地域投入的整體資金，必有部份是用作長期基礎建設，或鑲嵌於土地上的固定資本：例如鐵路、公路、火車站、碼頭等，或社會基本設施：例如醫院、學校，以致醫療、教育經費等的營造。第二，這間接隱喻了「透過時間遞延各種地理擴張，來對應資本主義危機的特殊解決之道」(頁90，中文版2008／2003)：當資本投資在某地，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後，所產生的剩餘資本必定又要再尋求新的投資機會，或將剩餘資本流注往其他新地方(以作開發)，由此，資本才可以持續獲利及增長。Harvey認為，這兩種意義在具體層面上是互相矛盾的。

簡略而言，Erica Schoenberger說明了「空間修補」(Spatialfix)，其實就是Harvey所有理論的焦點：在Harvey的理論中，「空間修補」的定義就是，在資本的運行中，地理空間的組織、建構及再建構起來的整體歷史。Schoenberger(2004)以下列三點，再深入解釋「空間修補」的意思：

1. 資本在地理空間的運流，不斷更新勞動力在國際空間的分配模式，因而產生新的空間聚合群；

2. 地理空間的型態的改變，正是某區域吸收剩餘資本的過程和後果；

3. 「空間修補」其中一個形式，就是資本不斷創造、擴大及改良人造地理空間，好讓資本持續及加強其自身的創造。

## 2. 不平均地理發展理論 (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

Harvey在《The New Imperialism》(2008:101)中重申，資本主義的邏輯就是永恆的擴張，進行無止境的資本累積並不斷尋求利益的增長。Harvey更進一步肯定了資本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就是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的中心課題；也認為「資本累積」是改變世界的政治、經濟及環境的基本力量。在《The Limits to Capital》一書的其中一章：〈The Dynamics of Accumulation〉中，Harvey簡潔地說明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將資本不斷膨脹。資本主義的原則是為累積而累積，同時它的能源動力即是來自對工人生產力的剝削。由此資本主義是一種永恆在改革、不斷在變動的力量，也正是不斷改變著人的世界的力量(1982:156)。

《Space of Hope》中的〈The Geography of the Manifesto〉一章，便清楚地提出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基礎，確認了「資本累積」是一件「地理事件」(2000:23)。

Harvey指出，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都圍繞著資本的增長與累積，資本主義就是不斷發掘新的生產方式／生產線、新的生產科技、新的資本運行方式、新的盈利方式、也促使人們在地理空間上遠征新的殖民地、在日常生活內容上組織新的生活方式。

而在《Space of Hope》（2000）中，Harvey用了整整一個章節去闡釋「不平均地理發展理論」（第5章）；若細心研讀，我們會發覺Harvey試圖把他整套歷史地理學理論放在這個主題中詳述一次。總括而言，在這一章節內與其說是將「不平均地理發展理論」作為一套獨立理論詮釋，不如說「不平均地理發展理論」是Harvey的歷史地理學中幾個可互用的總體概念之一（其他如「空間修補」，也是在Harvey的理論系統裡另一個總體概念）。簡約而言，不平均發展的理論乃是要審視地理空間的構造和經營，如何成就及維持資本主義的存在。

在經濟架構下層物質生產及資本累積的過程中，我們很清楚地了解到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原則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關係。其實，馬克思主義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必得在地理空間上擴張與資本強化不可。帝國主義正是資本主在空間上的擴張與強化。

當在某地的資本累積不斷增加，而科技發展，加上生產模式、勞動效率提高以致所生產的商品亦不斷增加時，必須要將這「過度」的剩餘擴散至地球上其他地區，在那裡建立新的市場以消費這剩餘的科技、生產模式、勞動力及商品。由此而使資本在「安全」的情況下繼續增長。很明顯，這是西方先進國家向「落後」國家輸出剩餘價值的原因。資本主義於19世紀自西方發源地開始向外擴張，向未被資本化的地區進行殖民侵略，自此，在物質層面上，被殖民的地區向宗主國提供各類資源，同時不斷吸納先進地區所生產出來的過剩生產過程及製成品。更且，在上層文化、意識型態的建構層面，資本主義亦無孔不入地將全球人們的價值觀改變。西方先進國家透過交通航運科技，以資本主義為經濟動力，將全世界所有地域劃分為不同檔次的區域<sup>8</sup>，並且企圖將世界各地的資源及文化都包攬在所謂資本主義所建構的經濟、政治、建制及知識的進步過程中。當然，西方先進國家首先自封為現代文化的中心發源地及最高峰；而世界的層級檔次劃分，就是從此中心／高峰點出發，逐層界定及劃分為先進或



落後地域。落後的地區於19世紀或更早時期即受到先進國家無孔不入的殖民侵略，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乃至於文化體系都被宗主國掠奪。那些本來各方面都是自給自足的（非資本主義的）地區成為殖民地之後，將本有的經濟、政治、社會甚至文化模式都變成依從宗主國的標準來重新組織其制度及文化模式。

雖然那些被界定為「落後」的地方，大部份在20世紀二次大戰後都於政治上紛紛獨立，但卻不能擺脫以西方先進國家發展為進步標準的意識型態，無論在國家建設、文化繁衍或人民生活素質，皆以「超英趕美」為竭力達到之目標。資本必須不斷擴張及增長，由此，資本主義所衍生的意識型態及價值觀也是以（生產）科技的進步及發展、經濟的擴張及增長為正面價值取向。世界上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將這種價值觀奉為圭臬。到了今時今日，「進步」仍是橫行無阻的普世價值觀。向這價值觀提出異議的人們，在世界各地都被視為破壞穩定的、與主流思想對抗的反對份子。

總括而言，地理空間之劃分過程，正表現出資本主義在地球表面運行的歷史。並且，資本正在無可避免地膨脹及擴張，成為一種不斷使世界改革的力量，也同時不斷改變我們對世界的強弱二分的觀點：

- 宗主國／殖民地之二分（19世紀）
- 先進國／落後地區之二分（19至20世紀）
- 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之二分（20世紀）
- 全球城市／非全球城市（20世紀末開始）
- 在城市空間內：城市中心與邊沿地區之二分

世界除了有中心及邊緣、先進及落後的地區劃分，Harvey更陳述了資產階級如何挪用全世界各處的剩餘資本（surplus）。Harvey指出，首先資產階級並不生產剩餘資源，他們其實是挪用並且控制全世界剩餘資源的一群人。他們之間互相競爭，無遠弗屆，到世界各地去投資那些有潛在生產剩餘資源、卻

還未投入資本生產的環境及地域，將之大肆發展<sup>9</sup>；他們甚至將不同地區的傳統、本土文化歷史都變成可出售的商品，使之轉化成剩餘資源。80年代中國開放以來，各大跨國企業在中國城市重建發展項目（例如商場、超級市場、渡假村等）上的投資，正是最佳例子。再者，旅遊業成為文化工業的最大後盾，衍生出各種文化商品（由有形的城市形象設計、博物館建設、紀念品的生產，到無形的音樂電影藝術節、嘉年華會）的生產、出售，其背後目的，正正就是為資本的運籌不斷累積剩餘資源。

資產階級不單挪用其所屬國家的剩餘資源，並且更不擇手段地挪用並控制別國的資源。自19世紀殖民地勢力不斷擴張，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為要掠奪弱國的剩餘資源，便先摧毀其在地生產模式，然後以本國的出口貨代替：Harvey舉的例子是於19世紀，英國將印度發展得十分成熟的紡織手工業摧毀，好讓英國出口的廉價棉布取而代之。

在《Space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之〈Monopolistic Competition〉<sup>10</sup>一節（2006：99）中，Harvey指出了資本家為了在安全及可計算的情況下得到最大的利益，一定會進行壟斷。直至19世紀，交通及通訊科技尚在發展階段，運輸費極為昂貴，故此致使有財力的資本家進行壟斷。然而現在交通通訊科技發達，資本家為保持壟斷優勢，便透過法律保護所謂的專利及版權。同時，將所有資本的生產及累積運作的組織、管理及控制都集中於某個在競爭上佔特殊優勢的位置空間上。這個空間便是全球化城市。

### 3. 全球化下的世界地理空間結構

在《Space of Hope》名為〈Contemporary Globalisation〉一章節中，Harvey明言，全球化這現象，並不是現今當下才發生的現象。「當下的」

(Contemporary) 的全球化現象，根據Harvey之描述，是自1492年（或以前）已開始，當時貿易及商業活動已開始國際化。只不過正如上述，在不同歷史時段，人們以不同名稱去界定種種跨國活動。

資本主義一旦開始啟動，便依照本身增長累積所需的空間為藍圖，不斷地對世界的空間組織進行建構以及再建構。它構造了特定的地理面貌，在其中產生了交通運輸及資訊系統，基礎建設及空間界域的組織，這一切都是以配合及促進資本累積為目的。全球化的地理組織，根本就是一個世界性的資本運作系統，亦即一個資本的地理空間組織的體現。

概括而言，西方世界由19世紀開始，因著生產及運輸等科技機器的發展及進步，促使原料、能源、商品、資訊、生產力等，在地球上以最快速及最低廉的方法，從生產地到市場運行著。同時，因著這種高速的流動，新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以致新的（偏遠的）市場也在不停的開發。科技開發的目的，就是要不斷增加商品的流通量及交換頻率，也同時減低了人力、商品、資訊在運輸交流途中滯留的時間。Harvey視高速的流動為「時間空間的壓縮」。

資本的全球化累積與流通及擴張越來越激烈，加上高速流通及累積，除了在前一節「不平均地理發展理論」內展述的在歷史過程中出現之地理空間劃分之外，今時今日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運作，也重組了整個世界的空間類型，構成了不同的空間區域。這些空間區域包含由世界到個人身軀所佔的空間，由廣至狹，建成不同層次的範圍層級（scale），好讓資本在其中依著其自身的速度暢行無阻（Harvey, 2006：104）。

- 全球範圍
- 洲際範圍／地區範圍
- 國際範圍
- 本國範圍

- 本土範圍
- 城市範圍
- 本區範圍
- 個人身體範圍

所有的空間範圍之特質、內容及估計的價值，都在資本流動的運作中被界定。同時，各個範圍之劃分組合往往都是為了符合資本累積的要求，由此，它們的內容及造型也持續不斷改變及重組。例如，因著後工業經濟模式的出現，現代都市重建多被「仕紳化」（gentrification）的規畫方向所控制。

在以上的章節內，我們嘗試簡述了資本累積在全球的地理空間的運籌、膨脹、全面佔據及控制。Harvey更深化地提出，資本主義在全球地理空間累積過程中，構成了各種性質、層次不同的空間結構及空間結構群。在《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及《Space of Hope》中，Harvey重覆提出了地理空間上不同層級的界域範圍，實際上是依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範圍大小而分類。

所有的範圍都在資本流動及累積的運作過程中被界定其特質、內容，甚至人們在其中的活動的形式樣態，它們的形成皆是要配合資本累積的要求。除了資本累積制定了上述的空間界域範圍，Harvey強調資本累積過程中，也產生了各個地域之間的強弱懸殊。他先用較傳統的殖民帝國主義理論來詮釋這空間上懸殊的發展，以及衍生的控制者與被控制者之間的矛盾關係。於19世紀的歐洲，先進國家推行的資本主義，藉著政治、科技軍事力量的支持，將落後地方吞併為殖民地。到了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則因著金融全球化的運籌，將地理空間分界為經濟上分強弱的空間——全球化／非全球化城市。

地理空間不斷變換其形態，以適應資本累積的過程中，資本在某一地理空

間（例如城市）中密集或膨脹，更擴散至偏遠的資源／原料收集區並開發「新興市場」。同時，不斷開發的交通／資訊網絡更助長及促成了上述的資本累積形態。上一節所述的空間範圍，並不是靜態的空間地域劃分；各個空間範圍覆蓋地域，其相對重要性及相互之間的關係，都在不斷改變。

Harvey稱，「空間範圍」的生產是不平均地理空間發展的主要現象，除了有經濟強弱懸殊性的分別外，資本還嚴重地改變了各個地理本土空間中傳統細緻特質的歧異（the production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他亦追本溯源指出人類在地球表面住居，沿著悠悠的歷史長河而滋長出不同的「風土人情」，即是生活方式、生活素質之標準、運用自然資源的方法以及人與生存／生活環境之間的關係，及由此背景而孕育出不同的文化政治形式等等。但是，一旦資本開始對一個地方投資，該地方的本土特質便會逐漸改變，甚至被摧毀。尤其是現時世界越來越全球化，資本主義為被投資地所帶來的改變就更是快速且深層。Harvey更直接指出，被投資的空間所經受的直接改變，總括來說，就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在這裡，我們可舉澳門為一個明顯案例來作詮釋。澳門自16世紀開埠以來，乃是一個寧靜的漁港，後逐漸發展為一個旅遊小鎮，1999年葡國將澳門歸還中國之前主要是依賴博弈業為主要收入，而市內的葡國殖民地建築及中國漁港亦於2005年獲承認為世界遺產。然而，自從2001年賭牌於國際開放競投後，澳門便出現了巨大的改變；外資不斷湧入，興建一間比一間大的賭場，大量勞工也從澳門周圍地方湧入。各方的投資為了維持及保證其投資能更快速地得到回報，一方面將市中心地區劃為舊城區，進行保育以利旅遊業；另一方面卻徹底改革舊城以外的空間結構及內容，以增加其在房地產市場上的價值。

澳門的例子正正說明了資本大舉進入對當地本土日常生活文化的徹底破壞。澳門作為一個寧靜小鎮的社會文化面貌已全失，古蹟的外殼之所以不被破

壞重建，乃是因為那是吸引旅客的景點。在賭博／旅遊業的脈絡中，各路資本亦激烈角力；資本累積過程使得空間及建築物等硬體也成為如同股市一般具高流動性的資本。土地發展商與各跨國博彩集團同時進駐澳門，經營賭業的公司不單在賭檯上掙取金錢，同時上市發行賭業股票；更大量發展房地產業，將「地皮」、「房屋」換算為地產價格及租金，並上市發行股票。

澳門在金融海嘯之前，市面一片繁榮，然而，根據BBC中文網2007年12月31日之報導，澳門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1998年至1999年，澳門堅尼系數為0.43；2002年至2003年，堅尼系數為0.45；到2006年則升至0.48。

BBC中文網對金融海嘯前的澳門的評論，與Harvey闡述資本主義對被投資土地之本土經濟社會及文化所帶來的負面改變不謀而合：

澳門繁榮風光的背後卻並非人人受惠，部分企業正面對人力資源緊張、租金不斷攀升等問題，然而，那些遠離賭業賭場的傳統旅遊景點，卻因遊客流失而一片蕭條。有澳門學者認為，從微觀行為的制度約束來看，貧困是由於個人行為能力被剝奪和生存機會喪失的直接結果；而從宏觀行為的制度約束來看，貧困是由於政府未能有效建立一個公平分配制度導致資源分配不公的直接結果，或者是人民未能有效約束政府的結果。

在新經濟強勁增長下，舊制度的缺陷制約了個人能力發揮，形成新經濟與舊制度的不協調，貧富差距擴大就是新經濟增長強勁，個人能力追不上，而制度殘舊不變交織下的結果。

## 從現代化到全球化，從烏托邦到社區： 城市建造及都市經驗的批判

Michel de Certeau 在〈Walking in the City〉（1984）一文認為在高處鳥瞰城市，只能獲得一個抽象的觀念，Certeau 倡議，要走進街道去獲得對城市的具體、真正認識。然而，在《The Urban Experience》<sup>11</sup>（1989）的導論中，Harvey 徹底地反對 Michel de Certeau 這個觀念，認為必須對城市也要作為一個整體去了解。他明言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制高點去理解都市運作／發展的過程及歷史；雖然日常生活的都市經驗十分重要，但也必須從不同角度去對城市進行整體的了解。Harvey 進一步認為，我們需要有一個清晰的理論架構去理解城市，因為理論能提供一幅「認知地圖」，好讓我們去尋得一個方法理解那複雜並持續地在改變的環境。

Harvey 所採取的理論立場，當然是馬克思主義。Harvey 在肯定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更肯定了馬克思本身理論工作的價值，他認為馬克思本人，正正是透過專注於寫作、分析，從事理論工作來參與社會，也即是以嚴謹的方法去理解、批判社會，以揭示種種運行中的「意識型態」，這正是積極參與社會的途徑。

Harvey 認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十分清晰：馬克思主義界定了資本主義的「革命性」的力量，乃在於不斷在重構、重組城市。

從馬克思理論的脈絡，我們可清晰地理解到資本主義城市化的整體過程。Harvey 也明言，他書寫《The Urban Experience》一書的目的，主要有兩個：（1）資本如何（在地理空間）進行「都市化」；（2）都市化之後果為何？自 19 世紀開始，工業生產愈漸發達，古舊的城市（如巴黎）被逼重建以適應新的經濟政治環境，而工業城市（如英國的伯明罕、利物浦等）也相繼興起。這

些工業城市的規畫方針就是徹底地以工業生產過程所建構的時空系統為原則；其中，城市的面貌、建築物的設計、社會秩序與生活經驗之組織及管理，全部都順隨著人力資源的再生產、工業生產地的設定、人流和物流的通順度來決定。總括來說，資本的生產及累積與都市化的形成／產生是一脈相承的。

更普遍地說，自工業化以來，所謂都市化的過程，亦即是人力資源、商品、資本、交通網絡及資訊系統生產、成長及膨脹過程所依存（並且製造／生產）的空間組織（亦即城市）生產、成長、膨脹過程。在城市中，由整體規畫、基礎建設規畫到建築物設計的最終目的，皆是為了容許資本的生產、交換、分配及消費的過程順利運行。人們在這資本主義運籌而產生的城市空間中生活了幾百年，逐漸也習慣下來，城市因而成為「第二自然」。

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現代化城市會以「功能理性」將空間以其內容及性質分區分層級；城市中不同性質的空間，大約有以下7種：

- 市中心或城市內層（innercity）
- 工業生產空間
- 商品市場空間
- 大企業辦事處聚集地
- 衛星城市
- 市郊（中產）住宅區
- 渡假、休閒、娛樂區

這等不同性質的空間，皆以資本主義的邏輯，聚合形成一「理性的地境」：亦即城市。其間，一方面由於資本生產的時間空間劃分關係，另一方面也基於功能理性所頒布的邏輯，進而分割各不同區域，並且以功能性的拓撲學關係彼此連繫。人們在不同區分空間中工作、休息、休閒的時間程序，以及人們與物品所依存的交通運輸網絡及資訊流動運籌的時刻表，皆以資本主義的生



產模式及累積模式的速度及節奏為依歸。

除此觀察分析將城市空間的內容及特質劃分為7種不同區分外，Harvey更以金錢、時間、空間三個概念去詮釋城市的本質及運作邏輯：

### ■ 金錢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根本上是萬能的；依Harvey所言，金錢不單只是商品交換的中介物，更是改變及確定城市內的時間、空間、社會生活方式之意義的主要決定因素，同時也是都市化過程及形式的決定因素。Harvey更進一步認為，整體城市的人際社會關係及價值取向，都被金錢所統領。他指出，金錢是具體的，因為一旦有錢就能換取相應價值的物質、社會資本（關係、地位）及權力；但金錢也同時是抽象的，因為它終究是一種便利交易的代幣（token）。然而，在交易過程中，金錢卻會因著各種理由增加或減低其價值。現代社會一切的交易都以金錢為依歸，因此，它在所有人身上皆彰顯著極大的權力。

Harvey依循了社會學家Simmel的分析，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實就是錢財所構成的關係。眾所周知，在城市中，人們的關係是很疏離的，這是因為人只要有錢就能買到各種服務，例如醫療、住屋、護衛、教育、娛樂……等。在城市中，人並不需要所謂鄰舍之間的守望相助，也不需要受到其他人在倫理上的制約。並且，人越來越個體化，Harvey也以金錢的差距來界定階級的分別：階級關係就在金錢賺取的過程上經驗得到。若從現代個體主義的思維上考慮，金錢賦予人的獨立性亦可以被視為個人自由的彰顯。

### ■ 時間

時間的現代概念，基本上就是金錢的流動運籌過程的量度單位。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城市中，以金錢作為工作的報酬，即以時間作為單位，計算工資。

因此，人們的生活節奏，都是以金錢的賺取為基調。人們的生活，首先是以工作為主要內容，工作佔人生最大部份，故其他事情（吃飽、休息、運動等等）目的也是為了持續工作能力而做。在工作中，老闆對時間的理解，就是為要賺取更多金錢而安排：例如老闆要求員工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工作。工作以外擁有的休閒時間，一方面鍛練身心可以持續工作外，另一方面是要參與娛樂休閒工業（leisure industry）。

所謂娛樂，是要人們消耗著以工作時間賺取回來的金錢，同時消耗他／她們的餘閒時間。大眾傳媒與娛樂、休閒工業，其實是資本主義以人們的生活作為剝削對象：大眾傳媒及娛樂休閒工業計算人們的生活，規畫著人們的作息時間表，把各式各樣的消費模式塞進人們的生活中。

## ■ 空間

眾所周知，當整個世界都達成當下全球化的運行面貌，城市的空間更作了相配合的轉變。因著全球交通資訊網絡的發達與高速發展，導致全球融合成為一個密集相連的網絡，同時，城市規畫及設計專業，也將城市設計為一個複雜的生產系統，使資本的流通、生長及膨脹過程更為快捷及暢順。在各個先進的城市中，大小企業為求達到最有效率的資本賺取、累積，會集中在資源最豐裕的市中心區開設辦公室，因為市中心區是整個城市剩餘資本（人力資源、國內外投資技術知識、商品各種資訊交通網絡等等）吸納、集中，同時也是輻射發散、重組的中心。

由於目前全球化的關係，國際資金的流動極高速，因而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爭極大。為了吸引國內外的投資，城市要強化形象，同時也要變成商品、吸引消費；由於資源大量投放在市中心，排斥邊緣地區，因而產生社會分隔（social segregation）的現象：這是目前先進城市的發展方向。香港、上海可以說是此一現象的最佳例子。

Harvey明言，城市中的社會空間，是從階級分層的過程中生產出來，因此社會空間的劃分／分隔同時顯示了階級之間的相連關係及衝突矛盾。城市，不單只要吸引外地投資的資本，同時更要吸引消費者。Harvey的分析，將消費模式及市場依照著階級分作3種：即工人市場（生活必需品市場）、中產階級市場（商品市場、消費品市場）及資本家市場（資源、生產力的市場），這3種市場的空間設計各有其自身的特質及特有的觸覺（sensitivity）。

以上所述，是Harvey在《The Urban Experience》內對城市及都市化，在理論層面的分析與詮釋性介紹；在其他的著作中，亦曾經對兩個城市（巴黎、巴爾的摩）作深入的分析。Harvey的城市分析，其實帶有一系列理論驗證的目的。其對巴黎的分析，基本上是把馬克思對資本運行的分析，應用在巴黎在19世紀中葉，由重建而致興盛的這段歷史過程作平衡對應的解釋。

有識之士經歷了由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現代化城市所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以及生活素質嚴重下滑，於是提出了烏托邦式的對城市的構想。她／他們對資本主義的都市時空建構提出了空間組織、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美感經驗上的批判，也企圖提出「另類」（alternative）的理想性構想。現代主義式的烏托邦主義者，往往著眼於整個城市各種功能的和諧配合；而帶有後現代主義立場的烏托邦，則著重於在城市空間重建／重現人文文化、美感經驗。然而，Harvey對現代主義烏托邦主義（功能社會構想）及後現代主義（文化、美感經驗）都細緻地作出批判。

Harvey以馬克思的理論，批判、揭示了巴黎城市在特定歷史脈絡中因資本主義興起而需要作的重新規畫及組織，同時，也因著這改變，Harvey看到資本主義在實際地理空間中的累積、成長及膨脹所造成的實際後果。

Harvey也同時對巴爾的摩進行了分析，其目的在於帶出「烏托邦式」的

不同理念對城市的構想。他認為一旦這種理想性的理念落實在城市的規畫中，問題即層出不窮；同時，不同的理念，往往互相矛盾。Harvey就不同的都市理論家提出的烏托邦理念，一一作出分析，並同時勾劃其矛盾點。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以理性標準化功能性為基準的城市規畫作出嚴厲的批判，然而，後現代主義所推崇的品味美感，卻讓資本透過「消費主義」在社會及大眾日常生活中更廣而深地擴張，現今，人們已是無路可逃地接受資本主義的控制。巴爾的摩的市區重建，解釋了烏托邦式超時空的理念對城市空間、經濟及社會的組織作理想性構想的缺陷。這等欠缺實際歷史及地理發展脈絡的理念，終究也只是現代化意識型態的表象。Harvey對這兩個城市的分析，使我們理解到Harvey的歷史—地理學理論所能涵蓋在理論上的分析廣闊幅度。現就Harvey對巴黎及巴爾的摩的分析作分段陳述：

### ■ 現代城市成形——巴黎

Harvey在2005年出版了《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這本書（中譯本於2007年出版），其目的正正將資本主義的空間運籌放在歷史中去驗證其巨大的能動性，以及「毀滅的創造性」。巴黎發展成為19世紀現代化進程之要塞的歷史，完全體現了資本為累積而產生的空間定位、成長與膨脹。此書中，Harvey一再闡明他著書立說的目的：以卡爾·休斯克（Carl Shroke）的世紀末的維也納（Fin-de-Siècle Vienna）（2005：34）作為範本，研究巴黎在19世紀的演變。他的目的是整體地去理解在這特定的經濟政治時空下，巴黎的演變及其背後之動力。在此書的第一章，Harvey分析巴爾扎克文學作品中對巴黎整體表象的描述，這其實是將自己在歷史地理學的工作和偉大的巴爾扎克文學作品平排相比。早在《The Urban Experience》中，Harvey已提及巴爾扎克：他界定狄更斯及巴爾扎克乃是19世紀「史詩式」的小說家。這些著名小說家的作品往往是透過描繪金錢的運轉而在人倫中產生關係、矛盾與衝突，進而勾劃出對城市生活的整體視域（totalizing vision）。

Harvey，將巴爾札克的小說片段收納在各主題（見右頁之列表）中討論，就這些片段作為佐証，以展示巴黎的藍圖、解剖及整體展示，由此為自己以歷史地理學理論為視點的巴黎分析作為前奏。Harvey以極社會性的視點分析巴爾札克的小說：「19世紀初，巴黎表面上看來混亂地快速成長，使得城市生活變得難以辨識、解碼與表述。當時幾位小說家努力說服自己接受巴黎的種種變化，他們的實際做法也成了被仔細考察的對象。他們記錄許多在他們身旁流動的物質世界以及社會過程。他們探索各種表述世界的方式，並且協助形成關於城市是甚麼以及城市可能成為甚麼的獨特想像。藉由召喚出與社會形式、制度及習慣相關的人類欲望表現，他們偶爾會以道德教化或間接的方式，來思考其他選擇或可能，如歐仁·蘇（Eugene Sue）在他的著名小說《巴黎的秘密》（*Les Mysteres de Paris*）中所做的一樣。他們解碼巴黎，使其能為人所閱讀，並且提供各種方式來捕捉、表述與塑造表面上看起來才剛開始發展、且經常處於斷裂的都市變遷過程。」（2007：42）。

這一段對巴爾札克作品總體主旨的陳述，其實也是Harvey自己著書的動機。他並更進一步，將巴爾札克作品完全套入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脈絡的歷史地理學理論去理解：

「巴爾札克作品使人能更清楚地了解（甚至是接受，不管是在無意之間還是勉強接受）現代都市生活背後的政治經濟學，並且這種政治經濟學為第二帝國巴黎的系統性轉變塑造出想像的前提。我將說明，巴爾札克最大的成就，在於他細緻地解開並表述了隨時隨地充滿於資產階級社會子宮中的社會力量。巴爾札克去除了巴黎的神秘面紗，同時也去除了覆蓋在巴黎之上的現代性神話，因此而開啟了新視野，這些新視野不只表現在『巴黎是甚麼』，也表現在『巴黎能成為甚麼』。透過巴爾札克的作品，巴黎的辯證過程與現代巴黎如何構成便赤裸裸地展現出來。」（2007：43）。

Harvey將巴爾札克作品的不同片段，歸納到下列各主題，以作為對巴黎演變的初步詮釋：

- 巴爾札克的烏托邦主義
- 巴黎及其外省：城市中的鄉村——地理空間的階級分割
- (巴黎的) 湍流——人的階級分割
- 地獄及其道德秩序
- 論空間模式與道德秩序
- 街道、大道與景觀的公共空間
- 內部空間及對親密關係的恐懼
- 時間的廢止
- 巴爾札克整體觀點
- 希望是欲望的記憶

綜觀這10個主題，基本上是Harvey對城市的結構及其演變所訂定的基本脈絡。他以巴爾札克的作品對巴黎的表述作整體分析後，遂開始對1848年至1870年的巴黎展開龐大整全的討論。

Harvey以巴爾札克的作品作為前奏，顯示了他的野心。他企圖分析都市經濟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找尋城市的整體感，重組第二帝國巴黎的形成過程。Harvey明確表明自己的思維乃是「建構性思維」。他定言此書乃是一「綜合性作品」（2007：35）。在此書中，Harvey以法國第二帝國（Second Empire）的政治歷史為經、資本主義的運籌為緯來分析之於巴黎，除針對「現代性」世界觀如何演化生成，如何重新規畫、組織其物質環境，聚集而成一個「都市」之外，同時也討論新的社會／階級關係，及衍生的不同階級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如何成形。

於19世紀中葉，巴黎遭遇到種種經濟政治危機，也就是資本累積過程中

所遭遇的危機。在Harvey的分析中我們可理解到資本主義所遭遇、陷入的危機，正是資本累積自身所建立的危機。這些危機，卻原本是資本得以更加膨脹的原動力。（Soja, 1989：157）。

城市的重建、交通資訊科技的發展及網絡的擴張，皆是因應資本主義需要擴張或解決而得以成就。

Harvey對1848年在巴黎發生的政治暴亂事件有很深入的描寫，並且以此年為對巴黎的發展作為一個開始點，他認為，「1848年標誌著一個思想與政治上的分水嶺」（2007：32）。根據Harvey的分析，資本主義到了1848年，已經成長到在整體政治、社會乃至於空間地理的重大重整，具有關鍵意義的位置上。

於1848年，在法國許多飢餓、失業的人們湧進巴黎尋找生計，因此產生很多問題。在巴黎，到處都有罷工、街頭示威及陰謀暴亂（2007：21），於同年發生的暴亂革命中，群眾甚至攻入杜伊勒里王宮，進行劫掠。路易·拿破崙在1848年當選總統後就開始進行都市更新計畫。他宣佈：「我們將開闢新的道路，並且改善人口密集區空氣和光線缺乏的問題，我們要讓陽光照射到全城每個角落，正如真理之光啟迪我們的心智一般。」（2007：122）。

奧斯曼於1853年6月被任命開始規畫新巴黎的景觀。Harvey對19世紀中葉的分析，正是從現代巴黎的締造者：奧斯曼（Haussmann）對巴黎所設計及規畫及其後果作出最細緻的分析及批判。

奧斯曼的規畫使巴黎成為整個法國的商業經濟中心。據Harvey的闡述，奧斯曼希望巴黎能擺脫工業基礎與工人階級，到了1870年，巴黎市中心已幾乎看不到工廠，而大部分工人也被迫遷離市中心（2007：165）。奧斯曼更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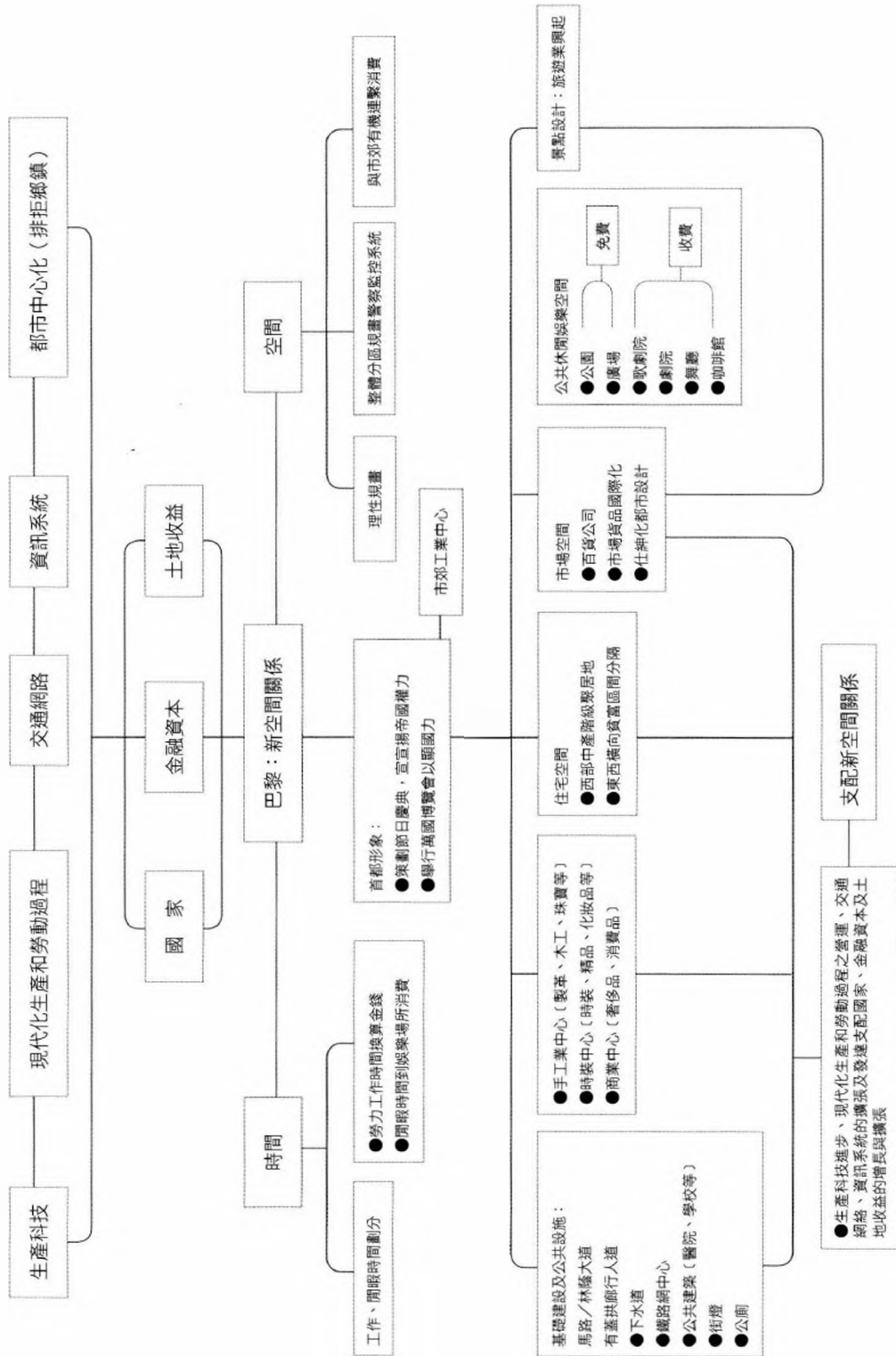
力使巴黎成為法國國家形象的代表，使這座城市「成為歐洲文明的帶領者」，以宣揚帝國權力。Harvey在他的分析中，指出巴黎不單成了彰顯帝國華麗的景觀，更「直接讚頌現代的誕生」。於1855年及以後舉辦的萬國博覽會，讓巴黎正式成為「商品拜物教的朝聖之地」，以及「資本主義文化」的最高展示場。巴黎經過重建之後，消費及娛樂場所不斷出現：百貨公司、咖啡館、餐館、音樂廳、劇院、馬戲團等等，由此林蔭大道成為了一個戲劇性的空間，展示富裕、宣揚消費，並敦促婦女們追趕潮流不斷消費。巴黎市民都湧到大道上，商店的櫥窗展示了各種引起人貪慾的商品，公園與廣場也成了社交及休閒的地方。

Harvey引用左拉小說《有關貴婦們的幸福》（*An Bonheur des Dames*）的一段，來述說現代百貨公司對平民大眾，尤其是婦女的引誘：「當婦女在公共空間展示她們的潮流衣著時，不自覺地成為了這消費景觀／商品展覽場的一個環節，成為『景觀的負擔者』」（2007：236）。奧斯曼在規畫重建巴黎之同時，也以新的「共同體」（community）概念來活化巴黎。如今巴黎的中產階級，成為以金錢為價值依歸的共同體。中產階級空間就是上述那些華麗的大道、百貨公司、咖啡廳、音樂廳、劇院，以及「商品拜物教的盛大慶典」：萬國博覽會。

貧窮的工人因著租金差距情況而被迫從富裕的地區（西區）遷離，他們就算住在富裕地區，也只不過是住在多層大廈頂部狹窄的「住家女工房間」（*Chambre de Bonne*），「垂直」的空間區隔，慢慢變成區與區之間貧富懸殊的空間展現：「資產階級的西區」及「工人階級的東區」。

現在將Harvey所描述的 Haussmann 對巴黎的規畫與設計列表，如下頁表格所示：





Harvey在本書末章指出，「他試圖說明經濟、社會組織、政治與文化上的複雜模式，這些模式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巴黎的面貌」（2007：308）。

上列之簡明圖表，讓我們得以整體地理解，在資本主義的資金／資源流動運作過程中，空間有效地適應、並由此形成的城市面貌。這個面貌雖以19世紀之巴黎作為藍圖而勾劃，但竟然和當下21世紀所謂後現代的都市高度相似。

### ■ 後現代城市——巴爾的摩

在《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Space of Hope》及《Space of Capital: Critical Geography》裡，Harvey重覆分析了巴爾的摩。其中，Harvey所描繪的（60年代末）的巴爾的摩是一團糟的：市中心大樓空置率高，同時流浪漢、失業人士及在職貧窮者人數眾多。據Harvey所言，當時的巴爾的摩的市中心，罪案頻生，毫不安全，投資絕無效益可言。漸漸地，較富裕階層的人們離棄市中心，在近郊地區建造較安全的住宅區及生活環境，由此，整個城市就分裂為二：市中心越漸頹敗，而市郊則變成一個資產階級的烏托邦。

為了重新振興市中心及改變城市的形象，自1970年代開始，巴爾的摩市政府和私人發展商聯手投資重建「內港區」（Inner Harbour），其發展規畫是將休閒及旅遊活動聚焦在港口。此一重建的目的，就是為了將旅遊業、酒店餐飲業、金融服務業及其他服務性行業從新在市中心發展。根據Harvey所言，這項發展在政府及商業角度而言，可說非常成功，不僅挽救了瀕臨破產的城市經濟，並且將城市的面貌從一個貧民區轉化為生氣勃勃、處處皆是商機及就業機會的旅遊商業區。但是，過度的商業發展、過度側重於視城市為旅遊景點而作開發，導致本土文化的消失，也因而毀滅了本土社區的素質、本土鄰里之間的社會連繫，以及本土傳統節慶之承存，這是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給城市文化上帶來的毀滅性後果<sup>12</sup>。巴爾的摩的例子，正是城市仕紳化的經典例子。Neil Smith清楚地指出，經濟生產方式的改變，必然導致建築空間的性質及用途之

改變（1986：21）。世界先進地區的演變，正是從工業生產模式轉移到後工業全球化生產模式。城市內與工業生產有關的建築及地區往往因此而出現高空置率。這會自然地導致房地產價下降。公營及私營機構合作將城市衰敗的地方重建，以重新提升土地之價值及引入投資資金，這就是仕紳化的背後基本原則。Neil Smith明確地說明，城市空間的重新規畫建構正是現今資本主義經濟的演變之其中重要環節（1986：33）。

Beauregard認為仕紳化的特質就是以「仕紳」的高尚生活方式所依存的空間為藍圖去重建都市（Neil Smith, 1986：36）。現代的仕紳，即指高收入的專業人士、高級行政管理人員、藝術家、文化界或從事文化藝術商業的人們。她／他們應是相對富裕、沒有家庭負擔及休閒消費的人們。仕紳化式的新建就是依照這類人推崇的生活環境來改變城市的空間。Harvey稱此為「雅痞式的烏托邦」（Yuppies Utopia）：為要顯示重建地區有文化有品味，必要保存／保育一兩間有歷史價值的舊建築，將之改裝成博物館、高級餐廳、酒吧、時裝店、藝術畫廊、精品店等，與此同時在周圍建造商合青年才俊入住的高級新穎豪宅。

然而，重建過程首要第一個任務，就是將本來居於此區的低收入群眾搬離，然後將空出來的地方重建成上述的休閒／消費的商業區、高品味高級住宅區。重建後地區住宅的租金無可避免地大量提升，而本來住在重建區的低收入人士，當然被排斥於重建區外。她／他們雖然在此區可找到工作，但往往是低技術、低薪的臨時工作。Harvey很肯定地說，重建根本無助於改善草根階層的貧窮狀況。

仕紳化的重建根本是使得城市明顯地展示貧富懸殊。Harvey說明，一向中產階級所佔用的住宅建築，皆是自成一國、警衛森嚴，將不合資格居住於此的人們拒之於外。例如位置在市郊的中產階級屋苑，就是一個「私人的烏

托邦」(privatopia)；而位於市區中心的，就是一個「厚牆保護下的社區」(gated community)。無論如何，貧窮的人們都是被排斥於中產階級的生活空間，只能聚居於都市的邊緣。無論世界自稱如何進步，城市卻永恆保持著分裂、資源不平均分配，與空間不平均發展的狀態。

Harvey指出，19世紀時期恩格斯說過的一句話，竟是一針見血地揭示現今世界的不平等：「資產階級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採取眼不見為淨的方法，或盡可能讓問題隱形，或將問題從一處移到另一處去。」

## 資本主義對身體空間的營構與監控

在《Space of Hope》中Harvey指出，對身體的詮釋，乃是其空間理論中最末稍的環節。他的論點，整體上是揉合了馬克思與傅柯的理論建構而成。Harvey首先借用了希臘哲學家 Protagorus的名句「人是所有事物的度量標準」，來開始討論人在世上最直接佔有的空間：身體。

人的身體並不單純是一個生物性的結構，Harvey形容身體為一個「未完成的計畫」，因為身體與其所處周遭的時空環境：自然、（其身處歷史時代之）科技、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是融滙在一起，互相影響、互相延續，並且互相塑造的。每個人的身體自出生，就開始被外界整體大環境所馴化。

人的身體會受到種種的社會、文化機制所控制。自有文明以來，人作為生物的身體就一直受到文化符號系統的控制及訓練；而人也天生有著運用符號的能力，身體內儲聚的欲力也會在內化的符號系統中彰顯出來。Harvey舉例說明，人們身穿的衣服裝飾及其在不同場合所表現的姿勢，皆是人類文明的具體化表達；人類的文明及其傳統將人的身體（及其欲力）馴化、教化，使其在某

文化符號系統內作出適當的配合及運作。人的身體受到教化，對文化及社會的不同機制及層級分別（例如民族、階級、性別、年齡等等）作出「循規蹈矩」之相應的行動。由此觀之，人之所以為「所有事物的度量標準」，是因為人的身體（及其欲力）首先受到文化的馴化及薰陶，符合了內化了人類有史以來所積累而成形的文明對外在世界的理解及判斷的標準，也由此成為所有事物的度量標準。

現代人身處的環境，乃是資本主義所模構而成，人的身體由始至終都要配合資本主義而活下去。現時的社會與文化建制脈絡，統統要受制及衍生於資本的運作、累積及生產過程。

幼年時人所受的教育，很大程度是訓練身體去學習不同技巧及活動方式，好配合、適應以後要從事的生產過程。人成年後參與種種的生產活動，其身體皆要與各種生產機器（由挖泥機、汽車到電腦）配合並操作。在生產活動中，人的身體乃是作為一個參與勞動的身體（*laboring body*）而存在。在工作的過程中，除了意識要集中之外，身體的姿勢及動作，活動的節奏及速度等，必定要與生產機器配合。身體的作息時間也不例外，受著工作機構的流程而被規畫。意識及身體，也直接受到不同層級的監控。

身體無可避免地溶在資本主義的架構中存在。Harvey很清楚地指出，資本主義對身體作出層級之分別、或被賦予的價值，就是正面的、能從事生產，以及與之相反的，負面的、不能從事生產的身體。資本主義甚至排斥某類型的身體於其系統之外：長期病患、殘缺、精神「不正常」以及年老，皆是資本生產過程中不能起作用的身體，因此，她／他們必定被排斥於資本主義之外，也就是社會之外。

當人下了班，離開工作崗位，資本主義又展開了對人的第二重更深層的控

制<sup>13</sup>：那就是消費主義對人的餘暇時間的規畫。透過大眾媒介廣告不斷宣傳，人們於是將身體休息的需求轉變為種種休閒娛樂活動。消費主義最厲害的招數就是直接將人的需要——亦即是說，將人基本生理、心理（性、成長）的欲求，更高層次的社會關係的位置，甚至性別自我身份的追尋，都將之物質符號化，將之內置在符號化了的物質的消費活動中。人於是產生了信念，以為從事消費活動，將消費品（即代表了欲望的符號）挪用，便以為欲望得到滿足。

### 結論：「革命必須是都市的！」

透過Harvey的主要／重要著作，我們可發覺他的取徑乃是將焦點集中於資本主義在地理空間上所展現的歷史進程，並且由此而給予地理空間造型的經過，也同時探求此地理空間「成型」或「變型」的規律。Harvey的立場，是以歷史的展現作為其對地理空間批判審視的過程。

在其著作中，Harvey細緻而且精確地描繪了自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開始全面控制世界的情況及演變。然而，Harvey明言，與此同時，反資本主義的思想，也此起彼落：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來有很多烏托邦主義者，紛紛提出各種城市規畫設計藍圖，實行以一穩定不變且理想的空間造型，來改善／規範種種社會上的問題和不公平現象。烏托邦主義者都認為「城邦」是一件可以有效地建設、營運、控制、改造的「東西」，也因為如此，只要完善地規畫建構某種不變的空間秩序，其他問題便迎刃而解。Harvey略提到，這類烏托邦主義者的中，代表現代主義的有Le Corbusier、代表反現代主義的有Jane Jacobs等人（2000：164）。

帶有烏托邦味道的現代主義城市規畫，遭受到很多都市理論家的猛烈批評，她／他們認為這種理想空間規畫背後其實完全受到資本主義操控，充滿著

權力對社會的控制、監視，並且壓制邊緣社群。然而，Harvey平心而論地指出，現代都市規畫是無可置疑地整體改善了前現代古舊城市的生活環境素質，例如能量（電、燃料等）的供應、房屋、廢物排汙、基礎建設、空氣品質等等。同時，都市空間也重新被釋放出來，如此新的一輪的資本累積的模式也就能因著這時機而出現（1996：406）。

或許是身處於後現代歷史時空的原因，Harvey對那些帶著懷舊意向的烏托邦式的思想卻較嚴厲地批判。在《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sup>14</sup>裡，Harvey很細緻地分析了另一種烏托邦式的思想：即社群主義。自從資本主義發展至全球化，便出現社群主義來對抗資本主義。反資本主義者企圖重新以鄉鎮村落式、人情味濃厚的社區（community）群體型態，來對抗經濟資本自動高速運籌而產生對人倫社會文化的種種威脅，甚至滅絕。但是，Harvey認為，這種以鄰舍之情為本的社群精神大多是「迷思」，並分別以兩個方向對社群精神的迷思進行批判：

### ■ 富人們的「都市鄉村」（urban village）

富人們或甚至很多學者（Harvey舉了英國查理斯王子、著名都市空間理論學者Charles Jencks及Peter Hall為例），都夢想將城市分區成為一個個「村落」，她／他們幻想懷舊溫馨的環境出現：即是低密度歷史建築空間、碎石子路、路旁咖啡室，以個體戶形式經營的特色小店，如設計品專賣店、時裝店、藝術作品、小型餐廳等等。人們悠閒地、彬彬有禮地享受著這消毒了的、沒有罪案暴力的「小鎮風情」空間，並且界定一切在消費過程中產生之「容易的愉悅」（facile pleasure）為品味美感經驗。

在對Jane Jacobs的批判中，Harvey明言Jacobs構想的都市模樣同樣是個烏托邦，實際上和她所反對批評的現代烏托邦別無異處。Jane Jacobs在她的構想中，強調多元化的城市生活。但底子里，這只是一種被監控的多元化。他認

為，Jane Jacobs的烏托邦，真正體現在那些為富人所建的「厚牆保護下的社區」（gated community）。

在〈Right to the City〉（2008）一文中，Harvey指出，城市發展方向的主導思維已為私人利益團體所掌握，城市中心發展主題為甲級辦公大樓、豪宅、購物區及旅遊景點全部包攬；就算舊區保育<sup>15</sup>，其目的也只是為了發展旅遊業。同時，現時全球各大城市的重建的規畫與設計，都流行邀請世界著名建築師、設計師操刀，以爭取宣傳效果。如此，城市重建規畫與設計都被政治、經濟精英及專業人士的想法所主導，而真正在城市裡汲汲營營、生活著的平民大眾，卻對自己的居住空間，完全沒有發聲參與的機會。

#### ■ 平民代表們（民間團體）的「民間社區」

作為草根階層代表的「民間團體」（通常是受過高等教育，對社會自認有責任的年輕有志之士所組織），則毫無批判地捍衛破落殘舊的平民住宅區，把一切草根市民的日常行為習慣、居住及活動空間，甚至日用品食品等等都無限量提昇其「文化價值」，吹噓這是「本土文化」，再由大眾傳媒廣泛、大肆宣傳，敦促政府建設大眾文化博物館，供人欣賞、甚至崇拜這等日常用品。由此，民間社群主義的捍衛者，不斷勸喻大家相信，只要藉著社群團結的精神，便可以抗衡資本主義所衍生的個人自利主義以及資本家的貪婪。

在「都市鄉村」及「民間社區」成為主流文化，並且排斥經典文化為「高檔」文化的當下，Harvey清醒的批判，的確十分值得我們深思。他警告我們，如果把「人民」抽象化，或將「社區」或「社區／本土文化」過度神聖化，誤解為一件「物件」（a thing），或自然而然地孕育滋長的「物」，並且企圖將這「物件」（即社區）孤立在全球化的大勢以外，無限上綱地推崇、甚至膜拜，同時排斥不屬於「社區」或「本土」的任何事物（例如西方中古時期音樂或中國宋明山水畫）或思想（例如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嚴謹科學地反省），這



種思維行徑，與所有排他主義甚至乎族群沙文主義，根本完全沒有分別。

無論在香港或臺灣的文化界，甚至本土文化的倡議團體中，Harvey都備受推崇，但是可能大家都沒有細心閱讀Harvey的作品。例如，《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的最後一章〈Possible Urban World〉中確切地提出：一方面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強權，當然阻止了自主性的都市發展，或妨礙某特殊城市界定其本身獨特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烏托邦式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基本上即是建立迷思的社會團體。Harvey認為，社群主義對全球化的反抗是幼稚的，他們幻想本土政治可以孤立起來，街坊鄰里的社區鄰舍感情，被表象為發自內心的精神，並成為動力去團結坊眾，自成一國，可獨立於資本主義經濟作持續發展，更可以藉此來對抗在「區外」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侵略，以及種種的都市病態現象（1996：425）。於此點，烏托邦主義者正正忽略了草根階層本身之形成，實為不平均地理空間的發展而衍生的階級。

再者，Harvey在這本書最後部份〈Prologue〉中，對「公義」（Justice）這概念也有深刻確切的批判。目前，正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反資本主義及環保組織都企圖尋求一個平等、自由的公平理念作為行動的基準，一方面爭取大自然可從人類的侵害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努力為人類社會中受壓迫的人們得以取得公平對待，並可自由地「實現自我」。Harvey對這等理想以一個相對及辯證的立論去討論。他很清楚地指出，公義在現代人類文明中，好像是無可置疑的普世價值，但是「公義」（Justice）這個概念的內容及意涵，就正如資本主義之下所衍生的空間、時間、（人造）地方、自然環境……等概念一樣，總是某特定時空建構的社會構造。人們構造了一套有關「公義」的意涵及語彙，由此而去理解或詮釋社會關係，並對某種權力的建構作出討論、反對或對抗。Harvey認為，一旦此特定內容及意涵的「公義」概念獲得當其時空的社會共認，制成律例（constituted），便會客觀地在這社會中對人們施加控制；同

時，這特定的「公義」律例若落實成為「建制」（institutionalize），則所有相關的社會組織及進程（social process），皆要受到其法律上的監控。

若我們要求討論一個（脫離資本主義所控制的）世界的可能性，我們就必須了解到尋求建構或制度化「公義」之外的另類可能性。

他認為必須要用相對及辯證的思維去審視、討論我們所經驗到的社會進程，然後由此脈絡去尋求「公義」的意涵。並且，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所尋求的目的或理想，是基於特定的自然、社會生態、歷史及地理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目的或理想。在《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的結論中，Harvey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社群主義」及「全球化」的語言，皆是要放棄的語言，我們還可以怎樣做？Harvey一再說明，我們必須建立一個不抽象化「時間—空間」、「地方」和「環境」等概念，並且將它們和具體世界的進程連結起來的視域，作為我們的理論的立足點。

在這一章中，Harvey很明確地要求同時放棄「全球化」及「社群主義」語言。他的立論，即是要成立歷史—地理學的物質主義理論，以「不平均地理空間發展理論」的批判性語言，來掌握那縱向而言經過歷史沉澱累積而成的社會空間，以及橫向而言由不同社會層面不同階級聚合連結而成的當代社會面貌。Harvey肯定地指出，任何反資本主義的運動若想成功，都必須非常集中地從地理學的方向去反省及部署。由此立論出發，無論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發展，或是被過度神話化的社群主義，Harvey都認為是需要批判的。

Harvey所寫〈The Right to the City〉一文，出版於美國2007年金融海嘯之後。從這次經濟災難，Harvey深深體會到城市正在過度發展，然而人民居住環境的素質卻日漸變壞：不僅居住環境本身淪為房地產市場，平民大眾也誤信投資買房子可帶來收益並改善生活素質，卻因此跌進次按借貸的陷阱。總括

Harvey所言，次按風暴使美國整體經濟瀕臨崩潰，也致使約兩百萬人幾乎流離失所。他在這篇文章中說明，歷史發展到現階段，全球人民要展開的鬥爭，乃是反抗金融資本在全球進行的都市化：人們要反擊，首先就要針對在都市重建過程中，資本主義藉著「掠奪式累積」去對都市中最貧窮的一群的剝削，將她／他們已生活了長時間的環境、軟硬兼施地掠奪，作重建發展。再者，人們要反抗的，就是以經濟發展為藉口，替社會上富裕階層將都市空間殖民及私有化的官商。

面對此「掠奪式累積」對都市環境的強權與暴力，人們要做的並不是建起圍欄把世界排拒於外來幻想製造世外桃源，反而是要切切實實地深入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真正了解資本的剩餘價值如何營造城市的發展，由此組織社會運動，爭取對真正民主的都市管治。

在這篇文章的末端，Harvey確認了Lefebvre的一句話：「革命必須是都市的！（Revolution must be urban.）」Harvey認為，這句話在任何層面上，其意義都是正確的。

## 注釋

- 1：《巴黎·現代性之都》，黃煜文譯，台北：群學出版。
- 2：中文譯《後現代性的狀況》。
- 3：《資本的空間》，王志弘等譯，台北：群學出版，2010。
- 4：中文譯《後現代地理學》。
- 5：中文譯《資本的限制》。
- 6：中文譯《希望的空間》。
- 7：中文譯《新帝國主義》，王志弘等譯，台北：群學出版，2008。
- 8：在19世紀殖民地時代先進工業國家將世界各國或各城市依據其經濟科技發達的程度劃分檔次或層級的行動，跟20世紀末英美的都市理論家將世界各城市依其「全球化」程度而將它們排列的舉措，可謂同出一轍。請參閱本書末章：〈從上海到全球化〉之詳細討論。
- 9：請參照前述「空間修補」（spatial fix）一段。
- 10：中文譯《全球資本主義空間》一書之〈壟斷式競爭〉。
- 11：中文譯《都市經驗》。
- 12：見2010年5月12日AKPress訪問錄：David Harvey on Gentrification in Baltimore and Barcelona, <http://www.revolutionbythebook.akpress.org/david-harvey-on-gentrification-in-baltimore-and-barcelona>
- 13：對於消費主義對人們生活的控制及規劃，本書於下一章：〈城市文化——日常生活的發現和完結〉內作了整體的詳細分析。
- 14：中文譯《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
- 15：Harvey說：「將市中心地區重鋪碎石子路正是為了吸引旅客的視線。」

# 城市文化

## ——日常生活的發現和完結

### 日常生活的發現

在上一章中，我們借用了Harvey的理論，宏觀地呈現城市文化的構造脈絡；本章裡，我們進而試圖展開在消費主義的大環境覆蓋之下，人們在現代城市中如何建構日常生活方式的論述。

很多人文科學的學者都會同意「日常生活」，乃是研究人類文明進入現代化時期的主要課題。著名法國社會學家Henri Lefebvre在《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2005）<sup>1</sup>中很精簡地定義了所謂日常：

從前……即是說只不過幾十年前……「日常」這概念乃是用來形容那些構成日復一日的生活或生存的東西……在一個較廣泛的脈絡中，「日常」是指涉整套互相關連起來成為一個整體的「日常」活動：飲食、穿著、睡覺等等，即是所有消費活動。但是，除非社會是完全被消費主義所涵蓋及界定……我們會意識到這些日常的活動並不直接等同於「日常生活」，我們必須注意這些活動的形成脈絡，亦即它們出現並開展的社會關係網絡。（2005：2）

根據Bennett & Watson (2002)所言，在社會學的範圍裡，「日常生活」的研究，最早出現於1920年代，然而於二次大戰後，才漸被公認為社會學的重要研究課題。社會學家大多公認（如David Chaney, 2002：17；Bennett & Watson：2002，x），「日常生活」這概念乃衍生自Max Weber，他認為現代世界即是一整體被「除魅」的世界（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意思即是人們的生活越來越世俗化，人們所背負的普遍價值也漸漸遠離高遠的「形而上」的意義系統。對此，Lefebvre在〈The Everyday and Everydayness〉（1987）一文中更有更徹底的闡釋。

這篇文章中，Lefebvre指出，從20世紀開始，所有傳統固有的文化、意義參照系統都崩潰了。首先是最根深蒂固的父系價值系統，即是形而上、永恆、宗教的價值系統，還有俗世、（社會倫理）秩序系統，都統統受到質疑、被推倒；再其次是具體的道德、歷史、自然、宗教、空間、甚至音樂的聲調論述也被推翻（Lefebvre, 1987：7）。於是，人們整體的「在世存在」實踐及表象，都陷進了俗世的日常世界中。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固有價值的意義「參照系統」（referential system）逐漸崩潰，繼之而起的乃是帶有「平凡」（ordinary）意涵的「日常生活」在社會中漸漸擴大，受到重視；現下所主流盛行的，就是通俗的大眾文化研究理論。粗略地說，這些理論更認定平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為現今文化價值之主要參照系統。

但是，若我們以一歷史性的批判角度去剖析現今城市的日常生活，便會明白「日常生活」中的複雜結構，並不是如一般大眾文化研究理論所鋪排那般，總是以感性角度出發去簡單化平民大眾的日常生活文化、並以正面角度去對之作出肯定。

從Lefebvre對「日常」的定義出發，本文企圖將現代城市「日常生活」的本質及其歷史中形成過程勾劃出來。我們將會從不同的城市研究理論開始，勾劃城市在具體實踐的層面上彰顯的文化軌跡。這些城市日常生活理論，主要是去理解平民大眾日常生活模式背後，由資本主義所籠罩、控制的都市文化中衍生的權力架構及意識型態。作為出發點，我們會先詳述Lefebvre對城市日常生活的經典的「歷時研究」，然後加上其他理論家的詮釋，由此而為「城市日常生活文化」劃定一個清晰的討論範圍，以作為本書所收納個案研究的普遍理論基礎。

## Lefebvre的日常生活理論

自1947年開始，Lefebvre便著手進行以城市生日常生活為主題的研究，維持了幾乎40年。期間，他出版了3冊《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1947／1992、1958／2002、1981／2005）；於1967／1971年，出版了《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sup>2</sup>。而1992／2004年所出版的《Rhythmanalysis：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sup>3</sup>也是被公認為有關日常生活的重要著作。Lefebvre這龐大而且經年累月的研究，總括來說，首先是企圖把馬克思理論之重要概念：「異化」（alienation），從工作生產層面（即工人在工作時與生產模式及製成品完全疏離、異化：estranged labor）擴大到人們整個生活範圍（意味人們的生活整體已被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完全控制：即estranged life）去深入地反省及詮釋。由1947年至1984年這幾乎40年的研究，Lefebvre紀錄了資本主義如何在人們的工作以外的生活範圍持續侵略與擴張。

在1958年出版的《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第1冊的第二版序言中，詳細地分析了先進國家（例如Lefebvre所身處之法國）戰後時期，資本主義以私人商業企業為單位之發展。工業開始大量生產供大眾使用的商品，同時也生

產出「平民大眾」的日常生活方式（popular lifestyle）。Lefebvre指出，市場經濟愈漸發達，新科技產品越來越多，消費主義也就越具規模，逐步地控制人們的日常需要、夢想及欲望。

在先進國家中，人們的生活空間主要集中在城市。以科技思維主導製作而成的城市空間中，幾乎不受自然天氣季節影響，恆溫、恆光的室內環境，成為了城市人主要活動空間。自從1920年代開始，城市的建築通常發展為多層大廈，容許人群高度密集地生活及工作；二次大戰後，所有城市商住高樓皆為多層大廈，並且越建越高。所謂不斷改進的環境，實則是不單在工業生產的情況中大量運用科技，同時，於生活家居環境中，科技的操控演變成無所不在：科技從屋外（例如海陸空基礎建設、街道照明）進入屋內，除了電燈照明、自來水及自來燃料之外，人們享受著各種電器用具帶來的自動化的環境的方便。漸漸，人們以購入並擁有多少件家庭電氣產品的經濟能力，來量度自家的生活素質的水平；所謂生活素質之提昇，實則是越來越傾向於以物質環境之豐儉程度來衡量，而生活素質之優劣，則是基於家庭擁有電氣產品的量數。Lefebvre早在1958年，已看出大眾傳媒對人們有關生活素質的指導及控制。他指出，觀眾們從電影中得知「有錢人」的衣食住行的模樣，也依據此一模型，去營造自家的生活環境及生活方式。隨著資本主義越來越發達，大眾傳媒工業越來越強盛，渲染力也越來越大，人們對所謂生活素質的要求，幾乎都是依賴傳媒發放的資訊作為指導及標準。

由此基礎開始分析，Lefebvre在此序言中，聲言現代社會的人們所經受的，就是徹底的異化。馬克思在其分析中已清楚說明，在工業生產過程中，人們所經驗到的是製作者（工人）與製作過程及製成品的分裂（fragmentation）。工人在個別的工作崗位上，永恆重覆運作同一套工作程序，但對整體生產過程毫不知曉，也無從宣稱製成品為自身之作品（work），在此情況下「工作」正可說是外在於生產者（亦即工人）；「工



作」並不能使工人成就其自身的本質性存在（essential being），試看一個寫小說的人，一生的功業成就及成果就是成為「著作等身」的小說家，但是一個售貨員或在巴士站維持乘客秩序的工友，一生的「功業」並不能彰顯在他／她的工作成果上。在理論層面上，馬克思稱個體人的自我主體化過程與在世界中客體化的過程完全異化，由此，人與世界的統一關係被整體地破壞了（Lefebvre, 1948：10）。

在實際層面上，Lefebvre清楚指出，在工作中，人們不僅無法肯定自身的身份認同及價值，若被勞工市場排斥，更形成有否定自我的傾向——例如到某個歲數就要退休，或某個工種因社會經濟轉型而被淘汰；於是，若工人被辭退，往往會覺得是因為自己年紀大或讀書少，因而在勞工市場中被排斥。

Lefebvre在其《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第1冊中，延伸了馬克思的這個人們在工作生涯上成形的（異化）理論，他肯定清晰地說明，就算在工作以外的餘暇時間中，人們也會經受（異化）。如上述，自從現代工業社會開始，大部份的人們（尤其是生活在都市的人們）因勞動而形成的時間規畫，大體是分為上班工作及下班餘暇兩段。上班時要服從於機構制度，要和各類機器（無論是工廠的生產機器還是文書工作所需的電腦、印表機等等）合作去工作，時間完全是為機構服務。於是，人們會覺得工作根本地控制著思想及行動，同時更感到刻板而重覆的工作使人生沉悶，了無趣味。

另外，人們在工作餘暇必須要進行放鬆、減壓、休息，讓精神舒緩，同時也要多做運動，以保持健康強壯的身體。因為由此，人們才能回復精力及體力，繼續上班進行生產。由此，「餘暇的時間」成為現代工業化社會中新的基本普遍要求。

人們對休閒時間的理解，通常是一廂情願地認為是下班之後休息的時間，

是可以完全歸自己支配、安排的。理想地說，人們在下班後的時間，可自由的選擇興趣去學習各樣技能，如學習太極、烹飪；或進行文化活動，如學習唱粵曲或寫書法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人們以為在餘暇時間中，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逃離被受控制、機械化的工作環境去輕鬆一下。人們認為這樣做，個人無論對自己或社會的素質提昇，也會有所貢獻（Lefebvre, 2005：12）。

隨著科技發達與進步，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逐漸市場上出現了為休閒而設計構造的機器，慢慢控制人們的餘暇時間。在二次大戰前、後，至50、60年代，首先出現了收音機，而後是電視。而現今社會，人們下班後，往往只是再走進另一個科技環境中，進行餘暇娛樂活動（例如收音機、電視、電影、卡拉OK、電子遊戲機、大型機動遊戲機、以及近期極流行的Wii遊戲、電腦上網活動等等）。所謂「進步」，實則是人們的生活，從具體的科技工具使用，進而受科技運作的邏輯指導而全面受到操控。人們生活的環境，已完全是一個科技環境，人們一般的價值意向，也傾向認為越科技化的城市就是越進步及富裕的城市（1984：49）。由此邏輯發展，人們於是認為，若擁有越多及越貴的機器則表示越富有；例如富豪們要擁有私人遊艇甚至飛機，其富豪的身份才能被確認。

城市是資訊科技越來越集中及發達的地方。這些科技的演進，不斷地深切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模式。人們的生活方式，即衣食住行、工作或娛樂等任何一方面，都越來越依賴科技所提供人們運作模式及效果。城市根本上是以科技為主導的生活環境。

總括來說，城市本身，就是一部巨型的機器。人們生活在城市近乎自動化的環境中，同時要適應著城市的機械速度去進行所有活動。漸漸，住在城市的人們對「餘暇時間」的理解，幾乎等同逃離操縱著人身自由的制度與時空。但是在「餘暇時間」中，逃避了工作後，人們是否真的能回歸到自身的自由自

在？沒有工作的空閒時段，人們卻會（被消費主義社會教導）覺得面對自我，面對「平淡無所事事」的生活是空虛而沉悶的。於是，人們除了要逃離工作，也要逃離空虛而沉悶的下班／下課後生活，消費社會便因此更進一步提出「尋求快樂乃是人生最終目標」的主張。而同時，它也負起了提供快樂的責任，開始組織、編排各式各樣的消費活動讓人們參加，教育人們：若能成為消費者，便會有快樂。由於傳媒的大力吹噓，人們因而相信，如果沒有了休閒活動或各種娛樂充塞「餘暇時間」，她／他們的生活就沒有了意思。因此，現今社會，人們的餘暇時間幾乎完全受到消費市場控制，消費主義生產了所有餘暇生活經驗的內容，並且作了緊密安排。

由此，餘暇生活的出發點由初期理想的「養精蓄銳」、「發展個人潛能」及「提高個人修養」的正面觀點，發展到目前的逃避主義（*escapism*）為主要指導思想：消費主義讓我們以非常負面的觀點去否定「無所事事」的時間。餘暇活動，乃是要來逃避沉悶的刻板的不能自主的日常工作生活，以及充塞下班後的「無聊的」時間。消費主義的最高技倆，就是令人們深信不疑日常生活要被消費活動轉化變換成別的樣子，才會是有意義（Lefebvre, 1984：98）。

## 消費主義對日常生活之控制

根據Lefebvre的描述，現代社會正在不停地擴張及不停地發展。對Lefebvre來說，所謂「擴張」乃是經濟生產的全球化過程，而「發展」乃是現代社會不斷地城市化。更進一步地說，城市的日常生活，可說是完全被消費主義所控制。

在《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的第3冊，Lefebvre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對待平民大眾日常生活，就正如19世紀時期先進國家征服殖民地一

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無所不用其極地以消費活動來「殖民」平民大眾的生活時空。同時，也使普羅大眾甘心承擔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雙重身份。到了今時今日，再加上通訊科技及大眾傳播工業的發達，平民大眾的日常生活時空中具體的衣食住行的內容，其實已被媒介、廣告整體地密集指導、組織、編排，人們再也沒有甚麼餘地能逃離消費主義。總的來說，在現代社會，資本主義對平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的侵略及征服，是完全及徹底的（2004：6）。

Lefebvre在《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對消費主義的分析，可以說是極其濃縮，而且一矢中的。他以短短數頁的陳述，已經將消費主義的要點全部列出，並進一步認為現今社會，是對「瞬間變幻的崇尚／膜拜」（cult of transitory）。我們有目共睹，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如歐美或日本，工業生產的規模越來越大，商品的流通量也越來越快。商品的設計師及生產工程師對商品的壽命期（life cycle）有極詳細的計算及規畫（1984：81）。由此，同一件產品可以有層出不窮的型號在市場上不斷推出。同時，在商品的世界中，每一件物品都是被設計為「會過時的物品」（obsolescing objects）。於此同時，人們的慾望，亦被資本主義有系統及有策略地組織、編排。Lefebvre指出，大眾傳媒將排山倒海般的資訊發放給平民大眾，這些內容永恆重覆的資訊不斷從消費主義角度去界定甚麼是社會、甚麼是生活（Lefebvre, 1984：26）。他特別強調廣告及婦女雜誌對人們的嚴重影響，這些媒體不斷創造修辭策略，向觀眾說漂亮的故事，教導大家應如何生活得「好」、如何將生活各層面處理「得宜」（最明顯的例子是教導人們理財之道，或與家人親子相處之道）、如何選擇生活所需及消費物品——媒體也會提供各種消費的理由給觀眾，使她／他們理所當然地消費（例如甚麼日子是甚麼節日、要與誰人慶祝、要買哪種禮物給誰等）；最後更指導大眾如何運用時間和空間。更進一步，媒體會運用戲劇性的語言、虛張聲勢的氣氛加諸於各種「時尚消費品」（如時裝、精品）以及各種各樣的物品（如廚具、傢俱，以至各式家庭用品）上，使人們在某種疑幻疑真的情況下對商品產生慾望。

在這情況之下，消費已離開滿足溫飽的生理生存需要極遠，同時也令人們對物質、社會、文化甚至世界沒辦法產生正確的理解。Lefebvre認為，人們在世的日常生活經驗已變成對消費主義所營造的「勸信為真實」（make believe）的認識、接受及適應的（消費）過程。

Lefebvre對消費主義的濃縮陳述，在Baudrillard的作品中，繼續找到詳盡而且精確的闡述。Baudrillard認為，所謂消費，已經不再只是擁有物質的使用價值。消費其實就是在社會中傳訊溝通及產生意涵的過程，是一個資訊與價值不斷運籌及交換的系統。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消費乃是與語言（系統）相類似的訊息傳遞及交換的系統。

消費所傳遞的最主要訊息，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安排階級分層的符號系統訊息，人們憑著四面八方而來的資訊所學習到商品的「貴賤」意涵，正指涉著社會階級分層的符號標記。很明顯，人們不再是為了某物品的使用價值購買它，而是越來越傾向於衡量物品的符號與階級標示的對應／換算，去購買及展示某一產品或某類別的享樂、服務。Baudrillard很清楚地指出「要成為消費對象，物品必須成為符號」（1997：212）。

在城市生活的人們，幾乎完全受制於在社會上通行的符號系統所頒佈的價值層級系統，去建造自身的物質環境，例如如何選配家居環境、衣著飾物、交通工具、收發資訊工具、餐飲方式以及餘暇時間的編排等等。這等消費符號系統的指令，就是由大眾傳媒賴以生存的廣告運作無孔不入地向社會大眾無時無刻地發放。Lefebvre和Baudrillard都認為，消費主義的終極武器，就是廣告。

人們在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中，消耗極多的時間去收發有關消費的訊息。並且，人們在這個對商品認識、慾求、獲得、適應、處理、丟棄的過程中同時學習到，在社會中個人所身處的階層及地位、自我形象及價值，以及其提升的

途徑。Baudrillard 認為，物品被消費，但（被消費的）不是它的物質性，而是此物在消費符號系統所寓意的差異（1997：212）。

如上述，人們被大眾傳媒教導，學習成為一個「稱職的消費者」。消費者讚嘆市場上層出不窮的商品，歡迎商品的款式繁多、美侖美奐。由此，消費者會感到她／他們有很多選擇，因而以為有自主及自由。但若細心了解商品的生產過程，商品的「多樣化」並不是如傳媒所吹噓，是設計者或創作者的「心血」或「創意」而產生的。商品的生產及銷售，其實是個十分嚴密的監控系統生產的方式及過程：所有商品，都經處心積慮地籌劃其生產過程，再加上市場促銷策劃才到達門市。最後，貨品經精心的櫥窗及展覽設計編排，才展示在消費者眼前，為的是要觸發及提高她／他們的購買慾望。

消費者並不是個自由的主體，正如Bourdieu的《Distinction》<sup>4</sup>（1984）所述，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者維持並展示的，是其所屬的階級的特性及形象。Lefebvre、Baudrillard以及Bourdieu皆認為，社會大眾都一致地以中產階級的生活模式為最高標準，以「歡愉」（pleasure）為人生目標；亦即是說，整個社會，實則上都奉行「得到歡樂」為人生在世的目標。而大眾傳媒則不斷傳遞「消費」就是得到快樂的途徑的訊息。於此，Lefebvre清晰地指出，廣告在一個消費社會中，已取代以往哲學、倫理、宗教以及美感文化對人們的教化（Lefebvre, 1984：105-107）。

資本主義的市場策略全面控制消費，更頒布消費品應當符合的滿意的標準。消費時刻為人們創造需要、創造慾求、創造意義、創造快感、創造價值，消費同時是對生命的整體判斷（Lefebvre, 1984：107）。而廣告，就正正擔當了創造／傳達這些關乎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重要角色。Lefebvre清晰地指出，大眾社會的「廣告」在消費社會中，其實已扮演了社會的道德、文化水平的釐定者的地位。在大眾傳媒（尤其是廣告）裡，我們都會碰到以下關係著人生的

問題：甚麼是快樂？甚麼是滿足？甚麼是美？甚麼是人生？甚麼是自由？甚麼是自我？時時刻刻、不停放送的大眾傳媒（尤其是廣告）都對人們「耳提面命」這些人類精神所追求價值的內涵及答案。

今時今日，大眾傳媒已和廣告混而為一體，不斷以誇張、圖文並茂的修辭力量，盡可能把日常生活出現的那些瑣碎平凡事物戲劇化，使它們變得充滿魅力及感性的意涵，以增加它們的消費吸引力。由此，在消費的世界中，物品的存在出現了真實與虛幻雙重面貌（Lefebvre, 1984：88）。

Lefebvre洞識到，大眾傳媒的語言力量使到日常生活變成「信以為真」：他稱之為「勸信真實」（make believe）。「勸信真實」的語言無孔不入，使到人們對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都以消費的意識型態去理解，並且欣然接受。

早在1958年，Lefebvre已能道出名牌貨品的市場策略對人們的影響：昂貴的名牌商品的銷售策略，往往是精心設計了一個上流社會及貴族的生活環境，作為這等商品出現的空間，同時虛擬出一個所謂「貴族階層」（被暗喻或換算為名牌使用者）的生活方式，大力渲染上流貴族生活的華麗奢侈，來宣揚名牌商品的超常性、優越性。廣大消費者耳濡目染，認定了這等商品就是貴族上流階級的標記。同時，受眾更學習到，（大眾傳媒中創造出來的）貴族上流階級的童話式日常生活，正是與自己平實無奇的日常生活有極大之貴賤分別。因此，一旦有能力便趨之若鶩地去設法擁有名牌貨品，以提高自身的階級地位。

總括一句，Lefebvre指出大眾傳媒正是一種強制運作（compulsion）：首先是市場學對商品生產的控制、作出市場分類、階級化；再下來是大眾傳媒相輔相成地對商品進行符碼化、階級分層化、戲劇化等。消費者無間斷地受到廣告的「勸信」，並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包裝這商品的一切象徵意義，更成為這些象徵意義的確認者、傳達者，讓符號化的商品，散佈到整個世界。

## 真實參照 (referentials) 的絕跡—— 虛擬世界 (simulation) 的出現

大眾傳媒的興盛，成為了社會中主要訊息傳播的渠道。但是，大眾傳播並不單只公式地傳播硬性訊息（例如政治、社會新聞），它更將各種「軟性的」日常生活資訊傳達到廣大群眾之中。很多媒體文化研究都清晰指出廣告在現代社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上述，Lefebvre指出在一個消費社會中，廣告已代替以往在（前現代）社會中哲學、倫理宗教以及美感文化對人們在生命意義價值，及對生活的態度上的價值取向的教化。

現在，大眾傳媒基本上吸納了廣告的精神，整體從事著虛構、渲染、吹噓以消費為本的生活方式。人們也透過消費活動去認識、學習及適應傳播媒體裡虛構出來的消費世界，以至將消費世界內化為欲求對象，並認為能在其中生活，才是達至優質生活素質的標準。Lefebvre很清晰地指出，現今世界已是一個失去了依據「真實」的參照系統 (referential) 的世界。

現今世界中，物質世界整體地在廣告／大眾傳媒的詮釋中虛擬化成為符號。據Baudrillard所言，而今虛擬的「影像組織」成為了世界的主流／主導參照系統 (referentials)。於此，Baudrillard可說是接續了Lefebvre的見解，把「依存於真實的參照系統在先進發達的世界已然絕跡」的觀點加以發展，以「虛擬」 (simulation) 的理論解釋得更清楚。於〈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一文中，Baudrillard一開始就以地圖和土地的關係為例來清楚說明：所謂虛擬，已不再是將一個真實存在之土地領域作為「原本」而再表象／再造的運作，反之，如今乃是「地圖先於土地」的世紀 (Baudrillard, 1996: 167)。我們現今的世界真實世界所參照的意義及價值的系統已被消滅 (liquidation of all referentials)；世界裡所有構造（例如在澳門建一個有運河又有貢多拉船、貌似威尼斯的賭城、或在上海近郊建一個連郵政信箱及電話



亭也是英式的英倫小鎮)已不需真實事物作為「本源」、「本體」。我們所有的，只是用不同符號加以組織(威尼斯的符號：運河、貢多拉船；英倫小鎮的符號：紅色郵政信箱及電話亭)的過度真實(hyperreal)的系統作為藍圖，而符號只是指涉著這符號系統內部各個符號之間的意義結構／關係。這符號系統，外部並沒有任何「實體」作為意義的指涉，也不會承接、延續實體空間的固有傳統社會之文化意義。

現代社會中大部份的文化現象，無論是抽象的藝術、宗教、社會、倫理的意義體系，或經驗的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甚至具體物質環境的設計(例如現今之城市設計或重建規畫)，其外表的表徵之「背後」，皆空空如也，再沒有一個真實的深層意義系統去支撐；外表表徵的組合，只是執行了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再生產運作。亦即消費環境、過程的設計及生產。同時，這等表徵的組織，也設計、生產、維持了人們不斷重複的消費活動。

在消費社會中，平民大眾最終極的意識型態就是要成為「大眾」(mass)其中之一員，好讓「大眾」共同支撐由消費主義開始、也由消費主義結束的價值取向——在消費主義涵蓋一切的社會中，所有人必須成為稱職的消費者。同時，為配合不同形式的消費品或服務的再生產，個人也必須追求個人自由、獨立性及「自我認同」。因此「大眾」(作為一般的消費者群)與「個人」(作為其中某系列消費品的個體使用者)並不存有衝突或矛盾。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大眾社會同時宣揚「個人」的價值及重要性，在「個人」的概念之下，也重疊了「自由」及「與別人不同」的意識型態，這是資本主義對人們不斷灌輸的「教化」。

這種「在大眾中成為個人」的價值觀在消費社會中，已成為消費的主導動力，人們在「心理」上所要求的，首先乃是達到「和別人一樣」的生活水平，更進一步，就是比別人更快獲得物品之更佳或更新的型類，以顯耀其過人之處

——當然，在生活環境中，若衣食住行都能「與眾不同」，即達消費社會中推崇的最高目標。從此脈絡出發，所謂的「自由」即可解釋為「自由地成為自我」，而所謂「自我」即是「自由地讓一己的欲望投放表達在某些產品上」，當人們以消費來解釋一切之時，人們其實已成為一個完美的（消費）社會存在者（social being）。

### 從日常生活到（時尚的）生活方式： 由「小資產階級」到「新小資產階級」

消費主義已成為一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前文所述，是一般社會的文化演進中，資本主義借助大眾傳媒的昌盛來籌劃消費主義對日常生活的滲透。若我們能作出細緻的分析，則必須更深入地去理解消費主義。消費主義所萌起的象徵乃至於虛擬的符號系統，究竟在社會那一個階層發揮最大的威力？是誰在接納、營運、持續、再生產消費主義的符號系統？若能夠回答此等問題，才可真正理解消費主義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之主導性威力。

我們試著透過Bocock、Williamson、Featherstone及Bourdieu的論著，來深入地理解消費主義的興起、發達過程；並掌握到其性質之漸變。根據Robert Bocock的分析，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眾社會興起，乃是因為「在20世紀的後半期，西方社會、日本以及某些東南亞地區中可以享有物品與服務等消費的人群越來越多。消費作為一組社會、文化與經濟的行動，搭配其消費主義的意識型態（ideology of consumerism），無不使得資本主義在數以萬計群眾的現代社會中看來深具合法性。」（Bocock, 1995：10）。Bocock詳述了在歐美國家出現之「大眾消費」之起源：

到了50年代，緊接著美國的腳步之後，先是英國、然後是西歐其他

國家，都興起了現代意義的「大眾消費」模式。除了一貧如洗的人之外，所有人都投入了消費。那些必須從事很多工作才能維生的團體也變成了「消費者」。也就是說，如今他們有了足夠的收入支應基本需求，並同時逐漸體察到他們所能負擔的諸多新事物，比如電視機、汽車、以及休閒經驗，像到西班牙度假等等。

從50年代開始，經濟的富裕漸漸在社會擴展，因而產生了應付到基本需求的大眾，在此時期，廣告媒介變得蓬勃，並且為每件東西塑造了品牌形象，從名不見經傳的肥皂粉到汽車、飲料、香菸、衣服和廚房設備，皆被廣告以美侖美奐的辭藻包裝。

Judith Williamson 之《Decoding Advertisement》<sup>5</sup>的第15版（2002）序中寫道：

在1976年我開始寫這本書。那時的世界充斥著炫目的廣告影像，也到處都聽到瑯瑯上口的宣傳口號……那時的世界，全由廣告指導、敦促著我們以使用消費品來創造我們的身份，也教導我們以消費品所衍生的語言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Williamson, 2002: 6）。

大眾消費越來越豐盛，人們也越來越多物質生活上的「選擇」。Featherstone很精確地描述了「新一族的消費者」的出現：「生活風格」一詞最近正流行。這個詞若是指涉特定身份固體的獨特生活風格，就具有某種嚴格的社會學意義，然而在當代的消費文化中，它所指的是個性、自我表現，以及風格的自我意識。一個人的身體、衣服、話語、休閒消遣、飲食偏好、住家、車子與假期去處等等，都標示了擁有者／消費者的風格與品味的個體性。相較於那被稱做灰暗溫馴主義時期的50年代，60年代之後的大眾消費年代，顯得蓬勃及欣欣向榮：因隨著生產技術的變遷、市場分眾的過程，以及消費者對更

多類型產品的需求，致使年輕人被賦予更大的選擇權（Bocock, 1995：51）。

Bocock、Featherstone、Williamson的分析可說確實無誤。在大多數的社會學家、文化評論家的理論中，消費主義表面地解釋為人們因為渴慕及推崇商品的象徵意義，因而熱切地渴求擁有商品或參與各項消費活動。但我們必須深入探求，人們為何會有這種熱切的追求？

在Bourdieu（1984）的文化階級理論中，我們理解到「消費」是一個明顯標示著階級分層的社會實踐：人們參與消費活動，即是依據其階級習性而選取購買某類型的商品，或從事某類型某檔次之消費活動（除購物以外，還包括文化、娛樂、消閒活動）。消費活動的選取及參與，在Bourdieu的理論中，乃是要建構並實踐屬於某個階級的「生活方式」的可能範圍——人們當然要有足夠的金錢（或貸款額），才能參與其理想社會階層之生活實踐。消費，就是人們要具體化其本身的品味之實踐，亦即是借助擁有某層次系列之商品、或從事某類型某檔次之消費活動，來具體地顯示出其本人在社會空間上所佔有的位置。

#### 由「小資產階級」到「新小資產階級」

於上述引文中，Bocock所指涉的「所有的人」、Featherstone指涉的「新一族的消費者」、Judith Williamson所指涉的「我們」，在Bourdieu的體系中，其實即是明確地被界定為「小資產階級」（*petit bourgeois*）的一群人。Bourdieu在《Distinction》裡，說明了人們從事消費活動，其實是要建構一個相配於其階級的生活方式可能範圍的系統。小資產階級，在Bourdieu的文化階級體系中，正好夾在經濟資本或文化資本最豐厚的上層資本家或文化貴族，以及工人／草根階層的中間，其位置就在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中層。

據Bourdieu的意思，「小資產階級」的定義，就是那些企圖向上爬、因此闖進了一個與自身永遠不相融的文化（世界）的人們。正如Bocock所言「他

們有了足夠的收入支應基本需求，並逐漸體察到他們買得起的很多新事物……。」（Bocock, 1995：38）。這個階層的人們對物質世界的追求，開始是基於基本需要，後來漸漸變成渴求策略性及選擇性的需要。「小資產階級」在財富上達到某程度的累積，繼而有能力「買得起很多新事物」，再加上不斷收攝媒體資訊、潛移默化，理解到她／他們憑藉消費象徵高尚品味的器物及服務，不單可與較低下的階層分別開來、更可進而接近那些擁有使用貴重物品之最高能力的上層階級。由此，這個階層的人們，特別沉迷於渴慕追尋消費品或消費活動所附帶的象徵意義。

那上層、更高的階層，其之所以被視是為「上層、更高」者，是因為能恰如其份地、遊刃有餘地使用／享用種種象徵其高尚品味的器物及服務。「小資產階級」蠢蠢欲試高攀去擁有那些本來屬於上流社會、更高階層的物質享受，因為這等豪華的享受，正是高尚階層的象徵。但是，基於「小資產階級」經濟資本的來源，始終是辛苦經營而得，所以他們往往傾向於以較為轉折的方法去獲得同等的象徵效果。Bourdieu在《Distinction》裡，以家居室內設計為例，說明「小資產階級」的心態，乃是去模倣、裝扮不屬於其本身特質的高檔事物：例如，不斷嘗試去把家居或甚至自身裝扮得豪華貴氣，穿戴、配置看上去像個有錢人的「行頭」，以為由此行為便可成為比其本身真正所屬的階層更高檔、豪華。（Bourdieu, 1984：321）他確切地指出「小資產階級」之所以為「小」資產階級，乃是那些將自己（對投資的範圍）收窄縮小，以使到自己能集中在某特定方面，能攀附上資產階級門檻的工人階級（Bourdieu, 1984：338）。筆者所見的例子，就是許多香港年青人，家住廉租公共房屋的單位，然而卻全身趨時名牌衣著打扮。

小資產階級竭力於搜羅、消費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的象徵物，在在展示了她／他們攀附「上流社會」的野心，她／他們之著眼點，是以經濟背景來構造一套階級符號系統。然而，消費主義的威力並不止於吞噬以經濟資

本所組織、結構的階級分層。Bourdieu在《Distinction》中所提出的另一個社會階級分層的系統：即以擁有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多寡為階級分層基準的系統，漸漸也被消費主義完全覆蓋、內化。近幾十年，大眾文化的開展漸盛，以至衍生了以抗衡正統文化的「後現代主義」的出現，這大潮流正好造就了所謂「新小資產階級」的出現。自80年代以降，也就是「後現代主義」愈漸昌盛的時代，「新小資產階級」文化，打倒了傳統的「高檔文化」（high culture）系統，昂然主導了當今文化最主要地位。

Bourdieu的分析，以巴黎的社會文化背景為脈絡，將屬於中下階層的人群中較年輕及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群命名為「新小資產階級」。被這個稱號所指涉的階層和Featherstone所描述的「新一族的消費者」非常相近。Bourdieu認為「新小資產階級」通常受過大學教育。但她／他們所受的教育及文化訓練，卻遠不足以讓她／他們進佔在文化領域上主導之位置（在法國來說，例如音樂家或大學教授）。她／他們多數從事新興行業，文化產業的行業（例如設計、潮流雜誌編輯等），或一些正統專業的輔助行業（如心理輔導員、護士等）。

年輕的「新小資產階級」傾向於在文化的領域上，挑戰傳統的經典的文化實踐如古典音樂、文學、藝術等，企圖吹捧處於正統文化範圍之邊緣或下限（lower boundary）的文化類型，例如現今的流行音樂、電影，科幻／武俠小說、動畫等，以爭取它們在文化上可被確認的地位（Bourdieu, 1984 : 360）。

Bourdieu認為，「新小資產階級」大都以「文化」去確定自己的認同及社會位置，故此她／他們經常出入文化場所，例如現代藝術館、畫廊、小劇場……等等。以法國的情況來說，她／他們多數聚居於巴黎，因為她／他們要刻意身處文化精粹的中心地帶，以圖參與在巴黎舉行的密集的文化活動。她／他們的生活方式，多姿多采：住在合潮流設計的家居、穿著趨時、出入各式娛樂、文化界舉辦的派對、宴會……亦即所謂潮流人士踴躍參與的場合。

Featherstone (2007) 的分析，也詳細地延伸了Bourdieu對「新小資產階級」的品味詮釋，他認為「新小資產階級」的品味，主要是表面地抄襲19世紀中葉的「浪蕩子主義」(dandyism)的生活美學：在19世紀中末期，所謂「浪蕩子」是指在英法社會中，那些屬於有閒階級，家境富裕的公子哥兒，他們崇尚豪華高尚的品味，認為衣飾的美觀是貴族的優越性象徵；著重說話、寫作的修辭、美感經驗及享受、休閒生活；「浪蕩子」十分自我，一味追求新鮮的感覺，藐視平民大眾的喜好。據波特萊爾(Baudelaire)在〈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sup>6</sup>(1863)一文中所言，「浪蕩子」(dandy)除了以「高尚」為己任外，沒有其他職務(the man.....has no profession other than elegance)。

然而，正如「小資產階級」一樣，無論在教育程度及職業階梯上皆只為社會中層的「新小資產階級」，對真正是貴族公子的「浪蕩子」的生活美學，也只是表面的模倣，即以折衷的方法去虛擬相近似的面貌。Bourdieu指出，儘管「新小資產階級」努力推崇新興的文化實踐作為主流文化活動，但基本上，這階層的人卻留戀、傾慕著傳統貴族階層的品味，然而，她／他們對貴族階層品味的理解，卻是膚淺及幼稚的。她／他們以有限的形容詞，去勾劃她／他們夢寐以求的貴族品味：例如有格調、與眾不同、雅緻、精緻同時浮誇自大的氣派(recherché)(Bourdieu, 1984: 362)。

Featherstone (2007: 102) 更進一步，深入地分析那在「新小資產階級」文化中極度流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概念：「都市漫遊者」(flâneur)。「新小資產階級」趨之若鶩地以「都市漫遊者」來形容其所嚮往的城市浪漫生活。

在19世紀中葉出現的都市漫遊者視城市為一個多姿多采的生活空間，他們終日「遊走」在城市的公共空間，走進人山人海——在城市中發生的種種

事件，不僅多樣化，並且充滿意外和偶發性。都市漫遊者終日遊走在起落不定的城市空間中，感受著澎湃不息的城市生活節奏，其目的正如波特萊爾所言，是要找尋「城市」的意義，和去摸索、勾劃那不能被確切界定的「現代性」（modernity）。故此，在波特萊爾的描述中，都市漫遊者總是帶著批判的心態，冷眼旁觀地去思想「都市」——這個代表人類現代文明的構造。為要維持這有距離的批判立場，都市漫遊者縱使走進人群裡面，也不能像普羅大眾一樣，汲汲營營地為生活風塵僕僕；他終日遊手好閒，這是為了保持一己的完整個性及冷靜觀點。

然而，波特萊爾對都市漫遊者的描述，只能作為初期的都市漫遊者的界定。班雅明在其巨著《The Arcades Project》<sup>7</sup>（1999）中，其實已體察到這等城市生活現代性本質的尋索者的墮落：「那遊走在人群中的「漫遊者」，終於在日暮時分到達一間還充斥著眾多顧客的百貨公司。他對百貨公司空間十分熟絡，在其中暢快地遊逛。」如果「拱廊街」（arcade）是經典的都市漫遊者遊逛的室內空間，也是班雅明眼中「街道」的典範的話，那麼，百貨公司就是這等室內街道的「墮落版本」了。如果在開始時期，街道對都市漫遊者來說成為室內空間，那麼，百貨公司這室內空間對他們來說，就變成了都市的街道：「都市漫遊者從前在像迷宮一樣的城市到處漫遊，而現在卻在重重疊疊的商品中遊逛……。」（Benjamin, 1999：10）。

在這段描述中，班雅明很確切地說明了所謂找尋都市生活現代性的都市漫遊者已沒落。班雅明很清楚地說，現在，都市漫遊者已是那離棄了群眾的人，因為他已沉迷於商品的消費狀況中。Featherstone對挪用了「都市漫遊者」概念來界定自己的生活「品味」的新「小資產階級」作了批判性的描述：他指出現今那些自我吹噓為「城市漫遊者」的人們，主要重於推崇城市裡流行的時尚裝扮與大眾文化。而這些時裝、大眾文化所彰顯的乃是人工化、表面、膚淺、偶發、奇幻以及虛假的價值。現今的都市漫遊者對此沉迷、樂此不疲。他們已



成為追求時尚的消費者，所謂都市生活文化批判者的角色已隨著他們沉迷於消費品中已消磨淨盡。

「新小資產階級」在都市五光十色的人工化時空、琳瑯滿目的商品中漫遊，不斷學習享受，經驗有品味及充滿美感的主活，據Featherstone的描述，她／他們十分重視餘暇生活，視之為「創造性的戲玩」經歷。無論穿著、打扮、所到之各個地方（食肆、娛樂場所、旅館等等），所參觀的各式各樣展覽（藝術、設計、時裝表演等等）都是把生活美感化的各個標準環節。經過傳播媒體大肆渲染、不斷勸信教導，她／他們也無不仰慕「浪漫」的藝術家／波希米亞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反叛、即興……凡是象徵這類藝術家／波希米亞生活方式形象的商品或經驗，新「小資產階級」都會欣然地去接受、消費。

在新「小資產階級」的宇宙中，文化或藝術，不再是精神提昇的歷練及渡越，而是變為餘暇享樂的經驗。Featherstone很正確地指出，文化或藝術，乃是對浮游易逝經歷的戲玩式發現、探索（playful exploration of transitory experiences）（Featherstone, 2007：93）。

總體地說，「新小資產階級」為求提高品味，日常生活於是被染上濃濃的文化、美感色彩。她／他們追求時尚、貼近潮流，玩樂輕鬆的生活。她／他們事事追尋「自我膨脹」的多樣可能性，推崇浮誇的生活方式。由此，文化商品（由時裝、娛樂商品如影音光碟、漫畫書、家居裝飾到城市）皆應運大量推出，其包裝及本身的設計都集中於發展其象徵（文化的）價值，人們也相應熱衷於消費。Featherstone指出，現今世界中，「真實與影像／幻覺的界限已被抹除，日常生活也因此而美感化」（Featherstone, 2007：67）。於此，因著推崇新興文化代表高品味的「新小資產階級」的出現，消費主義變得更傾向於崇尚（物品的）象徵價值之消費。

總括而言，以「新興」文化為價值參照系統的新小資產階級，簡直正中消費主義的下懷；消費主義將所有物品變成符號，也運用了這個符號系統來釐定人們的社會地位階級。消費主義先將物品變成以經濟財富資本多寡的象徵符號（例如對比於擁有日本品牌的汽車，擁有歐洲名牌汽車絕對是富有的象徵）。但是，若以文化資本為參照系統，消費主義乃是更進一步地將商品轉化為文化系統內各層級的符號，來定義人們在文化層級中所佔的位置。新小資階級離棄要經長期訓練才培養出創作能力及鑑賞力的古典文化之實踐及所形成的品味，走向吹捧屬於正統文化實踐之邊緣或下限（lower boundary）的文化類型。這即是說她／他們將現今的流行音樂、電影，科幻／武俠小說、動畫等，推舉為新世代的大眾的文化的典範類型。可是，這等文化產物，與商業市場的界線極度模糊，因它們大部份都是首先作為商品面世，其後才被公認為文化實踐之產物。同時，因著它們的平易近人，欣賞者並不需要艱苦學習便能理解。它們成為了新興文化的典範，正好協助消費主義累積大批仰慕者成為消費者（Bourdieu, 1984：360）。

由於大眾文化或商品作為象徵的符號文化取代了精緻高級文化成為主流，消費主義要侵入文化領域確是一蹴便成：文化實踐不再要求長時間的潛移默化地在技藝上的修練，才學有所成。從此以後，「文化」這個高尚的境界乃是以各種商品（作為象徵）堆砌而成的過度真實環境，所謂文化界的諸君也輕而易舉地借「搞文化活動」獲取社會上高位。從此，文化只不過是學習消費和消費的活動。

## 全民「新小資產階級」化：消費主義與城市

很多學者都指出，現代城市為了配合整個消費主義的大環境，都隨著時代及經濟生產模式的改變，而作出重大的市容改變。城市中不單只是到處都有各

式商品出售，商品也以高速的頻率變換款式；同時，城市的空間也成為象徵文化的消費空間，甚至其本身也成為消費對象。如上述，現今一般所指的「中產階級」現在已廣泛地被「新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所籠罩，其所崇尚的，乃是以「文化品味」來評價個人甚至城市的素質及層次。世界各大城市在80年代開始皆紛紛以「文化」作為主題來包裝——尤其是市中心區——使之成為美侖美奐的消費品。投放在城市上的「文化」包裝，通常依循兩個策略：第一就是將城市的本土歷史及日常生活習慣習俗美感化，第二就是以現今新穎的藝術品去裝飾城市，使之變成有藝術品味的空間，也由此而提高其「層次」。

這兩項策略，在很多城市研究上，皆有清晰討論。它們也指出，80年代以降城市規畫及設計的主流概念，乃是重返市中心以及仕紳化（gentrification）。依據Zukin的分析，市中心仕紳化的都市規畫策略往往是以文化潮流作為主題，將都市的經濟運作焦點由商品生產轉向到商品消費，尤其是集中於文化商品的消費。在仕紳化概念指導下，市政府管轄下的城市規畫、設計單位以及城中各大小文化組織，皆紛紛起而熱衷於在城中尋覓那些可被宣揚為有文化維護價值的事物（例如舊建築或社區傳統慶典等），將之大肆地感性渲染並推廣其文化價值。這等策略通常用在都市更新／活化的計畫中，將城市某區域包裝成富有歷史意義及價值的社區，更借助後現代美感的概念，將街道及建築物依據虛擬的人性化空間來規畫及設計；繼而將某座舊建築物改建為博物館；然後，將某些次等的、具本土／本區文化特色的建築物（或甚至另建虛擬的「舊」建築物）改裝成為設計味道濃厚的主題餐廳、咖啡室、精品店，或其他同類型商店。每當該區舉行傳統的慶典，政府與民間、學界所組成的文化團體，亦為之進行誇張性的推廣及宣傳，使整個事件完全在籠罩著過度真實的景觀內發生。

除了對舊建築或社區傳統慶典進行維護外，很多城市皆大量發展藝術。城於是出現了出自著名建築師設計的建築物作為地標，進而，市政府及各層級

有關機構在街道、廣場上大量裝置藝術品。再加上大量博物館、畫廊、劇院、音樂廳、戲院、娛樂場所（例如高級餐廳、咖啡館、酒吧等）遍佈在市中心地帶。城市不斷舉行藝術節，各大小藝術團體也不停表演。更進一步，在街道上，燈飾、彩布條、LCD大螢幕……皆時時刻刻、高頻率高速度地提供著趨時設計，以及時尚、潮流的、浪漫化、美感化、藝術化的影像。

現今城市要做到的，不單是成為文化、藝街的載體，而是要讓城市本身也成為藝術品，即消費品。Zukin（1995）很清楚地指出，一切城市的文化、藝術策略，背後的指導原則並不單純。她首先指出，若從地產發展角度去詮釋這等策略，我們會馬上明白透過文化包裝，加上街道藝術品在城市各類空間的適當放置的理由，正是使城中殘舊的建築能重新被吸納至地產投資項目裡面，同時更會提高新開發區域的價值。文化建築物並非單一個別存在的文化設施，它們會同時牽動鄰近房地產價值提高的「賣點」。同時，如上述，它們也會誘發高消費的商店如精品名牌時裝店、畫廊、高價餐廳及酒吧等，在旁邊開展營業。原來已殘舊的市中心區由此而活化起來，一躍而成為城中的潮流品味集中地，吸引了專業人士、高級行政人員及追求潮流的文化人來休閒及消費。於是，同區新建的住宅或商業大樓也因這些文化賣點而獲得「水漲船高」的出售價值提昇。

在城市本土的地產發展以外，若宏觀來看，城市因大量發展藝術得以美化，進而在國際層面獲得獨特形象及定位，從而也促進旅遊業。說穿了，這一切都是策動城市藝術化及文化維護的經濟動力。

Nan Ellin在其書《Postmodern Urbanism》<sup>8</sup>（1996）其中一章〈Themes of Postmodern Urbanism〉中，也扼要地指出了城市設計論述的重要主題，是要重重強調城市生活乃是以「悠閒」為目的——即人們會有極多時間去消費——於是城市的空間設計及各類設施皆必須充滿悠閒氣氛；人們在悠閒的日子

裡，總是被鼓勵四處遊覽、欣賞文化娛樂節目及藝術作品。因此，整個城市開始強調主題建築物、戲劇性的購物經驗；無時無刻不滿溢著節日、嘉年華色彩，四處裝飾得繽紛多彩、氣氛歡愉熱鬧。城中到處（街道、公園、商場……）佈滿了平易近人、能直接明解的街頭藝術品，讓所有市民不論知識文化水平高低，都能從容參與及欣賞。藝術品可作拍照背景、小孩子可當藝術品為「玩具」、在其中穿插玩耍，街頭藝術品正是「街頭坐具」——藝術及文化的意義不再需要任何深奧的思考，也不附帶任何精神價值，它們只是城市的裝飾品，讓消費空間衍生普羅庸俗的美感經驗，城市也由此得以持續其投資價值。

## 結論——城市：藝術的完結、日常生活的完結

長久以來，筆者對17世紀的荷蘭「寫實」藝術特別鍾愛，若到歐洲旅遊，一定會到巴黎的羅浮宮或倫敦的國立藝術館（National Gallery）去看這些畫作。在這個虛幻浮誇的世道中，那些17世紀的畫作對「日常生活」沉穩樸實的紀錄與描寫，無不讓人感到生命還倖餘下些微重量。

畫中所描繪的日常生活都仍存在，沒有花巧、充滿內容地進行著；人和物件，還有所發生的事，都平實地展示出一個真實的世界。筆者此一主觀偏好，竟在法國藝評家 Todorov 對17世紀荷蘭油畫藝術的著作《L'Éloge du Quotidien》<sup>9</sup>（1998）中找到共鳴。Todorov認為，以描寫日常生活為主題的17世紀荷蘭油畫，在西方藝術史的長河中，佔據了獨一無二的位置。這時期的油畫主題，離開了希臘神話、基督教聖經故事、偉大的歷史事件與英雄，甚至並不關係到貴族們牧歌式（idyllic）理想生活的描繪。

在畫面上，觀賞者只見到無名無姓的平民，盡情投入、參與著「眼前」實在的日常生活。在畫面上，這些平民老百姓只是做著她／他們日常做著的事

情。畫面沒有張力強勁的構圖，人物沒有戲劇性的姿勢，她／他們所進行的，也不是驚心動魄或雷霆萬鈞的行動。依據Todorov所言，這些畫作皆是對那可透過視覺掌握的具體真實世界的歌頌；畫作並不以傳統中任何一種美學原則來刻意作裝置；人物的舉手投足，或所進行的活動，如掃地、吃東西、寫信、彈琴……等，皆是最平常的日常活動。她／他們所擺出的姿勢也是最卑微的，然而她／他們也正在樂在其中。觀賞者在欣賞這些畫作所尋得的美感，就正正是能夠以（不帶宗教涵意的、人文的）眼睛細緻地觀察，對現世生活所領悟到的「具體、真實」的感覺。

17世紀，正值歐洲思想進入「現代」的時期，歐洲人正以無比的自信，把文明領向一個以「人」的向度及能力為基準的世代。然而，隨著歷史發展，此一黃金時代，即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具體發現與肯定，或認定人的視覺有能力掌握的世界的真實，到了今天已不復存在了。20世紀中葉以降，Lefebvre在有關日常生活的著作中《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第2冊，深入地探討了藝術與「平民大眾」日常生活之對立；他一方面指出日常生活越漸墮進資本主義科技生產與消費主義的模式與環境中，另一方面，他也宣告藝術或附帶有反省「人類整體精神文化」方向的藝術的完結——代之而起的是完全失去人類文化意義參照系統的大眾傳播媒體及廣告，在大部份城市人的生活環境中擴散，以致完全操控人們的生活方式及思維價值取向。

在1954年出版的《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第1冊，Lefebvre即以卓別林（Charles Chaplin）的電影來開始討論「日常生活」。在卓別林的電影中，城市中日常生活的瑣碎事物、情境變得陌生，充滿矛盾、顯得荒謬及可笑。電影引導觀眾在歡笑的氣氛中突然洞悉現代世界的荒謬，以及人與現代世界的格格不入與疏離。卓別林的電影故事主題通常是一個貧苦的流浪漢，在大城市的環境中委曲求全，但同時也與生活富裕的中產階級資本家引發當下的衝突與矛盾。Lefebvre指出這貧者與富者之間的衝突，並不是外在物質上的貧富

懸殊的對立；那流浪漢的角色背負著馬克思描述無產階級的特質：他無法投入身處的社會，因而鬧出很多笑話，然而這些笑話是尖銳的，甚至是近乎殘忍（例如在電影Modern Times中，工人在工廠上班，因工作要不斷加速，工人因而變成神經失常的情節）。

Lefebvre認為卓別林的喜劇雖然「不曾引致革命性的行動或政治的醒覺，但是，它卻利用『笑』來從根底處觸動群眾」。Lefebvre又指出，在卓別林的電影裡，「最超乎尋常的事件其實就是那在真實世界中最尋常的事。」在電影裡，這些尋常事離開了它日常的環境（亦即人們已太適應因而感到麻木的環境），經過情節的創作及組織，誇張、強調了這些慣常事對人的壓迫，觀眾也因而感到慣性的日常生活的殘酷及令人窒息。

Lefebvre在此書中，進一步藉布萊希特（B. Brecht）的「史詩劇場」（epic theatre）來點出現代日常生活世界的荒謬性、異化及矛盾。如上述，日常生活已被種種的「意識型態」不斷重重包裝，迫使人們以慣性（familiarity）來忘掉其中內含對人們的種種壓制。Lefebvre將「慣性」比喻作一個我們不能除掉的面具：「面具牢牢地黏在我們的臉上，我們的血與肉也變成了面具」。日常生活有著許許多多牢不可破的慣性，例如人與人之間常有「以和為貴」的既定價值，因而在資本主義覆蓋下，許多不公義及矛盾就因此被抹殺；又例如現時香港不斷宣揚的所謂家庭核心價值，即以安穩家庭為人生目標。這其實是極度資本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思維：因為要家庭安穩必須經濟穩定，個人若以「自我」為發展的目標，作出任何不切實際或冒險的計畫，便是對不起家人；人生的意義，也只能縮窄為對夫婦關係的忠誠、對兒女責任，以及對財政妥善的管理。

布萊希特的劇場創造了「異化效果」（Verfremdung effekt），讓日常生活的熟悉性，與當事人與物產生距離及陌生感；劇中安排當事人在判斷日常生

活的事情時，不能再憑藉身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所潛移默化的慣性價值為準則，去作習慣性甚至感性的判斷及行動。換句話說，布萊希特的劇場藝術，將日常生活所隱含的許多意識型態都揭示出來，喚醒觀眾的批判意識來對日常生活作清晰的審視。Lefebvre認為布萊希特的戲劇一方面使觀眾與熟識的日常生活產生距離，因而產生不安，但由此，觀眾卻可深入自身（的批判意識），同時也可意識到甚麼是「真實」，以及真實內所含藏的矛盾及疏離。

在James Joyce的著名小說《尤里西斯》中，Lefebvre看到文學企圖將人從庸俗的日常生活拯救出來的野心。文學家將語言的可能性推至極限，在極度細緻地描述／剖析的日常生活之同時，也正在以人非理性的一面：夢幻、影像及象徵來否定庸俗平凡的日常生活；在Joyce的筆下，真實然而沉悶瑣碎的日常生活，與夢幻而且超凡的意識想像混為一體，揉成延續的長河；亦即是時間。在真實經驗日常生活中人們慣性地意識到的時間發展，乃是以單線性進行。然而在文學的重構中，卻突顯了在經驗世界中發生的各個事件的斷裂性、偶發性。由此，我們可冀望從文學書寫中看到事件所展現的斷層隙縫中，重新窺見那重疊著宇宙性的、重複循環的時間性。

法國的社會學家們，看出藝術站在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其立場就是要刻意地和資本主義保持對立的距離，並作出不留餘地的批判。Lefebvre分析藝術電影及現代文學作品對現代社會之日常生活中所隱藏的矛盾作出尖銳的揭露。Bourdieu則在其宏大的社會學架構中，很精確地描述了「文化」在19世紀的歐洲社會中，成為政治經濟權力以外的另一股社會勢力領域的過程。深入Bourdieu的論著，我們可發現藝術界、文壇以其所確立的超然獨立性，鮮明地對抗著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及日常生活方式。Bourdieu在其重要著作：《The Rules of Art》<sup>10</sup>（1996）其中一個章節〈The Conquest of Autonomy〉中，藉著分析福樓拜（Gustav Flaubert）的經典著作：《情感教育》來進入福樓拜所身處的法國社會，作詳細的階級分層分析，勾劃出當時法國文壇中的翹楚福樓



拜及波特萊爾不遺餘力地將「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純文學確立為一個自主獨立的社會勢力之過程。這個自主獨立的文化新興勢力成功地成為政治及經濟以外的價值意義系統。

在19世紀的下半葉，歐洲的資產階級勢力越來越強大，於政治及經濟所建立的強勢漸漸洶湧淹蓋至文化領域。由於印刷科技的發達、傳媒工業的興起，文化創作也漸漸被工業生產方式所取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報紙設立連載小說專欄，於是文學寫作漸漸被日報的出版形式所控制。

傳媒工業原本主要的功能乃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當時所流行的資產階級藝術(例如上述的日報連載小說或戲劇等)，大部份都是捍衛資產階級的倫理價值觀：即歌頌婚姻、家庭和諧為核心價值；同時視科技發達、商業運作為人類進步的表現、金錢為所有價值的依歸，因而提倡家庭經濟穩定、人人審慎理財等處世的原則。資產階級藝術基本上是這些價值觀的宣傳機器。從事這種藝術創作的文人、藝術家多數以平易近人的手法，將通俗易懂的主題與內容包裝成為娛樂文化商品給人們作休閒之用。由於這等娛樂文化商品都可以賺取金錢利益，因此傳媒工業都願意投資生產，所以這些商品都得以在廣大群眾最容易接觸的媒介(例如報紙、雜誌、劇場及後來的電影)中得以推廣銷售。同時，由於有廣大的讀者群及收看率，從事這種藝術創作的文人、藝術家往往會賺取當下的金錢利潤及名氣。然而，以福樓拜及波特萊爾為首的文學家對資產階級漸漸插手操控文化感到極度厭惡。福樓拜於1870年已預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事物都變得虛假。

福樓拜在1871年9月28日寫給馬克西姆·杜岡的一封信中說：「一切都是虛假的，虛假的軍隊，虛假的政治，虛假的文學，虛假的信任和虛假的妓女。」他在給喬治·桑的一封信中寫道：「一切都是虛假的，虛假的現實主義，虛假的信任，甚至虛假的婊子……這種虛假……特別體現在判斷方式上。

人們想要一個女演員，但還要讓她是一個好家庭主婦。人們向藝術要求道德，向哲學要求明晰，向罪惡要求體面，向科學要求大眾的理解。」（劉暉譯；Bourdieu, 2001：73）。

福樓拜及波特萊爾看見文化工業被資本主義完全操控，他們認為傳播媒體正將一個墮落的定義強加於文化生產之上，即文化藝術奉資產階級的價值為合法價值；並迫使文化生產更趨墮落，由此，藝術品便能以商品的形式面世／銷售。他們於是拚力掙扎與資產階級劃清界線，創立一獨立自主的文化勢力領域。他們認為藝術家的價值，只能在創造藝術品時同時創造出來。亦即是說，藝術家的價值是自身的創造，並不是他人所給予，也不能換算為其他價值。

「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藝術家不單只抵抗資產階級對文化的侵略，同時也不會靠攏「人民」，堅決拒絕「社會派藝術」，拒絕將藝術創作變成政治社會階級鬥爭的工具。再者，他們認為，沒有受到太多文化教育的（less cultivated）普羅大眾，只推崇具實際功能的美學，總以滿足日常生活的標準來衡量藝術創作。Bourdieu指出，普羅大眾一般只能在藝術作品中，如按圖索驥般，去找出與日常生活世界出現過的實物或具體事件相類似的東西<sup>11</sup>，來作為理解這藝術品的基礎。Bourdieu稱他們在藝術作品中，只在尋找「見山是山」式的「超然獨立存在的喻意」（transcendent signification）（Bourdieu, 1993：219），而完全不能接受「藝術作為純粹的喻意」（art-as-pure-signification）。

故此，推崇「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藝術家其實是處於「雙向拚棄」的立場：她／他們既拒絕資產階級也拒絕人民；既拒絕資產階級藝術，也拒絕社會藝術（social art）。Lefebvre也清晰地說明，現代藝術基本上是在負面中的行動（the action in the negative）：「日常生活充滿高壓及抑制，要逃離它唯一的方法，就是完全瓦解它。」（Lefebvre, 2005：96）藝術家揭力去創造

一個另類的世界，否定以經濟商業世界的成功為價值，以獨立自創的文化美學標準及價值為最高的意義。Bourdieu定義這個「為藝術而藝術」的世界為「倒轉的經濟世界」（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這群文學家藝術家所發明的遊戲規則，乃是「失敗者便是勝利者」（a game in which the loser wins）（Bourdieu, 1993：169）。

這一群文學家為要將自己孤立於廣大的群眾，儘量避免作品被資產階級藝術及社會藝術利用，而淪為賺錢或控訴社會的工具。他們拒絕將作品交付大型商業出版社，只專門和小型的前衛出版社合作出版。詩人波特萊爾就是當時第一個與大型商業出版社劃清界線，並轉而將作品交付小型出版社出版的文學家。前衛文學家的特質，就是只會將作品寫給明白作品中真正意義的「知音人」來閱讀，其讀者群可以說是同道的創作人。因此，Bourdieu稱她／他們為「生產者」（producer），以別於那些資產階級藝術家——即專為「非創作者」的廣大群眾提供娛樂性文藝作品的文人。由於「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文學家出現，當時法國文壇出現了兩個旗幟鮮明的對立派系，一邊就是專門從事純粹文學創作及生產的純文學家，其讀者純是志同道合的創作人；而另一端當然就是大量生產的通俗文學家，其所面向的乃是不會從事文化商品生產的普羅讀者。

Bourdieu在《Distinction》中樹立的以對文化藝術的熟識程度及理解深度來定義「品味」，並定明「品味」的功能乃是階級的標記（markers of class）（Bourdieu, 1984：2）。由此定義／參照系統開始，Bourdieu著手去研究60年代法國的社會階級分層，其中位於最高梯次的階級，正就是那些最有能力去對藝術品從事辨識、注解其內含之重重符號意義的人們。這些人由於對藝術品進行長期的研習，因而能熟能生巧、潛移默化地理解藝術品，由此而孕育了「純粹的鑒賞力」（pure gaze），此即那自然而然便可洞識藝術品之本質及所涵蓋意義的美學能力。（Bourdieu, 1984：3）在眾多著作中，Bourdieu都強調真正

的文化藝術品皆承傳了該藝術內部系統的高深「意義」，例如具「純粹的鑒賞力」的人們，在某作品中，會看到作者如何在從該作品所屬的藝術類型出發，去體現所屬的藝術類型以及發展更創新的表象可能性。這等鑒賞者也能勾劃出該作品所顯現的時代精神或作者的表現手法，又能將同期的作者們在風格方面上作出比較等等。

然而，由20世紀60年代以降，到我們身處的21世紀，儘管很多城市都以大量的藝術品來作美化裝飾，同時也頻密地舉辦藝術活動來強化自身的形象，但其所表達的「藝術精神」，恐怕離開上述那最高層次的純粹藝術已很遠。充其量，現今的藝術都只能攀附在Bourdieu所定義之所謂「資產階級藝術」，或「中檔藝術」（middle brow art）的框架及水平而已——Bourdieu界定中檔藝術品乃是只為營利而投資生產的商品，它們的目標觀眾或讀者群就正是芸芸的平民大眾，亦即是「一般的觀眾」（average spectator）（Bourdieu, 1993：126）。

同時，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高明之處，就是看中了純藝術「不能被外行人明白」那種容易被神秘化的特質，因而順水推舟地以「超凡魅力的意識型態」（charismatic ideology），來將「藝術」作品（尤其是可被市場高價炒賣的視覺藝術）神秘化、魅力化。藝術品市場有兩條常勝策略：其一，是教導群眾將藝術品視為有別尋常日用品的「奇趣物」來觀賞，獲取的箇中經驗，就是新奇意外（surprise）及開心（fun）；其二，就是追捧藝術家為創造者，吹噓她／他們的創意，即為藝術品最原初及最高的價值。於是，觀賞的人們渴慕藝術家是充滿創意、充滿超凡魅力的人，所以對她／他們像明星偶像一樣崇拜。她／他們的一舉一動，也被看成為藝術的事件（artistic event）。由於藝術品充滿奇趣、藝術家就是明星，人們於是從此對「藝術」不再陌生，藝術品也因傳播媒體的不斷吹捧而變得「有價有市」。到了如斯的田地，我們不得不宣佈藝術已死。

要闡釋藝術已死的原因，Featherstone認為這是要歸咎於後現代文化的出現，同時，如前所述，新小資產階級的出現，也使得正統藝術名存實亡。他清楚指出現今我們身處的文化環境，已被後現代主義所涵蓋。後現代主義主張「抹掉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線，殲滅高檔藝術與大眾文化的之間的分別」；然而，後現代文化並不曾因為破壞了高級文化的崇高特質，而使得普羅大眾認識或理解到藝術在人類文明所佔據的位置。Featherstone扼要地指出後現代文化本質就是虛浮的「不同符號意義的玩樂式的混合」（playful mixing of codes；Featherstone, 2007：64）。

後現代主義強調日常生活美感化或藝術化，我們在Baudrillard的批判裡，更看出在我們身處各處都充斥著媒體影像，在符號的運用上，符徵（signifier）及符旨（signified）任意隨便配置的文化環境中，於是所謂「日常生活藝術化」其實就是將真實世界的實在性完全洗擦掉。人類創造文化及象徵，正是人類面對著世界，將之溶進自身的存在，衍生在世意義、真理及真實性的企圖與過程。然而，當今世代的文化卻將「文化」放在一任意、無意義（也即是無深度）的，浮遊不定的脈絡之中，將影像、語言和其參照系統脫勾，再自行胡亂搭配、分裂、虛擬。

Featherstone說得很對，現今世界，「藝術可以是任何事物與及在任何地方發生，藝術品也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他所言之現今藝術，已變成「反作品」（anti-work）：即藝術乃是指涉一些瞬間即逝的即興事件（happening），但另一邊，則所有事件都可被放置到博物館內、皆可「博物館化」（museumified），當作藝術或文化品去吸引大眾參觀。消費社會也勸信人們要將生活不斷「藝術化、美感化」：所謂的現代優質生活，乃是不斷擴充自我（enlarge oneself），追求表現／表演性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和內容，以及日新月異的享受。

眾多文化理論（Baudrillard、Bourdieu、Featherstone、Lefebvre、Williamson、Zukin等）都指出在城市之內，日常生活的環境充斥著無數影像，但幾乎所有影像都被商業活動所利用——這即成為了廣告的強大勢力。廣告幾乎控制了所有城市影像的生產、展示與演繹過程，也充斥在城市的每一角落。Baudrillard認為在現今世界所有符號都已變成商品符號，如上述，廣告大舉透過影像來指導人們如何生活，及如何生活得有意義。

Baudrillard認為，所謂日常生活「美藝化」（美感化、「藝術化」）的美譽，其實是指世界已不能再將影像與真實清楚劃分。總括而言，世界商品化、符號化及日常生活「美藝化」，這兩件事基本上是同出一轍的。

Baudrillard認為現今的文化環境，一切「真實」已變成「過度真實」（Hyper-reality）。他一針見血地勾劃現今世界的虛無：我們現在生存正陷於「美藝幻覺」無處不在及已經存在的環境，由此，現實已被「美藝幻覺」所吞併、吞噬，亦即現實已不能和「噩影」分別開來（We live everywhere in an aesthetic hallucination of reality.）（Baudrillard, 1983：148）。在這一美藝幻境中，還有甚麼是藝術呢？對此問題，Baudrillard有以下的回答：人工製品（artifice）已經進駐真實（reality）的心臟，藝術因此隨處都存在。但藝術也因此而死亡了，不單只因為藝術賴以界定其本質的批判的超越性（critical transcendence）已經遠去，更重要是，真實的本身，也因為整體被「美藝化」，故此已不能離開「美藝化」而界定其本有的結構——亦即是說，自身也與「自身的影像」合而為一，變得混亂不堪（Featherstone 2007：68）。

這段文字所點出界定藝術的批判的「超越性」（critical transcendence）（Baudrillard, 1983：151-2），其實與Bourdieu用來界定純藝術內部的符號系統（codes）及其意指的意義範圍（sphere of meaning of the signified）是平行的。而曾與藝術相對立的真實，在Featherstone的分析文本的脈絡中，我們可

理解為那「曾經是」工業社會中的日常生活。但是，這仍意味具有真實內容的生活經驗已被抹除了：人們現在只醉心於以消費主義提供的影像及模型去營造時尚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於是乎變成了以追尋虛構事件與奇異繽紛為尚的活動（Featherstone, 2007：98）。

如今，我們經驗到藝術經已死亡，而與此同時，日常生活也在消費主義及後現代文化的操控扭曲下，整體地失去真實性。

本篇文章借用了各個著名的社會學家的理論，闡述了在工業化社會到現今後工業社會及後現代文化的覆蓋下，日常生活涵意的變遷。透眾多學者的批判理論，我們會發現，那好像平平無奇的日常生活其實隱藏著嚴重的危機——我們可以說，那是威脅著人們在世生存的危機。Lefebvre在《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第3冊（2005）中，指出假若我們要問「甚麼是都市空間？」或「甚麼是一個城鎮？」等貌似在經驗層面出發的問題，我們其實是在問「甚麼是人？」、「人與其存有（being）的關係為何？」，以及「人與其存在於其中的空間關係為何？」等涵蘊著人的定義的深層哲學性問題。我們必須從這最根本處出發，去批判地理解當今城市環境的營造，以及細心分析在這環境衍生的日常生活，以圖發現現代城市文化在深層處對人的在世生存的承擔之種種可能性的條件（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在宏觀的層面，我們見到全球經濟循環中資本主義無孔不入地運籌、擴展其勢力；落實到微觀的具體層面，我們發現資本主義一脈相承化為消費主義對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整體的控制。本書理論部份的第一章描述了David Harvey的歷史地理學對資本主義批判，宏觀地審視了現代都市的形成及轉化；再者，我們承接了這歷史地理學的橫向開展脈絡，縱向地借用了Lefebvre、Bourdieu、Baudrillard以及Featherstone等當今重要的社會學家的理論，以揭示現今都市文化（由藝術到日常生活）如何整體受到消費主義的完全控制。由

此全面而深層的理解，我們清楚地明白到現代文明已被資本主義、消費主義重重圍剿。我們在此導論部份的三個章節，所闡述建立的理論架構，正好用作武器，對下文所挑選的三個城市的文化實踐及其背後的意識型態作深度批判。

## 注釋

- 1：中文譯《日常生活批判》。
- 2：中文譯《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
- 3：中文譯《節奏分析：空間、時間與日常生活》。
- 4：中文譯《秀異》。
- 5：中文譯《解碼廣告》。
- 6：中文譯《現代生活的描述者》，1863。
- 7：中文譯《拱廊街計畫》。
- 8：中文譯《後現代城市主義》。
- 9：中文譯《日常的遺蹟》。
- 10：中文版《藝術的法則》，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 11：在《The Love of Art》一書中，Bourdieu引用了一個工廠工人看完了某博物館展覽後所做的評語：「我喜歡所有畫有耶穌的圖畫」（頁48）。



第2部  
城市空間文化研究個案篇

東京

# 引言：回歸亞洲

## ——東京城市空間發展的轉向

在深入描述及分析東京兩個地區（六本木及神樂坂）發展的個案之前，在此有必要先簡單介紹東京自1980年以來的都市發展進程。我們認為只有以歷史發展作為基礎脈絡，其後帶出對個案的深入研究，才能夠得出更深層次的理解及批判。

大部分有關東京都市發展的研究，集中以Sassen（1991）的經典著作《The Global City：New York, London, Tokyo》<sup>1</sup>為出發點。在該書的陳述中，Sassen將東京、倫敦及紐約並列為世界最頂尖的三大全球化都市。Sassen在第一章扼要地界定了「全球化城市」的特徵：即該城市為世界主要經濟、金融機構、高度專業化服務行業的集中地，並且同時為創意產業的生產基地及新開發產品的市場。

此書初次於1991年出版，大致總結了這三個城市於90年代以前的發展。80年代正值日本經濟發展最發達的黃金時代，Douglas（1988：438）指出，此一時期的世界最頂尖20大企業中，有7間是日本企業；也即是說，世界上最

龐大的企業約有20%或以上的源頭是日本資金。他認為1980年代可以稱得上是日本資金「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漸趨成熟期。很多有關東京都市發展的研究,無不以1980年代為起步點。於此時期,日本跨國企業的資本不斷膨脹,其製造業及產品漸漸雄踞了世界整體市場的重要份額<sup>2</sup>。

在這世界經濟形勢中,日本的跨國企業運籌於兩個龐大的資本流動領域/網絡之中:那就是(1)世界的整體先進資本國家的網絡,以及更集中的(2)「環西太平洋」範圍(Western Pacific Rim)的經濟領域。東京作為日本的首都及最主要城市,也隨之而不斷擴張發展。東京成為日本眾多跨國企業的總部所在地<sup>3</sup>。

80年代的日本政府,認定東京一定要成為一個世界城市,以吸引國內及國外的資金投資;因此,此一時期東京的發展主題,就是「國際化」及「世界城市」。於是,大量的土地便騰空出來,以準備作大規模發展。其中,辦公室空間的需求最為迫切,並且,流暢而頻密之交通網絡也是重要且必須的配置。整個城市若要成立「世界城市」的規模,兩者的發展是刻不容緩的。除此,資訊社會也逐漸成形,高科技的基礎建設更是要火速成立。

據Herbbert及Nakai的描述(1988),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當時的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及巴黎市長雅克·希拉克同樣是新保守主義的支持者。在1980年代的早期,中曾根康弘對東京的規畫政策積極推行了「拆牆鬆綁」(Deregulation of Town Planning)、同時也實行了私有化以及減省開支的政策;其目的正是為了增強日本在國際間的競爭力,全力在全球化環境中把東京打造成為世界城市<sup>4</sup>。其中,中曾根有關都市的「拆牆鬆綁」政策,乃集中於鼓勵東京市中心進行大規模重建、放鬆樓面面積及樓層高度的限制,並在市中心多建公共空間。同時,也放寬於市區邊緣地帶的發展規限。

1980年中期以後，東京的都市空間急速發展起來。Saito及Thornley於〈東京之世界城市地位的變移及其城市規畫的回應〉（Shifts in Tokyo's World City Status and the Urban Planning Response）（2003）一文中，指出1980年代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對東京的影響極為深遠：日本的企業廣泛國際化，服務性行業昌旺，使得東京市區內的辦公室空間嚴重欠缺、奇貨可居，這情況也自然使得地價飆升。為配合經濟的急速增長，市區重建項目也不斷增加，由此，在社會上，最大的負面影響就是社區潰散。

在中曾根康弘的領導下，日本中央政府提出了多個計畫，不斷強調東京都心區的發展重要性，同時更發出指令，認為都心區要發展為容納國際金融、商業、政治、行政、國際會議及展覽的空間。

根據Saito及Thornley（2003）的文章，在政府的政策報告書中，「世界城市」這個詞彙不斷出現在有關東京發展的政策中。隨著「拆牆鬆綁」政策的實行，東京都不斷出現「超高層」大樓及甲級辦公大樓，也有越來越多高價豪華住宅。同時，大量的休閒空間也在此時不斷落成：商場、地下商業街、音樂廳、博物館等。這說明了日本政府銳意將東京發展成為一個世界商業中心，作為國內及國際間資訊流動網絡的主要節點（node）。總括來說，日本的野心，就是把東京發展成為在世界中擔任領導地位的「世界城市」。東京市內的具體發展，就是除了以丸之內區為中心點作為都市重建的重點外，更把山手線所經的重要大站如：新宿、澀谷等積極發展為「副都心」——新宿將會成為國內企業行政總公司或大企業的支援系統及行政辦公空間，澀谷是時裝與媒體事業的中心；而東京臨海區（Tokyo Waterfront）則會發展成為全球資訊科技的中心。

整體而言，在1980年代日本中央政府、地區政府以至市政府，皆從創造資金利潤、吸引外國或國內投資的方向去評價城市，並制定城市的發展方向與

策略。亦即是說，各級政府把城市徹底地視為一項商品，而非「資源庫」，其發展的目的是支援市民生活、文化的各項需求。

由町村敬志（Takashi Machimura, 1998）所寫的文章〈Symbolic Use of Globalization in Urban Politics in Tokyo〉<sup>5</sup>指出，東京以「國際化」為發展方向，實則是延續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日本「西化」或「歐化」的改革方向。事實上，由「西化」或「歐化」到「國際化」、「全球化」，皆是以建構現代的具體事物為進步的象徵。尤在日本，無論是國家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其所出版的都市發展研究刊物，皆將東京定位為「世界都市」。這等刊物不斷將東京與世界各大頂級都市例如紐約、倫敦及巴黎比較，並且不斷強調東京在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據町村敬志所言，不斷強調東京為全球化都市，正好將都市重建的行動合法化，東京必須不斷改善其都市面貌、增強其基礎建設系統，以持續發展、維持其在世界上的競爭力。

町村並提到，儘管社會主流的意識型態不斷發放「全球化」作為城市正確的發展綱領與方向，但是在實際層面上，東京的市民卻實實在在地感到所居住的地區被重構／重建而帶來的壓迫。在具體生活方面，1980年代，重建計畫主管機構聘用不法份子恐嚇不願搬離舊區的居民，又關閉一些傳統上作為街坊聚腳的空間，由此而嚴重削弱了社區的凝聚力；同時重建使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也使得物價百物騰貴，迫使很多居民必須搬離東京都中心。在另一方面，政府及發展商為了減少直接面對重建區住民的抗爭，都盡可能另覓阻力較少的地區去發展：例如公共用地、填海地，或棄置的工廠用地。於是，公共資源都用在這些「處女地」上。而在都市生活文化論述方面，正當政府及財團浩浩蕩蕩地將整個都市規畫、以配合「全球化」的發展，在地市民卻死硬地堅持著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及固有的生活方式，甚至進而刻劃表象成為身份象徵及自我認同的要素。

由此，町村很清楚地指出，所謂「全球化」的影響，正在人們具體實在的生活空間環境顯現出來。在這個脈絡去理解「全球化」及「本土化」的對立，確有著明顯而具體的分別及對立張力。

於1999年小淵惠三上任為日本第84任首相，他委託了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長河合隼雄統籌了「21世紀日本的構想懇談會」。於2000年，該懇談會出版了以題目名為《21世紀之構想：日本的極限在於日本的內部——以自立及協治來建築新世紀》<sup>6</sup>之報告書。報告書中說明，「全球化」已重新被肯定為日本之發展方向及主題。這顯示「全球化」被認定為當今世界21世紀的真實面貌，而不再只是進展過程。大眾媒體及市場將世界一體化，人力資源、商品、資訊、媒體影像自由、大規模地高速運轉。在此情況下日本必須銳意發展其科學、文藝的教育，以配合全球一體化發展的大方向，尤其在語言方面，報告書鼓勵日本人學習英語，以增強與國際對話能力與掌握資訊溝通的技能。

在這個報告中，日本政府重新以「全球化」這個意識形態來釐定其發展方向，尤其是在於首都東京的城市發展方面。它重點地強調東京與其他（亞洲）城市的激烈競爭：於21世紀，日本政府不再如80年代時只視歐美第一大城市如倫敦、紐約等為比較並列對象，反而實際地正視亞洲的大城市如上海、香港、曼谷、吉隆坡等為競爭對手。

2000年的《東京都市白書》，其副題就是「增加世界城市——東京的吸引力」。這份都市白書提出了四個發展方向：（1）經濟動力；（2）高素質生活環境；（3）都市文化及旅遊；（4）完善及功能效果顯著的交通網絡。

Saito及 Thornley（2003）於此指出，日本人很瞭解城市的競爭力正在於其對國際資金及遊客的吸引力。我們可以留意到，這份都市白書特別強調了旅遊業的發展。Saito及 Thornley也指出，於此時期，政府不再簡單地把東京直

接視為「世界城市」，而是實際地把東京放在亞洲、甚至環西太平洋的地理範圍內，思考如何讓城市更具吸引力而能在激烈的城市競爭中勝出。

在東京的規畫方面，其焦點在於重新整頓都市中心區（即在JR山手線範圍以內的地區），使之成為商業及住宅共融的工作生活空間。政府的策略，就是使其密度增高，廣建高素質多層商廈及住宅。

總的來說，在東京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執政底下，東京的城市發展的方向，乃是由80年代的以供求帶動為主題，轉為由政策所領導為主題；都市的形態，也明顯地由傳統的所謂中央商業區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為焦點，轉到所謂「ABLE City」——平行注重設施（Amenity），營商（Business），生活（Life）及環境（Environment）的形態。

東京的發展轉向，是力求將東京變成一個無論工作、居住及休閒都極具吸引力的城市：在工商業方面，東京集中於高科技，媒體創意工業的發展；在居住環境方面，不斷建造高素質的豪華住宅區；在休閒空間方面，則將東京臨海地區改建成為舒適及吸引旅客的消費空間。再者，為了增強東京的國際聯繫網絡，東京市政府將羽田機場從本來的國內機場變為國際機場。

於2007年，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07年在第一次都議會定例會上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提到，「為東京的未來描繪出一幅清晰的遠景」。該演說之主要大綱，乃在於說明東京在地理上要做好準備，預防可能發生的大地震、在環保課題上實現為「綠意盎然、空氣清新的舒適都市」，以及在社會課題上要「創建為高齡社會的新型都市楷模」；除此以外，最為我們留意的，在於他加重強調旅遊業的發展。東京城市空間的發展，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使東京成為世界上最熱門的觀光都市之一。同時，石原於此時清楚地提出了申辦2016年奧運會的意願。

以上論述之東京城市20年的發展，成為我們對「六本木／東京中城」及「神樂坂」兩個地區的研究脈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見到近年東京市政府容許私人資金大量參與東京市區的土地發展，也由此成就了循著消費主義路線而發展的城市文化新方向，這逐漸成為東京市中心的主流表象。正當所有國際媒體的「休閒生活旅遊」版一旦提及東京就離不開「六本木／東京中城」文化圈之際，我們卻退隱至神樂坂，期望真正感到東京人對傳統與生活的詮釋及表達。

## 注釋

- 1：中文譯：《全球化城市：紐約、倫敦、東京》。
- 2：日本於這個時期，成為重要的商品出口市場。此外，日本的金融業、電子業、建造業、房地產、創意工業亦都作長遠發展。
- 3：據Saito及Thornley（2003）研究顯示，很多頂級跨國企業及銀行的總公司皆設在日本，然而這些跨國企業及金融機構，大部份皆是日資機構，而不是外國企業。從這角度視之，東京只能算是一個日本面向全球推展的城市，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全球化城市。東京的成功只能視為日本企業經營的成功結果。
- 4：根據Saito及Thornley（2003：169），中曾根的主張著重於把東京提升成為世界城市，同時擔任推動全日本經濟的引擎之角式。
- 5：中文譯〈東京都市政治中全球化的象徵性使用〉。
- 6：原文為：〈21世紀日本の構想：日本のフロンティアは日本の中にある—自立と協治で築く新世紀—〉。



# 藝術消費、消費藝術

## ——六本木新城（六本木ヒルズ）

2004年，日本成美堂出版了《東京：首都圈未來地圖》。卷首之重點報導，正是六本木新城的發展規畫。這篇對六本木新城的介紹，點出了這項東京市內最矚目的重建計畫的主要發展方向，乃是要建立平衡「職、住、遊、憩」的生活複合空間。這個計畫完成之後，聲名大噪，成為當今世界上城市重建的典範。據Elberse, A., Hagi, A., & Egawa, M. (2007) 所言，六本木新城是一項世界各國的企業家都一致讚賞的偉大成就。陳偉，張帆及廖志強（2006）的文章〈日本東京六本木新城建設對上海城市規畫的啟示〉一開始就稱頌六本木新城：「日本東京六本木新城可以成為未來城市建設的一個典範，它提供了一種未來城市復興的方式、一個未來城市生活形態的範例、一份提升城市魅力的建設宣言」（2006：55）。

到目前為止，世界潮流仍然吹捧六本木新城在城市重建上所豎立的典範；然而，如果從都市研究的批判角度去審視這整個空間建構，便會發覺其中暗藏了一個資本主義運籌為主導、消費主義被推展至極致的龐大系統。在這個系統之內，藝術文化明顯而徹底地被吞併、消化，同時改頭換面，重新包裝，成為

消費主義推銷賣點；繼而，現代人的生活文化也成為消費主義操控下的虛擬「品味生活文化」。為要對六本木新城作精細之分析及批判，我們首先需描述該地段之背景歷史、重建該地段之源起、以及六本木新城整體空間規畫設計，由此揭見其內藏的策略。

## 六本木地區之背景歷史

六本木區位於東京的中心赤坂以南，麻布以北的地區，是東京的中心區域。據說在江戶時代，六本木的名稱源於六個漢字姓氏（青木、一柳、上杉、片桐、巧木及高木）<sup>1</sup>中有木字部首的家族居住在此地區有關，故此地區稱為六本木（日語中「本」是量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進駐東京並接收六本木一帶的軍事設施，並設立了包括美國大使館及其他各國的40個大使館、10間國際學校等外國設施。此後，大批為外國人而設的商店與餐飲業在此開業，六本木遂演變成酒吧、夜總會、夜店林立的繁華地區。1980年代後期，夜總會數目達數十家之多。由於大量夜店聚集，六本木一帶的治安亦逐漸變壞。根據Whiting（1999）的引述，六本木的交通交匯點正是日本的黑幫主要活動場所。

據Elberse, A., Hagi, A., & Egawa, M.（2007）之說明，該區的主要發展商是森大廈（森ビル）株式會社之總裁森稔（Minoru Mori），他在小淵惠三政府時期出任經濟對策閣成員時期（1998－2000），提出活化東京、使東京能夠增強其競爭力的方案。並且，他認為要提高市民的生活素質。於此，東京市的都市空間應採取縱向發展策略，以代替當時所遵行的不斷橫向延伸的空間擴展，讓東京市內可騰出空間以增加其綠化程度，同時也能大量增加居住空間，使更多人能在城市內生活，減省每日往來郊區住所及市中心工作地點的交通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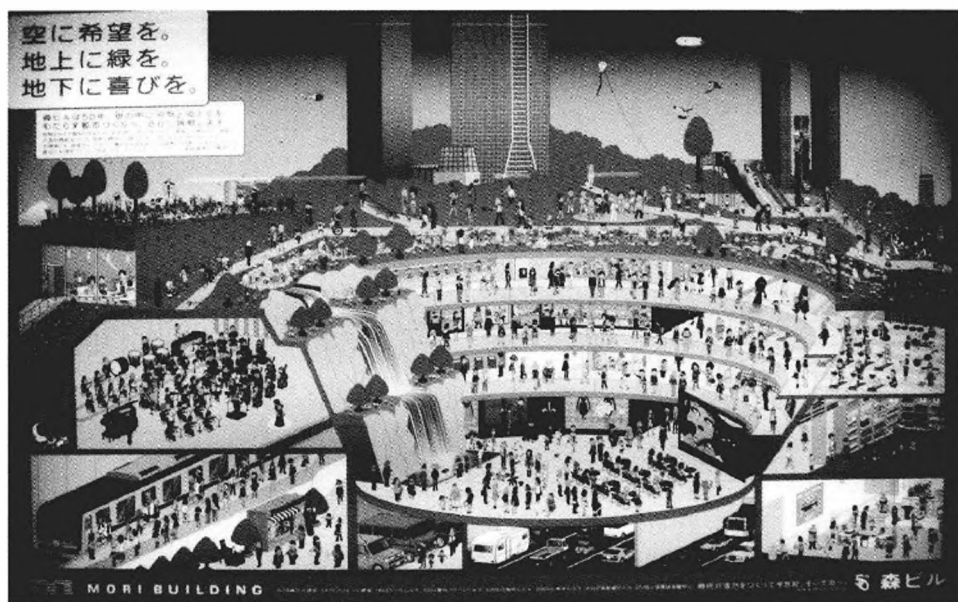
間耗費。森大廈株式會社所負責重建發展之六本木新城，就是依據此理念發展的首個項目。

總裁森稔在森藝術博物館所出版之刊物：《Art, Design and the City Roppongi Hills Public Art Project 1》（アート.デザイン.都市：六本木ヒルズパブリックアートの全貌1., Morita, 2004）的導論中，很清楚地介紹六本木新城之發展策略：

（1）日本傳統城市文化之延續：森稔（與及著名建築師槇文彥）在此書中，首先把六本木新城與傳統的門前町<sup>2</sup>相提並論。據槇文彥的解釋，門前町乃是自日本中世紀（即約由十二世紀末鎌倉幕府到十六世紀室町幕府）至江戶時代，位於寺廟門前的商業、娛樂與休憩的社區空間，人民在其中可暫時放下階級之間的規範與距離，貴族武士和庶民可以一同尋歡作樂。他們將六本木新城定位為門前町的現代版。此種觀點企圖將六本木新城與傳統以降的城市／庶民文化空間相提並論，使日本人以此熟識的歷史形象來接受六本木新城。但是，最諷刺的是，六本木作為東京最著名的紅燈區這個事實，在這本刊物中卻隻字不提。

（2）由藝術誘發之品味生活空間：在其英語導論中，森稔宣稱：現代人們有一個使命，那就是接受藝術及智性修練的啟蒙。他將六本木新城定位為一個站在資訊時代前線的高級藝術文化品味的生活空間。六本木新城包含了一級辦公大樓、藝術館、圖書館、電影院、公園、高檔時裝店及餐廳；區內的平臺街道皆佈滿著名藝術家創作的雕刻品。這些硬體，正好用來包裝一種充滿文化及藝術氣氛的、工作與休閒共融的高檔次品味生活。

（3）藝術作品街頭化：森稔宣稱滿佈六本木新城的街頭及平臺的藝術坐椅及雕刻品打破了博物館保衛森嚴的展覽文化傳統。六本木新城的街頭藝術品



在地下鐵車站見到的森建建築物（包括六本木新城）的美好空間規畫宣傳海報

不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它們可以是人們約會的會合點標記，又可以是家庭攝影的背景；並且，有部份街頭藝術品甚至可以變成「遊樂設施」，讓小孩攀爬。森稔的描述，似乎將把藝術品放在街頭，讓遊客隨便接觸，等同於讓人們更接近，繼而能深入理解藝術。

在六本木新城的設施指南中，日本森大廈株式會社董事長森稔宣稱六本木新城是東京的最新文化中心。發展商也清晰把這個都市重建計畫定位為：「融和藝術，娛樂的完美都市空間」<sup>3</sup>（Morita, 2004：2）。由此角度視之，六本木新城並不是單單是一個購物商場，而是集商業工作空間、文化設施、高檔住宅於一身的「城中之城」。

六本木新城被命名為Artelligent city（日語以片假名直譯其音）：這個字就是結合了Art（藝術）和Intelligent（智慧）。發展商創作此英文名稱，就是將六本木新城以「智慧與藝術融合的城市」的形象作定位、包裝設計及宣傳。在規畫中，森稔表示，六本木新城並非是以一個獨立的建築物去構思，而是一個整全的生活及工作環境；它不僅提供了購物及娛樂的空間，顧客更可以「在娛樂天地擁有充實的藝術和生活空間」<sup>4</sup>——因為六本木新城除了一般商場的購物及餐飲場地外，更設有美術館、會員制圖書館、露天廣場等「文化場所」。同時，發展商更以大量名設計師或藝術家所設計的街頭座具（如內田繁的「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吉岡德仁的「Chair disappears in the rain」）來包圍商場之空間範圍，這一舉一動都充分顯示建造一座「巨型綜合高檔文化城」<sup>5</sup>的決心。森稔宣稱六本木新城是一個可以讓人完全投入於文化，藝術，音樂及電影的新都市中心。

如上述，在六本木新城中到處都是名藝術家、設計師的作品，森美術館不時的展出現代藝術展覽。遊客或消費者身處其中，在商業味道甚重的名店中間，或多或少也感染到這些作品所製造的「文化氣息」。

然而，在日本，藝術這個非商業元素在商業空間出現並非新鮮事物，百貨大樓與博物館連結早已經在日本出現：日本許多大型百貨公司皆在頂層附設展覽廳。一些極優質的藝術工藝展覽，都是在這些展覽廳舉行（例如於2007年8月東京日本橋三越舉行了日本陶藝家北大魯山人展）。在日本，日常生活及藝術與消費的關係已經成為錯綜複雜的混合體。附設藝術展覽廳的確能提昇百貨公司的層次，但藝術還是與消費活動相隔，勉強可保持其本身的價值及意義。在大型百貨公司頂層之展覽廳，皆遵循傳統展覽方式陳列展品，並且收取參觀入場費，使參觀者有距離地欣賞展品。然而，六本木新城之設計，卻讓行人近距離和藝術品接觸，還開宗明義地界定及宣揚藝術品為約會的「集合點」標記，或是拍攝照片的背景（2004：29）<sup>6</sup>。

究竟六本木新城的策劃與設計是否如森稔先生所理解，真能改變人們在消費空間的活動模式？又或是否可讓市民大眾有更多機會認識文化藝術，並支持及普及藝術發展的新出路？抑或，藝術已淪為替商業服務，成為商品或消費活動的附加價值（added value），而徹底失去自身獨立的存在價值？我們對六本木新城進行分析，意圖正式回答上述問題；而終極期望，乃是藉由Lefebvre到Bourdieu、Baudrillard的理論，以檢視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對文化及藝術的本質性破壞。本文目的正是要剖釋六本木新城以藝術及文化來作包裝之背後動機。以下段落將會描述六本木新城的整體空間結構及組件內容。

## 六本木新城——Artelligent city的誕生

六本木新城可分為五個區域，主要根據不同的用途而規畫；分別是（1）北方大廈（North Tower）、（2）地鐵明冠（Metro Hat）及好萊塢美容美髮世界（Hollywood Beauty Plaza）、（3）庭園側步行區（Hill Side）、（4）西側步行區（West Walk），及（5）六本木櫻樹阪大道（Keyakizaka）區。（見附表1、2）

## 六本木新城發展概念

### 1. 文化與藝術：消費空間的襯托物

六本木新城以「Artelligent city」<sup>7</sup>作口號，宣稱此地為藝術、文化和知識性活動的集合場。由以上陳述之空間及設施佈局列表可發現，主要的公共藝術品，通常是放在六本木新城最貴重的商業空間，例如大型鋼鐵蜘蛛雕塑「Maman」放在「地鐵明冠」的出口、商場、電影院的入口的交匯點——從某一角度視之，「Maman」剛好成為六本木新城森大廈及商場的襯托物；而



<p>3 北三大廈 North Tower</p>	<p>時裝店 珠寶店 化妝品店 便利店 餐廳（中式餐廳、 西式餐廳及咖啡 店）</p>	<p>相連設有噴水池及免費座具的66廣 場 （露天廣場）</p>	<p>地鐵日比 谷線六本 木站相連 入口</p>						
<p>4 西側步行區 （West Walk）</p>	<p>健康及美容服務 精品店 室內裝飾用品 珠寶店 時裝店 餐廳（日式、西式 及中式） 健康及美容服務</p>	<p>相連設有噴水池及免費座具的66廣 場（露天廣場）</p>	<p>收費停車 場</p>	<p>高10米 的蜘蛛藝 術裝置 “Maman”</p>	<p>銀行 郵局 商務中心</p>	<p>櫻阪公園 （免費）</p>	<p>11件名師 設計的街 具</p>	<p>屋上庭園</p>	<p>高級服務 式住宅</p>
<p>6 六本木新城森 大廈</p>	<p>名牌服裝店 餐廳（西式餐廳及 咖啡店） 書店及唱片店 （相連咖啡店）</p>	<p>辦公大樓</p>							



附表2：六本木新城區設施及特點

區域	特點
<p>1 庭園側步行區 (Hill Side)</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露天廣場設有巨型遮雨蓬的公共休憩空間。平日廣場上均會放置大量的桌椅供遊人使用，朝日電視台的大型電視螢幕為使用廣場的遊人提供娛樂。每逢假日或特別假期，例如聖誕節或新年等，廣場上更出現多項免費大型節目或慶祝活動。</li> <li>● 免費開放庭園，設有大型人工湖及綠化園林</li> <li>● 樓高250米及擁有360度視野的觀景台，能觀賞整個東京的景色。東京城市觀景台 (Tokyo City View) 與森美術館 (Mori Art Museum) 相連。</li> <li>● 每逢週末通宵營業的電影院</li> <li>● 森大廈內所有文化設施均為收費場所 (森美術館及學術中心) 及只供收費會員使用之場所 (六本木圖書館)</li> <li>● 六本木新城森大廈內的會員制俱樂部設有只供會員使用的8間餐廳和5間酒吧</li> <li>● 電視台入口設有商店及咖啡店</li> </ul>
<p>2 地鐵明冠 (Metro Hat) 好萊塢美容美髮世界 (Hollywood Beauty Plaza)</p>	<p>裝置大型電視螢幕的入口與地鐵都營大江戶線 (とえいおおぞせん) 六本木站相連。</p> <p>圓柱形玻璃建築，時刻轉變的燈光效果不斷投射。區域內設有健康及美容服務、餐廳、時裝店及精品店</p>
<p>3 北方大廈 (North Tower)</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與地鐵日比谷線 (ひびやせん) 六本木站相連入口</li> <li>● 底層設有內設有餐廳、時裝店、珠寶店及化妝品店等。</li> </ul>
<p>4 西側步行區 (West Walk) 六本木樹木大道區域 (Keyakizaka)</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森大廈內樓高五層的大型購物中心，各層有不同的商店：一樓：巴士站及的士站二樓：原創及本地新的服裝品牌；三樓：高級室內裝飾用品、珠寶店及時裝店；四樓：健康及美容服務；五樓：餐廳 (和式、洋式及中式)；六樓：醫療設施及商業設施</li> <li>● 六本木樹木大道長約400m的大道集中了國際名店、裝置藝術品及高級餐館。名牌服裝店，包括：LOUIS VUITTON、GIORGIO ARMANI、LUIGI BORRELLI、LA PERLA、Tiffany &amp; Co.、Max Mara、ESCADA Boutique、HUGO BOSS、Loro Piana、FRANQUEENSENSE The Lounge、Baccarat Shop Roppongi、Fellisi、Kiton</li> <li>● 六本木新城住宅區 (Roppongi Hills Residents) 內4棟高級服務式住宅大樓旁邊的櫻花阪公園內設有色彩繽紛的兒童遊樂設施及60棵櫻花樹排列成的散步道由名師設計的街具及裝置藝術</li> </ul>
<p>六本木新城森大廈</p>	<p>無柱構造的辦公大樓</p>



Maman 蜘蛛雕塑旁邊就是商場入口。昂貴藝術品其實是商場門口的裝飾品。

玫瑰則位於好萊塢美容美髮世界一側，並且巧妙地與遠景中之東京鐵塔互相輝映。東京鐵塔由此被「借鏡」而成為六本木新城的景觀；而名設計師或藝術家所設計的街道家具，則列排於六本木櫟樹坂大道（Keyakizaka）——那是一條集中了國際第一流名牌時裝專門店、高級餐館、精品店的街道。

作為六本木新城中心地標的大型鋼鐵蜘蛛雕塑「Maman」，乃是法國著名藝術家Louise Bourgeois的作品。在六本木新城的「Maman」當然並非獨一無二的作品，眾多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館均收購這個雕塑品：「Maman」複製版本分別被安置在加拿大渥太華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Ottawa），俄羅斯聖彼得堡艾米塔吉博物館（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韓國首爾三星現代美術館（Samsung Museum of Modern Art Leeum, Seoul），

法國巴黎杜樂麗花園 (Jardines Tuileries, Paris)，以及設於英國倫敦之泰特現代美術館 (Tate Modern)<sup>8</sup>。由於通常被放置在各大美術館博物館的入口附近醒目的位置，它已成為了頂級博物館的如門神般的象徵，或大門旁的「金漆招牌」；而放置在六本木新城的「Maman」蜘蛛雕塑與其他7大博物館門前的蜘蛛雕塑一模一樣。這很明顯地說明，發展商希望藉著此雕塑來帶出「索引」式符號 (indexical signs：即以部份代表全部) 象徵；意即，有了此一雕塑，六本木新城便在象徵層面得到與各舉世知名的博物館一樣的地位，即是鎮守現代藝術的代表空間。亦由於擁有此充滿象徵意義的符號雕塑品，也讓人們認為六本木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項目，而是融合了「藝術」的空間。

除了在正門入口及主要街道放置的大型藝術品外，露天廣場還不時舉行各類音樂會、表演節目，並因應不同節日舉行相應的表演慶典；位於森大廈的森美術館則舉辦各項時裝、建築、設計、攝影的展覽。同時，於森大廈所設的六本木新城俱樂部和學術中心亦經常舉辦講座；整個區域都似乎充滿了有關藝術及文化的活動。六本木新城的市場策略，乃是透過精心計畫的宣傳，將之渲染成最前衛流行的文化藝術集中地，是一座「巨型綜合文化城」，而非一般的大型商場——所有的設計與裝飾，都在強調這裡是藝術及文化的愛好者的交流平臺，以及讓平民百姓就近認識藝術文化的環境。

我們特別注意到的是，森美術館作為主要展示現代藝術的場所，其展覽主題並不只是純藝術，一些在日常生活大眾文化中出現的潮流、休閒物品也成為展品，例如：流行漫畫，著名服裝品牌或精品的系列。

據森稔所宣稱，那些在六本木新城到處可見的雕塑及公共街道座具，破除了傳統藝術品高不可攀的形象，它們並非放在博物館的展覽廳或密封的玻璃箱內，令人敬而遠之、不可觸及。相反的，這些大型的作品擺放在公眾場所，隨意讓遊客參觀、觸摸、作背景拍照甚至是供小孩攀爬玩耍。如此，人們可以隨

意與藝術品接觸，但同時，這些外形出眾的雕塑街具亦使得整個空間的趣味性增加，因而間接地延長了遊客在這消費空間逗留的時間，增加了他們消費的可能性。

六本木新城以「文化藝術化」設計空間佈局，加上大量文字宣傳渲染，其目的是為了要帶出一個口號：「讓你和藝術設計從此零距離」。如果深入探究，我們會發覺，這其實是在說：「讓藝術及設計走進你的生活，讓藝術及設計所襯托的消費生活成為你的生活。」把藝術融入消費空間中，讓藝術提昇消費活動的格調及層次：這是發展商十分高明的計算及策略。人們在商業空間、進行各項消費活動的過程中，突然看見一個著名藝術家創作的作品，帶來的是額外的驚喜，由此而拿起有拍照功能的手機，以作品當背景拍照留念，這確實會為消費活動更添樂趣。又或者，因新裝置的藝術品出自名家之手，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人們為一睹名家創作而從四方八面蜂湧而至，使之成為都市著名景點，於此同時，周遭佈滿了富有吸引力的名牌商店、高檔餐廳、咖啡館，於是遊客也不免開始購物消費。現今世界，「文化」或「藝術」，已成為以消費為主題的城市空間設計不可或缺的、必勝的宣傳技倆。

## 2. 商業購物空間設計

典型商場（例如：「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香港的「時代廣場」及「又一城」）很多都是採取「展示全景式」（Panoptic）的空間佈局，即是只要遊客在商場任何樓層環視，都幾乎可見商場內大部份的商店。遊客根本不需要親身到達每個樓層，也可以清楚知道商店的分佈及各樓層所售賣的商品類型。在這樣的設計下，人們可以因應自己不同的購物目的而選擇到該樓層：例如在「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家居設計品及傢俱商店都集中在三樓。

然而，六本木新城中的商場——West Walk，卻一反這個以商店／商品全面展示、購物為大前題的空間佈局。在六本木新城的介紹中，West Walk以畫廊／展覽廳（gallery）的設計為主題，縱向上有瀑布式噴泉由屋上庭園的空間直瀉至底層，同時在中庭的空間，開放了四層樓作商場。這四層樓的佈局是採取錯落蜿蜒的橫向設計，商店不規則地安排在路旁，人們漫步其中，有時會走到如陽台般的凸出空間，稍作逗留或向四周觀覽；又有時同一層樓不同路段用橋作橫向的連接，如此曲折的空間，誘發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瀏覽，以獲得對這個地方的全面感受和理解。這種迂迴曲折的空間其實營造了「遊歷」的體驗，其效果實在顯而易見：延長遊客在商場逗留的時間，也增加他們在「遊歷」過程中「發現」商店的樂趣。

在六本木櫸樹阪大道的兩旁，放置了14組雕塑傢俱作品。這些都是世界著名的藝術家、建築師、設計師的作品。然而，大道旁的建築物也儘是世界頂尖的名店——其中包括Lancel, Giorgio Armani, Ferragamo, Louis Vuitton, Le Chocolat de H.等。在這條大道上，雖然裝置著現代雕塑及藝術品，但是，這些藝術品並不誘發觀者對周遭環境作深入反省及思考。相反的，這條街的主角很明顯是各間名店，藝術品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乖乖地以「藝術品」的身份襯托各式名店，很含蓄地變為「設計新穎的第一流名店」門前的擺設，提高這條街的愉悅氣氛及格調。由此，使得遊客覺得在這條街上消費是一件高尚的事。遊客一邊購買最時尚的衣飾，最昂貴的名牌時裝、昂貴巧克力時，也同時穿插在最前衛的藝術品當中。此舉不但增加了商店的「文化」氣息，同時感到在其中購物是一項高品味的活動。

### 3. 公共空間設計

六本木新城在規畫時將地區發展與都市整體規畫相結合，宣傳強調規畫區內一半以上的區域設計將成為戶外開放空間，但其實，這是將建築物的高度

（即樓面面積）大量增加而換取得來。

這樣的空間設計的確突破了傳統商場的形象，除了以大量的藝術品裝置淡化「購物空間」的商業化、庸俗味道，更強調在商場中出現的綠地和公共空間，使人感到這裡是一個（不怎樣商業化）的休憩空間。其中的綠地和公共空間的範圍包括下列各處：附設大型電視螢幕及桌椅的大型露天廣場、毛利庭園（就是以名門毛利藩宅邸遺址中庭園之復刻版，內有淺溪流水、小橋與小花園）、櫻花坂公園（內有色彩繽紛的巨型機器人遊樂設施），以及櫛樹坂六本木綜合大樓的屋頂庭園（栽種有稻穗的稻田及蔬菜的菜畦）。這些廣闊的綠化地帶和戶外開放空間，都成為宣傳六本木新城「藝術化」以外的另一個賣點——「綠化」。

然而，若將傳統的公園（例如新宿御苑或井之頭公園）和位於六本木新城的公園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對遊客來說六本木新城的公園只是作為一個「特色景點」：遊人只能單純以視覺去參與其中。於此，傳統的公共開放空間其實已完全消失<sup>9</sup>。在傳統公園中，遊客通常可身體力行地做各式運動（例如散步、緩步跑、遛狗、看書、野餐、小孩子們隨意追逐玩耍、大人們休閒地躺在草地上曬太陽……等），然而，六本木新城的公園，人們只能依著路標沿著指定路徑在公園繞圈，光是用眼睛看一些過度設計的人工化景色。櫻花坂公園的巨型機器人柱子是用眼睛看的；色彩繽紛的遊樂設施，也同樣是過度的設計，小孩子們只能依著指定方法去玩耍。

在設有大型電視螢幕的露天廣場，六本木新城會定時舉辦一些節目，為空間營造氣氛。除了在特殊節日（新年、耶誕節或日本傳統祭日）會舉辦的大型的娛樂節目或慶祝活動之外，廣場內大型的電視螢幕不斷在播放朝日電視台的節目預告片段，廣告及商場安排的活動，活像一個巨型的廣告牌。

遊客或附近居民在這公共空間，不能進行自發性的活動，所有人都只有被動地根據廣場的時間表來參加觀賞各種既定活動。這個所謂的公共廣場根本沒有空間讓人們自由的溝通，或進行自由討論。但是，諷刺的是，六本木新城的宣傳刊物上卻鼓勵人們在美麗的環境下，激發智慧和創意的交流。其所鼓勵的溝通及交流，都只是限制於六本木新城會員俱樂部內發生，所有發言的人士及聽眾，皆是被邀請或繳交入場費才能出席。總括來說，六本木新城內的，只有虛擬的「公共空間」，它們實質上只為賣點，顯示六本木新城的設計特色。它們充其量只是與購物區交錯的緩衝地，其作用是迂迴地將遊人拖延、挽留在消費空間中。

#### 4. 虛擬的學術文化空間：Academyhills (アカデミーヒルズ)

Academyhills設在六本木新城森大廈第49、50兩層。其官方網頁宣稱，它包含了4種功能：學校、論壇、圖書館、研究網絡；宗旨是希望能集中世界最好的專業人材、科技，以及資訊，並建立交流平臺。它的課程對象，主要針對與設計、藝術及文化有關的人士。其中稱為「都心書齋」的圖書館為藏書豐富的24小時圖書館，但屬於收費及會員專用<sup>10</sup>。在其官方網頁中，宣稱其圖書館的會員的年齡多是20~30歲，強調它象徵了年輕、站在社會文化的前線、活躍而且知性的生活方式。

#### 5. 高層次的住宅及辦公大樓 (六本木ヒルズ)

六本木樺樹坂大道旁四座的服務式住宅提供800個住宅單位，每月最低租金為30萬日元。根據Elberse, A. Haigu, A & Egawa, M 等人(2007)引述華爾街日報報導(2003/05/07)，六本木新城森大廈提供達38萬平方尺的辦公室租用空間，屬全東京最大的辦公大樓。同時，該大樓擁有最強的抵禦地震能力及獨特的「無柱」室內設計，提供彈性的使用空間。六本木新城森大廈的目標

租戶，為有意在東京擴充的外資金融及資訊科技公司，第一批租戶包括科樂美（Konami）、株式會社ライブドア（Livedoor）、樂天株式會社（Rakuten）及雅虎日本（Yahoo! Japan）等大型資訊科技企業。2006年，六本木新城森大廈的辦公室租用率達100%，成為東京最受注目的商業項目。

筆者偶然發現了一本名為《六本木ヒルズの若手社長たち～21世紀勝ち組企業家たちの新・哲学》<sup>11</sup>，內容是介紹10位60、70年代出生的年輕企業總裁的成功哲學。它提出了這10位年輕企業總裁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若不是在六本木新城的服務式住宅居住，就是在六本木新城的辦公大樓開業。很明顯，這本書所推崇的，就是「進駐六本木新城，便是成功的象徵」此一意識型態。在這本書的「column」附錄裡，還紀錄了六本木ヒルズ紳士們之間密切的關係，作者岩田智也在附錄中附上「讓我們變成六本木人」的「策略」（岩田智也，2005：93、103）。這幾頁附錄，其實是吹噓及強化在「六本木ヒルズ」生活不是普通人能隨便加入的社區／社群。刊在此書雖然皆是膚淺的遊戲文章，但亦可看出日本社會公認了若有財力進駐「六本木ヒルズ」，或在「六本木ヒルズ」工作、生活，正代表了一種地位和身份：這等「少年得金」的新富，由於擁有「六本木ヒルズ」這件在房地產方面而言是貴重的物業、在文化上而言是標示著「高品味」的象徵物品，於是顯出他們的與眾不同（distinction）：他們在「六本木ヒルズ」生活，而不光是在此地約會。於此，「六本木ヒルズ」的一切藝術文化設施，就像（本來該）帶在詩人頭上的桂冠（即文化象徵資本的符碼）——現在則變成價高者得。憑藉著由金錢換取了在空間上佔據「六本木ヒルズ」的一部份，這些企業家們很成功地將經濟資本轉換成象徵資本，這本書錦上添花地抬舉了新富們有利有名繼而有文化的成功之路。



### 毛利庭園

#### ●ごあいさつ

##### 毛利庭園

六本木ヒルズの緑のシンボルとして、「庭」と「緑」を併せ持つ日本庭園を創りました。この庭園では、古くからの地形を活かして池や湧き泉の噴き出し、クスノキ・サクラなど日本の樹種を植えて、春はサクラ、秋はもみぢと季節の移り変わりを体感できる庭園としました。この庭園が、これから開かれる庭園として、多くの方々に愛されたい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

##### MOHRI GARDEN

The Japanese garden with an atmosphere of sky and green was created as a symbol of green at Roppongi Hills. In the course of landscaping, old land features were utilized to create the pond and water flow. Fine existing trees such as camellia tree and cherry tree have been preserved,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birth of a so-called "existing garden" with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scenery like cherry blossoms in spring and maple leaves in autumn. We are wishing that the garden serves as an arboreal garden which is loved by many people.



毛利公園指示牌標示著許多的使用規則 (作者拍攝)

#### ●庭園利用規程

利用者の皆様がお楽しみください。ご利用の際は、以下の注意事項を必ずお読みください。

##### 利用時間

平日午前9時～午後1時まで、但し、庭園の案内により変更または一時閉鎖する場合があります。

##### 利用規則

1. 樹木を大切にすること。
2. 施設を大切に利用すること。
3. 緊急事故の発生に備え、お静かにすること。
4. 危険な行動はしないこと。
5. 園内はきれいに利用し、お片付けをお願いします。
6. ペットの散歩の際は、糞の処理をお願いします。
7. 池の辺り等の危険な場所には近づかないこと。
8. 池に落ち、傷等の発生を避けてください。
9. 酒類を持ち込み、飲酒は禁止されています。
10. 喫煙は指定喫煙所以外では行ってください。
11. 池での遊びは禁止されています。
12. 池に石やコイン等を投げないこと。
13. 花火等の大衆の娯楽は禁止されています。
14. オートバイ・自転車・スクーターボード等の乗り入れは禁止されています。
15. 園内にて、許可のない撮影行為は禁止されています。
16. 園内でのけが、盗難等の事故については、当方は責任を負いません。その他、入園者の安全に関する事故、管理上支障を及ぼす行為は禁止されています。

皆様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します。

統一管理 株式会社ヒルズ

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for the visitors to enjoy the garden safely.

##### Utility time (Open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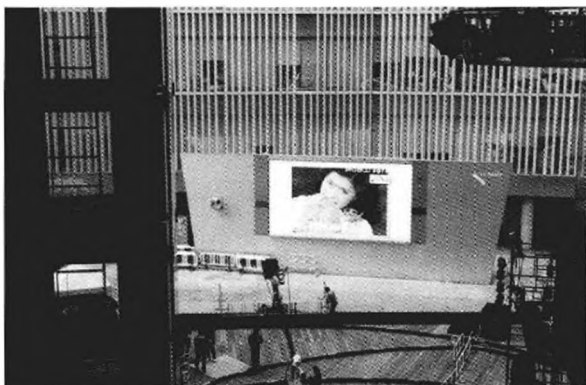
It is open from 9:00 am to 1:00 pm except when management office reaches open time or it is temporarily closed.

##### Regulation

1. Treat the trees with care.
2. Use the facilities carefully.
3. Do not cause other visitors any inconvenience by holding a meeting and the like.
4. Do not perform any dangerous act.
5. Keep the place tidy and bring back any trash.
6. Pet owne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posit of feces immediately after walking a pet.
7. Do not touch makuhi (fish) or other creatures in the pond.
8. Do not enter garbage or any other creatures in the pond.
9. Do not bring in alcohol or do not enter the garden when you are drunk.
10. Smoking is prohibited while walking or except in designated smoking areas.
11. Do not play in the water.
12. Do not throw coins or stones in the pond.
13. Use of fire, fireworks and the like are prohibited.
14. Riding a motorcycle, a bicycle and skateboarding in the park is prohibited.
15. Video or still photography and all other types of media coverage require prior authorization.
16.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accidents in the park, such as injury, theft or robbery. Do not cause any other inconvenience to other visitors or trouble to the management of Mori Building Co., Lt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operation.

Mori Building Co., Ltd.



会場内大型の電視螢幕不斷在播放朝日電視台的節目預告片段

## 6. 程式化的區內連繫網：「六本木藝術三角」

隨著六本木新城以嶄新概念重新定義城市的未來發展，透過「智慧與藝術融合的城市」的發展方向獲得空前成功後，在2007年3月另一個耗資4000億日幣的大型商業發展項目在六本木地區落成。這片原為日本防衛廳基地的10公頃土地，是日本最大宗的國有土地更新開發計畫<sup>12</sup>，現在則變為結合酒店、美術館、店鋪、辦公大樓、住宅、公園等多功能的發展項目「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這個項目承接六本木新城的聲勢，成為另一個以文化藝術為主題的商業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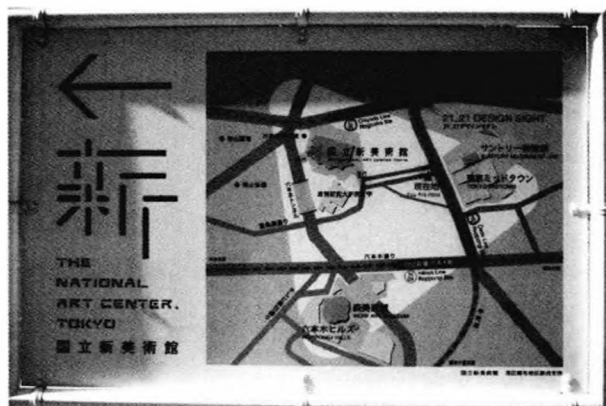
「東京中城」與六本木新城的設施相仿，主要由商場、廣場、庭園及藝術館部分組成。東京中城在空間分佈及宣傳上更著重以「設計、藝術」為「主打」的元素：其官方網頁說明「東京中城作為將日本的设计推廣到全世界的基地，到處瀰漫著藝術的氣息」，而且也希望遊客「在這條街上隨時都可以和藝術邂逅相遇」<sup>13</sup>。「東京中城」希望創造一個以藝術為中心的綜合新區，不但邀請國內著名建築師，例如：安藤忠雄、隈研吾、青木淳等負責各個部分的建築設計，商場範圍也到處可見大型的雕刻（例如放置在廣場入口，由雕刻家安田侃創作的雕刻作品《意心歸》和《妙夢》）和不同的繪畫作品。另外，商場內的三得利美術館以及著名設計師三宅一生、佐藤卓及深澤直人擔任指導的21\_21DESIGN SIGHT設計館更成為商場的另一賣點，這些設計大師的建築作品成為吸引本土或外國遊人的重點。

「東京中城」與六本木新城兩個計畫，在地理位置、發展理念，甚至對象也十分相近。他們不但沒有因為對手的出現而改變市場策略，而是更進一步進行合作計畫。兩個商場分別提倡不同的主題重點；六本木新城是以文化為中心，而東京中城則希望以設計及傳統藝術為商場的主題。

另外，「東京中城」的三得利美術館及六本木新城內的森美術館，更與在2007年1月在六本木開幕的日本國立新美術館組成了嶄新的「六本木藝術三角」，成為東京市內藝術及文化的新地標。對於「六本木藝術三角」的成立，國立新美術館館長林天英樹接受媒體的訪問時表示，「六本木藝術三角」的定位及宣傳大計是三家美術館館長一起開會討論的成果，他們在展品的題材達成共識（新美術館沒有固定館藏，三得利美術館主要展出日本傳統藝術品，森美術館則是展出現代藝術、設計作品），舉行不同類型的展覽。他更表明：「人家可能會覺得我們彼此是對手，但是我們不想這樣，而是要藉由連結，把這個區提升為一個藝術區，一起提升藝術在東京與日本的地位與普遍性。<sup>14</sup>」

結果，美術館及商場進行聯合宣傳活動，鼓勵遊客同時參觀這幾個美術館。例如，人們如果到其中一家美術館參觀，可以憑參觀門票的存根，獲得另外兩館的門票優惠。這些優惠活動表面上鼓勵遊客瞭解三個展館內不同種類及時代的藝術品，但在此策略下，遊客會被誘導到各個美術館參觀，這區空區經過小心設計，參觀者到達位於東京中城及六本木新城內的美術館，均須經由商場進出。雖然人們未必有明顯的購物目的，但在這些消費空間來回遊逛也可能增加他們的購物意欲。發展商充分利用藝術文化帶來的機會，使遊客在參觀藝術品的同時也不忘消費。

再者，六本木新城及「東京中城」均與地下鐵連接，這樣的安排既可以方便遊客到訪，更可以確保人們直達商場消費，完全不會因踏足路面範圍而流失。「六本木藝術三角」三個展覽館間步行距離少於20分鐘。人們就算離開商場範圍進入社區其他地方，只要在發展商規畫的參觀路線範圍走動，也仍被這幾座大型商場緊緊包圍：三得利美術館在商場建築內、商場與21\_21DESIGN SIGHT設計館以行人天橋連接。走去日本國立新美術館，最便利的路線就是從六本木地鐵站出來，經過東京中城，依地圖指示走去。整個區域是一個極有系統的程式化空間整體設計，人們在其中的活動都在精密計算之內。



六本木藝術三角地圖（作者拍攝）

## 結論

### 1. 藝術虛擬化、生活消費化

經過細心分析，我們可發覺，整個「六本木ヒルズ」的規畫及設計大方向，其實就是將經濟資本換算為文化象徵資本的策略，「六本木ヒルズ」攻於心計地製造了一個以藝術為主題的商業區，透過平易近人的藝術品在路上四處擺放，高度渲染該地段的文化氣息。新小資產階級、新富們為要顯耀自身（在文化上）的秀異（distinction），於是就趨之若鶩地來「朝聖」<sup>15</sup>，並將六本木據為己有（租／購工作或居住單位），好讓自己獲取這高尚的身份認同。

藝術自身，在此境況中已完全失掉其本來／內在的意義。當Dufrenne（1987）以「世紀之崩壞？藝術的死亡？」為題去討論當今藝術的意義時，仍然認為藝術仍是在其自身的思維內去理解其存在或甚至滅亡的意義。然而，在「六本木ヒルズ」所見到的，藝術已變成藝術「品」，它們自身已不附帶任

何內在精神方面的價值，藝術品的空間形狀跟周圍的環境之間，也沒有任何相互深遠的溝通，臨場觀賞的人們，完全領會不到藝術及其座落環境之間的任何關係。藝術品已淪為名牌商店、商場的裝飾品，其作用乃是給予該空間一個鮮明的品牌包裝、形象，來吸引遊客；以致增加地方的文化氣氛、提昇空間的象徵價值（或格調、檔次）；最終，當然是因著商場的格調提昇了，商品也自然賣得更貴了。

六本木新城美術館成為了一個時尚的場所，到此地飲宴、娛樂、參觀美術館已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與時尚的行為。

Zukin（1995：150）引用Robert Hughes（1990：28）的評語<sup>16</sup>來批判紐約淪為藝術市場，那些評語也可應用在「六本木ヒルズ」的「藝術策略」上：「發展商及一切的宣傳基本上是將藝術整體地轉換成為一個推銷的機器！」Zukin說得很對，現今的城市已不再是創造藝術的地方，反而是將藝術變成雜架攤（Bazaar for art）的地方；藝術不是死亡，而是被消費主義謀殺，再以資本主義生產的方法製成標本（虛擬物或模型），然後投進市場裡去展覽出售。

六本木新城成功地把一種虛擬的體驗引入在整個計畫中。它的空間設計策略，就是讓消費跟藝術元素不連貫地出現。它並非如傳統商場般，商店、餐廳一家一家的密集排列，或者，如一般百貨公司把銷售樓層及藝術展覽廳清晰劃分，讓顧客自行選擇去處。相反地，它是特意的把商業及藝術元素巧妙地混合在一起，好像是彼此作出互為提升的作用。如此一來，一方面使商業十分含蓄地被藝術包裝於其中，消費主義的庸俗形象被藝術的象徵意義品味化、藝術化；另一方面，藝術品在購物場所出現，變成平易近人，毫不需要觀眾思考及深思其意義，遊客於是覺得自己不單脫離了商業味道濃郁的消費空間，更好像因為逛商場途中碰見了這許許多多的藝術品，由此產生了認識了藝術的幻覺。對遊客來說，這種似是而非的藝術虛擬空間確實能增添遊覽及購物的趣味。

到了今時今日，任何人也明瞭藝術「品」在消費社會中的作用。且看部落客Lemonz@2007的文字如何清楚地掌握在「六本木ヒルズ」出現的藝術品（Maman）的功能：「來到六本木新城（六本木ヒルズ／roppongihills）。大致上，六本木新城沒什麼改變，就跟上回來的時候感覺差不多，那隻美國女藝術家Louise Bourgeois所設計的大型蜘蛛Maman依然乖巧地站在那邊，陪著一波又一波的旅客拍照留念<sup>17</sup>。」

由此可見，「六本木ヒルズ」所標榜的所謂藝術化、智性化的生活，只不過是扮演「影像工程師」（imagineers）的資本家發展商們的技倆策略，他們將文化、藝術主題化，將一個「地方」變成集體休閒及消費的「影像」，向遊人提供的是藝術的「感覺」；透過商場內展覽的「藝術品」來虛擬藝術；以虛擬的公共空間文化／節日慶典文化來裝扮成公園、廣場。將消費者虛擬為藝術觀賞者、文化人。於此，遊客也不需要憑著長年累積的藝術鑒賞力或歷史、社會文化知識，去獲得文化美感經驗。歸根到底，在「六本木ヒルズ」所能獲得的藝術經驗，莫不是匆匆忙忙、「一波又一波」的拍照活動而已。

## 2. 城市最後也不過是一個超巨型的商場

東京作為一個發展最迅速的一個亞洲城市，城市內出現大量的消費空間。由早年發展的銀座區的和光、三越、松屋及松阪屋等的百貨商圈，南青山PRADA、Dior等大型品牌旗艦店，到近期的購物商場表參道之丘（Omotesando Hills），六本木的六本木新城及「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甚至是一直以來也是東京經濟中心的丸之內也新建了丸の内オアゾ（Marunouchi OAZO）辦公大樓與商場的綜合大樓，東京市的中心地區都漸漸被一個又一個大型主題商場所佔據，成為社區最重要的地標。總括來說，大型商場正代表其所在的地區的地位及（房地產）價值。

對於旅客來說，城市內的消費空間已成為這城市的主要景點。在香港坊間所見的東京導遊書，對東京市中心的介紹，大部份都是大商場、購物區、商店街、特色餐廳、商店的主打潮流商品、餐廳受歡迎的主打菜色等等。這些旅遊書教育我們，旅遊的活動最重要就是購物及美食。在各個商業區外加上藝術元素，對一般旅客來說，只不過是提昇這個地區的形象，使其更突顯及清晰的點綴或標記（也即是使消費者更容易記得這個地區）。再者，為了使人們（無論是遊客或在地居民）在休憩的時候都「傾向」留在商業空間去消磨，商場的範圍內出現了傳統、非消費性的文化、生活空間：如公園、公共廣場、美術館、甚至圖書館等等。在節日期間，城市中舉行的大型慶典甚至會在商場範圍內的公共空間舉行。這種設計包攬了所有休憩空間及娛樂活動在同一區域範圍以內，將之系統化成為一個整體的消費空間。

於此，城市的生活越來越都集中在大型的消費空間內。在發展商鋪天蓋地的宣傳下，遊客都清楚知道每個主題空間的內容及所能獲得的對應的經驗，人們來到這些場所，透過按圖索驥的方式，依照指定路線逐一參觀這些預設的空間，重複又重複地感受程式化的遊覽體驗。接受這種虛擬的旅遊方式後，遊客很少會深究商場位處的社區，也完全不會意識到該社區有何特色及獨特性。由六本木到「六本木藝術三角」，所謂遊覽的經歷也只不過是由一個大型商場走到另一個大型商場，當中所碰見或看到的藝術品，能誘發的感觸乃只是「有趣」、「好玩」的意外驚喜等。這種程式化虛擬化的城市生活及文化「體驗」，已似乎成為現代的城市生活的新定義。

## 注釋

- 1：楊瑪利、藍麗娟、陳應欽編，《新東京美學經濟》，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79〉。
- 2：門前町乃日本中世以降，香火鼎盛的寺院門前及周圍的繁華街。因著參拜善惡，故此各類商店、手工藝品工場兼售賣店、旅館（旅館）皆在這等寺院周邊密集。
- 3：六本木新城遊客指南，2006年繁體中文版。
- 4：六本木新城遊客指南，2006年繁體中文版。
- 5：六本木新城遊客指南，2006年繁體中文版。
- 6：見Nanjo Fumio, Ogita Asako & Machino Kayoko (Eds.) Art, Design and the City Roppongi Hills Public Art Project 1 アート・デザイン。都市：六本木ヒルズ パブリックアートの全貌1. Tokyo:Rikuyosha Co.Ltd, (2004:26)。
- 7：Nanjo Fumio. Art providing creativity and aesthetic values, and intelligent standing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in Nanjo Fumio, Ogita Asako & Machino Kayoko (Eds.) Art, Design and the City Roppongi Hills Public Art Project 1 アート・デザイン。都市：六本木ヒルズ パブリックアートの全貌1. Tokyo:Rikuyosha Co.Ltd, (2004: 166)。
- 8：另一個雕塑「Maman」在2009年8月被放置在Iowa的 Des Moines。
- 9：Kevin Lynch對公共空間（open space）作以下的定義：「在都市環境中，那些容許人們自主自發自由地活動的空間，例如草地或公園等……」（1990:398）。
- 10：「都心書齋」的入會費為¥10,500；月費¥9,450（2009年11月）。
- 11：岩田智也：《六本木ヒルズの若手社長たち-21世紀勝ち組企業家たちの新・哲学》。ブックマン社，2005。中文譯《六本木大廈之年輕總裁們——21世紀成功系企業家的新哲學》。
- 12：楊瑪利、藍麗娟、陳應欽編，《新東京美學經濟》，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53〉。
- 13：東京中城官方網頁中文版<http://www.tokyo-midtown.com/cn/about/index.html>
- 14：楊瑪利、藍麗娟、陳應欽編，《新東京美學經濟》，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83〉。
- 15：劉細良，《大朝聖：全球旅行狂熱的文化觀察》。香港：TOM (Cup Magazin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27)。
- 16：'The Conversion of much its Museum System into a Promotional Machine' R. Huges (1990：28) 引自Zukin, Sharon. The Cultures of Citie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5: 150)。
- 17：樂多新文創之旅行不旅行：<http://blog.roodo.com/lemonztrip/archives/6443871.html>



# 從傳統到地方認同

——神樂坂之町營造（まちづくり）<sup>1</sup>

## 所謂町營造（まちづくり）

日本自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經濟發展起飛，到1980年代即攀上世界城市高峯。在戰後高速經濟發展的年代，日本中央政府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維持日本在世界的競爭力，政策上明顯向大企業傾斜。Saskia Sassen於2001年的著作《Global City》<sup>2</sup>中提到，東京在1991年即已被稱為世界三大全球城市之一。日本以「都市」去稱呼城市<sup>3</sup>，開始於二次大戰前後，以識別傳統以「町」去界定人民聚居的地理空間環境。據Sorensen（2003：521）的陳述，日本中央政府為了使城市現代化，對於國土以至於都市規畫方面，一直採取國家控制地方、自上而下的強勢政策，將空間整體地組織為緊密的政治、經濟結構，好讓資本、人力資源、貨物暢順地運轉（最明顯的例子是新幹線運輸系統的規畫）。而城市的規畫及設計的主題方向，也定位於致力增加對跨國企業的投資的吸引力。由此，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日本多以大範圍之空間、基礎建設、運輸系統的整體規畫為主導，以容許經濟在各層面的運作更為暢順流通。至於環境或房屋的規畫，則是次要的（Sorensen & Funck, 2007：1-4）。

然而，90年代泡沫經濟的破滅，宣告了日本自戰後經濟重建以至高速發展的完結。舊的系統漸漸失去效率。迎向21世紀，日本的城市發展也進入了新的時代。80年代騰昇的房地產市場於90年代初瀕臨崩潰，接二連三，日本的金融及保險業也因為背負著巨額呆壞帳而瀕臨破產狀態；日本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已盡失。再加上1995年關西大地震，政府無法及時救援災民，所有日本人對本國防震工程的信心，也因阪神高速道路無法抵禦地震而倒塌的情狀而大感震驚，人民對中央政府的信心已破產。凡此種種，都嚴重削弱了本來權力極度集中的日本中央政府合法性及威信，日本的「本土權利年代」（the era of local rights, Sorensen & Funck, 2007: 12）也由此而開展：中央政府的權力開始旁落到縣及市政府，市民社會在城市管治方面也不斷爭取到更大的參與權。而在關西大地震時期，全國各地的大量義工到神戶參與災後援助工作，也造就了許多非營利組織（NPO: Non Profit Organization）的成立，加重了市民社會在城市管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此種種使得「町營造」（まちづくり）<sup>4</sup>運動影響力越來越壯大。

近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運作愈漸熾熱，日本城市居民除了要抵受因本土經濟高速發展而改變土地使用外，更要面對全球流動的房地產投資基金在大城市（例如在東京）對空間環境的基本性改造。很多大發展商都認為，日本必須進行根本的都市重建，以維持在世界的房地產市場中的競爭優勢，以面對來自新加坡、上海及香港等東亞城市的挑戰。2002年，小泉純一郎任內閣總理大臣期間的日本中央政府，成立了「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以推行市區重建。這個政策簡化了城市申請市區重建的程序，同時也批准將原本在市中心的低層建築區改建成高層大廈。在這個脈絡之下，日本城市內的發展變得更進一步的以房地產資金流動為主導（Fujii et al, in: Sorensen & Funck, 2007: 252）。由此，日本的城市居民感到居住環境有愈來愈大的遭破壞的危險。為了維護自己在城市中心生活的權利，以及爭取素質更佳與能持續的生活環境，很多市民在其住區中，都紛紛推行了社區營造的運動。

我們從Sorensen的著作中可得到一簡單的歷史脈絡，幫助我們瞭解「町營造」運動在城市空間規畫與管治方面的開展。Sorensen & Funck為補充西方世界對日本的「町營造」(Machizukuri)運動認識之不足，於2007年出版了文集《Living Cities in Japan: Citizen's movements, machizukuri and local environments》，介紹日本的「町營造」(Machizukuri)。但是，這本文集對「町營造」的界定，稍嫌簡單及直接。作者從西方的角度，抽取了「町營造」較普遍的政治及社會學元素作解釋，而忽略了從文化角度來理解日本人竭力保衛日本傳統空間意象這一重要動力。此書兩位作者概括地認為「町營造」從環境保護運動衍生而來，因此與環境保護運動十分相近。

在此書的導論中，兩位作者提出了「町營造」的三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有關「町營造」這種社會行動的目的，即是創造一個「可生活」(livable)及「可持續」(sustainable)的城市。所謂「可生活」及「可持續」的城市，就是經濟上充滿生氣、可吸引投資及誘發創造動力的城市；同時亦是透過減低對資源的消耗及廢物的生產，提供市民健康及高素質生活的城市。在這層面上，作者們指出，「町營造」運動提倡市民參與生活環境的營造權利，更進而挑戰官方及專業城市規畫對都市空間建造及管理主導方向之權威性。

簡單說明了「町營造」行動的目的之後，Sorensen & Funck繼而以大篇幅從政治的進路去理解「町營造」的第二個特徵，即「本土管治」(local governance)的課題。至於第三個特徵，作者們指出了從9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及地區政府兩者的角色，以及兩者關係的改變；同時也分析市民與國家在公共空間的管治上所建立的關係。他們總括指出，這些年來，市民持續爭取在公共空間的管治上能有更大的參與權，他們以本土社區為基礎組織，爭取其在市區發展進程中的管治合法性。由此，在市民社會的層次而言，通過「町營造」運動，市民社會的行動者對本土的管治參與(都市的管理政策、社區及環境的管理)之重要性及影響力變得越來越明顯。

在本書的結論中，除了再次強調「町營造」的主要目的為創造更可居住及可持續的城市之外，也有提及歷史空間保育為其中之一個目的（Sorensen & Funck, 2007：271）。然而，Sorensen & Funck對「歷史空間保育」在「町營造」運動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並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也即是說，Sorensen & Funck沒有從日本東京人對傳統空間意識的角度去理解「町營造」運動。

Sorensen & Funck所編的文集（2007）的第二篇文章：〈Toshi Keikaku vs Machizukuri：Emergiing paradigm of civil society in Japan 1950-1980〉（都市計劃與町營造：在日本公民社會冒升的新範例1950-1980），作者Watanabe簡單界定了「町營造」這名詞：（1）「町營造」本質概念是相對於都市規畫的系統而言的；（2）「町（Machi）」一方面是一個細小的物理空間及環境，例如城市用作住宅用途的建物群或區域，住民／坊眾在其中度過其日常生活。除了物理空間，「町」另一方面還包括了區內非物理性的功能及服務，例如社區福利設施、終生學習機會、以及社區改良議題的討論空間。「町」最重要的精神是當區所共同承認的價值觀取向及生活方式，是從非官方、非專業、亦即從居民／坊眾的立場去衡量的；（3）有關「營造」——Zukuri（造り）的意涵，是指一個特定住區的坊眾有權去參與創造、管理及營運對其所屬住區的居住、生活環境。這種參與創造、管理及營運的作業，是持續的過程，而不只是組織一個一次性、沒有後續跟進的事件。在「町營造」的運動中，參與的町住民／街坊是以保護本區的日常生活素質為目的，有時甚至要因保衛本區的環境／文化而與政府商討談判甚至對抗。「町營造」運動通常是街坊裡聯合組織起來對抗政府或大發展商在本區進行大規模的重建或改動；若有重建規畫企圖破壞本區的面貌、文化以及生活素質，區內住民都會團結起來對抗這些改變。坊眾會成立各種主題的非某利組織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不單只保衛本區的生活與文化素質，更主動爭取本區變化的主導權。

戶沼幸市在其編著的文集《まちづくりの哲學》<sup>5</sup>（1995）中，指出

「まちづくり（町營造）」一詞並不容易翻譯為外國語——例如最常見的「community building」，因為這樣的翻譯無法將まちづくり的完整概念表達出來。本書作者提出之前現代的農村及漁村的理想模式（戶沼幸市，1995：213-215），來對まちづくり的基本概念作詮釋。在農村及漁村中，面對嚴峻的自然環境，為求生存，同村的人必須通力合作，共同創造、發展生存／生活的環境。在前現代的農村及漁村，差不多全體的村民都從事著大同小異，或互相配合的職業，因為在一個地方群居，所以住宅的建築模式也大致相同。由此觀之，全村人所面對的環境、生活問題，皆有很多相同之處。需要全村人去共同合作，維持一個可生活的環境。作者認為，聚落群居的優點是將群體所從事的生產方式合理化及穩定化，以保障全村人能夠將生存／生活的環境能持續下去<sup>6</sup>。同時，全村人期望能夠有豐盛的農作物收成或漁獲、村民能安居樂業而向神靈、或祖先祈願，以及進行各種宗教儀式。亦即是說，整個村落，對生命的持續，及維持人倫關係和諧性的價值取向，產生了宗教象徵的形態（神靈、儀式），也透過組織對神靈祖先的敬拜儀式、祭祀活動而體現了整個村落的團結精神。

藉此農村及漁村的理想模式，戶沼幸市揭示了著重個人為本位及依靠科技支援的現代化城市生活中有著諸多弱點。他指出，在都市生活的人們，有很大部份人（尤其是長者、有孩子的婦女、兒童、草根階層人士、傷殘人士）的主要生活模式，並不如流行的媒體所宣揚那般，以個人為本位、經常性地流動，時刻依靠科技與其他人作長距離的溝通（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今時今日，在全球化經濟控制之下，的確有部份人是經常作城際流動，並經常以電子科技與其他人通訊，但這些人只是社會上少數的高收入白領階級）。再者，除基本的生理活動以及功能性的經濟活動外，人們亦會在生活空間中進行其他各式各樣的活動，也會與同一生活空間中的其他人建立由親至疏的關係。戶沼幸市強調，人們在特定空間中並不是單單「居住」，即是說，人們並不會只是「居住者」，而是「生活者」。

於現今的全球化時代，人們在都市中居住，但無可避免要面對居住環境變異／變壞的危機——住居地不再只是一個生活環境，而是一項投資項目。全球性房地產投資基金，促動政府及發展商對都市空間整體作根本性的重整與發展，力求不斷增值。單憑個人的力量，人們絕對不能維持、保障生活環境的穩定及素質（例如社區空間、設施的保育），更不用談要維護傳統的生活方式，或本區特有的個性文化。政府與發展商以經濟發展為大前提，毫不留情地將象徵本區集體記憶及文化的舊建築拆掉，之後所建造的高層大廈，往往破壞了整區的市容及和諧感。這般巨大的力量，不單將生活空間徹底破壞，更進而迫使人們只能著眼於功能性、投資價值而去衡量環境。當情勢越來越惡劣（例如樓價越來越高、高層大樓越來越多，造成屏風樓或熱島效應、城市生活完全為消費主義所控制等），人們漸漸重新理解到，生活在自身家宅以外，還需要一個「以（生活著的）人為本」的公共環境。因此，人們開始從個人或家庭為本的生存／生活範圍的考慮，擴大關注至與鄰人共同分享分擔的社區環境。由此視點觀之，現代的都市人，跟前現代的漁夫農民差不了多少，同樣要跟環境搏鬥才能生活／生存下去。而團結其他人一起，共同營造可以生存／生活下去的環境之「町營造」運動，也是由這邏輯而衍生。

由戶沼幸市的分析中，我們可理解到，「町營造」運動之焦點在於跟環境搏鬥；團結同區住民去締造可居住的環境，乃是達成目的之手段。

除了上述以社會及經濟發展去理解町營造的基本衍生理由，我們繼而要從歷史的角度出發，以理解日本「町」營造的獨特性：首先，我們要追溯到德川家康時代，東京的前身——江戶城區之都市規畫，乃是依照這地區特殊之地形，將整個城市作二元劃分為「山手」及「下町」。即是說，山手是在城西的高地（武藏野臺地），此處劃定為武士及貴族的住宅地；而下町則為接近東京灣的低窪之地，在當時是商人及工藝師、平民大眾聚居的空間。到了現在，東京的城市表象仍殘留著這個傳統的意象：一般來說，在東京城西，有較多高級

住宅區；而平民大眾，則多聚居於稱為「下町」的地方。江戶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的二元空間文化表象，儘管經過了許許多多重大的歷史衝擊，但對於日本人來說，還是基礎的<sup>7</sup>。Paul Waley (2002) 也指出，山手及下町是東京特有的空間象徵：這兩個空間概念喻意著由傳統遺傳下來，由於不同社會階級聚居而形成的兩種不同生活態度。即使是遊客，來到山手的地區（例如澀谷、代官山或自由之丘），也會感到整個氣氛與統稱為下町的地方（例如淺草、谷中）十分不同。

前文所解釋的「町」之概念，其所內含的日本人對生活空間的意識／理解（perception），多少也是自江戶時期延續至今的表象。這種傳統的空間表象勾劃了一個對日本人來說頗為明確的文化、社會及集體心理意識，並且賦予於山手或下町某「町」內居住的坊眾，具體的理由及內容去保衛／保育該「町」。

Fujii, Okata & Sorensen所寫的〈Inner-City Redvelopment〉一文中，以神樂坂為其中一個例子，介紹了東京市內進行重建規畫及町營造運動的過程（Sorensen & Funck, 2007: 259-262）。然而，此文的介紹過於簡單，讀者並不能從這例子的描述來理解到町營造運動的本質與價值，也不能掌握到神樂坂作為一個典範例子的有效性以及獨特性。我們對神樂坂的研究，必須由其歷史文化開始，深入發掘，為何神樂坂的商戶及住民要阻止發展商在本區拆卸舊樓、興建高層大廈，為何要拚力保衛本區的景觀？在神樂坂所實踐的町營造運動，背後是以甚麼精神、理念所推動？由於認識到神樂坂町營造運動，我們能否舉一反三，對一般而言的社區營造運動作根本性的掌握之同時，繼而反省我們自己身處城市中推行的社區營造運動的得失？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回答這幾個問題。

## 神樂坂之町營造（まちづくり）

### 1. 神樂坂之所在地

神樂坂地區是由早稻田街道（早稻田通り）與大久保街道（大久保通り）交叉形成的「神樂坂上」和與外堀街道（外堀通り）交叉形成的「神樂坂下」構成。其中，主要的通道就是由神樂坂下交叉點直線延伸約700公尺的斜坡——神樂坂通り。該斜道沿路兩旁為行人道，聚集了各式店鋪及餐廳。另外，神樂坂地區除了這條主要的斜坡道外，兩旁的建築物更構成了宛然曲折的窄巷（路地／橫丁）網絡。這些路地是神樂坂的象徵。巷道內座落著神社、日式旅館飯店，以及售賣傳統工藝品的老店；除了讓人有尋幽探秘之感，更令人回味神樂坂地區昔日的歷史及繁華。

### 2. 神樂坂的歷史

鈴木俊治指出，於江戶時代初期德川家光政府畫定坂下之外濠開始，至坂上的台地是神樂坂的地域，並以一之坂（一つの坂——即現今之「神樂坂通り」）為區域之中央骨幹道路。據《まち歩きガイド東京+》<sup>8</sup>一書所陳述，神樂坂在江戶時代（1603—1867）曾經是下級武士的住宅及寺廟神社的集中地。但神樂坂真正的繁榮時期，該算是在明治（1868—1912）末期、大正及戰前昭和時期。當時，神樂坂一帶開設了大量的高級料亭及酒館，同時，也聚合了大批穿著華麗、考究的和服、精通傳統舞蹈與三弦琴藝的藝伎（現稱藝者）赴會，並在酒席上表演、陪酒、娛賓。神樂坂漸漸成為藝者的世界。根據《神樂坂キーワード第2集／粋なまちづくり 過去・現在・未来》<sup>9</sup>（2010），於大正（1912—1926）至昭和（1926—1988）初期，區內藝者的數目達600人之多，是當時著名的「花街柳巷」。當然，神樂坂除了集中了各式的藝術表演及娛樂場所，除傳統的能劇堂、旅舍、料亭外，還有幽靜、高雅（但並不趨



時趕潮流)的咖啡館、西餐廳、酒吧等西式娛樂休閒場所。

由大正至昭和時期，甚至直到現在，東京的文人、演員、藝人、畫家等，都喜歡到神樂坂去。他們將這地方凝聚成為一個有濃厚傳統兼夾雜著古典西洋韻味與日本風情的文化空間。曾於大正到昭和時期在神樂坂留下足跡的文人，包括赫赫有名的夏目漱石、永井荷風、泉鏡花、尾崎紅葉及北原白秋等。據稱，夏目漱石喜歡到相馬屋文具店訂購原稿紙。而山田洋次、宮崎駿、水上勉、寺山修司、蒼井聰等皆曾為神樂坂區著名的「和可菜旅館」的常客。

### 3. 神樂坂的「路地」

神樂坂作為山手地域的文化空間代表，正在於其既包羅了傳統文化藝術空間及活動，也同時夾雜著代表典雅高尚的法蘭西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這種種特質都點出神樂坂是個「山手階級活動的場所」<sup>10</sup>。

#### (1) 「神樂坂精神的代表空間」：路地

神樂坂的社區組織為了強調本區的特殊風格，於平成17年成立了「粹之町營俱樂部」，以「粹」(いき)<sup>11</sup>這個代表了日本傳統江戶美感意識的概念去表象神樂坂的空間文化精神。

神樂坂所瀰漫著的日本風情，亦即「粹」的魅力，顯現於其「路地」空間之中。從地下鐵神樂坂站或飯田橋站下車到地面，我們便可進入神樂坂大道(神樂坂通り)的範圍。這是神樂坂區的長約700米中央主軸道路，有上下兩條行車線，路的兩旁店舖林立，熱鬧得很。其中有些店舖已被封譽為老舖(例如履物店「助六」，創業於明治43年；又如「山下漆器店」，在神樂坂經營了60年)。從這中軸大道轉入如蜘蛛網般的側巷，便步入了神樂坂的精神代表空間：路地。

據山下馨（西村幸夫，2008：67-78）的形容，神樂坂的路地，依著起伏的地理環境而建，有時如蛇般彎彎曲曲，時而要依著梯級上上落落，道路的轉彎時急時緩，空間的變化複雜而豐富。在神樂坂這個小區，這等充滿魅力的路地，分為三種樣式：

- 花街路地：裝飾性、迎客性的路地（しつらえ及もてなし路地）
- 小型食店，商店林立的生氣盎然的橫丁／路地（にきわい路地）
- 低密度小型住宅集中的生活路地

現在讓我們簡單描述這三種路地的特質：

- 花街路地：裝飾性、迎客性的路地（しつらえ及もてなし路地）

日本的花街柳巷與一般俗稱的「紅燈區」完全不一樣，此乃日本自江戶時代開始的傳統娛樂文化之集中地。花街的主角當然就是藝者，然而，她們華麗的和服衣著，音樂、歌唱、舞蹈藝術，還有藝者出現／演出的舞臺：料亭及其料理，以及在料亭宴飲（座敷）的禮儀規例，皆是日本傳統的「和」文化的重要元素。神樂坂的「坂」（坡路）、路地「石疊」（石子路）、料亭，還有那越過圍牆、自庭園內跨到牆外的植物（如果在適當的季節，便會有「一枝紅杏出牆來」的意味了），都濃濃地保存了傳統的「花街柳巷」的「情緒」之空間。

這是一幅纖細而且雅緻的圖畫：在路上遊逛的人們，從現代化喧嘩的城市，突然轉入了這個寧靜、優雅的空間，令人有彷彿如詩的感受。到了晚上，料亭暗沉而暖黃的燈光亮起，在寂靜的路地經過，不期然幻想料理亭內華麗的藝者彈著三味線與人們在暢飲的熱鬧境況，使人產生無限的遐想。據山下馨言，人們彷彿融在畫中，與建築物及狹窄路地空間渾然成為一體的古典「情緒」頓然而生。

### · 生氣盎然的商店路地

在橫丁路地上（例如本多橫丁），充滿特色的家庭經營的和式餐廳、西餐廳、酒吧、和服店與售賣精品等等的店舖，每當華燈初上，這狹窄的街道便充滿了熱鬧的氣氛。

### · 生活路地

低密度的，不同樣式的小型單幢住宅建築，在路旁並排而立。在此居住的鄰里街坊都會美化大門前，面向（街外）路地的空間。通常，住民都會放很多植物在門前，使路地給人輕鬆舒暢、悠閒的感覺。

根據數本以神樂坂為主題的「散步導遊」雜誌介紹，很多小型店舖（餐廳、畫／藝廊、精品店）皆為經營已久、甚或代代相傳的「個體戶」。專門介紹神樂坂散步的雜誌，不單點出各店提供之招牌菜色，更會描述該店主人或服務了多年的店長對本店的感想，以及其對提供的菜式，或甚至一杯咖啡的執著。這等店舖與神樂坂本區的風格及「個性」根本已形成一體。她／他各都有一個以神樂坂為舞臺的故事。

例如，割烹店世喜，已在神樂坂經營30年，店內第一個「女將」（即料理屋店、茶屋、旅館等的女主人，依日語三省堂大辭林解釋），乃是人所共知的三味線高手。本多橫田丁那極富家庭格調的新富壽司，已在神樂坂經營至第三代。於2007年開始營業的「George Sand」茶館的主人是一個曾旅居法國20年的女作家吉村葉子，著有多本介紹巴黎風情的書籍。而茶館パレアナ的女主人，對烹調咖啡特別講究；每月都會有文化講座在此咖啡館舉行。

同時，由於使用生活路地者，多數是坊眾鄰居，所以，這是個半公共的空間。坊眾鄰居們在這個地方，因為碰面的機會很多，所以很容易互相認識，繼而建立緊密的鄰舍關係。

## (2) 路地散步——傳統日本式散步的美感經驗

很多日本出版的有關神樂坂的旅遊書籍，或學術性的路地空間文化的討論文集，都重覆推薦神樂坂路地散步的活動。這些書籍很深入地介紹在神樂坂路地散步，乃是體現傳統日本式散步的美感經驗。

山下馨（in：西村幸夫，2008：69）對路地散步的詮釋，更是富哲學意味。他提到在狹窄並且迂迴曲折的小路上迴遊，會使步行者漸生猶如在只有三疊或四疊半的茶室中，那種壓迫性的空間感，也由於這種實際經驗上的壓迫，令人對空間產生「無限」的構想。同時小道迂迴曲折，轉彎抹角，使人感到走進了迷宮一樣；再加上窄路延綿，更有彷彿離開了日常經驗空間而進入了奧秘之境的感覺。由此步行者在狹窄的路地上尋幽，漸漸對空間產生了「無限」的遐想。

川本三郎（1999）為永井荷風之名作《日和下駄》所寫的解說中，亦很透澈地闡明和式散步的美感經驗。《日和下駄》的首要特色就是著力於在路地迴遊的過程描寫。在路地的環境中，那尚未被現代化急速經濟發展而破壞的傳統生活方式還完整保存著。散步者逍遙地走過，靜靜地欣賞到芸芸眾生投入生活的悠閒風景；散步者在迴遊過程中放眼而望，在眺望外在世界之同時，那一幅「眾人正在生活著」的現象，徐徐在散步者的視線以及意識中浮現。與此同時，散步乃是極為個人單獨之行為。在散步中，個人享受著孤獨的樂趣，也由此而返回一個人的自我意識的經驗。對於永井荷風而言，散步是最孤獨的文學行為，同時也是極具哲學意味的經驗。

## 4. 文化承傳：從古蹟到生活空間

據Lynch（1990：628）所言，城市建築空間乃是人們經歷時間之流的有形體現。對人而言，在空間的建築物中可具體地經驗到時間的延續性。Hull



神樂坂不同式様の路地

IV、Lam & Vigo (1994) 循著Lynch的觀點，指出現今人們意識到自身的認同 (identity)，即人們感受到與過去 (歷史) 的關聯性。同時，人們也因為此 (意識) 延續感而體驗到自身可以對未來下決定及開展行動的能力。Lynch對「以人為本」的具體存活時空的理解，可讓我們更清晰地理解到Rautenberg (引自：Tweed & Sutherland, 2007：63) 對建築空間作為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 的兩種詮釋。據Rautenberg的表述，在文化保育的脈絡上，對於某國族或某地方區域具有意義的建築空間的文化，可以有兩條進路詮釋其本質：其一是「被指定的文化遺產」 (heritage by designation)，那就是經國族，或被承認的權威專家嚴格審為承載、傳承、體現傳統文化的空間。這些空間被界定為無可置疑地被所屬國族或所屬地方區域的人民共同承認，為富有本國族或本地方區域文化價值的象徵空間。很明顯，中國的萬里長城、紫禁城，法國的羅浮宮、巴黎聖母院，意大利的羅馬競技場或日本京都的清水寺，都是代表著其所屬民族的文化精粹的歷史建築物。第二種為「經挪用而成立的文化遺產」 (heritage by appropriation)，這是指某些文化建築空間透過普羅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挪用，因日子久遠而漸漸沉澱累積成在地的文化空間，無論是國族公認的文化建築空間或人民長久挪用而成立的文化空間，對其所屬的民族或本地區的坊眾皆富有極高意義及價值。

Lynch (1990：628) 指出，對一個地方或國家來說，「古蹟」 (或本地文化空間) 乃是在地住民或民族對時間意識的有形體現及重要象徵。「古蹟」乃是其所屬民族的共同記憶的一個具體而穩定的象徵，這象徵容許整個民族共同去緬懷及肯定屬於她／他們的過去。然而，在特定社區及其所屬市民所過的日常社會中出現的空間或建築物，卻是關聯著在地市民的個人記憶。在地的市民往往對這些空間或建築物充滿了記憶，這些空間或建築物也豐富了本地居民的個人特殊記憶或想像。國家／國族級的古蹟，往往是一個城市或甚至國家的「地標」或象徵，讓本國的人民可與其他國家識別開來，也具體地增強了本國人民對國家／國族的認知及認同。古蹟作為祖先的文化精粹遺傳，使本國人民

對其所屬的族群／地方感到驕傲，也相輔相成對自己能屬於這秉賦著豐盛文化的族群感到自豪及自信。

而在特定區域所出現的空間或建築物，通常不是甚麼偉大的建築物，但卻秉富著該地住民之文化，其價值是讓在這空間生活的人們，掌握到一個穩定的基地，好讓人們日復一日（但也正在靜靜演變）的生活節奏，在這穩定的空間脈絡上展開，也因此而使人們能有熟識、安穩、安全的感覺及信心，從而可為未知的將來下決策及展開行動，同時也對這空間產生了個人或集體的回憶及幻想；許許多多文學、藝術創作也因此而衍生<sup>12</sup>。

Lynch及Rautenberg對空間及建築物的文化遺傳的詮釋，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神樂坂所秉承及體現的日本文化及地區文化的多層次向度。我們目前所收集到有關神樂坂文化的資料，大致都將神樂坂的文化分為兩類：一是傳統文化的空間及其所承載的文化藝術活動；二是一般平民的日常生活和娛樂空間，及所承載的大眾文化娛樂活動。

### （1）花街柳巷文化及傳統演藝文化

在神樂坂的傳統文化空間，除了上述的室外「裝飾性」路地為代表，還有以室內空間為表象的「花街」（總括代表乃是料亭及藝者表演藝術）。在日語中，「花街」乃是設有傳統藝者歌唱舞蹈表演娛賓的料亭集中之地。神樂坂是自明治時期開始興盛、留存下來的六個東京區內之「花街」的其中一區；在明治時期（十九世紀末）已十分繁盛<sup>13</sup>，當時有「山手銀座」之稱。於關東大地震（1923年）時期，因神樂坂所經受的損毀較其他地方輕微，所以很多名店都從東京的中心地區如銀座、日本橋等遷來神樂坂暫時營業，娛樂場所也因而集結在神樂坂。根據《神樂坂キーワード第2集／粹なまちづくり 過去・現在・未来》及〈神樂坂之町、路地、歷史〉（見於：新宿區觀光協會網頁）之陳述，戰前的昭和時期是神樂坂街最興盛的時期，當時區內有藝者約600餘

人，料亭約有150餘間；到了戰後，即昭和30年後半期（約1950年代），神樂坂的花街也漸漸回復戰前期之興隆。其主要原因為當時那些（例如跟鋼鐵業等有關的）大工業家及政治家，都喜歡到料亭消遣交際，形成了「花柳界」之頂盛一時無兩。當時藝者有200名以上，料亭約有80間。然而，1994年左右，因經濟泡沫爆破，很多料亭都停業了。於此時期，藝者只餘下50名。

平成11年（1999年）開始，神樂坂的「花柳界」每年4月都舉辦一年一度的傳統日本音樂及藝者舞蹈表演大會——華之會（華の会）。本區的NPO為了讓一般平民大眾認識花柳界的藝術，於是與藝者們合作，舉辦各式各樣的公開表演活動，例如脫口秀（talk show）、舞蹈、座敷遊戲介紹等。由此，花柳界再不是專為娛樂政要富商巨賈的高檔表演，而與社會群眾越來越融和了。

藝者的歌舞，再連同其他傳統藝術表演如能劇、落語，被尊崇為日本傳統的藝術。在神樂坂，傳統藝能被視為本區的精華與特色，因此除了藝者的歌舞外，其他傳統的藝術表演如能劇、落語，以及日本傳統音樂，如長唄（歌唱藝術的一種）、箏、三味線等，都在本區的劇場、音樂廳，或其他表演場地長年公演。另外，本區還有各種傳統的商店售賣和服、履物、傳統陶漆器物、香、扇及傳統點心等。

## （2）生活文化空間

根據Norberg Schultz（1985：89）所言，日常生活乃是在我們在世界存在、延綿、連續的具體呈現。正因人們身處在社會、歷史以及文化交織而成的複雜空間中，城市除了提供住屋及工作空間等基本空間環境外，更必須能提供良好的文化環境及社區網路。

神樂坂是一個生氣盎然的住宅區，聚集了許多符合一般民眾家庭消費的商店在此營業。這些店鋪，通常聚集在神樂坂大道（神樂坂通り）兩旁，大部



份都是非連鎖店的個體戶，供應著一般的日常生活實用品給附近的區民。據 Christopher Alexander（1994，模式8：街角雜貨店）所言，鄰里商店對居民來說，是居民們在住區中，感知到鄰里關係的空間，也是促使居民大眾去走動走動的「散步引發器」，這對年長的坊眾尤其重要。《神樂坂キーワード第2集／粋なまちづくり 過去・現在・未来》（2010：107-173）指出，神樂坂的居民的高齡化現象頗為嚴重。那些長久在該區營業的小店鋪，正是長者散步的理由與交誼的地方。

附表1：神樂坂地區內的供應日常生活食品商店餐廳

**餐廳食肆**

個體戶咖啡店	日式料理（立食）	日式料理（居酒屋）	家庭餐廳	
小酒館	蛋糕麵包店			

**食品店**

超級市場	茶葉專門店	咖啡豆專門店	豆腐店	海產店
鮮肉店	外賣壽司店	米店	蔬果店	

**商店**

和服店	日式傳統便鞋店	和服配飾店	文具店	藥品店
美容院	理髮店	漫畫店	書店	時裝店
傢俱店	寵物診所	診所	花店	便利店
照相館	線香專門店	鑰匙店	雜貨店	100日元家品店
首飾店	陶瓷專賣店			

**公共服務**

郵局	醫院
----	----

## 5. 神樂坂社區生活

### (1) 咖啡喫茶文化

根據「粋なまち神樂坂」的網頁<sup>14</sup>的紀錄，在此區域內，有為數不少的咖啡店／喫茶店。它們分別是歐式（露天茶座）、（日化）美式漢堡店（速食形式外賣形式如 Mosburger等）、日式的連鎖式或個體戶式的咖啡店（在室內可供閒坐，個體戶式咖啡店的店長通常對烹調咖啡十分講究），大部分提供特色咖啡蛋糕以及簡單的早餐／午餐。

在Christopher Alexander（1994）對社區的分析中指出，一個充滿咖啡店（模式88）的城市才是充滿人情味的地方。因為咖啡店是個特殊的公開環境，「人們可以懶洋洋地、無所顧忌地坐在那裡、觀看街景，並注視熙來攘往的行人」；同時，人們可以在這個地方閱讀、聽音樂、放鬆休息一段時間。Christopher Alexander進一步定義咖啡店為「社區的黏著劑」（social glue for the community），那是個大眾或朋友聚會的老地方，也同時可以偶遇朋友甚至認識新朋友的場所。另外，如果社區內出現不同的咖啡店，就可以吸引、聚集不同特性的人們。他們可以隨著自己的喜好，到適合的咖啡店內尋找共同話題、興趣的群體，從而建立人們的社區身份（identity of a neighborhood）。

從我們觀察所得，神樂坂咖啡店，尤其是那些較便宜日式的連鎖半自助的小型咖啡店，顧客主要是附近居民，早上是上班族吃簡單早餐的地方，有些客人會長時間耽於咖啡店內閒坐，通常他們會點一杯咖啡或小吃，然後靜靜的閱讀或用筆記型電腦工作。下午時分，一些學生會到這些咖啡店內一起溫習或做功課。獨立開業的咖啡店則時常接受日本的國內休閒雜誌訪問，讓店主暢談自己創立的咖啡店及對咖啡的執著（例如Patio、George Sand）。這些店都經過精心佈置：（例如キイトス茶房），宛如圖書館一般，讓顧客能自在地一邊看書一邊享受香濃的咖啡<sup>15</sup>。「トンボ口」咖啡店則毫不造作，男店長本身是個建築師，一個人打理著咖啡店。店內播放著悠揚的古典音樂，混著咖啡的香

味，恆久洋溢著閒適的氣氛。店主從容地為客人沖製咖啡或準備食物，又不時與客人閒話家常，據《特集神樂坂であんない帖》報導，這裡是本町人們的聚會的場所（2007：82）。

## （2）社區節慶及活動

神樂坂是一個充滿生氣的社區。居民自發組織各種節目活動，由此建立社區的定期活動時間表。於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節奏和社區的慣例活動及節慶連在一起，增添了街町生活上的樂趣，以及與社區內其他居民相識、互動的機會。同時，居民也因為融入及參與社區的活動（計畫、組織及推行）而產生對社區的歸屬感。

神樂坂的社區組織很懂得利用露天空間舉辦節目，平日只用作運輸的馬路和行人道到了節慶日便成為慶祝場地或市集。這令居民和外來客人都能在有節目的日子中解除日常生活的慣性束縛，在公共空間裡自在地享受節日的氣氛。

在神樂坂的街頭巷尾，社區季刊及網頁都不時宣傳社區內舉行的活動，清楚記述社區內每天的活動安排（見下文附表2）。粗略地說，活動類型可以被歸納為兩個類別：社區節日及文化知識學習的機會。



神樂坂區內的咖啡館

### (3) 神樂坂的慣例活動及節日

■欣賞櫻花是日本人生活中一項重要的季節活動。當然，也成為了神樂坂居民的地區例行活動。每年三、四月，人們都會到飯田橋附近、神樂坂入口的河道旁欣賞盛開的櫻花。

附表2：區內每年的慣例活動

月份	節目	月份	節目
一月	新年：參拜山手七福神（昆沙門天為鎮守山手七福神其中之一間寺廟）	七月	神樂坂祭——阿波踊舞蹈表演
二月	神樂坂獅子舞及太神樂	八月	
三月	到飯田橋車站的外堀（即江戶城的護城河）即神樂坂的入口欣賞櫻花	九月	神社秋祭（赤誠神社，築土八幡神社，若宮八幡神社）
四月	神樂坂藝者音樂舞蹈表演（神樂坂舊名為華之會）	十月	神樂坂下町文化祭——坡道繪畫活動
五月	六丁目青空市（商店露天特賣）	十一月	防止災消防演習
六月		十二月	商店街年終特賣

#### ■神樂坂藝者音樂舞蹈表演（神樂坂をどり）

根據東京神樂坂組合事務所的資料<sup>16</sup>，現在仍然有大約30位藝者分別被8家料理店邀請工作。這些新一代的藝者們都組織了團體，除了在料理店工作外，她們也不時在神樂坂劇場內表演。每年四月份的第一週，他們更會舉行大型的公演，名曰「神樂坂をどり」，向普羅大眾介紹傳統日本音樂及舞蹈。

### ■六丁目青空市

神樂坂每年也會舉行商店露天特賣活動。在這特定的日子，神樂坂坡道的行車線都會封閉起來成為行人專用區。商販在道路兩旁擺賣一些特價的貨品、蔬菜及地方特產等。這些露天市集都在夏天的日子舉行，居民甚至遊客都在這裡走動、閒逛、觀看有沒有喜歡的商品。若是走得累了，便在路旁買小點心、或喝上一杯茶，並與大家聊天聯誼……這樣的活動已經成為了區內每年必辦的活動，神樂坂在這些日子也會變得鬧哄哄。

### ■神樂坂moving festival（まち飛びフェスティバル）

神樂坂最盛大的社區節日是每年十月的神樂坂moving festival（まち飛びフェスティバル）。最引人矚目的是神樂坂大道上會放上一張長約700米（神樂坂大道的長度）、90釐米的畫紙，讓行人隨意繪畫。當天，街頭上更設有小吃攤或傳統小玩意，讓遊客們玩耍作樂。自2007年開始，還舉辦服務生持水杯托盤賽跑（ギャルソンレース）。同時間，更舉辦大量的傳統及普及文化表演：如能劇、長唄、藝者舞蹈、茶道會等，亦有藝者介紹座敷的遊戲、街道寫生大會、工藝品市集等等。這的確是極其雅俗共賞、熱鬧和快樂的社區節日。

### ■宗教節日

神樂坂地區上的毘沙門天（善國寺）及赤誠神社，是本區內重要標誌建築物。建於1595年的善國寺是神樂坂的宗教中心，寺內供奉東京地區的七福神之一。而著名的赤城神社（建於1460）每逢新年及祭禮（9月19日的神社秋祭），都有大量本區居民及其他地區的信眾到此參拜。

對神樂坂的居民而言，善國寺不僅是一座廟宇，更是社區的一個的活動中心點。每年區內的大型活動都會在此舉行。例如：2月份的江戶時代的獅子舞及太神樂，在7月則舉行慶祝夏季來臨的祭典阿波おどり大會（阿波舞蹈大會）。在這個活動之前，街上或社區網頁均有宣傳及大型招募活動，希望區內



神樂坂下町文化祭：行人在長約700公尺的畫紙上繪畫（攝影：渡部晉也）

居民可以積極參與，擔任舞者及義工等崗位。這些民間自發的活動都是有系統的組織，在表演之前有緊密的練習及排練，在網頁或區報內都有明顯的宣傳和召集訊息的發佈。

在活動當天，表演的舞者會身穿鮮豔浴衣，在善國寺門前及神樂坂大道上進行大型集體舞蹈遊行。觀眾們扶老攜幼，聚集在神樂坂坡道兩旁欣賞。

#### ■文化知識學習的機會

一個良好的社區或城市環境，應能提供給市民終身學習的機會<sup>17</sup>。神樂坂地區內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教室，提供給區內外的人們報讀。這些小型「教室」大都是由居民自行舉辦，提供各式各樣的興趣學習班。其課程內容十分廣泛；由日常生活知識（例如：烹飪班、家務料理）、藝術創作（例如：繪畫素描、插花藝術，書法水墨等）到傳統文化（例如：傳統日本浴衣和服布料製作、日本民謠戲劇、能樂的欣賞及基本技巧，日本三味線演奏及茶道等）皆齊備。



在神樂坂大道上舉行阿波踊り舞蹈大會（攝影：山口賢二）

這些多元化的學習班不單是一般興趣班，或針對日常生活上的需要而開設的課程，更重要的是在「實用」「休閒」以外，也提供了傳統文化及藝術的知識：例如能樂、花道、茶道及三味線演奏等。同時，這些教室並不是集中在某個社區中心內，而是在社區內不同的地點舉行。有關烹飪料理的學習班，部分是由區內的日式料理或西餐廳主辦，上課地點均是安排在餐廳內，時間則在非營業時間（例如：早上店鋪還未開門或下午休息時間）。擔任的導師都是該店的廚師，教授學員們有關料理的知識及技巧。至於傳統文化藝術課程，則在區內小規模教室內進行，例如：新內若木會教室、矢來能樂堂等。這等課程還會不時邀請在各領域的著名大師擔任導師。

所有教室的課程資料，除了在教室及店鋪張貼外，居民也可以從社區季刊及神樂坂的網頁內獲得相關資訊。社區每天都會清楚發佈資訊，其中包括各個教室的活動、內容、時間及地點等。除了定時舉辦的學習班外，區內更不時舉行藝術展覽、音樂會、舞蹈演出、講座及研討會等。另外，部分商鋪（例如：陶瓷店或漆器店）也在店中舉行一些免費的小型展覽，展示店家自己的蒐集或創作的作品。

在網頁內的「今日の神樂坂」欄目中刊登了每天在神樂坂地區舉行的文化或表演項目<sup>18</sup>，區內幾乎每天都有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發生（請參考附表3）。區內大量的藝術文化活動，使神樂坂成為一個文化氣息濃厚的小區。

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在區內不同地點以及商店內舉行，各個地方的主持人多數同時擔任作導師，教授各種文藝技巧，也開拓了坊眾聯誼的空間及機會。這種舉措大大有助於建立「神樂坂」在人們心中形成為一個完整的意象，這也促成了「神樂坂」的獨特之地區性格的形成。

### 神樂坂的町營造運動

在神樂坂營業的商戶及住民，十分積極地組織了各個團體，主要有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粹的町營造俱樂部<sup>19</sup>（NPO法人粋なまちづくり俱樂部）、神

附表3：神樂坂地區內不同類型的學習班的場所

料理教室	舞蹈教室	花藝教室	繪畫	傳統藝術教室
縁の豆 神樂坂焙煎所	アロヒマカ・フラダンス・クラブ	飯村華道教室	甲斐デッサン教室	陶藝教室
ビルッフアス	矢來能樂堂	愛フラワースタジオ	アユミギャラリー神樂坂美術塾	東八拳
アルパージュ	バレエ「サイガ・バレエ研究所」		ドトールで繪畫教室	大正琴教室
Janat ジャンナッツ	阿波踊り「神樂連」	アトリエ・カサブランカシルク	神樂坂カルチャーサロン繪畫教室	友禪染め教室
	マツウラダンススクール			神樂坂森戸記念館日本酒の科



樂坂町營造興隆會<sup>20</sup>（神樂坂まちづくり興隆会），會員為神樂坂各個組織：商店會、町会、花柳界、料飲組合、町營造会、NPO法人粋なまちづくり俱樂部）、神樂坂組合等。有關町營造的組織，除了實際地以政治性或文化性途徑去推動町營造運動外，亦透過舉辦區內大型節慶活動、出版各種特集、期刊、報紙等報導神樂坂各類訊息來凝聚街町內的能量：這類資訊包括散步地圖、商業宣傳推廣、居民專訪、文學抒情文章、藝術文化節目介紹、神樂坂歷史考證、町營造運動的反省及討論等，應有盡有<sup>21</sup>。在神樂坂的書局更設有專區，售賣各類有關神樂坂的特集、期刊、雜誌等。

從這等期刊雜誌，我們可掌握神樂坂町營造運動的歷史進程。神樂坂的町營造運動，其實始自昭和47年（1972）。如上述日本戰後開始經濟高速發展，在神樂坂之坂下接壤之飯田濠於當時受到嚴重污染，惡臭非常，新宿區之區議會於1972年的「再開發都市計畫」之其中一項，就是填飯田濠（原為江戶城牛込濠）。但昭和53年，一位擁有土地權的人士由於土地交換權利問題而提出訴訟，由此引起本區的居民及商戶聯合社會上的其他團體，成立了「保衛飯田濠會」，反對政府的填濠行動。反對者主張，飯田濠不僅是江戶時代以降的歷史景觀、傳統以來人們都在夏天於飯田濠泛舟觀賞煙火；同時一直以來，飯田濠附近的居民都以濠的岸邊作為休閒空間。這次運動，「保衛飯田濠會」成功保衛了江戶時期遺留下來的歷史景觀，及於稠密都市中寶貴的休憩閒適空間，到了今時今日，人們仍然可以見到牛込濠的石垣之外觀。現在牛込濠之岸邊種滿櫻花樹，每逢開花季節遊客都聚集在此賞花。這次運動，也從此掀起了神樂坂的町營造運動。

綜合《まちづくり季刊》（2005年9月）、Sorensen & Funck（2007）以及《神樂坂キーワード第2集／粋なまちづくり 過去・現在・未来》的報導，1988年新宿區政府劃定神樂坂為推廣町營造的典範地區。1991年，神樂坂的居民及商戶成立「神樂坂町營造之會」，制定了神樂坂町營造憲章，也出版了

「神樂坂樂樂散步」，用作宣傳、推廣神樂坂的空間文化。1994年，「神樂坂町營造之會」訂立了「町營造憲章」；而1997年「神樂坂町營造之會」推行了街道改良計畫，於計畫中神樂坂之商店會會員，制定了有關沿著神樂坂大道之1至5丁目街道空間的以下各項規範：（1）建築物高度限制；（2）對應於街路面的建築物外牆壁面後退空間（setback）的尺度；（3）建築物之設計樣貌；（4）美化街道之措施及計畫等等。

2000年，有發展商在神樂坂區內收購了幾塊相連的土地（約4500平方公尺，大多數是經濟泡沫繁榮時期所興建的料亭），準備興建一座樓高31層的住宅大廈。神樂坂整個社區都感到極大震驚，認為有這一幢「超高層」大廈在神樂坂出現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在地的店家及居民成立了「神樂坂高層大廈對策協議會」（神樂坂高層マンション対策協議會），進行反抗活動。運動過程中，東京大學都市設計研究室提交了兩全其美的高樓設計反提議方案，一方面保障發展商的收益，另一方面也考慮到神樂坂整體街道形象及活動。協議會收集了4569人的簽名，要求新宿區政府停止這項超高層大廈建築計畫。新宿區政府與發展商討論商議（在討論期中，協議會收集到8400人的簽名反對），結果由原來的31層，減低至26層。

2006年，又有發展商提出於神樂坂四丁目興建14層高之住宅大廈，神樂坂的商戶及居民又開始反對，掀起了另一場保衛神樂坂本區空間文化及景觀的運動。2009年12月，神樂坂區的網頁宣佈「神樂坂まちづくりの会」獲選為日本聯合國協會聯盟所舉辦之「未來遺產運動」計畫之一。日本全國有50個提案應徵這個計畫，結果在10個獲選計畫中，「神樂坂まちづくりの会」為其中一項，而且也是關東地區唯一被選中的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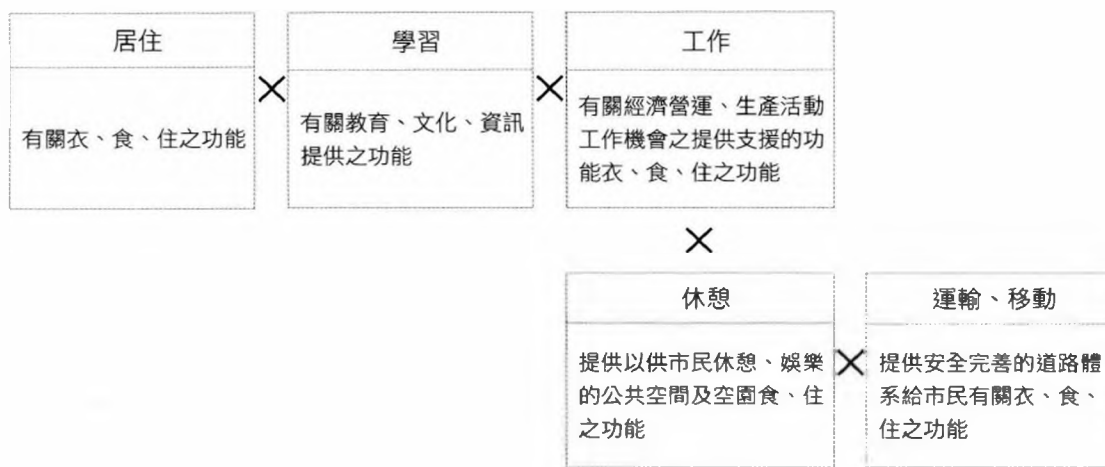
2009年9月至2010年2月，神樂坂各個町營造組織合辦了6個工作坊，參與者為區內的居民、商戶以及愛護神樂坂的人士。這次運動訂定了「神樂坂粹的町街道景觀保育規則（神樂坂粹なまちなみルール）」，及「路地界域的粹的街道環境的保育規畫（路地界限粹なまちなみルール）」的提案<sup>22</sup>。

經過深入的研讀後，我們可以發現神樂坂之町營造運動，並不盡如 Sorensen & Funck 所言，集中在於政治（市民爭取更大地區政府管治參與權）及社會（環保、可生活環境）的課題，為展開對抗運動的主導動力。反而，我們在眾多資料中得知，保衛及持續歷史及傳統文化的景觀，正是神樂坂之町營造運動的最主導的動力。

綜觀神樂坂的町營造運動，全面兼容到古蹟保存保育、傳統文化活動及空間保育、日常生活空間保育、本區整體景觀保育、推廣本區特色等項目，這是十分成熟的、可成為典範的町營造運動。佐川嘉久在其題為「都市計畫的任務和町營造」的（都市計画の役割とまちづくり）講義／報告中，以兩個圖表陳述出「都市生活空間需要強化的5個方向」，以及「以町營造為本的都市規畫的原則」。第一個圖表描述了都市空間的素質標準以致市民對都市空間的要求概覽性的理解<sup>23</sup>；第二個圖表「以町營造為本的都市規畫原則」，描述了總體町營造之方向目的。我們翻譯了這兩個圖表，並在第二個圖表各項概念旁列出了神樂坂的町營造運動所得之成果，以求檢視神樂坂是否已大致達到上列圖表所陳述的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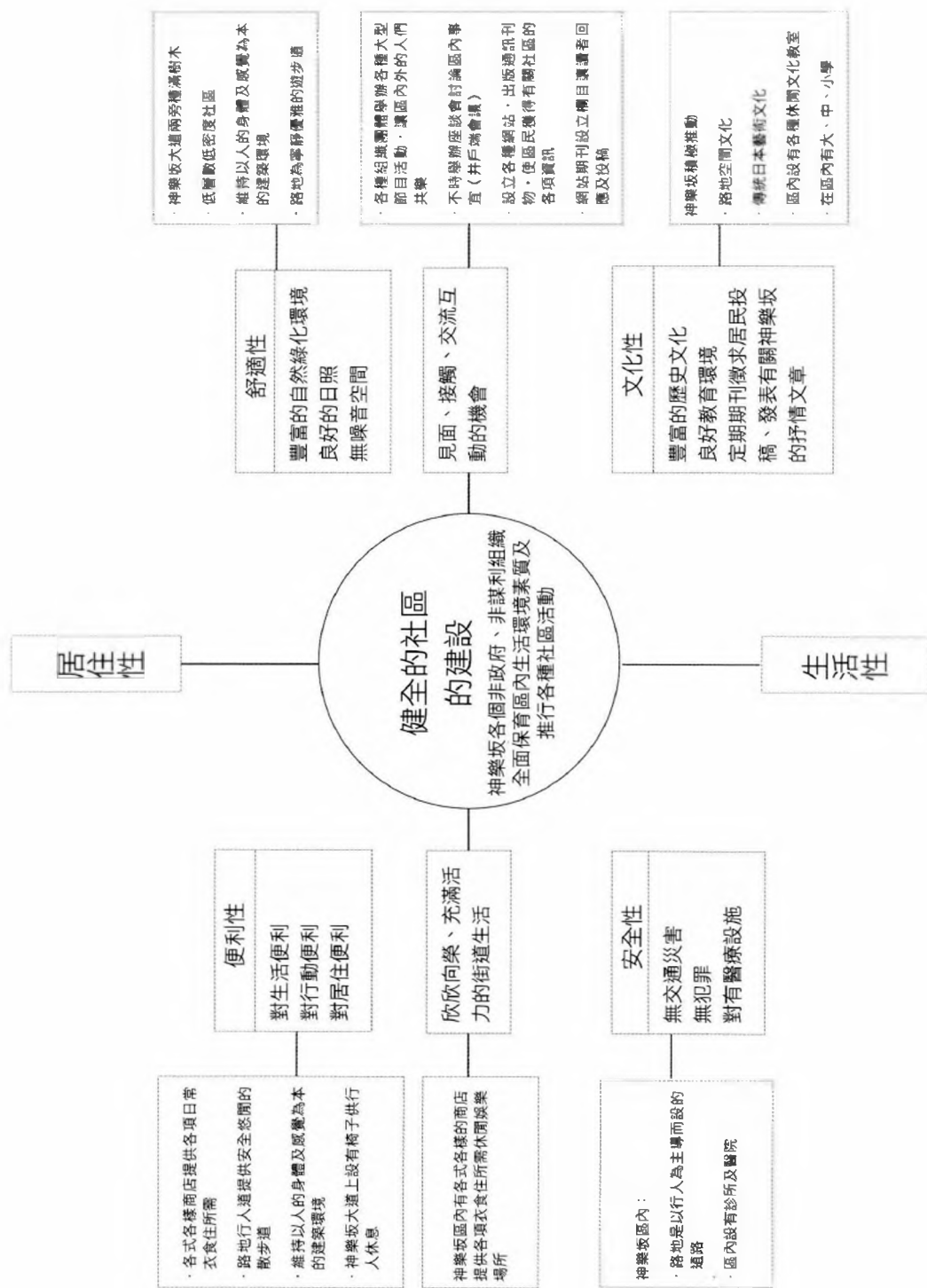
1. 「都市生活空間需要強化的5個方向」（見右頁圖表）

2. 「以町營造為本的都市規畫的原則」：從理念原則展列神樂坂的町營造運動所得之成果（如頁154之圖表）



## 結論

透過對神樂坂的町營造運動的報導，我們可較為深入地瞭解到日本的町營造運動。首先「町」是一個沿自歷史以及集體回憶、有範圍的空間意識，在此空間內，人們日復一日地累積衍生著生活及文化。町內居民也由此掌握了明確的空間表象。神樂坂町內各町營造組織也很明確而具體地強調，以本町的傳統及集體回憶的象徵空間及活動來標榜該町的「個性」（即總體意象），一旦政府或發展商對該町進行拆除或重建，町民很容易意識及掌握到所要保衛的那個整全的、屬於集體回憶的象徵空間及傳統的生活模式及活動，而提出合情理之反抗的理由。再者，傳統的建築（室內及室外）空間實際上乃是以人的身體及感覺作為基準及尺度去興建及營造的空間，這也給予町民更強而有力的理由去對其作保育，因為此即同時保育一個有素質、適合人居住生活的空間。



「人的感覺」除了人們對物理空間的尺度的感覺外，更包括人們的社會及文化需求。以此感覺及需求去維持、營運及建造一個可以提供人們進行各項以人為本的活動——交誼、學習、休憩娛樂及營生的空間，就是町營造的主旨。

《神樂坂キーワード第2集／粋なまちづくり 過去・現在・未来》最後以「景觀十年、風景百年、風土千年」（2010：11）為口號去總結在神樂坂推行的町營造運動的精神——從有關各種報導及紀錄得知，神樂坂是經過很長時間，有心人士及組織團結一致在其崗位上，持久努力不懈地進行爭取運動、並且不斷宣傳、教育，才能獲得今時今日的「町營造」成果。「町營造」不是一場有了成果便可完結的政治或社會「運動」；而是提醒人民爭取將城市建為可住居地方（habitable place）的權利要爭取在城市以應有的權利去住居（to dwell），是一場世代永續的長久戰爭。

於本書涉及香港部份的章節，我們將會介紹在香港曾經推行過的反重建的社區運動；並以對神樂坂的町營造的理解作為脈絡及觀點，去分析及批判在筆者自身所屬城市——香港的社區運動。

## 注釋

- 1: 通常まちづくり都是翻譯作「社區營造」(英譯名是community building), 然而Sorensen & Funck (2007:1) 認為Machizukuri並不容易翻譯, 所以他們沿用日語羅馬拼音的音譯。戶沼幸市(1991)認為まちづくり一詞並不能簡單地翻譯為外國語, 例如community building, 因為這樣的翻譯不能將まちづくり的原整概念全盤表達出來。本文作者認為まちづくり的翻譯困難在於まちづくり的意涵。據《廣辭苑》, 有關「町」(まち)的解釋包括了: 有限範圍的地域、為數眾多的人群、住宅、繁華的街道、商店、在此地域內的人們的生活方式等等概念之間的複雜關係。當Hein (2008) 解釋Machi的意義時, 他首先舉出於江戶時期這字詞的意思: 「町」乃是江戶城內各個分別管治地區的稱號——江戶城並沒有一個市政府統攬整個城市的政務, 於此, 「町」有分別區與區之間的範圍的意思。時至今日, 「町」在日本的城市仍有多重意思: (1) 「町」這稱號多少也帶著懷舊的意味; (2) 「町」乃郵政系統內的某個都市各區單位; (3) 以一條商業街道為中心的住宅區。Hein (2008: 79) 更詳細解釋Machi含藏了很厚「鄰舍坊眾集體參與活動」的意味。這複合的概念超越了在日語中以片假名書寫的外來語: コミュニティ (community) 的意思——コミュニティ是泛指「一個沒有明確範圍的社會空間」(Hein, 2008: 103) 「社區」較傾向於社會學的意思。故本文暫用町營造來詮釋まちづくり。
- 2: 中文譯《全球城市》。
- 3: 據Hein (2008), 日本學者兼政治家一せきはじあ, (1873-1935) 於1913年開始採用「都市規畫」這個名詞, 以「界定西方」式自上而下的、功能化系統性的、地理空間大範圍的策劃及組織城市整體的空間佈局及運作系統。
- 4: 據Bestor的陳述, 有很多學者都指出, 日本都市仍然殘留著前工業時代的「町—社區」特色,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種傳統接近村落形式的社區的社會組織或結構, 並不是無間斷地自前現代時期一直延續至今時今日, 反而, 這群學者認為現今日本人的視社區作為群居聚落的社會意識, 是近期的文化構造。姑且不論「町—社區」是前現代時期的延續, 或是經濟泡沫爆破後市民重新肯定社區組織及團結, 以保育本區生活環境質素的運動, 現時的日本市民, 一般都非常熱衷於參與町營造運動/活動。
- 5: 中文譯《町營造的哲學》。
- 6: 戶沼幸市對傳統村落的理論性描述, 跟Tönnis (2002: 43) 所描述之傳統村落社區模式極為吻合。Tönnis指出, 同一村落的村民, 有共同謀生的空間(農地或某特定海域), 她/他們群集而居, 村舍通常一家接著一家。村民要互相分享謀生的知識, 經驗及消息, 大家在生活上互相支援, 也要共同負責整條村落的秩序。
- 7: 據三浦展, 自大正昭和時期開始, 山手已變成較富裕階級的代名詞; 但同時三浦展也指出, 自1970年代開始, 山手階級已變得大眾化, 成為「中流階級」的代名詞。
- 8: 中文譯《町漫步guide東京+》。
- 9: 中文譯《神樂坂Keywords第2集/粹之町營造過去·現在·將來》。
- 10: 神樂坂所提供的藝術文化休閒娛樂空間, 皆配合三浦展《下流社會》一書所描述所謂「靈活族」類型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這群給人高生活水準印象的人們, 乃是「過著樸實的生活、畢業於一流大學、熟知藝術和文學、熟知日本文化和歷史、熟知西洋文化和歷史、熟知政治經濟情勢」的。其興趣大多是「閱讀」、「美術鑑賞」、「園藝造景」、「旅行」、「散步」等。
- 11: 黃文宏在《粹的構造》序文中指出, 「粹」是江戶時代的美學概念(2009: xviii)。該書作者九鬼周造則於書中深入地以江戶文學及藝術解釋粹的本質。第三章(粹的外延性構造)中說明, 與粹有關的意思還有高尚(日文為「上品」)、華麗(日文為「派手」)、滋味/雅緻(日文為「渋味」)等(2009: 47)——這大概是神樂坂企圖建構的傳統文化環境之氛圍。
- 12: 村上春樹的名作《尋羊冒險記》第三章, 講述了主角對小時候常到訪的水族館, 靜悄悄地從館中所展覽的鯨魚陰莖前面, 呆呆度過幾小時。主角感到「那裡散發著一種被切除陰莖們特有的某種難以說明的哀愁……」。而後, 主角第一次和女孩子性交之後所想到的, 也是那巨大的鯨魚的陰莖。這奇異的展示著鯨魚陰莖的水族館, 令主角產生悼念及感懷, 正是「經挪用而成立的文化遺產」(heritage by appropriation) 的最佳例子。
- 13: 淺原須美所著《東京六花街》, (2007: 72)。
- 14: 見連結<http://kagurazaka.com/mise/kissa-vs>
- 15: 見《特集神樂坂であんない帖》(特輯神樂坂旅遊資訊集)インフォレスト/INFOREST MOOK, 2007: 42。

- 16: 東京神樂坂組合事務所・神樂坂花柳界 [hppt://www.hana-kagura.net/link.html](http://www.hana-kagura.net/link.html)
- 17: Lefebvre所提出人民在城市生活的各種應有的權利其中兩項為：獲得教育及培訓的權利、獲得工作的權利及獲得文化修養欣賞的權利（1996：157）。
- 18: 神樂坂から発信する、アート&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情報サイト [http://www.kaguramura.jp/detail\\_day.cgi](http://www.kaguramura.jp/detail_day.cgi)
- 19: NPO法人粋なまちづくり俱樂部組成主旨為：（1）推動町營造活動；（2）增進區內保健、醫療及福祉的組織及活動；（3）振興區內文化、藝術及運動（4）保育區內環境；（5）維持地域安全活動；（6）推廣及支援區內各項特定非營利之團體活動。
- 20: 「神樂坂まちづくり興隆會」（神樂坂町營造興隆會）為專門檢討地區之規畫之地區代表主理的組織。
- 21: 幾種有關神樂坂的主要定期刊物：まちづくりキーワード集（每10年出版一次，專集回顧及討論神樂坂的町營造運動進程及去向）；ここは牛込、神樂坂（1994年創刊）、かくらむら（刊物、電子版）、神樂坂まちの手帖季刊（2000年創刊）等等。
- 22: 這次運動訂定了「神樂坂粹の町道街景觀保育規則（神樂坂粋なまちなみルール）」之7條規範提案：
  - （1）保育町內以人的身體及感覺（human scale）建築造作為本位
  - （2）保衛街道與建築的密切連接關係：
  - （3）擬興建之）建築物的高度應與周圍（已存的）建築物作出調和，以使町可維持整體和諧的景觀。
  - （4）神樂坂大道的建築物的地面商舖應經營適當的業務（此項規畫主要反對色情事業佔用地面商舖，同時也不贊同無人管理的提款機或自動販賣機等機器設在地面商舖）
  - （5）商店的外觀的設計所用物料顏色，應與周圍的店舖調和而增強其連續性的感覺。
  - （6）商店或建築物的出入口應該方便殘障人士出入
  - （7）商店或建築物的標記，看板及照明的設計應該讓行人容易看到，同時也應在設計上增加步行者視覺上的趣味。
- 「路地界域的粹の街道環境保育規則七條規範（界限なまちなみルール）」提案：
  - （1）不擴寬路地，不令路地消失
  - （2）使路地界限的尺度感保持著像神樂坂的模樣
  - （3）保持著路地的町的環境的連續性
  - （4）以自然石來完成路面
  - （5）室外與建築物外部的裝飾設計應能令到景觀持生氣勃勃，並與周圍環境設調和
  - （6）指示牌、看板、照明適應路地空間
  - （7）繼承及保護路地的一直沿用的使用方法
- 23: 佐川嘉久在其所製的圖表所列的都市生活空間及都市規畫所需要達到的原則，大致與Lefebvre所提出人民在城市生活的各種應有的權利相同：性別及年齡平等的權利、階級平等的權利、獲得教育及培訓的權利、獲得工作的權利、獲得文化修養欣賞的權利、獲得保持健康的權利、能有時間空間休憩的權利、獲得住屋的權利（1996：157）。



第2部  
城市空間文化研究個案篇

香港

# 引言：赤裸裸的「雙元城市」—— 香港城市發展的危機

下筆描述香港城市發展的此刻，正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2010至2011年年度施政報告之時（2010年10月中）。整份報告最引人注目的部份，就是有關房屋政策方面。政府一方面委託半官方機構香港房屋協會興建中小型住宅樓宇，以先租後買的優惠，幫助市民購置房屋（此項措施定名為「置安心計畫」）；另一方面監察發展商銷售樓宇過程，更擬定法律取締樓宇依照建築面積而非實用面積制定（每方英尺之）售價。

政府一方面宣佈這數項為「穩定樓價」的措施，但隨即又強調這些措施並非用來「打擊樓市」。說穿了，這些策略皆是極為現實、並以市場為主導的：其基本原則是不妨礙房地產市場的運作，並控制它平穩上升，也容許大部份中產階級參與投資，協助她／他們成為房地產市場的消費者。政府這個意願，其實是反映了香港大部份人「樓房是最佳的投資」的價值觀。

2003年發生了非典型肺炎，香港的經濟一落千丈，中國為了挽救香港的經濟，容許中國內地居民「自由行」到香港旅行。在同年，香港政府又推行了

香港投資移民計畫。其中一項條件，是要求申請人在申請移民前或申請獲批後的六個月內，把總值不少於650萬港幣的資產，投資在「獲許投資資產類別」的項目之上<sup>1</sup>。

此項政策，在剔除「房地產為投資移民之其中項目」的措施實踐之前，的確誘使了中國內地富人紛紛來港投資，尤其是在房地產市場方面；香港的地產價格也因此被帶動、越升越高。中國的富人們特別喜愛香港最中心地帶的房屋，由此亦導致靠近維多利亞海港兩旁的香港島及九龍的房地產價格越來越昂貴。儘管房地產已不是投資移民之其中項目，現時香港豪宅的買家仍有很多是內地富豪。

市中心的地價越來越高，這也促使市區重建的步伐越來越急促，並且規模也越來越大。以往普羅大眾聚居的地區，皆被政府以樓房殘舊為理由，進行大規模拆卸及重建。而舊區中的新建築物價格，一幢比一幢高。例如在灣仔區，位於太原街的「尚翹峰」（落成於2007年），於2010年末，單位建築面積一平方英尺的售價已超越萬元港幣；位於馬路對面的「Queen's Cube」，提供的單位建築面積為400至590平方英尺，實用面積只佔建築面積的68%，但售價（以建築面積計算）卻是平均一平方英尺約17000港幣以上。這兩個物業皆由香港市區重建局與私人發展商所合作興建。

灣仔（由海傍至山邊一帶）自開埠以來、到近年重建開始之前，本來是普羅大眾的聚居之地，但是如今卻遭受「仕紳化」赤裸裸地將之改頭換面。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資料，香港目前（2010年第三季）個人及家庭月入中位數分別為約1.1萬港幣及約1.8萬港幣，試問這高昂的樓價，一般的香港人如何能夠負擔得起？

舊區居民因重建而動遷，區內提供鄰近居民生活所需及日常生活消費休

閒的場所及活動（例如平價茶餐廳、中藥店、藥局、茶樓等）的商戶也隨之而消失，這即是說，在市中心，體現著平民大眾日常生活文化的空間，已逼近消亡。而香港的市中心區，已慘遭以金融投機為主導的全球化巨浪所沒頂。被淹沒的正是香港普羅市民的生活環境和香港平民的生活方式——簡單地說，香港固有的日常生活文化，已蕩然無存。

取而代之，在香港人眼前出現的，乃是一幢幢呎價過萬、但單位面積細小得不能「住居」（habitable）的貴價大樓；而住宅大樓周圍街上的店舖，就只有連鎖咖啡店、高級精品店、（由歷史建築物改裝而成的）貴價餐廳、精品酒店。逃過拆卸大難的「歷史建築物」，成了仕紳化地區的點綴。「歷史建築物」變成了樣板房、象徵物，虛擬了「懷舊文化生活特色」，在仕紳化地區中「錦上添花」，使舊區的「文化品位」更得以提高，大大增加了這地區的「特色」、宣傳噱頭；也因此，當區樓房價格，更是水漲船高<sup>2</sup>。

目前的香港，尤其是市中心區，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房地產市場，熱錢滾動形成了建築群，也吸引了一群又一群從世界各地而來的投機者（最新消息是，曾經在1998年狙擊港幣衝擊香港金融體系的索羅斯已在香港成立辦公室，投資中國大陸的股票）。參與投資的人們，完全沒有「地方」及「安居」的觀念（或直接將這些觀念全面商品化），大家已成為了赤裸裸的賭徒，將房地產價格「舞高弄低」，掠奪一切利潤。

Arundhati Roy認為國家本來職責的其中一項，是代表人民保管國境內的自然，但現在國家卻任由私人公司奪走自然「資源」，將它們變成股票買賣，她稱這些暴行為「以史無前例的規模進行的一場野蠻的奪取過程」（引自Harvey, 2008: 126）。然而除了掠奪自然，私人財團企業對人類的文化及文明的侵略，又何嘗不同樣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進行的一場野蠻的奪取過程」。今時今日，消費文化已幾乎完全將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殖民——市民在

日常生活中，被教導追求的，就是傳播媒體不斷吹噓的所謂「品味」；所有平實的生活空間，已盡被「品味」所毀。即使是到茶餐廳吃一碗雲吞麵、喝一杯港式「鴛鴦」（咖啡加奶茶），都要被某種氣氛、品味包裝。「香港文化」已越來越成為沒有內容的虛擬表象。

全球資金大量湧入，不僅不斷推高房地產價格，也使市區重建的步伐加速，致使大部份低收入的草根階層（多數是舊樓板間房或甚至床位租戶）被逼遷離重建區，而到租金較低、（通常也是）較偏遠的地區居住及生活。然而，對於在香港積極發聲、關注市區空間資源分配的社運人士來說，那「仕紳化」理論中主要描述及批判的，即草根階層的動遷現象，卻是比較次要的討論點。綜觀由反對灣仔利東街拆卸（2004—2007）、反對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拆卸（2006—2007）、反對興建廣州深圳香港高速鐵路香港段（2009—2010）等多次有關城市空間的反抗／抗議運動，參與者的主流論述焦點，都是傾向於放在「文化保育」（即保育當區歷史文化及社區鄰裡生活文化）這課題上面。

2006年至2007年，社運份子空群而出反對拆卸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她／他們也不斷在各種媒介宣告反對拆卸的論點，又舉行各式各樣藝術文化活動去發聲，爭取傳播媒體及市民的注意，甚至屢次與警方發生衝突；然而此一同時，於2007年3月30日，市區重建局卻「啟動」了歷來最大的市區重建項目——觀塘市中心<sup>3</sup>，將之打造成商業購物中心。根據新聞報導，是次重建估計受影響人數將達4,500人，但中心地裕民坊重建後的住宅數量會大大減少，估計到時住宅單位每平方呎會超過八千港幣（於2006年估計）<sup>4</sup>。

對於市建局這個觀塘的計畫，我們見到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及陳婉嫻在2006年發起過一些觀塘重建論壇及設計計畫<sup>5</sup>，於深水埗順寧道的重建計畫中，「順寧道重建關注組」依循曾在灣仔利東街推行過的「區內居民自主規畫方案」的模式，以民眾的意願進行參與式重建區規畫及設計運動<sup>6</sup>。然而，積

極關注城市發展的社運人士卻沒有組織過類同反利東街拆除的大型集體運動，或在媒體中發出巨大聲音作討論、批判。

除了東九龍的官塘，位於九龍半島較西面的深水埗區，也在進行重建。「深水埗重建關注組」所制定之「深水埗k2-23街坊的留低方案」（2008年3月發表）中表述了「規畫方案之原則及實踐方針」，態度可說是十分溫和。該關注組所倡議的是（1）可持續發展，即「社區原有的優點，人們原有生活的優點，應予以保留，在好的環節上面，再加以發展，至於一些需要改善的東西，則予以改善；（2）期望可實踐「多贏、可行的原則」：希望不破壞原有街坊的生活質素，同時又讓社區有更更新的机会，亦讓房協在此中可以有收益，更連地產商亦可以得益；（3）期望可實踐「公平原則」：意思是希望由原舖搬到新地點的方案——關注組強調提出要求的人士「並非藉此希望獲得比以前更優厚或更差的生活條件，而是希望同時保留舊樓與臨街店面，因為留在舊大樓，我們才有能力負擔，不需要房協或政府提出任何另外的金錢優惠」。自利東街拆卸事件（2004-2007）以致還在進行的官塘及深水埗重建，社運人士及區內居民在重建過程中，爭取權利的語調已變得不一樣。於深水埗重建中，有關人士並不揭露發展機構（如香港房屋協會）、地產商在重建中能謀取巨大利益，反而在字裡行間期望發展機構、地產商能給受影響的居民一條生路，讓三者皆可在房地產市場上得益<sup>7</sup>，這種妥協實在無法讓人們理解到香港城市所面臨的危機。

利東街拆卸事件之後，於拆卸期間成立的民間團體「H15關注組」，繼續關注香港各區重建進程及出現的各種問題<sup>8</sup>。但是，其主要立論點定位於溫和的「可持續發展（即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公平）」的方向，關注組成員們的研究傾向在於如何保存鄰里社會網絡，與及那些被稱為「技藝行業」的，即是在市區中心營運的輕工業（例如印刷業、小型修理汽車工場等）的持續經營可能性；反而，仕紳化研究的最主要課題，即被動遷的貧窮人士去向如何，

則少有詳細搜集資料及作批判分析。關注組成員們討論的問題的核心，向來皆集中於重建區如何重建<sup>9</sup>，而少有重點地揭示整個城市已斷裂成為赤裸裸的雙元城市的危機。

2010/2011施政報告發表之後，香港的樓價繼續上升，所有人都有目共睹，政府自己也承認，將樓市降溫的企圖，目的不在於壓抑樓市，而在於使房地產市場運行得更好。面對以金融為本（finance based）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運行及掠奪來勢洶洶，政府顯得無能為力，任由土地、大自然被轉變為房地產業、旅遊業市場，任由公共服務（例如教育、醫療等）私有化。但是，社運人士的抗爭取向，卻只能令香港人感到更加無能為力。近年發生的有關城市空間的爭議，社運人士對政府的控訴是十分感性的：她／他們不是批判政府官員們無能或愚笨，訂定的政策沒有效用；就是指責政府官員們是充滿陰謀和奸詐的，只和發展商「私通」、「勾結」，欺騙善良的老百姓。社運人士的行動，一次比一次激烈和戲劇化：從於街頭抗爭、駐紮在皇后碼頭（後來有人斷食抗議），再於反高鐵運動中進行苦行抗議（即每行走26步便跪拜一次，寓意反對興建全長26公里的高鐵香港段）。可是，在立場的反省上，社運份子少有將討論之焦點，集中在對香港整體局勢作深入批判上——他們並未在公眾面前指出，香港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政府對資本主義高速並且大範圍的運行，其實已失去了控制能力，這逼使城市空間徹底變成市場，也讓城市空間資源呈現完全不公平的分配的劣境。

到了今天，香港的城市空間已經很清晰地斷裂為「中心v.s邊緣」的格局：中心有無限的發展潛能與資源投入，邊緣則是貧者越貧，不單被排斥城市的經濟發展以外（例如工作機會嚴重缺乏），更被排斥在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的發展以外。

2009年年底至2010年年初一場反高鐵行動，造就了一群被稱作「80後」

的年輕社運人士，成為社會的焦點人物（這群社運人士中的主要發言人士，與反對天星、皇后碼頭及灣仔利東街拆卸運動的參與者，大部份似乎是同一群人）。當立法會通過了撥款興建高鐵之後，便少見了這群人士繼續在城市空間中發表批判城市發展的言論，反而，她／他們走到菜園村<sup>10</sup>，一方面幫助留守在該村的約90個核心家庭爭取集體「搬村」與「復耕」，另一方面這群社運人士也在菜園村成立了「菜園村生活館」，跟該村農民學習耕種。並計畫將搬遷後的菜園村發展為進行有機耕種的「生態村」<sup>11</sup>。

這種轉變，可說頗為突然。「反高鐵」主要是一場有關城市經濟、城市中心空間的抗爭，其立場是以「反對城市發展主義」及「爭取民主規畫城市」為出發點。然而，這運動發展至今，主流聲音卻奇怪地變成了「參與設計（約有90個家庭的）鄉村」、「學習有機耕作」、重新定義「生產」及其價值、「實踐田園生活價值」的「新生活活動」<sup>12</sup>。

如果由反對天星、皇后碼頭、利東街拆卸一直到反高鐵，是一場又一場在城市中爭取空間資源作平均分配的持續的社會運動，那麼離開城市中心地帶到郊區（注意：不是農村）從事耕種、反思生活模式的行動，是否已墮進了眾多社會學家已作批判的，那「社群生活的拜物主義」（fetishism of the communal life）的陷阱？早在1960年，Lefebvre已明言，對那些追求緊密而和諧的人倫關係作為理想的社群主義「十分有保留」。他認為那些不斷推崇一個以簡單、直接以及即刻體現之和諧、互助互愛人倫關係為價值意義取向的社區，正是一個抽象烏托邦的顯現。在這個烏托邦內，所欠缺的，乃是真正的社會生活。人們活在其中，必定要服從一個特別沉重的道德倫理秩序，與及依順集體生活的模式。Lefebvre指出，此種以類似超驗的（transcendent）宗教或倫理作為生活意義的指引的群體，社會學完全不能去對它作回應，因為這類社區團體所信奉的，已遠離了「知識」的範圍了（Lefebvre, 2001：112-113）。



社運人士的激情地強烈地控訴過後，繼而離開了城市中心到郊區「歸園田居」；留在城市中心的，乃是受政府資助的福利機構的社會工作者們，她／他們把文化人士、社運人士反建制、反政府的激烈言論的聲譽調低，溫和地「虛擬」了社運人士的「城市文化論述」，將之放在「通識教育」、「城市文化」的脈絡中演繹，成為「文化旅遊導賞」計畫：即是將市區僅餘的50、60年代（或更早以前）興建的建築物「文物化」、將普羅市民60、70年代的生活方式「博物館化」；並將市中心將要式微的輕工業「標本化」，向香港人，尤其是青少年學生大肆宣揚：這就是香港本土文化！

政府和私人發展商看到城市能夠向這方向發展，是高興也來不及的。文化人、藝術家、社會工作者、青少年齊心把城市空間變成旅遊景點、特色社區，為城市空間增值，為房地產市場增加額外的（文化）價值／噱頭，那確是政府與發展商意想不到的收獲……將「歷史」、「文化」變成「創意工業」；將輕工業「工藝化」、加上坊眾的生活一併作為本區特式展視，這全都可列入有錢賺的旅遊業的點子、設計業的靈感、餐飲業的氣氛……這真是香港人全民贊同的舉措。

到了現在，香港的城市，已徹底地進入了「雙元城市」（dual city）（Borja & Castells, 1996：38-44）的格局。在市中心區維多利亞港一帶，房地產市場無比熾熱，分層住宅大廈價格可高達每平方呎港幣六萬元，中外投資者仍繼續把樓價不斷推高；此外，榮獲米其林（Le Guide Michelin）評價為星級的餐廳至少有40多家；然而，在偏遠的新市鎮，例如天水圍、屯門、東涌的公共房屋中，卻聚居著大批低下階層的市民及「新移民」。在這些屋邨持續傳出的，多數都是負面新聞，由「在職貧窮」的困境、青少年吸毒販毒，更嚴重的就是震驚社會的家庭集體自殺，或父母殺死子女繼而自殺的倫常慘案。相比市中心的盛世璀璨景象，這些偏遠地區卻是極其慘澹。

於2008年3月出版的《社情》季刊，其中一篇文章〈天水圍需要甚麼？〉的導言之中，報導了天水圍公共屋邨不時出現父母殺死子女後自殺的悲劇，令全港震驚，因而，整個社會開始對天水圍投注「史無前例的熱切」關注。根據這篇文章報導，社會福利界向有關機構提交申請撥款的申請，只要有「天水圍」三個字，獲得撥款的機會至少有九成，若提及「天水圍（北）」，撥款機會則可謂「十拿九穩」；但是，這篇文章所要追索的主題，卻仍然是「天水圍究竟真正需要甚麼」。香港的新市鎮（尤其是蓋完一條又一條公共屋邨的天水圍）最大的缺失、錯誤就在其空間規畫之上。如果Foucault所言之環形監獄式的全景敞視（Panopticon）是極權在視線領域上的具體彰顯的話，那麼香港偏遠新市鎮所遭受的「視線領域的極權」，就是由城市規畫專業操刀，將之（即偏遠新市鎮）暴力地被排拒／割除於整個香港城市的視線之外：以天水圍為例，幾乎完全相同的住宅高樓一幢接一幢，在屋邨範圍內幾乎沒有可供市民發展小型個體戶商業的空間，社區設施貧乏（天水圍1987年開始發展，但到現在2010年已有多於27萬人口，卻連一間醫院也沒有），同時還有到香港市中心區交通時間過長及交通費用昂貴等<sup>13</sup>問題。

這種只純粹以功能主導的單一功能（居住）空間規畫及貧乏的社會設施配套，赤裸裸地顯示了天水圍根本不是一個「可住居」（habitable）的地方。它幾乎可以跟Foucault所提及的「瘋人船」（the ship of fools）相提並論：在15世紀的歐洲，被判定為「瘋癲」的人，會被送上一條船，然後被放逐在河上，任由她／他們隨水飄走。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香港，「貧窮」正是要被排拒、放逐的「罪惡」。專業規畫師、建築師所設計、建造給貧窮人士的「容身之所」，乃是絕對貧瘠的空間。那裡，只是僅僅容許人們在生理上「死不掉」的空間。

在〈天水圍需要甚麼？〉一文中，刊出了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周永新教授的訪問，周教授正確地指出，在這裡生活的低下階層人士是一群

已失去了對自身期望，也不感到「自我」有甚麼可能性的人們。周永新表示，「天水圍問題在於人口以公屋居民佔多數，消費力薄弱，致使該區的地區經濟不蓬勃，就業機會偏低；這群低學歷低技術勞工就更難找到工作。這不單使天水圍出現貧窮問題，連帶其他社會及福利問題也都集中在該區。除此之外，天水圍有一半住戶是新來港定居的家庭，我探訪過不少新來港家庭，他們關心的是下星期／下個月的生活怎麼過，著重解決眼前的生活問題，解決不了便走進死胡同，甚至做傻事。她們的想法與主流想法很不同，例如我們會覺得香港是充滿機會的城市，學業有成，找到好工作，就可脫貧。但他們的圈子則只會討論一些急切問題，例如失業可拿多少綜援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老公給多少家用？哪個朋友出外工作賺了多少錢？他們都會寄望子女成才，但顯然並非我們所想的那麼長遠，自我增值、自我提升，對他們是很遙遠的事情。」

周永新的文章很透切地分析了天水圍的社會問題。但是天水圍的規畫、建築空間體現著一個什麼地方？面對這種完全不能容許人們對「自我」有所期望，不能支援人們有發展之可能性的空間，我們察覺到香港城市已陷入絕對分裂的「雙元」結構——這簡直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在《Beyond Neoliberalism》<sup>14</sup>（2001）一書中，法國社會學家 Alain Touraine 分析了法國自1995年大罷工之後的社會運動的特質。Touraine 認為社會運動絕對不能只是簡單直接的反對當權者，社會運動一定要宣言為保衛或達成整個社會都承認的某種價值，作為思想路線及行動的綱領。我們發現現今香港社會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一）絕對明顯的階級分割與貧富懸殊，延伸至城市空間資源絕對不平均的分配，以及徹底雙元城市的出現；（二）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洶湧形勢下，政府已無能力作為社會進步發展的保證者：在就業問題上，低收入人士薪金長期偏低；在教育問題上，一連串自2000年代開始，以「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為目標的教育改革，偏重以參加課堂外的活動的成績來評核學童能力的趨勢，致使很多沒有資源學習課堂外其他技能（如外語、樂

器、運動項目等)之貧窮家庭的兒童，無法與較富裕的兒童競爭；(三)在居住環境問題上，如前所述，貧窮人士幾乎等同於被放逐至偏遠地區自生自滅。

在這形勢下，如果香港社會要推行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應該是往哪個方向呢？這幾年來，積極關注城市發展的社運人士帶動、誘發傳播媒介，大肆宣傳的焦點課題都往往是「文化」二字：(一)社運人士們對城市生活文化的詮釋，乃是市中心地區60、70年代(或以前)之生活方式的回顧及爭取保育；(二)社運人士們對人們所需要建立的社會關係，甚為狹窄地以地區(例如港島中西區、灣仔)為本的社群主義、或甚至郊區鄰舍主義來論釋。總括而言，我們所目睹的，乃是社運人士越來越傾向「唯美」，她／他們以「觀賞」的角度界定文化、以「懷舊」界定文化的內容、再加以「展示」：即以設立「民間生活博物館」，或將生活藝術化、藝術品化，來作為社會行動的實踐環節。這群積極關注市區空間作為資源的社運人士，現時所專注的，乃是社運人士自家的「生活方式取向」：她／他們正追求「反消費」、「歸園田居」的「新生活」，以作為延續運動的進路。

Touraine討論「文化運動」(cultural movements)(2001: 67-72)時，指出於20世紀發展至今的文化運動，乃是由環保運動、婦權運動開始，發展到社會上的弱勢族群<sup>15</sup>起而爭取在城市生活的權利，此亦即Lefebvre所言，在城市中人們應獲得工作機會、受培訓、教育的機會、住屋的權利、同時也應該獲得有質素的生活(休閒、健康)，以及參與文化生活的活動的機會(1996: 157)。在香港推行的城市文化運動，究竟何去何從？這是我們需要深入反省的。

在本書以下有關香港的兩篇文章，其一，我們將會描述及評論受到傳播媒體高度關注的「反對拆卸灣仔利東街」之行動，文章目的乃是反省香港城市空間的社會運動之得失；其二，我們會展述及分析在偏遠的屯門區所發生的，年

長人士們因天天在屯門公園進行歌舞活動而與當權者的衝突的事件。

究竟積極聲稱反抗市區空間霸權的社運人士如何界定並保衛「城市的空間」，作為可平均分配的資源？如何保衛、爭取市民應獲得有質素的生活及進行文化生活的活動的權利？而生活在邊緣城市的弱勢族群其中之一族群的年長人士，又如何因為了保衛自身可進行歌舞（文化）活動的空間而去跟當權者抗爭、如何繼而引伸出整個社會的對年齡歧視、對年長人的身體及其文化活動的忽視、歧視及壓制？——究竟誰在向整個社會的強權挑戰呢？我們期望藉此兩個個案找出回答的方向。

## 注釋

- 1：由於香港輿論認為投資移民可將指定在港投資金額港幣650萬投資到房地產項目，是炒高樓市的禍首之一，於是本年度之施政報告決定由2010年10月14日起在資本投資者入境計畫內剔除房地產項目，並將申請來港的投資門檻由650萬，增至1,000萬元。
- 2：香港最負盛名的文化人，所提出的反對灣仔全面拆卸、倡議政府保留歷史建築物的理據，都是不約而同將紐約蘇豪區作出典範及將之與灣仔比較，認為必須保存舊建築及當區居民生活，才能令該區有特色（見《黃翻飛處》，2007）。然而，Zukin（1988，1995：150）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紐約蘇活區作為「文化仕紳化」的標榜空間的成功之處，乃在於將此區域因著有藝術文化作為地標，而使房地產價格大大提昇。請見本書後文〈社區營造還是社群主義——香港灣仔反對利東街拆卸行動的觀察〉之分析。
- 3：香港市區重建局表示，觀塘裕民坊重建計畫是歷來最大的重建項目，重建計畫佔地5.3公頃，涉及1,600多個業權，估計受影響人數達4,500人。
- 4：香港電台通識網：再建官塘 [http://www.liberalstudies.tv/environment/ls\\_environment\\_07.html](http://www.liberalstudies.tv/environment/ls_environment_07.html)
- 5：批判市建局官塘重建計畫的聲音，散見於不同網站：例子有（1）於2006年，在網站「獨立媒體」曾經出現過一系列的批判官塘重建的文章，其中朱凱迪所寫的「還觀塘居民商戶一個真正的諮詢——就觀塘重建設計方案提三點要求」（2006年10月），有提及「市區更新」實情是要在觀塘這個「老化」社區中促進「仕紳化」（gentrification），將負擔不起急的生活指數、不諳消費主義式休閒的基層居民迫走；（2）韓麗珠（2009）在其文章中指出：根據政府統計處2005年的分區人口概況，觀塘人口587,000多人，65歲以上人口為91,900，佔全港人口的15.5%；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低於10,000元的佔了36.4%；低收入人士佔全港比率12.8%；失業率佔全港比率10.2%。這些數字說明，長者、低收入家庭、失業人士，才是觀塘社區人口的一大部分，所以，建設一個大型商場、華麗的私人屋苑和高級酒店，對於改善居民的生活不但毫無作用，反而可能把他們趕離觀塘區，驅逐至更邊緣的地方。（見<http://joesresearch.wordpress.com/tag/>）（3）而後，在網站「獨立媒體」見到舉辦了「一起紀錄官塘的活動」——即官塘遷拆在即，邀請網友為官塘舊跡拍照、留個紀錄。
- 6：見網站<http://shunning6983.wordpress.com/>
- 7：事實上，於深水埗福華街（深水埗地鐵站旁）一個由市區重建局及地產商信和買業共同發展的住宅新樓盤——「海峯」（2009年入伙），一平方英尺的建築面積價格已達港幣5仟至6仟元，而收購舊樓價格則是實用面積一平方英尺3200港幣（據太陽報2010年7月11日報導）。
- 8：於利東街拆卸期間成立的民間團體H15關注組，以民間角度出發，於2009年2月至6月期間製作了《市區重建策略檢討之民間綠皮書》，到各大專院校和地區進行《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民間諮詢會，聲稱收集過千人的意見，並根據這些意見，製作了《民間白皮書》（見於網站<http://urspolicy.wordpress.com/>）。
- 9：見：「深水埗k20-23街坊的留低方案」（2008年3月發表）及《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民間白皮書〉現有條文及實施檢討》H15關注組製作（2010年8月）。
- 10：菜園村位於新界八鄉平原石崗，50年代開始租予國內新移民種菜和養豬賣家畜。受高鐵工程影響須於2010年10月遷拆，全村230戶共450名村民須遷出。村民最初堅持不遷不拆，後來村民與政府達成撤村及復耕協議。料有200多名村民遷往新村。據香港文匯報（2010年7月6日）之報導：香港運輸及房屋局今年初推出的賠償方案，因應收回菜園村私人土地，已於6月起發放共1.6億元的特惠津貼，連同村民獲批的特惠現金津貼總賠償額達2.4億元，另外農作物及相關設施的賠償料達800萬元。
- 11：大紀元時報2010年3月30日：「菜園村生活館」實踐田園生活價值觀 <http://hk.epochtimes.com/10/3/30/115867.htm>
- 12：見於網站「獨立媒體」2010年9月7日。
- 13：現時香港政府正推行交通費支援計畫：支援元朗、屯門、北區及離島四個偏遠地區居民，提供每月六百元交通津貼，讓他們可到較遠的市區或在區內工作。但設時限為期一年，申請者資產不得超過4萬4000元、月入不得超過6500元、每月工時不少於72小時等。根據2010年施政報告，政府將會向全香港低收入人士提供每月600元的交通津貼。有了交通津貼，但也解決不了偏遠地區到市中心工作交通時間過長的問題——在居住區會內工作機會太少才是問題之癥結。
- 14：中文譯《超越新自由主義》。
- 15：以香港的情況而言，弱勢社群乃是指貧困的新來港人士、低收入人士、傷殘人士、少數族裔、年長人士等等。

# 社區營造還是社群主義

## ——香港灣仔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的觀察

### 導言：利東街重建與反拆除——從爭取合理賠償到反拆除

2007年12月，在整條灣仔利東街拆除期間，由該區居民及相同立場人士所組成的H15關注組<sup>1</sup>，進行了街頭抗議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當時，其中一名H15關注組成員進行絕食。這次激烈的行動，不僅使公眾開始留意、關注市區重建問題，並且，由此次運動開始，香港市民也要求在市區規畫及重建的政策上有更廣泛及深入的參與。

由利東街居民、主要參與社運人士、及高知名道之文化界人士共同編寫及出版之《黃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2007）詳細地紀錄了是次運動的過程及主要參與者的想法及觀點。據這本文集的報導，H15關注組自2003年成立，連同各有關組織一同在此次運動中，連續地舉辦了12次全區性的居民大會，成功訪問了150戶家庭及商鋪；還舉辦了5次規畫工作坊、7次公眾諮詢會以及4次街頭展覽（2007：93、127）。直至最後的抗議及絕食行動，此次運動各有關組織的要求，有以下列各項：

- (1) 向當區受影響業主依法賠償同區7年大樓單位的價值的金錢
- (2) 當區受影響業主可補差額在原區樓換樓、舖換舖
- (3) 保留喜帖街（即利東街）

此次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對香港社會運動發展的影響是重要的：它被視為香港新社會運動的里程碑：自這次運動開始，愈來愈多香港市民就保留本地社區、地方特色、文化資產及集體回憶表達訴求。同時，根據《香港市區更新成就與挑戰摘要最後研究報告》所言，其他市區重建具體要求，包括社區參與規畫、業主參與重建及「樓換樓」與「舖換舖」賠償等，全都在H15項目的個案反映出來（2010：16）。

然而，正如Beauregard所言，我們應該避免對一個複雜的現象只提供簡單化的答案（引自：Neil Smith, 1986：35）。當眾人都在義憤填膺之際，我們更需要冷靜地反省：若翻查及分析此次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的資料，會發覺各界贊同及參與此次運動人士的論述，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例如，究竟這群人士是站在甚麼論點、甚麼立場之上反對拆除舊區？對於更核心的課題，即「都市空間的生產」的方向，這群人士如何回應？這些反重建／保育運動，在某程度上也促使香港社會及政治取向在方向上的改變。然而，我們可以從甚麼角度討論這種改變？這是否是一場反對資本主義重構、操控城市空間的抗爭？在城市重建規畫中，房地產的資本往往利用房地產重新估值、房屋租金回報差額（rent gap）、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私有化等等的策略來將城市空間變成商品重新投進市場；參與此次抗爭運動的人士，對上述資本主義的策略，有何行動上或論述上的回應？我們可否將此場社會運動視為可和「社區營造運動」關連起來的運動，以作為城市中進行的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回應實踐呢？本文試圖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分析反利東街拆除行動之前，我們企圖抽絲剝繭，回到本源去理解都市空間重構的各種政治、社會及經濟關係與矛盾的基本脈絡。我們認為，唯有在這清晰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找出在這等社



會運動中，究竟是誰在跟誰角力。

香港市建局明言成立該局的原因是為了解決市區老化的問題。然而，推行此次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的社運份子卻聲稱，舊區才有社區特色和社區網絡，所以應該保留不拆卸。究竟市區老化的真正指涉為何？究竟是為誰來捍衛與保存社區特色和社區網絡？研究及批判都市空間的重新建構及都市空間的文化價值的論著，可說是多不勝數，它們對上述問題，已提供了很多詳細的回答。以下一節我們試圖提出一個基本藍圖，以勾劃這些問題的解答方向。

## 市區重建的理論背景：仕紳化 (gentrification)

《黃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提供了一個一般人對仕紳化最普遍的界定：「指社區依照中產或上層的劃一美學標準來規畫，造成排斥窮人及社區本來特色的結果，亦可理解為一種在文化上和空間上加劇貧富懸殊的過程。」（2007：105）。這個以文化為主要論點的通俗定義，其實遺漏了仕紳化最中心的強權政治的概念。

人所皆知，市區重建首先是指對城市的某個區域進行更新 (renovation) 的過程。市區重建通常都在城市中心建築群已老化的區域推行。同時，市區重建並非單單是物理空間或建築群的重建、更新的功能化過程，而是一個極複雜的現象，我們必須避免只提供單一解釋。

已有許多學者指出，都市重建同時是一個不同社會階級在市區空間脈絡。仕紳化最普遍的定義，就是都市裡較低收入的工人階級被逼遷離其原住區，讓出空間來興建中產階級住宅大樓或商業大廈，因而房地產價格大大提高，導致原來住於此地的居民無能力再留在原區居住及生活。根據Lees, Slater &

Wyly (2008: xxii)，仕紳化是在都市研究中最政治化的概念，因它討論的中心概念「動遷」，是關乎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甚至衝突。Lees, Slater & Wyly 的立場頗為激進，他們認為其他有正面價值、意涵的都市重建名詞，例如：再生 (regeneration)、復興 (renaissance)、活化 (revitalization)、更新 (renewal) 等，都是用來掩飾都市空間資源不公平分配：即原住該區之較貧窮階級被逼遷移走，將空間讓出給更富裕階級發展、生產及累積更大的資本 (Lees, Slater & Wyly, 2008: xxi)。

若依照這個定義去看灣仔的重建，我們必定要承認這是最典型的仕紳化例子。單看在灣仔重建地段一個拆除舊樓／街市後新蓋的私人屋苑「尚翹峰」（2007年開始入住）的漲價情況，即一目了然。據香港房地產經紀商利嘉閣的買賣成交紀錄，「尚翹峰」一個面積749平方英尺的中層單位於2007年6月買入價為463萬餘港幣；2010年7月售出價為654萬港幣，帳面上即漲41%；同區的保和大廈（入住日期：1972年9月），於剛開始落實重建計畫時（2004年），一個500平方英尺的單位為126萬港幣（2005年11月成交），但到了尚翹峰落成後（2007年），同樣一個500平方英尺的單位已為港幣238萬，漲幅近一倍；及後在2010年社區配套成熟後，保和大廈500平方英尺單位更升至360萬成交。若將灣仔的樓價，與2010年香港家庭每月入收入中位數（以住戶人數2.9人）約1.8萬港幣<sup>2</sup>相比，便可知道這地段並不再是中低收入家庭負擔得起的地區。

在灣仔的情況而言，官方（市建局）與發展商合作，將作為公共空間的街道拆除而改建成一平方英尺售價近萬港幣的「豪宅」，毫無疑問一個將市區空間私有化，並將公共空間圍關化 (gated) 的過程。政府將公共空間（街道）私有化，建造貴價中產住宅地區，樓房售價不斷高漲，在在都告訴我們，重建根本上是一個仕紳化 (gentrification) 過程。Neil Smith在其著作《Gentrification and the City》<sup>3</sup>（1986）的首章節〈有關定義〉(On

definition) 一節中，已明確說明仕紳化就是一個在住宅樓房的市場運作的過程——現在灣仔重建前建後的變化，明顯是房地產市場價格向上揚的運作。

這個運作過程即是，將老舊房屋拆除、將低收入人士的生活空間改裝或拆除、然後將此重建的區域轉化為一個中產階級的社區。這個簡單而明確的界定，讓我們從根本地了解到市區重建過程，首先應該是赤裸裸地呈現為社會階級矛盾的過程。

Neil Smith繼續解釋，住宅區的住客更換(rehabilitation)是仕紳化過程中最受矚目的一個環節，其後隨之而來的是更為深層的經濟、社會及空間的重新建造以及營運的改變。區內住民的日常生活文化也會出現巨大的變化。而在城市內遺留的(小型)工業生產空間，則會隨仕紳化而逐步被淘汰、拆除，繼之而起的是高級辦公大樓、酒店，再加上那些「時尚」的消費場所，如餐廳、畫廊及精品店等等。這些改變明顯地體現了整個社會已完全被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佔據——製造業被服務業取代，那是自然不過的事。Neil Smith很肯定地指出，仕紳化是資本主義社會轉化過程在空間上出現、成形的過程。

政府及發展商對市區內舊區「發展潛力」準確地評估，並將這些市中心位置絕佳但價格偏低的土地重新規畫建造，即是「租金差距」(rent gap)理論的最佳例子。灣仔一直以來都是香港「二線」的都市中心：不同方式的白領、服務性行業的辦公室／陳列室／店面(例如眾多律師辦公室、建築師辦公室、傢俱店到書店等等)都座落於灣仔，使該地極具進一步經濟發展的潛力。在目前大範圍經濟已步入全球化的環境中，外資與中國資金同時尋求投資機會，熱錢湧入目前房屋貸款利息極低的香港房地產市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灣仔的重建也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在重建過程中，常會出現尖銳的階級矛盾及對峙。人們往往輕易對進行重建的政府機構及投資建築新大樓的發展商提出最猛烈的控訴。這是對仕紳化極度簡化的界定而致使對事情的來龍去脈由一知半解到曲解。Neil Smith提出一個很根本的問題：誰是仕紳化的策劃者？又或，誰是「仕紳」？只要往深入一步想，我們隨即會產生疑問：就算政府加上大財團及發展商皆認定重建有利可圖，但是，「利」的來源在哪裡？——重建後的規畫及建築空間，該由誰來購買、消費呢？

專注於研究仕紳化的學者，都會詳細地從仕紳化之中心（經濟）理論——「租金差距」（rent gap）開始去討論仕紳化重建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階級對峙；繼而，更分析其中的美學意識形態，來全面地討論「仕紳化」的構造。

據眾多學者所述，後工業的經濟生產方式乃是以服務性行業代替製造業。這也代表了越來越多人從事服務性行業。服務性行業有很大部份都涉及娛樂、零售、休閒行業，而這些行業的經營空間絕大多數都集中在市中心。由此，市中心由供應一般大眾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空間，漸漸轉化成為推銷較高價的消費品及消費服務的空間；其所推銷及服務的對象，就是傾向於以消費為日常生活主要活動的中產階級。

在這批傾向以「消費」為其生活主要活動的中產階級中，學者們多將焦點集中於所謂的「新中產階級」——她／他們的特質與（在英美）傾向群居於市郊的關圍式社區（gated community）、以及光以擁有經濟資本為尚的舊中產階級十分不同。這批新中產階級正與Pierre Bourdieu在《Distinction》（1984）一書中所形容的「新小資產階級」相仿；Bourdieu指出「新小資產階級」們多數聚居於城市，因為她／他們要刻意身處文化活動集中的地帶，企圖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她／他們的生活方式多姿多采：包括居住在符合潮流設計的家居、穿著時髦、出入各式娛樂、文化界舉辦的派對、宴會等等<sup>4</sup>。

Lees, Slater & Wyly援引加拿大航空月刊《enRoute》中於2002年4月刊登名為〈Canada's Top Ten Coolest Neighbourhoods〉的文章（引自：Lees, Slater & Wyly, 2008：94），指出這篇休閒文章對「新中產階級」／「新小資產階級」有十分貼切的描寫：

現在典型的年輕專業人士（她／他可能是平面設計師），當她／他離開父母的家自立門戶時，傾向找一個年輕有朝氣的地區落腳。這地區多數是同類藝術界人士集中居住的地方：一定是個讓他可以輕易參與喜愛休閒活動的「有趣」地方。同時，周圍環境也反映了年輕專業人士的品味：即一個有「型」（cool）、又合潮流的地方！

Lees, Slater & Wyly並引用了不同學者的研究（Bourdieu、Jaeger）及理論，企圖立體地「剪影」新中產階級，描述了她／他們普遍、典範形象，以求更為準確地詮釋新中產階級的特質，並展示新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如何控制都市市中心地段之重建的方向：

經濟及工作背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後工業社會中從事服務性行業的專業人士</li><li>● 從事專業（如律師、建築師、文化藝術界人士）、管理階層的人士</li></ul>
教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普遍擁有高等教育程度</li></ul>
消費活動習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傾向偏好於「炫耀性消費」及文化文藝性炫耀的、富「藝術文化色彩」的消費；同時傾向於藝術投資</li></ul>
休閒活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文藝／文化節目消費、文化旅遊、高檔、特色餐飲（fine dining）</li></ul>
消費空間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具備「有品味」的室內設計的住宅、藝術文化空間（博物館、音樂廳、畫廊等）</li><li>● 特色酒店（hip hotel）</li><li>● 提供各國特色料理的餐廳</li><li>● 懷舊傢俱店、精品店</li><li>● 工業時期的歷史文物</li></ul>

從上述描繪仕紳典範形象的圖表，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到，從這個脈絡衍生出的新中產階級的美學——新中產階級特別著重文化／美藝形式的消費活動／生活方式，因為透過參與這些活動，能使她／他們感到在社會人群中成為秀異階層，並能藉著這些活動獲得自我的表達（顯示為與其他人不同階層的個體）。總之，在空間上，新中產階級特別愛好以美感經驗為主題設計的景觀。

所謂仕紳化的社區，由於主要消費者為上述的新中產階級，故必定是一個炫耀性的、「特殊的」消費景觀。這些美其名為文化美藝空間，其實是變成了一個炫耀社會秀異階級的空間。新中產階級為了創造／設計這等強調「美感經驗」的空間，大都贊成歷史建築物的保育行動，意圖保留老舊的建築物以增添當區的特色。Lees, Slater & Wyly清晰地指出由新中產階級主導的都市中心營造，極注重表面展示及展覽（ostentation display and exhibition）。為了創造一個「與眾不同」的、充滿「美感」的空間，她／他們都熱衷於強調建築物的文化特色：有時甚至會將沒有文化特色的舊建築物，以視覺或文字大肆包裝、吹噓，使這些建築物產生文化展示的效果（Lees, Slater & Wyly, 2008: 114），同時也由於當區有著此等（經包裝吹噓）的「文化」建築物，因此當區在全城中的位置亦被提昇，獲得了「地標式」地位。由此類推，由於當區在城中是一個充滿「特色」的區域，搬進來居住的人們也會感到自己提高了（以文化作為標準的）社會地位及身價被提高了。

Lees, Slater & Wyly因而指出，新中產階級的美學，很容易就實體化為各式各樣的空間（及在其中營業的行業）——除了老舊的建築物（在香港，連街市也被視為有特色的文化空間），最佳例子為畫廊、時裝店／特色舊衣店、特色餐廳、咖啡館、設計精品店或特色酒店等，同時，將老舊的建築物「活化」，即在老舊的建築物中讓上述行業經營，這更是全世界流行的做法。

再者，我們不能忽視傳媒／廣告對仕紳化重建空間的大肆宣傳、吹噓的力

量。Lefebvre早已明言，傳媒及廣告在一個消費社會中，已代替以往哲學、倫理、宗教以及美感文化對人們的教化（Lefebvre, 1984：107）。眾所周知，在消費世界中傳媒乃是創造、界定及決定「潮流」的力量。經傳媒一再重覆地宣揚哪裡是「有歷史藝術文化特色的地區」，哪裡就保證地價高昇、門庭若市。

大家都是一丘之貉；城市中心這個方向的演變，Ley清晰地指出這其實是將一個地方的意義改變、將其象徵性意義膨脹達至超越其實際功能上之涵義的過程。「藝術文化」對地方的改變，有時往往是將一個地方上那些已漸變得頹敗的事物東西（由建築物到日用品），變成「廢物藝術」（junk art），繼而將之變成「商品」的過程（Ley, 2003：2529）。於是，由藝術家、文化界人士的指導及示範、傳媒的大肆宣傳，商家們完全理解文化資本絕對可以轉變成經濟資本。商家們已清楚知道投資在古舊空間、物品的修復及形象生產上，會獲得巨大的利潤——大發展商與政府協力去重建市中心區的空間之同時，也留意到「文化消費」是符合潮流發展的方向。消費者無間斷地受到傳媒廣告的「勸信」，也就趨之若鶩，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包裝過的舊物／廢物的外加象徵意義，義無反顧地去承認它們的文化價值，並一窩蜂地去消費它們。

現時，無論是文化界本身，還是傳播媒體，都會吹噓將平凡無奇或甚至破舊的東西包裝為某種有趣味性物品的商業生產活動是「創意」行動，而物品的「趣味性」地位乃是依靠上述這些「新中產階級」所建構的「品味化」語言系統的嘉許而獲得。Ley明言，新中產階級的語言正正就在於「透過宣告擁有與眾不同及真確性的特質，而成立象徵性的價值」（2003：2530）。

經不同方面的努力，市中心空間由此被浪漫化、戲劇化成為一個充滿文化藝術特色的場所。新中產階級進駐城市中心地，在各種文化活動中聚集、露面、並消費各項文化節目、商品，於是成為一股勢力；並漸漸由「文化話語權之擁有」轉為「社會」地位之提昇，由此獲得期望中的（以藝術化品味化意識

型態為本質的)身份認同,甚至權力。

社會學家如Lefebvre、Bourdieu、Featherstone,以及眾多研究仕紳化的學者(Ley, Lees, Smith, Zukin)都再清楚不過,「藝術」或「文化」這等語言,正被新中產階級大肆利用來表徵自身的品味和階級,一方面和單純以擁有經濟資本為尚的舊中產階級之分別開來,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優於草根/工人階級。

新中產階級既然喜好文化、藝術之表象,他們熱衷於保育城市中心歷史建築物乃是非常合邏輯的。Zukin(1987)將「城市歷史保育行動」的潮流放在新興中產階級的形成過程中進行分析。她首先確認了在資本主義城市中出現了先進服務業模式的經濟體系,城市中心的時空需要被重新營造,以適應這個新興城市中產階層(urban middle class)的社會性及物質性之構造。

而在此一服務業模式為主導的後工業經濟體系中,很多專業性行業及文化消費行業都集中在城市。從事這行業的人皆屬於中等收入人士,她/他們所偏好的消費行動及習慣,產生了新興的生活及文化形成的環境(habitus)<sup>5</sup>。她/他們對於居住生活的環境,偏向要求或「有特色」、「有創意」的地方,以顯示自身的階級的「秀異」。在渴求象徵文化資本的動力推使下,她/他們十分熱衷於保育城市內的歷史建築物——Zukin更清晰地指出這行動是為了要「創造」某地區的歷史文化意義的過去。

John Urry(2007:199)引述了Lowenthal對「歷史建築」的定義:

- (一) 堅固,它們歷經戰火、風吹雨淋,甚至是土地開發商與都市計畫的摧殘,還能存留下來;
- (二) 具有歷史延續性,它們是過去世代與現今世代的連結;



(三) 具有威信，它們象徵著一個值得保存的年代與傳統；

(四) 作工精細，因為它們大多是運用前現代的技術與材料所建成。

上述此一普遍的「歷史建築」定義，可應用在例如300年前建成的教堂或古廟，這是所有人皆承認的歷史文物。

然而，新中產階級更推崇「經挪用而成立的文化遺產」<sup>6</sup> (heritage by appropriation) (Rautenberg, 引自: Tweed & Sutherland, 2007: 63) ——這等經挪用而成立的文化遺產在香港多不勝數：如戰前唐樓，50、60年代建成的「廉租屋」，甚或本文所描述分述的主題：利東街的舊住宅建築群等等。傳播媒體及新中產階級，不斷以各種媒體大肆宣傳保育行動，高舉某地區某些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及文化重要性」，市民甚至訴諸抗議行動反對政府將舊建築物拆除；在此，Zukin在其文章〈Gentrification: 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Urban Core〉<sup>7</sup> (1987) 正確地指出其後果的諷刺性：在西方（香港亦然），很多受重建影響、或被迫要動遷的原區居民，都會因某些理由而贊同新中產階級，並肩反對政府（和大發展商）的重建方案，並加入保衛、保育歷史建築物的行列。但居民是否意識到，新中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即以美感及品味主導城市面貌景觀的營造，根本與一般平民大眾追求「不刻意不做作、可負擔得起、以功能方便為主」的生活環境願景南轅北轍？

Zukin指出，原區居民參與新中產階級所推動的歷史保育行動可能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某個地區因保育了歷史建築物成功，而變成了有文化特色的區域，由此而大大增加了其投資價值，原區居民可能無法再負擔這地區的房價或租金，因而要被逼遷出原住區。但她同時也提到，原區居民與新中產階級並肩作戰的原因十分複雜，仕紳化地區的房地產價值，可能會因有地區文化特色這個「附加價值」而水漲船高，業主亦可因提高其物業的售價而獲更高的

賠償，由此從中獲利。

新中產階級成功地將歷史文化保育元素加進某個區域，使她／他們獲得了其（在文化上之）集體的身份認同。再者，這也同時可以是一種商業策略，外區的人往往會因傳媒的推介而來到這個有歷史文化特色的區域觀光消費。

在〈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Urban Core〉一文中，Zukin提出兩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來總結有關新中產階級興起與仕紳化空間文化的討論：「但（所保育的）是哪一個過去？是誰的過去？」（But which past, and whose?）（1987：135）。

這兩問題也使我們冷靜下來，審視分析鬧哄哄的「歷史文化保育」運動。

一個地區的建設與發展，在媒體的宣傳語言及文化界的學術性表述語言的持續包裝下，相輔相成地構造出附加的「文化、藝術、歷史」意義，同時也虛擬了美感經驗；於是城市空間便由「功能性——需求主導」的發展原則變成了「象徵性——消費主導」的都市發展原則（Zukin, 1995：141）。眾多學者都異口同聲地承認，Zukin所言正是所謂「仕紳化」的意涵，而「仕紳化」由於獲得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支援，最終使得資本主義在城市中心的發展增加了經濟資本累積、發展以外的「文化」理由。

我們發覺，這些表述所持之最有力的武器，乃是「文化」一詞。Zukin的著作《The Culture of Cities》<sup>8</sup>（1995）一開始便提到：

文化是……一種控制城市的強勁手段／策略。借助了「回憶」及「影像」，文化利用這個手段／策略將「某地域屬於那些人」的訊息象徵性地表達出來。（1995：1）

以此次反對利東街拆除的行動為例，各界參與反對行動的人士，正運用了文化的力量去創造出「喜帖」街的印象，賦予喜帖街一個清澈的論述觀域（vision）以及框架（frame）——亦即，將利東街「去蕪存菁」，轉化為充滿文化意涵的喜帖街。《黃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一書中報導了一項如假包換的幻境工程（imagineering）：一群文化人士（攝影師、電腦藝術家）合作製造了一幅從街頭到街尾的喜帖街全景圖（2007：9-53）。他們明言「避開了密集的招牌、路上的車輛」，依著50、60年代住宅建築典範的模式，以電腦調色、改變透視、構作、拼貼而砌成了這全景圖」——到底，這是否是一幅將喜帖街「過度真實」化的表象？創造的目的，是否追求一個恆久連續的、緊密關連的、穩定的（perservance, coherent, consistent）的「喜帖街」印象？

喜帖街的50、60年代舊住宅群，在市建局及發展商眼中本來只有（愈漸下降的）經濟價值，然而其所在的那塊地，卻有極大的利潤上升潛力；經過文化界人士的強勢的文字、影像論述將之重構及幻境工程化（imagineering），這類敗的舊住宅群變成了以印製喜帖的小企業為核心的、有特定範圍的「文化」社區：文化人士及各贊同者同心合力描述了活在這社區的人們透過長時間面對面接觸、緊密而沒有疏離的關係，逐而形成的「社區網絡」。她／他們在特定空間範圍內的所從事的經濟商業活動，在論述中被轉化成為人與人之間增進感情的交誼活動，論述者並不斷將之褒揚為高尚的人倫關係。文化將城市包裝得「有性格」「有特色」，也因為這理由，宣稱保留舊建築、比另建新樓房更具價值（此價值在旅遊業的範圍更形顯著）。從此脈絡去分析，我們發覺，政府、發展商及掌握城市文化論述權的人士，其實不是戰場上的死敵，彼此的策略雖然貌似對立，但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認識仕紳化的理論讓我們了解市區重建現象背後的複雜的權力組織，我們應該由此理解都市表象之不同向度，由以可免除被「視覺上有吸引力、但暗中

被私有化了的公共文化」所誤導（Zukin, 1995：3），也可避免跌入Harvey所言之「社群主義」（1997：1）陷阱中。

若依從Harvey, Smith, Zukin及Lees, Slater & Wylie等學者的理論觀點去分析反對利東街拆除的行動中所衍生的對文化的論述，我們可以分三個步驟去揭示這論述含藏的意識形態：（1）「地方」理論的成形；（2）從向迪士尼學習到喜帖街文化的創造；（3）文化大眾（cultural mass）的文化仕紳化進程。在進行詳細的分析之前，我們先簡單陳述反對利東街拆除的行動的過程。

## 灣仔利東街重建個案

### 1. 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的過程

在香港市中心商住區所推行的重建項目中，最受注目的可說是位於灣仔的「利東街／麥加力歌街項目個案」（編號H15）。香港大學出版的《香港市區更新的成就與挑戰》（2010年3月），清晰地陳述了這重建項目的地理數據（研究報告之「圖3·1」如下頁）。



這個項目聲名大噪，乃因為它是香港第一個有眾多原區居民組織起來反對政府／市建局重建計畫與規畫的項目。據〈香港市區更新的成就與挑戰〉的陳述，該項目區內的居民與業務經營者組成了「H15關注組」（更加上「來自不同倡導團體的志願者」不時參與），緊隨市建局於2003年10月對H15項目成立的公佈，向政府／市建局提出3項要求：

- (1) 向當區受影響業主依法賠償同區7年大樓單位的價值的金錢
- (2) 當區受影響業主可補差額在原區樓換樓、舖換舖
- (3) 保留喜帖街

由2004年至2007年，以H15關注組為主導，加上各界參與人士舉行了大量活動，並作大量詳細的印刷、影像紀錄，因而編輯、出版了兩本書籍：《黃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2007）（以下簡稱《黃幡翻飛處》）及《灣仔街紙》（2006），陳述並正面評價此次運動。

反對拆除利東街（總稱為喜帖街）的人士所舉行過的活動計有（資料引自《黃幡翻飛處》）以下9項：

- (1) 居民大會
- (2) 對居民進行焦點小組（focus group）訪談；以收集原區居民對重建及「動遷」的意見
- (3) H15關注組與各方人士——專業人士如建築師、規畫師、社工、文化研究學者、社會學學者、政界人士、文化界、藝術界等等「跨階層、跨界別的」合作，進行由下而上的諮詢過程，並於2005年2月3日向城市規畫委員會提出由民眾參與設計制定的喜帖街規畫方案：「啞鈴方案」<sup>9</sup>。
- (4) 藝術展覽活動
- (5) 灣仔歷史文化展示及推廣
- (6) 灣仔生活文化展示及推廣
- (7) 於各大學舉行講座
- (8) 街坊鄰里之社區活動
- (9) 街頭抗議行動

2007年12月，整條灣仔利東街拆除期間，由該區居民及相同立場人士所組成的H15關注組，進行了反對利東街拆除抗議行動。當時，其中一名H15關注組成員葉美容進行絕食。但利東街繼續清拆，反對拆除利東街的街頭抗議行動，也因此暫時作結。在抗議過程中，H15關注組及其他站在同一立場的人士創製了各式各樣的文字、影像的表述，並且製定「啞鈴方案」作為「另一個發展概念的規畫」，以作出反建議。接著，他們更舉辦各式藝術展覽、本區的歷史文化展覽，再加上文化界、學術界的高知名度人士（例如李歐梵、梁文道等）發言及發表文章作支持。這些對社區特色及社區網絡的表象與詮釋，漸漸讓讀者意識到一套「論述」的形成。

## 2. 「地方」論述的成形

此項特定的重建計畫（H15）中，居民的要求（例如賠償予業主同區7年屋齡之單位的價值的金錢、樓換樓、舖換舖及保留喜帖街等）皆是非常實際的。但由此抗爭而生的一套有關「地方」的論述，是否有漸偏離在此區居住市民的思維呢？這套論述正向著哪個方向走？其內裡所隱藏的意識形態為何？這是本文希望進一步釐清的。現在我們先以圖表的模式，把在各項資料中取得的言論分類，以求清晰理解在這次反對利東街拆除的各個團體之立論點：

當區原住居民對此區之描述與評價	交通方便，餐廳、娛樂場所林立，租金便宜，處於中學名校校網，社會服務充足，社區經濟運作良好。對長者及婦女而言：住所附近即有（臨時）工作機會。熟悉本區民眾：充滿個人童年回憶。
受重建影響之原住居民對本區重建之不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商戶：找不到同類型租金便宜的店面。市建局的賠償不足以在同區找到（購入）另一店面店面。搬家會令多年建立起來的商業網絡消失。</li> <li>● 業主：本來擁有七百多呎單位的曾婆婆所得的賠償，只能在同區購入三百多呎的舊樓。市建局賠得少，賠款只夠買舊房子，「咁靚地盤」（素質那麼好的地區）利益歸發展商。</li> </ul>

我們發覺（在資料中）有紀錄的當區居民及店家的言論，都極其具體地表述其所需的生活及營商空間。發表言論的住民皆為本區的長期住戶，大部份是住宅業主。她／他們覺得「所住的地區，發展得越來越好」（《黃幡翻飛處》，2007：7）不願意搬離灣仔是怕生活習慣要因此而改變；而店家則要求地點必須開揚、人潮旺盛、可停車；喜帖街則以「成行成市」的模式經營為最有效。事實上，這種經營模式在不同行業也很普遍，例如尖沙咀金巴利道的婚紗店或香港西區的海產店等。店家也正確地指出這種營運方式的好處：顧客很明確地知道這一區是出售某類型的貨物或提供某同類型的服務，於是「在同一區到不同的店面中挑選他們合意的產品。店家之間固然有競爭，但也是互相依存的。」（2007：15）

住戶對本區的評價，正指出灣仔在香港是一個處於上等位置的區域，如果我們參考報紙房地產版面（主要為2009年的香港《蘋果日報》）對灣仔的介紹，正好與當區住戶的評價吻合：

- (1) 灣仔鄰近金鐘中環核心商業區（吸引上班族）
- (2) 節省交通費
- (3) 一流中學校網區
- (4) 店家林立、多元化，起居方便
- (5) 鄰近社區康樂設施多
- (6) 老灣仔區有「另一番獨特風情」
- (7) 房價有進一步上漲的潛力

報章上房地產投資版對灣仔區的正面評價，正好指出灣仔區符合香港大部份市民一般對居住地區的要求，既然灣仔的位置環境正好在城市內上等地段，加上絕佳的配套（一流中學校網、完善之休憩社區服務），這地區必然會誘使「仕紳化」的重建發生。我們不能否認資本主義經常會創造有新買點的空間及環境，這些環境是特意設計出來賺取利潤，同時令資本流通及累積更為暢順（Lees, Slater & Wylie, 2008: 51）。在房地產之商業角度而言，灣仔舊區確實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地區。灣仔向來都是香港二線的都市中心，也一直都是各行各業密集的區域。正如我們在前述引言部分所提及，灣仔舊區的實際房地產價格大大低於其潛在價值。

而利東街的拆除，正顯示在市中心區還存在的小型製造業——喜帖印刷業的存在經濟價值，必然比不上重建後房地產的巨額利潤。同時後工業經濟的生產方式，即以服務性行業代替製造業的市區重整的命運，一定會降落在利東街。店家也很清楚知道及承認印刷科技之改變需淘汰舊式生產方法，同時，國際性的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已經取代了一家工廠從頭到尾生產一件貨物的生產模式。



店家堅持要繼續從事喜帖印刷業，她／他們的要求，十分具體的顯示了若市中心區的小型製造業要持續營業的條件：

- 店家必定是臨街地點（方便送貨卸貨）
- 店家內需要較寬敞空間作製造過程
- 需要准許長時間停車的馬路以便上下貨

然而，如果我們承認後工業時代來臨已久——也就是世界整體經濟的基礎在於商品世界、金錢資金不斷作全球性流動、科技不斷改進，以及生產是以國際性分工進行的這一大環境，那麼在先進城市中，我們面對的演變，必然是製造業轉化為商業服務、文化消費行業的過程。製造業的空間（工廠）漸遷往較便宜的地域，而市中心也由供應大眾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商店，轉化為銷售消費品及消費服務的商業空間——事實上，灣仔整個區域也正在作這種改變。

我們由此理解到利東街在「租金差距」（rent gap）及城市空間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大環境之下，小型製造業幾乎不可能在此市中心區繼續存在。相比住戶與商戶平實而具體的表述，我們發覺支援此次反利東街拆除運動的各界人士的論述，卻很明確而肯定地強調以「文化」作為主要概念及策略，進而組織建構其「保育」主題及反政府重建的言論。於此，我們再次以圖表方式去展列她／他們的言論。（如下頁圖）

David Harvey在其書《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1996）的其中一章〈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深入並清晰地分析了所謂「地方」（place）的理論脈絡、構造因素及這理論所引出的意識形態及危險性。對馬克思理論有極深入認識的Harvey，很清楚地指出「地方」（place）的形成本來就是一種「社會性的營造」（social construct）；而社會性的營造過程，必然在資本主義歷史歷程內顯現的地理擴展範圍／情況中出現。亦即是說，「地方」的構造必然要在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邏輯中

各界反喜帖街拆除的「文化」論述的形成：

社區文化的各個概念	概念內容（資料引自《黃幡翻飛處》及《技藝行業的危機與轉機：灣仔篇》）	由此延伸對喜帖街的文化的「定性」（資料引自《黃幡翻飛處》）
社區網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強調居民／商戶長時間在利東街營業、生活</li> <li>● 強調街坊在日常生活密切接觸、守望相助、互相關懷</li> <li>● 否定人與人之間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的「外在」的社會，乃是以「同行如敵國」和「辦公室政治」的概念運行</li> <li>● 突顯疏離／異化的「外在」社會正是區內「有機」密切的「社群」（community）的對立面</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喜帖街是灣仔區「文化的物質依托」（呂烈丹）</li> <li>● 高度「社區凝聚力」（呂烈丹）</li> <li>● 集體回憶集體認同。將喜帖街製造業「文化」化為「婚俗文化」（梁文道）</li> <li>● 將於該區的居民及住戶命名為「灣仔人」（呂烈丹）</li> <li>● 梁文道提議建「婚俗博物館」以增加喜帖街的文化濃度</li> </ul>
「社區經濟」 「本土」經濟模式 （長期紮根於灣仔） 「社區認同」之根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定義「喜帖」製作為「都市型的傳統技藝行業」；以「傳統」（暗喻有人傳人成份）及「技藝」（非純粹工業運作）來淡化喜帖製作的是一項工業生產過程</li> <li>● 強調此技藝必須經過長期的經驗累積</li> <li>● 強調這行業長期紮根於灣仔的社區；並強調這工業生產行為造就了人際間產生感情的環境</li> <li>● 喜帖印刷業造就的人倫關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維繫著社區內的商業與社會網絡</li> <li>— 店戶之間有默契與信任</li> <li>— 構成了社區認同</li> </ul> </li> </ul>	
集體回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強調居民及商戶多年對灣仔的回憶</li> <li>● 出版居民以文字或口述紀錄，表達其在灣仔生活之狀況各大傳媒不斷宣傳灣仔居民之集體回憶</li> </ul>	
社區特色／空間美學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強調地理上有邊界有範圍的空間作為「地方」（place）</li> <li>● 喜帖街舊住宅群建於50、60年代，是「風格」一致的舊樓群此舊樓群乃灣仔區文化的物質依托</li> <li>● 梁文道稱：喜帖生產製造業為「婚俗文化」</li> <li>● 梁文道引用Jane Jacobs的理想社區形象來肯定喜帖街社區</li> </ul>	
以比喻性的文藝辭藻顯示重建機構之惡及反對拆除者的美與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不能讓「溫厚」的傳統技藝行業變「厲鬼」</li> <li>● 我們向「鐵鼻」投以「玫瑰」</li> <li>● 留守利東街的「造夢者」</li> </ul>	

去理解。但是，他亦留意到「緊緊於土地」的認同感是人們解釋、論述空間的主要論點，同時也是推行本土文化運動的動力。他在這一章節內，抽絲剝繭地將本土／社群文化由其哲學基礎<sup>10</sup>，清楚地陳述了他對這種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意識形態的批判。

在此文中，他認為一個地方在全球資本運轉的環境中能夠被「保育」（保持原狀），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現今人們強烈傾向於將空間、回憶與認同感緊密地關聯起來——此理念即所謂「地方」是「集體回憶」的軌跡以及其物理空間的承托、體現。

有關地方的文化理論，通常都是將某特定範圍的空間，與在其中生活的人們的活動之軌跡與回憶緊密地連繫起來——假若人們世世代代都居住在某地，某地的景觀風貌又恆久不變，此地的人便會以此地方為等同其身份（identity）主要元素。

有關「地方」的一般論述，就正如這次灣仔利東街反拆除的運動所形成的文化論述一樣，通常先將某特定範圍的空間標示出來，繼而假設這空間內生活的人們的日常生活軌跡跟她／他們的回憶的緊密連繫，於是由此而肯定「集體回憶」的意涵。於此脈絡中，推崇「地方」論者標榜「地方」是恆久不變的，在此居住的社群世世代代居住於此，形成對此地方一種共有的認同感，並且留下一些故事、回憶、傳奇，世世代代相傳下去，以致漸漸形成本地居民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Harvey認為，透過故事、回憶所構造的，正是對空間的幻境（imaginary）。這等充滿感性、感情的論述給予這地方某種象徵性的價值取向，更同時形成對這地方的某種視境（vision）。

Harvey對由「共同社群」衍生出來的「地方」的觀念有所保留。他直言，儘管不能否認其對地理空間理論的貢獻，但仍要嚴謹地檢視出這種理論

的危險性。他認同Young對「社群」（community）概念定義的理解，亦即，「社群」（community）所強調的，是成員之間的同質性（homogeneity）。Harvey及Young都同時對這種同質性的狹窄向度感到不安。

Harvey借用Young的分析，指出這種「共同社群」的論述，首先清晰地強調其有邊界有範圍的活動空間，然後是堅決地正面肯定人們在（由家庭至鄰里，乃至工作空間中的）同一空間，因長時間面對面接觸而產生感情，由此衍生高尚的倫理價值涵義——「共同社群」論述的最佳例子，就是這次反對拆除利東街的人士對「社區網絡」全面認同的表述；她／他們最常重複的讚揚是：（1）人與人之間有默契和信任；（2）人與人之間互相合作；（3）人們在社群內能建立穩固的身份認同感；（4）人們在社群內能賺取社會資本，以及（5）人們在社群內能得到精神寄託。

在一份名為《技藝行業的危機與轉機：灣仔篇》（2007）的研究報告中，從頭到尾都強調不同技藝行業內的東主、師傅、工人或徒弟皆能互助互勉，和睦不欺壓地長時間相處的理想。該報告又強調「外在世界」與灣仔區內在工作上出現的人倫關係之不同，並複述受訪者的話語，指出外在世界乃「大都會中人與人之間」存有「陌生感與冷漠感」（2007：35），「流行同行如敵國」和「辦公室政治」，然而「這裡」的關係則「未被外界污染」（2007：18-19）。

Harvey對這種「共同社群」所建構的「社區網絡」甚具戒心，他一方面承認國家權力及資本的全球化運作釀成了強權控制及人際疏離之關係，但另一方面，他贊同Young所說的，這並不意味在特定範圍的空間中，人群透過面對面的互動及產生緊密關係，就是抗衡這種強權的唯一方法。反而，過分強調某個社群的同質性、歸屬感和認同感，很容易就會變成對其他社群的排斥勢力。以論述來創製一個緊密的社區網絡以產生「幻境中的社區」（imagined

community)，實際上是形成政治勢力的可能性。

這份研究報告為了強調社區網絡的正面價值，甚至連技藝行業內實行的師徒制學習過程也正面地肯定。報告說師徒制「有其一套資訊管道，互相學習，跟學校或傳統的學校體系並存，不用理論支持，從實踐出發，邊學邊做是他們的格言，亦是生活的智慧」。同時，亦詮釋其師傅、師兄及學習年資較淺的徒弟／師弟之間的關係，為一種某程度上的類似家庭的關係——學藝者必須把師傅當成家兄。在這份研究報告之陳述中，隱約洩露出這是一種對上級（師傅、師兄）的命令絕對服從（2007：11）。這種絕對的服從，不恰正是傅科（Foucault, 1977；引自Harvey, 1996：312）所批判的馴服身體（docile bodies）的鍛煉過程嗎？其中有沒有含有壓制及控制性？有沒有含有某程度的勞力剝削？這些問題，研究報告則完全沒有提及。

反之，它借用了受訪者的立場，正面地詮釋「學師」為一段「刻骨銘心」的過程。也由於此「門內」的訓練，「重視實踐」的學習令學藝者「大都能掌握生產工序的運作」，並宣稱「經驗和鑽研是現在技藝業的生存之道。」

《技藝行業的危機與轉機：灣仔篇》這篇報告將人們在某特定地方「由灣仔甚至縮窄到工場」內長時間的活動（技藝學師），翻譯為人們對環境產生「生於斯，長於斯」般的感情及歸屬感；報告中不僅不斷強調這種社區網絡及社區認同的重要性及正面價值，甚至將它們提升為幾乎等同於人世間應然的高尚倫理操守。區內人們以無私地以「集體的力量」，以對抗外在世界人情上的「陌生感與冷漠感」、經濟上的大陸（中國）或大行（同業大商戶）的蠶食（2007：31-35）。

假若我們將此研究報告及其他正面報導「反利東街拆除行動」的資料，放在Harvey的理論脈絡中去理解，我們便會意識到這種言論背後意識形態

的權力彰顯及其危險性。這種言論辨別、定義哪種社群／社區為「本真」（authentic），並將它們與「非本真」的社群／社區地方作出分別；同時，強力抗議對此本真社群／社區的任何損害。我們搜集了反利東街拆除人士的論述的各份資料並經過分析，認識到這些文字甚至影像紀錄正以最大的努力，去製造一項有關「地方」的論述。

Harvey很清楚地指出，這種創造一個理想的共同社群的幻想力正是創造政治勢力的可能性。推行「社區」政治運動的論述不斷表象社區網絡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甚至給予這人際關係高尚的道德價值判斷，其實已是將社區網絡或社群原本作為一個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的實踐歷程，轉換成為有關權力對立之關係（分清內／外、善／惡、政府及外在社會／本區及原區居住及工作之民眾、贊同者／反對者）的鬥爭勢力。而鬥爭的武器，就是以「社區網絡」及「地方／身份認同」的論述來組織政治團結力量。將社區／社群給予一個理想的幻境的表象，正是「地方」的文化政治的推動力量。

### 3. 從「向迪士尼學習」到喜帖街文化論述的建構

Zukin在其書《The Culture of Cities》（1995）之其中一章：〈Learning from Disney World〉中，仔細分析了迪士尼王國如何成就一個完全以「文化」——亦即是以一個「不以工業生產」（non-productive）為基礎的龐大經濟發展，以及這王國鋪天蓋地所宣傳的「文化」觀。若我們細心閱讀，可以發現迪士尼王國的「文化」論述竟然與反對拆除（被「文化」化為「喜帖街」的）利東街所建構的論述相類似；這等論述最成功之處，就是讓人們認識到「文化」——即那表象為竭力抗衡政府重建計畫及行動的「社區文化」，乃是一股民眾皆贊同的建構都市空間的觀念及動力。

如上述，Zukin用以分析迪士尼文化的概念，有部份其實可以借用來深

入探討「喜帖街文化」的論述建構：首先，迪士尼樂園創立了以「文明」（civility）和安全（security）的概念來建構的公共文化之部分。他認為，迪士尼文化中的一個要點，就是指出在迪士尼樂園的圍牆裡，創造了沒有持槍壞人、沒有失去家園的流浪漢、沒有醉酒鬧事的人，也沒有毒品。在迪士尼樂園內大家以禮待人，有秩序地去享受各項遊戲及娛樂（1995：52）。

我們發覺「喜帖街」也是被描繪為一個世外桃源的象徵。在整個香港空間都受到資本主義、房地產資金（當然也涉及其他金融運作）操控的大環境下，「喜帖街」被標示甚至象徵化為一個有特定範圍的區域，在其中居住生活的人們自然而然無分階級地以互相關懷、互相照料及關懷的方式生活著。有關灣仔／喜帖街之各項報導的作者多次重覆強調此區居民在生活上會照顧其他人，商店老闆會關心無業長者，給予她／他們生計，也開放其營業空間予大眾娛樂（燒烤、打麻雀）等等。大眾不論階級一同在一段長時間中合力營造了一個極和諧的「公共空間」和「社區網絡」，這可說是體現了人類最「文明」的面貌；同時，也締造了一個人與人之間只會互相關懷（而不會互相惡性競爭、掠奪或加害）的安全空間。這種理想化的公共空間被表象為「文明」、「安全」，沒有歧異性、紛亂性，並且是絕對一致連貫（coherent）的公共空間。

再者，迪士尼文化透過各種影像文字媒體構造美國人的「社會回憶」及「集體身份認同」可觀視的形象。相類似的文化建構，可見於反對喜帖街拆除的重要宣言。

反對利東街拆除的人們以各種視覺影像及文字去塑造「喜帖街」是香港人的歷史文化完美形象。利東街內有著上世紀50、60年代的舊住宅建築群，它們正是被美稱為「灣仔區文化」的物質依託；而那名為「整整一條利東街」的視覺影像展覽，正好將整個建築群再現成為「凝視」的對象。創作者以高度選擇性的手法去處理拼貼幾百幅照片，將整條「喜帖街」重組重現。於是，在觀

眾眼前出現的正正就是「過度真實」、亦即最典範的50、60年代的住宅建築群影像。《黃幡翻飛處》中〈整整一條利東街〉（2007：49）的作者讚賞稱道「300幅照片拼出『不可能』的視點」這句話是完全正確的。其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我們在這「全景觀」拼貼照片中，只看到了一被美化了的「大樓各層」的合拼照，並且，這次反拆除喜帖街運動的贊成者與參與者亦被攝在其中。然而，這種過分強調人們同屬一個社區，並且會共同努力維護這同質的空間的言論及表象引起了我們的懷疑：是否所有居民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

我們想問，這文化論述建構裡有沒有何喜華<sup>11</sup>所論及的那些住在「牀位」、「板間房」及「頂樓、天台非法加蓋屋」的低收入人士的面貌和聲音？所謂「整整一條利東街」，屬於誰？在所有目前搜集到的所有有關H15重建計畫及反對這計畫的紀錄資料中，我們都找不到那些研究「仕紳化」的學者最想知道、最花精力挖掘的資料：即受重建影響最深的低收入租客去向<sup>12</sup>。她／他們有沒有得到足夠補償以租住另一個住宅單位？政府有沒有安排她／他們到公共房屋居住？她／他們是否被強行投進一個高租金的房地產市場，要付高昂的租金去租住房屋？即使被安置到新居所，所住的地方又是否真的適合居住？住居地區附近是否有工作及受教育的機會？社區設施及服務是否齊備？有沒有娛樂及休憩的空間？有沒有學習及享受文化的空間？

反對利東街拆除的人士，以很容易為大眾理解、消化及覆述的言論，強力反對、否定了「現今」的時空——即是政府（主要以市建局為代表）對受影響人士賠償不足、不能原區安置，以及破壞代表集體文化認同的物質依託（即50、60年代舊樓群）和代表人間善境的「社區網絡」。

但是，香港都市地理空間整體不斷受到全球化資本勢不可擋的流動運轉所侵吞的過程，同時使社會人際社會關係整體改變的嚴峻狀況，卻很少在反對利東街拆除的論述中被提及——就算提及仕紳化也是以極簡化的言辭去闡釋。



除了上述之抗議聲音，反對利東街拆除的人士將視野正面地集中在一個虛擬的「過去」之上——她／他們撰寫了大量文章，也以視像媒介建構了一種敘事（narrative）來創造一個已失落的桃花源：人們在其中長年累月地否定、超越金錢利益來互助互愛，互相關懷照顧，仿如親密家人一樣和諧地、延續地生活著（而那些50、60年代的舊住宅，正好就是承托著這個桃花源，讓它實踐與體現的物體空間）。

讀著這些反對人士不斷描述利東街社區網絡的美與善的文章，繼而大聲疾呼要保衛、保育利東街的舊住宅群。於此，我們不禁要仿效Zukin問一句，要追求的究竟是哪一個「過去」？這個「過去」是屬於誰的？

#### 4. 文化大眾的文化仕紳化的進程

如上述，於重建過程中，最受影響的，就是被動遷（relocation／displacement）的低收入居民，幾乎所有關於市區空間仕紳化的研究，都是以「動遷」為主題——甚至文化的課題，也該是跟「動遷」有關為脈絡。最佳的證明就是Zukin在〈Gentrification：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Urban Core〉（1987）一文中，針對「歷史建築的保育」這個課題的討論：她的論點就是，住在居住區域需要重建的民眾，假若參與了歷史文化保育運動，去阻止居住區域的歷史建築群的拆除，很可能到頭來正由於這原因（地區增加了文化特色而令地價租值高漲）而被逼遷。

在我們搜集的資料中，看到灣仔受重建計畫影響的居民所表達的意見，大多數皆來自該等居民接受訪問時的訪談內容的節錄（見《黃幡翻飛處》，2007）。表面上，這些訪談內容的意見都相當一致，說明重建引起的動遷對受訪者的負面影響。但是，假若我們要求以客觀的立場與觀點來理解、研究及詮釋在重建過程中居民所承受的動遷影響的嚴重性，則必須要謹慎使研究與詮

釋能夠「超越那些分散的個案，能夠把它串起來，並且轉化它們成為一個整體的進程」（Eric Wolf, 1982；引自：Harvey, 1996：323）。

我們的研究進路與方法，必須超越案例的狹窄性及個別特殊性，以一個有深度的、整體的討論來量度市區重建對原區住民的影響。

Newman & Wyly對紐約城的仕紳化及（市民）反抗動遷的研究給予我們很清楚的指導。其研究之第一部份問題，是「如何去量度因著市區重建而引起的居民動遷的影響」（2006：24）？並且，這研究的其中一個假設，即是「仕紳化所衍生出的最嚴重社會問題，就是因重建後的地區房地產價格提高而逼使原居民動遷」（2006：27）。這研究首先描述了不同學者對「仕紳化」與「動遷」之間關係的討論<sup>13</sup>，然後就介紹其研究用哪種方法對「動遷」作量化及質性的資料搜集、紀錄及分析，以證明其假設為真實正確。

在Newman & Wyly的文章中，我們理解到如果要控訴市區重建所帶來的「動遷」的影響——以及進一步將之詮釋為資本主義中不公平的空間資源分配——必定要展示動遷所牽連的廣泛範圍及其深度影響。Newman & Wyly在其文章的結論中也承認，假若人們本來在一穩定的鄰里坊眾環境中長時間居住，一旦被逼遷後，將會對她／他們有深遠的影響。但是，Newman & Wyly亦提及，這些負面影響主要是由區內低收入與工人階級的租客來承擔：她／他們可能被逼遷離可提供資訊及互相支援的本區社區網絡，而被逼迫投入一個高價的房地產市場、承擔昂貴租金，也可能因此要付出昂貴的交通費去上班、上學，並遠離各種必須的社會設施與服務。

細讀Newman & Wyly的研究，我們發覺，單憑訪問幾個街坊代表，或者邀請幾位受訪者口述或撰寫文章控訴此次重建計畫對她／他們的負面損害，是不可能成立批判的論點的。在利東街的個案中，我們見不到收集資料者如何客

觀地為自己的論點驗證，由此對「仕紳化」作出正確的、整體性的批判。究竟「仕紳化」重建過程如何損害重建區的原居民呢？正如Newman & Wyly所言，我們需要一個有理據的回覆。

翻閱市建局所出版的《邁向市區更新3.0》（2008）時，我們發現香港市區重建局利用了類似「以夷制夷」的方法來回應反對重建人士的控訴：他們同樣以報導個案的形式去描述被動遷後的居民在新居中的愉快生活。

市區重建局報導了因重建而獲得滿意安置的居民之狀況，事實上已回應了反對利東街拆除的居民的控訴：這些人之中，有人能獲得原區安置、有人取得徵收賠償後可還清因醫治癌症所欠下的巨債，亦有人從香港住了40多年的舊居搬到九龍環境較佳的新居，提升了家人生活素質。另外，也有透露和同屋租客擠擁地共住在同一單位的寡婦幼兒家庭，因為重建獲得賠償金，而能購買獨家獨戶的單位，不用再受惡租客的欺凌。客觀地說：如果將《黃幡翻飛處》及《邁向市區更新3.0》作對照閱讀，會讓人感到香港市區重建局並不如《黃幡翻飛處》形容的那般惡劣、不仁及奸狡。

在《邁向市區更新3.0》這本刊物裡，除了有個別的「持分者」表揚了因重建而提升了生活環境或對賠償金額滿意之外，還有如《黃幡翻飛處》一樣，刊登了專業人士對重建計畫發表支持的意見。在《黃幡翻飛處》及《邁向市區更新3.0》中，建築師吳永順皆有發表意見，在《黃幡翻飛處》中，吳永順發表了有關反對政府拆除太原街街市，將街市攤販搬進室內的言論。而在《邁向市區更新3.0》中，則報導了吳永順參與士丹頓街、必列者士街的重建計畫。吳永順的意見重點在於，他認為香港中西區（士丹頓街、必列者士街）的特色建築有「深厚的歷史印記，加強了該區建築物的保留與文化價值」，同時：整個區的「街頭巷尾」都充斥閒適氣氛，這裡很多被稱為「台」的大片門前空地，他明言這是「街坊的公共休憩空間」（2008：80）。

《黃幡翻飛處》是一本反對市建局的其中一個重建計畫（H15）的特刊，而《邁向市區更新3.0》則是市建局介紹其業績及宣傳的刊物，兩本刊物的撰寫或發言的人物，竟然其中有部份是相同的，這足以證明反對利東街拆除的人士與市建局之間是有溝通商討空間的。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反對利東街拆除的運動中，部份具代表性人物與市建局的對立，發表反對言論，其實可視為於重建的運作過程中，不同階段的討論。反對人士認為保育歷史文化及生活環境可發展遊旅業的觀點，與政府（及發展商）將生活空間轉換作市場出售之商品的立場，並非勢不兩立、水火不容。我們觀察到最大的共通點，就是雙方都贊同歷史文物以至香港人的生活特色，皆可包裝成為「旅遊業」的賣點。

以吳永順及其他文化界名人的言論為例，我們可得知，至少有部份反對利東街拆除人士的立場，和Harvey所論及的「文化大眾」（cultural mass）<sup>14</sup>的立場（1996：325）有很多相同之處。

據Harvey所言，這個階級由於是有學識的人士（要不是文化界，要不就是專業人士），故此往往掌握著對「文化」的詮釋權。Harvey所定義之「文化大眾」，其工作可能是作家，或在報章雜誌、網誌上寫旅遊雜文或旅遊宣傳稿，又可能是電影製作者，或主辦藝術文化展覽的人士。由此延伸，我們可將建築師、都市設計師（urban designers）、廣告設計師或報紙副刊與雜誌編輯、專欄作家等人士，都列為「文化大眾」，她／他們的工作皆與城市文化論述及城市形象設計有關。

正如Neil Smith所言（引自Lees, Slater & Wylie, 2008：114），有文化的中產階級憑她／他們的想法，往往將沒有甚麼歷史價值的歷史建築物加上了重重文化歷史意義，以滿足她／他們期望的環境，即，將地方轉化為「有文化」的景觀來展示。由此也創作了虛擬的空間美感經驗。在《黃幡翻飛處》中，吳永順撰文指出，太原街市集是富灣仔地區特色的街道，原因是這裡擺賣著五花八

門、價格相宜的貨品，是平民大眾生活的一部份。由此他認為這是「城市的性格」，而這「獨特的性格」的功能，就是成為「吸引遊客的地方」<sup>15</sup>。

而《邁向市區更新3.0》中，吳永順則提及他有參與的士丹頓街及必列者士街的市區重建計畫，倡議保留其中一幢建築物，為「必列者士街街市」。他宣稱這街市建築物的「前身」（即已不存在的）為美國公理會佈道所，為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在那裡受基督教的浸禮，並在其內居住了2年。必列者士街街市乃是戰後所建的公共室內街市，根本與之前在同一地點出現過的「美國公理會佈道所」一點關係也沒有。Urry說得很對，懷舊是「現今世代的流行病」，即是「只要是與歷史有點關連，幾乎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都可能被拿來保存。」（Urry, 2007：69）。

吳永順要求保育必列者士街街市的理由，比這種流行病還要奇怪。因為他主張保留的，是與歷史根本一點關係也沒有的一座街市。他所宣傳的，是要保育已拆遷了、不存在的一座（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所座落的空間上，新建起來的另一座建築物。

如果以他這種邏輯來推論，那麼是否所有建築物都不能拆除呢？因為所有建築物的座落點，都可能有遠古時代的建築物存在過。由此觀之，文化人士、城市設計及建築界的人士，對於城市重建的立場，可說是完全符合仕紳化的美學。她／他們以「表面、表層的展覽主義」為目標，去將城市「美化」，繼而將城市以「故事」、「傳奇」及表面的懷舊建築物來包裝成為旅遊業的商品，供觀光客消費。

自從反對利東街拆除運動在全香港火紅起來之後，直接或間接地將「灣仔文化」強化的策略越來越多：其一，是非謀利組織以灣仔區居民帶隊的「灣仔區導賞團」。所有導覽員皆受過訓練，其中一個導賞團介紹灣仔的各個古舊

建築物及其中傳聞發生過的故事；另一個導賞團，則是介紹灣仔各處傳出有靈異鬼魂出沒的地方；每到一處，就複述該處所發生的「鬼故事」。這些「導賞團」皆盡情將灣仔這個地區故事化、傳奇化。其二，是設立灣仔民間生活展覽館。該展覽館的第一次展覽（2007年2月），即是展出灣仔區居民的古舊生活用品。這個展覽館，將平凡無奇的日常用品轉變成「奇觀與展示」（spectacle and display）（Urry, 2007：151），也將「灣仔」變成一個有「特色」、可被「凝視／觀賞」的地方。

繼而出現的，當然就是各大傳媒報章所宣傳的灣仔「特色」：其中最集中介紹的，就是餐廳及精品店。事實上，商家們也藉著「文化大眾」的「中產階級品味」對「老灣仔」大肆渲染，如雨後春筍地在灣仔開設餐廳、精品店、特色傢俱店等等。使得灣仔變成一個百分百中產階級的地區：這裡有全城共同捍衛保育的古舊建築、互助互愛的舊區社區網絡、更有「說不完的故事及傳奇」，也有特色餐廳、精品店等等。

從舊區到文化空間，灣仔不斷接受「文化大眾」的渲染、賦予這個地方新的命名（例如利東街被稱為喜帖街），乃至於重覆組織這個地方的故事及傳奇；於是，這次保育運動成功創造了一種令群眾深信、名為「灣仔文化」的神話。由此，灣仔的重建，在實際物理空間上及人們的意識形態上，都完全成功了——這即意味著整個空間完全成功地商品化了。

## 結論

Harvey小心翼翼地對「地方」（place）及社群（community）清晰地描述、分析。在他的分析中，處處顯露對這兩個概念存在著戒心。他認為一旦將「地方」的建構浪漫化，即強調將「地方」這概念放在信念、價值與理想的同

一性的幻想中建構，並且對人們強力勸說「集體回憶」的正面價值，主張人們有權在地方上抗衡、排拒外在世界；若這種意識形態若過分膨脹，便會變成一股在有限空間範圍內強力的排他力量（1996：426）。

在《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1996）一書的結論中，Harvey很謹慎地提出所謂都市（內的）鄉村（urban village）或「社群」（community）皆是一種神話（或迷思）。這些概念總是宣揚人與人之間在某一地方長時間互相認識，互相幫助、互助互愛，儼如同一家族地生活，並認為這種高度的凝聚力，是對抗外在世界的自私自利、金錢至上、物質主義、市場為本的都市病態的武器。但是，Harvey認為這種「同一群體在同一空間內長時期共同生活」是會變成排外的意識形態：他同意Young的論點，認為對某個群體的正面肯定常常是藉著貶斥其他群體而達成的。這種意識形態想像以一個穩定不變的空間框架，加上一個高度穩定的互相協作社群，來否定社會的所有改變、意外、衝突。

但是Harvey卻認為「改變、意外、不協調、衝突」其實是令城市變得刺激，令社會變得進步的動力（1996：424；1997：3）。他認為「社群主義」的論述往往會使社會運動之視野狹窄化，因為這種意識形態只是從「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的對立辯證抽象出來，同時將其中一方（即地方）膨脹成為一內部具有由因至果、自圓其說的權力之自我完備的形體（1996：426）。

從我們對由2004年至2007年的反利東街拆除運動的分析，我們看到這場運動所建立的種種觀點與論述，都正如Harvey所言，墮進了一個「社群主義的陷阱」（communitarian trap）。資料所見，參與此次運動並有記名的人士所表達的意見，立場都離不開憧憬那有故事、有傳奇、有特色、有品味的「都市內的鄉村」：同時她／他們都高度評價那被形容為在同一地方長時間互相熟

悉、互助互愛儼如同一家族生活的人們所構成的「社區網絡」。

這種狹窄的社群主義，嚴重阻礙了參與人士對此次重建所涉及核心問題之全面討論：亦即，灣仔的面貌的整體改變乃是名符其實的仕紳化過程。

重建過程中最受影響的一群人：即低收入的租客究竟何去何從？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搜集的資料中竟然幾乎找不到答案。反而，在仕紳化理論架構的另一支柱：即以中產階級的利用歷史建築物的保育成就了美學品味觀，由此而成立的城市景觀設計的主張，卻出現在多位贊同／參與運動者的發言中。她／他們的論點，總括有以下各項：

- (1) 聲稱50、60年代建成的住宅建築物乃灣仔文化的物質依託；
- (2) 香港特色街道景觀與旅遊業有正面關係；
- (3) 提議將太原街的市集、喜帖印刷零售的商業活動，轉化成為香港灣仔的文化象徵，以成為觀光客視線中的觀賞對象（提議建設婚俗博物館、保留唐樓）；
- (4) 將香港灣仔舊區與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的區域之關係相比於「充滿藝術氣息的格林威治區與SOHO區」與曼哈頓之關係，以顯出政府拆除舊區的決策之「功能理性化」、「官僚化」與「荒謬」；
- (5) 期望「文化藝術社區」在商場介入滲透

所有的贊同／參與運動者，對都市重建都一廂情願地高舉「文化」的價值，又以紐約SOHO區為典範，高度評價舊區變藝術區所帶來的文化、經濟的效益。但是，眾多都市研究者都已指出，「曼哈頓」裡座落了充滿了藝術文化氣息的SOHO區，根本就是中產階級最標準的都市重建模式。同時，藝術文化事物在住區中存在也符合了中產階級的投資策略：Zukin很清楚地告訴我們，SOHO區作為「文化仕紳化」樣板空間的最成功之處，乃在於將此區域的房地



產價格大大提昇。

Smith也引用了Zukin對SOHO區的批判，說明現今的都市重建模式，雖然SOHO區被劃定為紐約市的藝術區域，但是這並不代表文化戰勝了房地產的重建發展；這其實只代表了「再資本化」之下的曼哈頓城市規畫及管治的策略。總的來說，將所謂「藝術」「文化」貫注入舊區作為重建元素或主題，只不過是創造了一個「中產階級」的遊樂場（1986：3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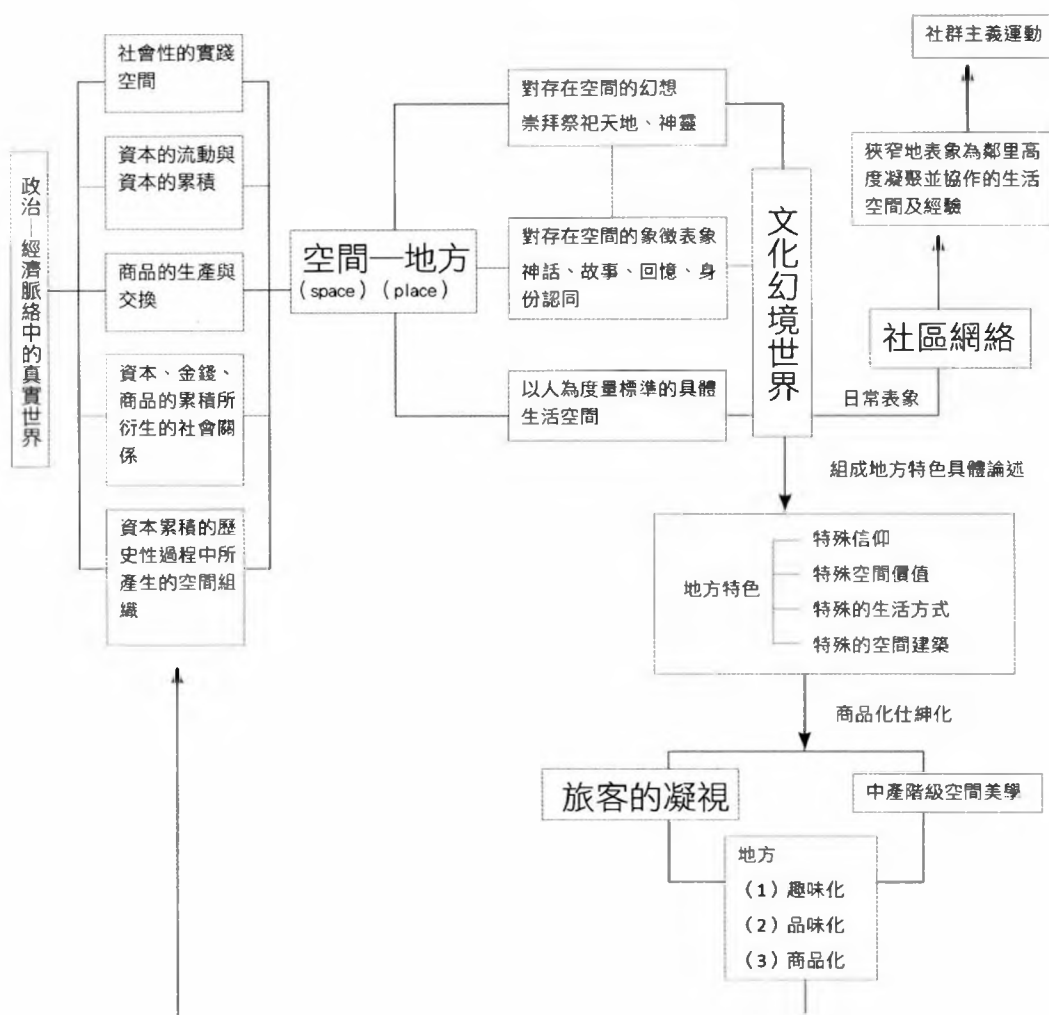
在此次反利東街拆除運動，可以發現大部分贊同／參與運動者在討論仕紳化的兩個重要論點都顯得不夠深入，也由此而墮進了陷阱。因此接下來，我們將以更清晰的反省來理解都市空間的整體構造。

正如Harvey所言，我們必須辯證理解空間／地方之間的兩面性，其衝突及矛盾，而在進行社會運動時，我們必須兩者兼顧，釐清運動的路線，於此，我們試圖以一圖表將空間／地方的兩面性列出：（如右頁圖表）

儘管Harvey對「社群主義」抱著很大的戒心，但是，他也得承認，在都市生活的人們，依靠著各式各樣社區組織及非營利福利團體，每天24小時不停地在社會努力援助輔導工作，才能在資本主義帶來的高速變易與重重危機的社會中的生活中，也感受到某一程度作為人的尊嚴與自豪感（decency and pride）（1996：425）。

細讀了香港最著名的保育歷史空間及社區網絡運動——反對利東街拆除運動，以及由此而引申對市區重建、仕紳化、社群主義的認識及批判後，我們企圖將此次運動與東京神樂坂町營造運動（詳見於本書討論神樂坂之文章）作比較。我們的目的是向有志尋求公義，要求都市空間資源作平均分配的人士作致敬。我們期望這篇文章所作的批判及反省，能提供點滴意見，好讓我們能夠以

此作為脈絡，去討論Harvey所言之「都市化社會較文明模式的可能性」：（如頁208-209圖表）



	神樂坂町營造運動
持久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自1997年起至今持續不斷進行對神樂坂整個地區的歷史遺跡、文化傳承及生活及社區空間的保育運動。</li> </ul>
組織嚴謹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神樂坂町營造運動為嚴謹及有系統的組織：組織領導人的名字，及各屬會之間的關係在組織出版之刊物均清楚列出。</li> <li>● 神樂坂町營造運動持續在神樂坂舉辦討論會、工作室，深入關注整區環境的轉變，與改善並持續推廣町營造運動。</li> </ul>
與建制／政府之關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積極爭取由國家以至地區政府各層級承認「町營造」運動之正面價值。更爭取申請成為日本聯合國協會聯盟所舉辦之「未來遺產運動」其中之一項計畫（2009年）。</li> </ul>
保育之原則與哲學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町營造」運動在日本乃是有廣度（對其原則之展述理解、分析及討論）及深度（不斷進行區域個案的紀錄及研究）之地方運動。同時，不少學者將日本本國的町營造運動與外國的社區營造運動作比較研究。</li> <li>● 日本現在出版了大量專書、期刊專門討論「町營造」運動。</li> </ul>
對「町」或「社區」之內容詮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町」（machi）雖然為一個有明確地域範圍的空間，但並不會強調／強化「町內人」的親密、「高度凝聚」的關係（所搜集得的資料中只見居民及學者或有關人士的聚會，乃是討論神樂坂的景觀文化價值及保育運作等課題），在町營造的過程中不會將空間劃分為「這裡」及「外間」。</li> <li>● 清楚指出，抗議發展商在神樂坂建造「高層」大廈是因為現代高層建築與有價值的傳統文化景觀不相符，而此傳統文化景觀同時是日本文化中高品質的生活／娛樂／旅遊空間。</li> <li>● 並未見神樂坂町營造組織為了吸引外國遊客而刻意開放或庸俗化傳統文化空間，純以商業為原則經營。</li> </ul>
有形文化：歷史建築及空間之保育（美學論點及文化承傳論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積極宣揚、保育本區的「被指定的文化遺產」（heritage by designation）：（1）年代久遠的佛寺、神社及持續舉行的宗教儀式與活動；（2）「路地」及「黑瀨」為日本傳統建築空間。</li> <li>● 推廣町營造運動的人士，說明歷史建築空間同時也是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並積極在原有的空間構造上作出改良。</li> </ul>
無形文化：本區傳統技藝工商業的文化承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神樂坂滿佈著由明治／大正時代留存至今的傳統藝術、工商業的活動、經營空間：例如：花柳界、能樂堂、落語表演場所、茶室、料亭等等。</li> <li>● 神樂坂經常開設各種教室，開放及教育本區、本國以至外國人認識及欣賞這等日本傳統文化。</li> <li>● 神樂坂同時是法國人的聚居地，很多法國人在此開設小餐廳，與日本文化傳統的及現代的社區生活文化能和洽地共存、生活在同一空間。</li> </ul>
社區空間的營造與保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設立各項研究，長期記錄該區傳統文化活動的盛衰、老舖的數目的增減，及該區高齡化的趨勢。</li> <li>● 代表區內住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的店家，如麵包店、豆腐店、文具店、日常服裝及鞋店、雜貨店等等，能長期持久地以小型企業的形式在神樂坂經營。</li> <li>● 以全方位的「人們生活各種所需」的論點提出「町營造」為都市規畫原則（見本書〈從傳統到地方認同——神樂坂之町營造（まちづくり）——一文列表）。</li> <li>● 每年舉辦整區同慶的社區節日，吸引東京其他區域的市民來神樂坂同樂——但一般的日本國外出版的東京旅遊指南並不會宣傳這類社區節日。</li> </ul>

### 灣仔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H15關注組

- 自2004年起成立「H15關注組」，在灣仔眾多重建項目中只反對利東街的拆除，也沒有詳細地對灣仔其他重建項目提出保育方案。
- 於2009年H15關注組提供了「回應《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建立共識階段之公眾意見總結展覽」文件。
- 「H15關注組」之組織嚴謹度無法估量。在有關資料中無法肯定誰是正式組員，也不能肯定哪些組員是真正策劃／策動運動者。
- 「H15關注組」聲稱在反對利東街拆除期間舉行了12次全區性的居民大會，及成功訪問了150戶家庭及商店，還舉辦了5次規畫工作坊、7次公眾諮詢會、4次街頭展覽等活動。但利東街正式拆除之後再也沒有公開舉辦過紮根於灣仔（利東街太原街以外區域）的反對重建或拆除運動。
- H15關注組主要以個別受重建影響的居民的的不滿及控訴，指出香港市建局的「陰謀」，繼而反對及批評政府市區重建政策「黑箱作業」、「使本來的社區網絡消失」、「嚴重向發展商傾斜」等等劣點。但對市區重建局所舉辦的「收集公眾意見」與市民「建立共識」的過程報導的所「達到之市區重建策略的目標」之成績，沒有提出客觀的回應、討論與評論。
- H15關注組及有關人士一面倒地正面評價（1）社區地方歷史文化特色（2）社區網絡；但對這兩個概念與許許多多「社區營造」的理論之關係未見有深入的討論，也未見有從定義到比較研究的討論。
- 本文筆者沒能力搜集到有關香港社區營造從觀念到實踐的得失之反省性研究工作的紀錄及資料。
- 高度強調大眾的和諧關係及社區凝聚力，以至用「灣仔人」來稱呼住在這空間範圍的人。
- 高度強調這極小範圍中的（例如由灣仔濃縮至一條（喜帖）街甚至幾間「藍屋建築群」建築物的空間）：在「內」的人們之間的關係「不是競爭，而是協作」及「和睦不欺壓」的關係，藉在「這裡」的人倫之關係以抗衡「外間」的道德敗壞（「現在流行的同行如敵國」與「辦公室政治」）及經濟挑戰（中國大陸的低廉工資）。
- 有參與是次反利東街拆除的專業人士明言，「社區特色」乃是吸引外國遊客的元素。
- 以文字、視覺大力宣傳「經挪用而成立的文化遺產」（heritage by appropriation）：（1）利東街上的50、60年代住宅建築群的特色，只因其是40、50年前的建築。（2）推行反對利東街拆除的人士，不能否認這種住宅建築並不是優良的生活環境，但不斷強調此住宅建築群為「社區網絡文化」的物質依託，並膨脹此住宅建築群為「灣仔文化之特色」。
- 將喜帖印刷、修車定義為位處灣仔的「社區技藝行業」。因處在市區的輕型工業並沒有觀賞價值，所以從事這些工業的人士被轉稱為近乎工藝的師傅，而空間則被膨脹為「社區網絡」衍生的發源地。
- 這些工業的運作空間被表述為坊眾聚合的公共空間、並孕育了的社區網絡的文化。非謀利團體開辦各種導賞團，吸引外區人士「參觀灣仔」，導賞的介紹將灣仔「故事化」、「傳奇化」。
- H15關注組所提出的「啞鈴方案」，大部份條款都集中在物理空間及其功能方面去理解都市生活環境，例如：行人專用區、特色街道、休憩空間、保存歷史建築物、細小的住宅單位面積。至於人的活動方面，則涵蓋了本土經濟發展、活化舊區及保持社區精神這幾項提議。但提出此數項建議的人士沒有考慮到，一個地方若真的作上述的更新建設，即有大量綠化休憩空間，有歷史意涵的建築物被保育，更配有「特色」的商舖在此開業，必定會吸引大量外來訪客，令旅遊業蓬勃。由此，商店住宅價格必然同時高昇；到時，又是否能保證業主不會出其商店住宅物業，或大幅提高租金，以保得了本區原來的「社區網絡」？
- 經過反對利東街拆除之後，媒體大肆宣傳灣仔作為一個有特色的「舊區」，吸引了很多高價的特色商店諸如特色餐廳、精品店、高級傢俱等到灣仔區開業。

最後，讓我們提出的立場，即是對「社區組織／網絡」反省批判之餘，並承認日本民間所推行的「町營造」運動，是比較貼近一個理想的生活居住環境的營造工作。

在〈The New Urbanism and the Communitarian Trap〉（1997）一文中，Harvey認為若組織具地方政治意識的「社區」（community），應該是（理論及立場上）以爭取一個有更多社會公義、政治上要求解放，及環境生態上考慮得更健全（sane）的「時空生產」<sup>16</sup>的社區為目標（1997：3）。而日本建築學會提出了「町營造」的10項（具體的）原則<sup>17</sup>，可讓我們深入理解組織社區運動之方向。總括來說，社區運動首先的考慮在於社區的環境的持續與傳統文化環境、個人獨立生活及公共社會生活的環境、自然及資源環境保育等各方的平衡發展。在此脈絡中，社區運動應該是倡議這等環境是所有人皆需要包容及所有人共同維持的。

我們很贊同Harvey所言：「當論述的反省完結，便是實踐的政治行動的開始」（1996：438）。謹以此文贈予所有熱心爭取在城市生活的權利的有志之士。

## 注釋

- 1: 「H15」為香港市區重建局於灣仔利東街／麥加利歌街項目個案的編號。由項目區內的居民和業務經營者組成的H15關注組，從2003年至2007年不斷反對及抗議拆卸利東街。
- 2: 資料來源為香港政府統計處2010年第3季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 3: 中譯《仕紳化與城市》。
- 4: 有關Bourdieu對「新小資產階級」的分析，請閱本書〈城市文化：日常生活的發現和完結〉一章的介紹。
- 5: Bridge (2000) 指出：新的中產仕紳 (the new middle-class gentrifies)，其生活及文化形成的環境 (habitus) 的特徵就是追求一個優於普通平民大眾的坊鄰、房屋 (規畫及設計)、生活方式、及消費習慣。
- 6: Rautenberg (引自: Tweed & Sutherland, 2007: 63) 對建築空間作為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 的兩種詮釋。據Rautenberg的表述，在文化保育的脈絡上，對於某國族或某地方區域的建築空間的文化，可以有兩條脈絡去詮釋其本質：其一是「被指定的文化遺產」(heritage by designation)：那就是經國族、或被承認的權威專家嚴格審為承載、承傳、體現傳統文化的空間。第二種為「經挪用而成立的文化遺產」(heritage by appropriation)，這是指某些文化建築空間透過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挪用，因日子久遠而漸漸沉澱累積成在在地的文化空間，無論是國族公認的文化建築空間或人民長久挪用而成立的文化空間，對其所屬的民族或本地區的坊眾皆是富有極高意義及價值的。
- 7: 中譯，〈仕紳化：在城市中心的文化和資本〉。
- 8: 中譯《城市文化》。
- 9: 據香港大學出版的《香港市區更新的成就與挑戰》(2010年3月)，「啞鈴」方案的設計特色為：a. 在利東街劃設行人專用區；b. 保存本區街道特色，連同街舖及混合用途；c. 住宅／商業用途；d. 本土經濟繼續蓬勃發展的機遇；e. 保存社區精神；f. 協助舊區活化；g. 提供公眾及私人休憩空間；h. 地面休憩空間連接春園街及廈門街；i. 在平臺層的相連休憩空間；j. 保存沿皇后大道東一帶的戰前歷史建築物；k. 細小的單位平均面積。
- 10: 例如海德格的「住居」(dwelling) 概念、Norbert-Schultz的「場所精神概念」(Genius Loci) 等。
- 11: 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7月20日報導：香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委員何嘉華接受訪問時指出：「市建局的目標重建區內，大部份是40至50年樓齡的舊樓，住了不少基層市民和窮人，……保守估計全港至少有五萬人住在環境差的地方。」
- 12: 於香港大學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所出版之《灣仔區議會利東街／麥加利歌街市區重建項目研究報告》(2004) 中，登錄了以該兩條街之租客為受訪者之調查報告(頁16-30)。該調查共訪問了305租客。這項調查所設計的同卷題目，乃是受訪者的人口統計資料、居住在灣仔的年期、有關市建局的諮詢程度及為他們提供幫助的滿意度等。是項調查沒有詢問受訪租客有否受到動遷之影響或受到何種影響之問題。
- 13: 這研究引用了Vigdor (2002) 對重建的極之客觀的問題——Vigdor企圖探究重建區中那些低收入租客有幾多人是真正因為重建而被動遷？與及重建區中有多少居民搬遷的原因正是重建？
- 14: Harvey所稱謂的「文化大眾」，與Bourdieu, Featherstone所介定的新小資產階級，或Lees, Slater & Wyly所表述的「新中產階級」，幾乎是完全相同的社會階級。各位學者站在不同角度去描述這個階級的特性：Bourdieu及Featherstone從最概括的範圍去勾勒這個階級以(其自主釐定的「文化」及「美感經驗」去爭取本身的文化及社會資本；Harvey與Lees, Slater & Wyly的立論範圍，則更清晰地收斂在介定這個階級如何以「文化」及「美感經驗」去主導都市空間的組織與營構。
- 15: 梁文道也認為喜帖街是「老灣仔的文化象徵」，認為一個地方必要以其「本土文化特色」來與世界各地競爭，吸引遊客。(《黃幡翻飛處》，2007: 25)
- 16: 在資本主義中，人們對時間、空間的意識與概念完全是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控制的，人們要爭取的，就是脫離資本主義所生產的時空意識及概念。
- 17: 日本建築學會更提出了「町營造」的10項原則：a. 公共福祉原則；b. 地域性原則；c. 自下而上(bottom-up)原則；d. 地方的語境原則；e. 多主體合作原則；f. 環境持續可能性、地域內循環的原則；g. 各個町進行營造活動的成果所互相作用的過程整合建構起來，以構成整體的「町」的形狀；h. 個人啟發與創造性原則；i. 環境共生原則；j. 全球(global)與在地(local)辯證的原則。

# 「嘉年華式狂歡之軀體」的鬥爭

——屯門公園長者之空間創造

屯門公園坐落於香港西北部的一個新市鎮。自2003年開始，有為數不少的自發組織團體，每天在這公園內表演粵曲及經典粵語流行曲，更引來大批路人圍觀。每天下午，粵劇、經典粵語流行曲演唱之聲此起彼落，大群的觀眾（大部份是年長人士）在表演者旁邊「聞歌起舞」，就這樣，屯門公園每天都像舉行嘉年華會那麼熱鬧。

這些歌舞活動，漸漸引起了大眾的關注。自2004年開始，公園鄰近的民眾住家不斷投訴受到噪音干擾，香港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便開始制定各項措施，來限制這些表演節目。自此以後，公園表演者與觀眾，跟政府的執法者時常為了表演場地、表演時間、歌舞聲浪而發生爭執，有時更演變成對峙騷亂的局面。

香港某些主要的媒體把公園內一票的表演者標籤為「歌唱刁民」、「使用揚聲器引起噪音的表演團體」<sup>1</sup>。香港一個知名的專欄作家陶傑，更以刻薄歧視的語言辱罵這群在公園內自發找尋娛樂的草根階層長者：

要唱歌，留在自己家裡唱個夠好了，不要滾到公園來獻醜。香港自稱國際城市，舉目環球的真國際城市如紐約的中央公園、倫敦的海德公園、巴黎的盧森堡公園，幾時會准許一千老人師奶、肥婆閒人等聚眾任意施展歌喉的？<sup>2</sup>

我們發覺在陶傑的言辭中，處處也顯示他視這些草根長者為「低等的他者」（low-others）——即一些沒有倫理教養的愚眾，完全不值得社會尊重（Pile, 1996：179）的人群。同時，陶傑認為，公園內，使用者必然要遵守先進城市的人的規則，好讓香港合乎國際城市的形象，那些不守規矩的人群，應一律禁止使用公園。

於2006年5月143日，在一場表演者及觀眾與康文署的衝突中，一名72歲的男子，「疑怕事件鬧大逃跑，離去時失足跌倒地上，送醫院搶救證實不治。」（蘋果日報，2006/5/153，版面頭條港聞版）

但自此事以後，雖然公園裡的歌舞活動雖然繼續受到政府限制、打壓，以及媒體的負面報導，但是表演者和觀眾還是竭力地堅持繼續進行。

若果我們從Friedmann（2002, 2005）所定立的「經濟空間與生活空間對立」<sup>3</sup>的立論點來看，屯門公園群眾與執法者在公共空間使用上的爭奪與衝突，讓人感到此一事件不會只是偶發性的官民爭執。

為何這群長者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仍堅持著在屯門公園裡，進行曲藝表演及聚眾觀看？站在Friedman的理論立場，我們假設了表演者及觀眾，乃是在長年累月地在爭取生活空間。為了證明這個論點，我們的研究組於2007年至2008年間進行了在地田野觀察，去考察屯門公園中的歌舞長者的空間活動與她／他們與執法者的糾紛。我們認為屯門公園事件，一方面除了是草根階層市



民實踐創造生活空間行動的活生生的例子，在另一方面，執法者的監視及壓制行動則是一連串赤裸裸的暴力，在都市環境中以「全視監控監獄」的模式來監視市民在公園的活動。我們藉著此次研究，期望瞭解到，為何這群長者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仍也堅持著在屯門公園進行曲藝表演。

本文所提出的另一個論點，是年長群眾透過其「歌舞欲望及意志」與持續的鬥爭，強烈地顛覆了一般社會上對於「年老」的觀念。長者們歌唱著、舞蹈著的身體在在地讓那「嘉年華式」的經驗（carnavalesque）<sup>4</sup>爆發出來。而其表演的空間就因此而成為「生活／生命」的空間。由此，透過歌舞活動，長者綻放強而有力的生命力，形成一股「反文化」的力量對抗政府的強權，以及官方對藝術的主流觀念。

隨著這脈絡進行，在本文的第二部份，乃是我們對觀察草根長者的曲藝表演行為的觀察研究，並對比觀察作詳細報告。我們期望藉著此次研究，能瞭解到屯門公園這空間所提供給表演者及觀眾的意義。而從觀察中，我們首先發現，曲藝表演及觀賞行動基本上是極強的群眾凝聚的力量，由此凝聚過程，群眾漸漸自發地建立了她／他們的社區。當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整件事件，就能夠解釋年長者在屯門公園作樂的群眾行為的原因。

## 屯門公園事件簿

### 1. 屯門在那裡？

Castells將香港界定為「香港—廣州」大都市連綿帶的其中一個「節點」城市（Borja, J.etal., 1997：34）。自1990年代開始，為了更適應「全球經濟」的運作，香港政府十分努力地重建香港的市區空間及重構基礎建設設施。

香港的城市規畫，所彰顯的是Friedmann所訂立的「市中心——邊緣地帶」（2002）二分的城市空間模式的最佳例子。自1990年代開始，為了更適應「全球經濟」的運作，香港政府十分努力地重建香港的市區空間及重構基礎建設設施。在1990年代末期，香港政府提出了以「國際都會」（World Class City）的口號來定位香港（引自《1999年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由此時起，香港政府集中在維多利亞港兩岸進行重建，以求以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世界知名的多元文化旅遊城市等主題來建造香港的形象。香港政府主要的策略，就是使市區中心成為一個「高品質的商品」；一個充斥著娛樂、暢遊、休憩玩樂、節日慶典的地方，以促進本地及外地旅客的消費。

香港的另一個發展方向，就是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大量發展衛星城市。這個城市的規畫方向自1950年代已開始實行——在衛星城市中，建造了大量公共屋邨，吸納大批低收入的勞工階層從市中心遷移來居住。於1960年代末開始，香港政府在更偏遠的地方，建設了更多的衛星城市如屯門、天水圍、東涌等。這現象正引證了很多都市理論家的論點<sup>5</sup>，即處於社會低層的市民被移徙至城市的邊緣地帶，好讓出城市中心位置來發展經濟，由此可知市中心的高級商業區與邊緣地帶的低層市民住宅區兩處的經濟不是平均地發展。再者，自80年代製造業式微，薪酬較高的服務性行業高度集中在維港兩岸的市中心等地方，居於城市的邊緣地帶的市民多半必須花費更多時間及高昂車資回市中心工作。這種現象正好說明「中心——邊緣」這種規畫模式的錯誤：一方面低收入人士被大量動遷到新市鎮居生存——但不是生活；另一方面也把工作競爭力低的市民密集地遺棄在城市的邊緣地帶（Castells, 1998：138）。

屯門正是朝此一發展趨向的一個最佳例子。屯門新市鎮<sup>6</sup>於1973年成立，但由於1980年代中國開放，香港的製造業工廠大量北移到廣東省，屯門區內的製造業面臨萎縮，市民被迫回到市中心尋找工作。由於屯門遠離市中心，交通車資昂貴，就業機會短缺就成為了這新市鎮主要的社會問題。

## 2. 屯門公園環境的描述

屯門公園於1985年建成，佔地12.5公頃，座落於市中心地帶，為屯門區內首要的公園。這公園為屯門市民提供了廣闊的綠化空間及大量的休憩設施，並在2003年獲得「傑出綠化工程雙年獎」的金獎。

據我們的觀察，屯門公園的設計是（Friedmann所謂的）「以鄰里為本的空間」的最優秀的例子。住在鄰近的居民步行數分鐘即可到達公園，廣闊的綠化空間及大量的休閒設施誘使居民到公園來休憩，因而可常與鄰居碰面「打招呼」、聚在一起談天說地，也漸漸締造友誼（Friedmann, 2007：2）。

## 3. 唱歌跳舞要把命拼？——研究起因

我們研究組當中，有一名成員居住在屯門公園附近，對於公園內的年長市民的歌舞活動、以致官民衝突時有所見所聞。於2006年5月13日所發生的官民衝突中，一名老翁竟因而死去，更引發我們的關注。在這事件之前，我們僅約略知道有大量的年長市民天天在屯門公園，自發性的舉辦近乎即興的音樂表演會，觀眾常常集體載歌載舞，樂此不疲。此後由於表演者使用擴音器材，漸被居住在周圍的居民投訴；然後政府及媒體判定她／他們的這等歌舞活動為噪音，政府更施以限制。我們認為居住於屯門區以外的香港居民，若沒有「親歷其境」，單憑媒體簡單的報導，不會真正明白屯門公園事件原委，也不會明白這個地方對這些參與活動的人士有何意義；因此，於2007年2月開始在屯門公園進行參與觀察，希望憑藉研究所得的資料，可客觀性地討論以下問題：（1）為何受到一浪接一浪的投訴及限制，這些年長市民仍熱衷於在屯門公園表演及參與唱歌跳舞之活動？（2）這些表演節目對他們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在觀察期間，我們漸漸地確立了一個假設，就是：這些年長市民透過在公園的活動，誘發了她／他們慢慢建立起牢固的鄰里關係。我們同時也建立了另

一個觀點，那就是年長市民參與在這些動態的、熱情的歌舞中，長者們實則是感受到生氣活現的、「嘉年華會」式（carnavalesque）的刺激及快感。正當她／他們載歌載舞的時候，她／他們同時也身體力行地顛覆了對「年長」的主流意識型態；更由此，她／他們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空間。

#### 4. 研究方法

為了具體地理解在屯門公園每天都舉行的歌舞活動以何種模式進行，並描述參與活動的年長市民、其參與的不同方式及型態，以及她／他們在參與／實踐活動的過程中所創造的意義，我們採用了「直接觀察」及「參與觀察」作為搜集資料的方法，以圖獲得最直接的體驗及紀錄這活動的實況。

此次研究所採取的方法——「參與觀察」，其意義根據為Maanen的論點：「文化的表達（或構成），只能由『當事人』——即參與活動於其中的成員的行動及言語才得以成立。田野考察研究者並不會被動地獲得這文化的意義，她／他只能主動去闡釋這文化現象的意義。」（1988：3）。這即是說，田野考察研究者要敏銳細緻地觀察參與活動成員的言語行動，再加上對這些言語行動做整體的反思，附加以清晰的闡釋，「文化現象」才會得以成立，並且產生意義。為求掌握「當事人」的觀點，並記載這項活動在不同處境上所浮現的多角度視野，我們採取了直接接觸這社區（與「當事人」共處）的方法，從而具體地闡釋她／他們創造出的生活空間模式。除了理解她／他們的空間的創造與運用外，我們還紀錄、分析她／他們與當權者之間的衝突。

#### 5. 研究的設定

這個研究是於2007年2月至2008年6月間進行。由於這段時間包含了不同的季節及節日，因此研究員能夠觀察到在不同時間及情況的環境下中，在屯門公園所舉行的活動模式及其變化樣態。研究員以居住屯門公園附近的公共屋邨

的鄰居身分進入被考察空間，再者，研究員的父母本即是這些歌舞表演的長期觀眾。這個身份有助於研究員去認識某些表演者及觀眾成員，達到研究員能與觀眾及表演者在歌舞表演期間作出多次的閒談或非正式的訪問。

在記錄資料方面，研究員曾意圖以拍照配以筆記方式進行，可是，由於表演者／觀眾與康文署之執法者不斷衝突，參與者對進行拍照的外來人會產生敵視，在此情況下，研究員只能以筆記方式進行紀錄。

為了更深入了解在屯門公園中的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於2010年9月28日訪問了屯門區資深區議員陳雲生先生。陳先生在屯門當區議員十多年，收過大量有關屯門公園的噪音投訴，也積極擔任了屯門公園官民之間糾紛的調停人。在是次訪談中，我們期望陳議員對下列題目提供答案及發表意見：（1）投訴者主要是那些人？（2）投訴內容為何？多數是有關噪音還是有關過多人在公園聚集？陳議員除了回答我們的問題，還告訴了我們在屯門公園產生歌舞表演的歷史經過。

## 6. 觀察與發現

### （1）屯門公園：長者樂園

蒼翠繁茂並擁有大量開放空間的屯門公園，一直深受年長市民（主要是居住於屯門的民眾們）的歡迎。在不同的時段，都有年長民眾在公園範圍內各處地方進行不同形式的活動。在早上，她／他們會在公園內做運動、跟朋友相聚及散步。在下午，他們就會進行歌舞表演活動，直至傍晚。在晚飯後的時間，又有年長人士出現在公園，與朋友們一起唱歌。

## (2) 屯門公園長者的歌舞活動

屯門公園內擁有廣闊的綠化空間，但管理部門並無明文規定空間使用的方法與限制，因此市民可以輕鬆自由地進行不同活動。

公園的中央地帶是一個大型露天劇場的設計；除此以外，其他空間都作開放式設計，非常有利於各式各樣的活動隨處進行。更加上這些開放空間都設有大量的長椅，供市民休憩使用，並且這些長椅多設置在樹蔭下，更自然形成一個舒適的環境。這種環境設計很容易地轉化成一個觀賞表演的場地，也因此歌唱及舞蹈表演便很自然地在此處發生，隨之而來的必定是吸引大批觀眾的駐足觀賞。這個有樹蔭有座位的空間佈局，誘導了來往經過的人不會匆匆地走過，很容易會吸引她／他們停下來觀看表演節目。

據陳議員的描述，2003年非典型肺炎之疫導致香港經濟衰退，因此自2003年開始，有一群年紀較大的失業人士，開始在每一個下午，在屯門公園內的露天劇場自發地組織及舉行一些有樂器伴奏演唱的表演節目。這種風氣漸漸興旺起來，曲藝表演也越來越多元化，包括多種不同音樂風格（廣東大戲、懷舊國粵語金曲、印尼及西藏民謠等等）。漸漸的，這些表演也擴大到露天劇場以外的地方，表演者及表演團體也逐漸增加。直到2004年為止，每一個下午，都大約有11組表演在公園內各處舉行。這些表演場地吸引十分多的觀眾聚集，而且這些觀眾多數是年長市民。

年長市民對於唱歌活動，表現出滿腔熱忱，這些節目更成為屯門公園內天天舉行的日常活動。在研究進行期間，我們發現不論是什麼季節、不論任何節日慶典期間，表演節目幾乎天天進行。活動多數是在戶外的環境進行，甚至是遇上不利於在戶外活動的天氣（例香港如天文臺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及「寒冷天氣警告」的日子），這些活動還是常規性地進行，除非下著暴雨才會暫停。

在重要的中國節日期間，如中國新年及中秋節，這些唱曲活動依然如期地舉辦。事實上，節日期間往往會引來更大批的觀眾；長期持續參與活動的年長市民會帶親友前來看表演。她／他們通常會藉此機會，介紹來探訪自己的親友（多數是孫子女），給在公園遇到的鄰居及朋友認識。

中秋節那天（於我們研究期間為2007年9月25日），白天唱曲活動如常地進行；到人傍晚時分，公園聚集了大批市民與她／他們的家人親友前來賞月。這時，不同團體舉行了盛大的音樂表演，很多年長市民更與家人帶了月餅、七彩燈籠來慶祝節日。

年長市民十分依賴近家鄰里社區而生活，她／他們都傾向於聚集在有豐富鄰里生活的空間。根據我們的觀察可以總結出，屯門公園就是這類鄰里生活的空間的典範。這個地方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讓人們集結，並且能自由地使用，讓人們能在其中舒暢地活動、交朋友。由於天天開放，屯門公園更能夠推動人們產生以每天日常為基礎的緊密社交聯繫。再加上那些像有磁石般吸力的表演活動成為聚眾焦點，鄰里坊眾於是乎日復一日、順理成章地在屯門公園過著歡欣快樂的生活，並由此建立起他們緊密的社會網絡。

### （3）執法者對公共空間的淨化行動

「搞到成個公園好似監獄，（我們）呢班人係咪犯人？（整個公園被改變到像個監獄，我們這班人豈不是成為犯人？）」——李先生（70多歲）

「果時（2006年）又話無得表演，政府啲（那些）人成日睇實，我幾驚以後無得聽呀！你叫我呢啲（這群）老人點算？（那個時候（2006年）政府曾說表演停止，政府那邊的人常常監示，我真擔心



每逢音樂開始，一眾長者立刻高歌跳舞，享受他們的娛樂活動。



長者們在池畔學習及練習樂器（於2007年9月已被禁止）



表演者穿上華麗舞衣及飾物在表演社交舞



貌似年近八十歲的李婆婆每天都到公園隨歌起舞



不良於行的殘疾人士不時到歌藝表演場地欣賞歌舞



以後沒有得聽歌曲表演呢！你教我們（這群）老人如何是好？」  
——陳先生（80多歲）

「市民投訴被噪音所滋擾，實在不同情理。四處也有噪音，就是貨車的聲浪也很大。」——84歲的張先生（每天到公園來也是穿著西裝的）<sup>7</sup>

於2004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接獲居住屯門公園附近的市民投訴<sup>8</sup>，屯門公園的歌舞喧天的聲浪對她／他們構成滋擾。康文署立即採取行動來控制節目的表演及觀眾的聚集，以求減低噪音滋擾。這些行動及措施包括如下：

- 為監察有效控制曲藝表演，康文署嚴格規定公園內的曲藝表演場地：在公園內設立四個「自娛區」供曲藝人士表演使用。曲藝表演人士／團體必須預先申請及抽籤分配場地，才可以使用該場地。

- 嚴格限制音量在70分貝以下。康文署職員會測量曲藝團體發出噪音的聲量是否超出70分貝上限。如超出該上限，康文署會向有關團體發出警告信。若再犯的話，康文署會終止所有已批准該團體使用自娛區的預訂時段。

- 康及署在公園多個位置掛有「屯門公園內進行曲藝活動須知」告示，提醒表演人士公園內不可使用揚聲器及發出噪音。

- 康文署在公園多處安裝攝影機監視系統以監管曲藝表演。

- 康及署的保安人員經常在公園巡邏，並定時到曲藝表演場地監察秩序及管制音量。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並撥出300萬元在屯門公園的露天劇場，興建隔音屏障，控制區內曲藝表演團體造成的音量。

- 康文署移除人工湖旁電子琴表演者使用的桌椅。

總結從2004至2008年期間，控制曲藝表演的措施如下表：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公園內開始出現曲藝表演	表演者及觀眾日益增長  康文署接獲鄰近的居民投訴受到噪音滋擾  康文署開始對公園的音量及表演空間作出控制	長者在露天廣場之外地方用揚聲器進行曲藝表演  鄰近的居民再次投訴受到噪音滋擾  康文署禁止使用揚聲器	康文署在公園以外提供曲藝表演場地，並在公園內設置監視器	康文署在露天廣場四周設置隔音屏障	康文署移走在中央人工湖畔那些可讓表演者放置琴鍵的石桌子

有關當局實施這些措施，我們認為其意圖是在於「淨化」（sanitized）這個空間；監視器的設立，幾乎是純粹旨在監控長者的歌舞活動。這等監控措施更是引起長者們強烈的不滿。其中一個表演者李先生，當提及當局的措施，便表現得非常憤怒：「現在康文署將公園變成監獄，我們也被視為犯人。」他認為當局完全不尊重這些歌舞活動和參與觀賞的年長人士；他們已被視為「犯人」。這些措施正正是引發參與歌舞活動的年長人士（表演團體及觀眾）與執法者對立的主要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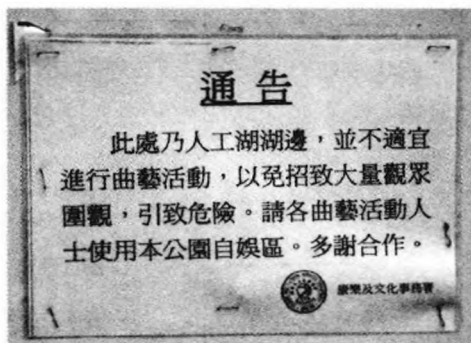
屯門公園的歌舞活動參與者的不滿、憤怒和反抗，很明顯地就是Koskela所形容的，城市市民對於當權者以全區監控科技來監視城市空間的反抗。Koskela指出：「監視器的鏡頭使得全視監控的力量被科技化、電子化，因而不斷擴展；我們的城市，因此成為一個巨大的圓形監獄。」（2003：293）當



花園狀位置為居民自發的曲藝活動進行地點



星圖狀位置為康文署設立於2004年的「自娛區」位置



康文署於2005年開始，在公園各處豎立警告牌及「於屯門公園內進行曲藝活動需知」的橫額，提醒市民不可使用揚聲器。

一個地方被監視錄影器監控，將使此地無論發生什麼事皆清晰可見。這種紀律性的凝視（disciplinary gaze）在所出現的地方彰顯出全面並且絕對的權力。執法者藉視像控制（visual control）來證明了它全面掌握著地方的那種絕對的力量。當局之意圖，明顯是以監視錄影器的存在，來將空間維持「正常」（normality）及「透明」（transparency）的狀態。同時，監視錄影器對於歌舞活動參與者的空間使用習性（spatial practice）來說，是赤裸裸的鎮壓。在屯門公園展現的監控暴力，實在令人感到窒息。一方面，當公園中一旦有歌舞活動進行，這公園就被看成是一個「失常的地帶」，也由此，當權者會視之為對其權力的威脅；另一方面，歌舞活動的參與者看到公園到處都有監視器，亦會感到被侮辱及敵視，極之不快。以屯門公園的案例而言，我們完全同意Koskela的看法，她指出監控鏡頭的功能就是「淨化」（sanitize）及正常化（normalize）城市的空間，並且將那些未能被馴服的「身體」貶為「他者」而將之排斥及懲處<sup>9</sup>。

Koskela正確地指出監視錄影器的出現，根本就是促使衝突的發生的導火線。以屯門公園為例，不僅當局在公園內設立林林總總的監控措施，執法人員更不時干涉她／他們的歌舞活動。對表演者及觀眾而言，這是惡意的挑釁。兩方的關係因而日漸惡化，衝突時常發生。歌舞活動的參與者在衝突中十分激烈地表達、主張她／他們應有權利自由並且無障礙地使用公園的空間。

長者每天都必須與執法者對抗，來捍衛她／他們參與及欣賞歌舞活動的權利。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為了阻止人們集結去欣賞及參與歌舞活動，所以到處到設置柵欄及禁區。觀眾們為求得到一個較佳的觀看角度，唯有攀過柵欄進入禁區。另外，由於表演者常常使用手推鐵車運載揚聲器及樂器進公園，當權者便禁止公園內使用手推鐵車，也禁止公園內使用揚聲器。表演者於是轉用其他運輸的工具（例如有貨籃的單車或大型的手提袋）來運載樂器及表演器材進入公園。



康文署於2006開始在公園各處設置監視器監控曲藝表演



康文署為了阻止人們集結去欣賞及參與歌舞活動，到處設置柵欄及禁區。

## 生活空間的意義

參與及欣賞歌舞活動的長者無論在載歌載舞中、或與執法者對峙及抗爭的過程中，都爆發著一股不能被壓抑的力量，我們從中體驗到，此一事件並非平常的普通市民不滿執法者的抗議行動。參與及欣賞歌舞活動的長者那種激烈的反抗可以借用Lachmann, Eshelman & Davis所言之「主流正規文化的秩序與非主流非正規的狂笑文化<sup>10</sup>」（1998：130）兩者之間的衝突。參與在歌舞活動中的長者，以其嘉年華式（carnavalesque）狂歌熱舞的身體，顛覆了官方建制所營造的、備受控制的「正規文化」。

以下章節，我們會逐一分析屯門公園歌舞活動的社會及文化意義，並分別根據社區生活的相關社會學理論，以及有關「嘉年華式」（carnavalesque）的文化理論，來深入分析屯門公園現象。

### 1. 載歌載舞、免費娛樂

「跳吓舞、食吓野、飲吓酒，好似『後生』時去玩咁開心（跳跳舞、吃吃東西、喝喝酒：就像年青時去玩那麼開心）」——達叔（60多歲）

根據我們觀察，在屯門公園內娛樂的長者大多數來自草根階層。她／他們收入有限，在娛樂方面缺乏選擇空間。在屯門公園內的歌舞表演是自發組織的免費表演，因此對這群在城市邊緣生活的市民，是莫大的生活情趣。再者，觀賞者並不是被動的、靜態地在旁欣賞表演，當她／他們興之所至，便會在旁邊聞歌起舞：觀眾不只是欣賞、更要參與，融入歌舞中狂歡。這就是她／他們為何拒絕有關當局，不願意搬到正規的表演場地去在台上表演及乖乖在觀眾席上

欣賞的原因。

每天下午2時正，音樂及舞蹈的熱鬧氣氛就讓屯門公園變得充滿生氣。表演者分為不同組別，散落在各處，興致勃勃地唱歌、跳舞及玩樂器，路人也受到吸引、聚集在各個表演團體旁邊，駐足欣賞。當觀眾被表演者的歌舞所感染，往往便跟著表演者群起載歌載舞。

其中一個常客達叔，經常參與這些歌舞表演節目，並不時會自備啤酒及小吃前來公園觀看表演。他聲稱這些曲藝表演幫助他恢復生活樂趣。他說自己年輕時，也很愛唱歌、跳舞，可是現在年歲大了，經濟上不再容許他到娛樂場所消遣，屯門公園則提供了免費歌舞表演及與眾同樂的機會，大大增進了他的生活樂趣。

屯門公園的歌舞活動是本地文化的最佳模範演繹，演員是真實的市民，她／他們的目的就是自娛同時為觀眾帶來娛樂。這種行為只有純粹的社會及本土文化價值，並無經濟上的價值。因此在這樣的活動中，我們可見到人民的生活，至少還有一丁點免於淪落為「經濟的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儘管有些表演團體不會拒絕觀眾的紅包打賞）或「等同於消費」（set equal to consumption）（Friedmann, 2002:97）。屯門的例子，正反映出人類的行為習性，確實有能力去創造一些「有素質」（qualified）的地方（Lefebvre, 1996: 148），來與社會上的消費活動作出抗衡，使生命得以重獲其真實價值。

## 2. 建立社交網絡，締造身分認同

「我哋啲老人嚟得玩一日就一日啦，但求落嚟傾下講下，開開心心又一日（我們老人家可以玩一天就一天，但求來到（公園）談談天，開開心心又一天）。」——陳先生（80多歲）



「份譜（歌譜）喺我叫個仔幫我影咗份大（大字版）嘅，留咗份俾肥陳啦（我已經叫兒子幫我影印了一份歌譜給肥陳啦）！」——林太太（60多歲）

歌舞活動具有極強的凝聚力，不僅提供參與者常常見面的場合，也製造了讓參與者彼此成為朋友的極佳機會。每日下午2時只要歌舞表演開始，觀眾也會聚集起來。這些觀眾、表演者未必會知道所有參加人的名字，但在此齊歌共舞、喧嘩熱鬧的大環境中，人們很容易和周圍的人交談起來，互相交換區內的資訊情報。大家在公園朝夕相見，由此而建立起真正的街坊情誼。民眾在公園以外的場所（例如菜市場），見到在公園內碰過面的「街坊鄰居」，往往會互相交換著公園的節目資訊及意見，例如：「今天哪個團會上台表演？」，或是「你下午會到公園去嗎？」……至於不同組別的表演者，則時有交換曲譜歌詞、互相討論，或交換心得、品評各個表演。透過這些交流，表演者之間也漸漸建立友誼。

除此以外，那些積極參與歌舞活動的年長市民，不論是表演者或是觀眾，都熱衷於互相傳授曲藝、社交舞及奏樂技法。我們觀察發現，在表演之間的休息時間，觀眾群裡面有很多人（社交舞初學者）會跟著較資深的人士、在他們指導下練習舞步。

另外也有年長的音樂愛好者在公園內練習、教授中國樂器及琴鍵樂器。在執法人員未移走在中央人工湖畔那些可讓表演者放置琴鍵的石桌子之前，那裡總有一群人聚集練習樂器。據我們所知，並不是所有學員都有能力擁有私人樂器，但有部份擁有樂器的人卻慷慨地借出自己的樂器給沒有樂器的人練習。<sup>11</sup>

屯門公園完全符合實現了Brower（1996）所界定的「鄰里關係」（neighborhood）之三大特點：四處洋溢民眾交往的氣氛（ambience）、民眾

積極投入鄰里生活（engagement）及鄰里環境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選擇（choice）（1996：20）。我們觀察到，人們把這個平凡的公共環境演變成一個多姿多采的娛樂及社交生活的、充滿歡愉氣氛的地方。自發、活躍的表演者推動了觀眾共同參與活動，也由此締造了人際之間廣泛地建立起社區互助互動的關係。公園內歌舞表演節目，像磁石一樣吸聚了大量群眾，草根階層的社區就得以自然而活潑地形成。

公園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充滿意義的地方。在這裡，人們建立起對鄰里空間的熟識感（public familiarity）、對民眾鄰里的相識與相知（mutual understanding），也由此獲取了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人們為自己的生活創造了選擇及素質，同時也建造了一個可作社交、娛樂及休閒之用的空間。這個行動正好體現了Friedmann所界定的「社會空間」（Friedmann, 2002:96）。

這個空間給人們提供了她／他們對社區生活的各類型的需要。再者，這個空間對那些經常在其中活動的人來說，含藏著重要的意義。她／他們在其中，創造了生活，也創造了（屬於她／他們）的空間。換句話說：這個空間就是人們的生命／生活的表達。

由於這個地方對於歌舞活動參與者極為重要，康文署對歌舞活動不斷施加限制及監控，自然使參與者「同仇敵愾」的意識越來越強，也由此感到彼此是同屬於一共同群體。當執法者與歌舞活動參與者正面對峙及發生衝突時，她／他們更會強烈地表達對自己所屬群體的認同。據我們的觀察，她／他們對「外來人」十分敏感：當發現有陌生面孔在她／他們的「領土」（territory）範圍出現時，若這些陌生人的身份使她／他們起疑，便會通知其他人。每次與康文署的執法人對峙時，她／他們也會在短時間內群集到發生對峙衝突的地點，築起人牆來阻擋外來人拍照。如果當中有人被康文署的執法人員起訴，所有人便會一起起鬨，懇求／逼使執法人撤銷檢控及起訴。在衝突後的隔天，長者們會

細心地查閱報紙，並且聚在一起談論新聞對衝突的報導。

參與歌舞活動的長者群眾把屯門公園轉化為屬於她／他們的領土的過程，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這個公園已成為了一個「歌舞天堂」，人們以載歌載舞的行動「挪用」這個空間，並賦予這個空間全新的意義。在與執法者激烈的衝突中，長者公開捍衛著她／他們唱歌跳舞的權利，以激烈的行動強烈地表達她／他們對這個地方的歸屬感，這些行動同時也為她／他們自己的生活與及這個地方創造了新的意義及認同。

### 3. 表演歌舞，掌聲中贏取賞識與認同

「我地絕對唔係玩玩下、呃街坊，跳得好，個個讚就開心啦（我們絕對不是鬧著玩、欺騙街坊，舞跳得好，觀眾讚賞，我們就開心啦）」——玲姐（60多歲）

「唱得好自然多人睇（看）！」——仁叔（75歲）

從表演者的立場來看，圍觀人數的多寡及觀眾們對歌舞參與的狂熱度，正反映了表演素質的高低。表演者們因此都很緊張，在未演出前都會重覆排練，以求表演到最好，吸引最多的觀眾圍觀、參與歌舞。越多人圍觀，表演者們所獲得的滿足感就越大。雖然歌舞表演於下午2時才正式開始，但預約了場地的表演團體往往都會於早上10時便到達公園，開始排練。表演者們多半很嚴肅對待排練，她／他們會裝飾舞臺，調校好樂器的音調，穿上表演服飾、張燈結彩，正式採排。

其中一個歌舞表演者玲姐，強調她與拍檔的表演是很認真的，有嚴密組織的表演團體。她更指出排練的重要性。她解釋說，因為食環署的預約制度設立

了諸多關卡與限制，踏上舞臺的機會得來不易，因此，表演者都認為要為這些難得的表演機會預備到最好的狀態。

另外，表演者一致都感到備受觀眾與其他表演者讚賞，令她／他們最感自豪。因此，「唱得好自然多人觀賞」成為了表演團體成員的口頭禪。每當一曲唱罷，觀賞者熱烈鼓掌時，她／他們也會多次向觀眾鞠躬，感激觀眾讚賞。

#### 4. 嘉年華式的狂歌熱舞，高齡人士的生命歡愉與活力

「睇人唱歌跳舞，自己都開心啲，無咁孤獨（看著人們唱歌跳舞，自己都開心起來，沒有那麼孤獨）！」——滿伯（60多歲）

「我唔識呀，不過見個個跳得開心，支歌我又啱聽，大家無所謂，我又跳埋一份，好好玩，跳下當運動（我不懂跳舞的，不過看見人們都跳得開心，我又喜歡那首歌，大家無所謂，我又一起跳舞啦，很好玩呢，跳舞當運動。」——王太太（60多歲）

「大亭（露天廣場）今日輪到邊班（歌藝表演團體）唱嘢呀？（大亭）今日輪到那一團（歌藝表演團體）歌唱表演呢？」——仁叔（70多歲）

每到下午，長者們都聚集在一起享受人生。我們會見到一些長者穿上西裝，有些會穿上60年代流行的服飾，有些舞者會穿上民族服飾，很多看上去已是中年以上的女士更會化妝。伴奏者奏樂、歌者唱、舞者跳，而觀眾就陶醉於這音樂的氣氛裡。有些活躍的長者，會隨著音樂拍掌及舞動身體。由於表演者與觀眾間沒有明確的分界線；當表演者唱歌跳舞時，會邀請觀眾一起參與，觀眾們會一圈圈地圍著舞臺一起唱歌跳舞。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是曲藝表演的活

躍分子，我們見過一位80歲以上的長者，她每天都上臺邊唱歌邊跳舞。而每次表演完畢都獲得熱烈的掌聲，觀眾更經常以高呼來表達他們的興奮。

市民如何在屯門公園中享受歌舞活動的樂趣，正好生動地實踐出巴赫汀（Bakhtin）所形容的「嘉年華會」經驗：「嘉年華會的狂熱氣氛並非經過有意組織所產生，或坦白而言，嘉年華不是一種表演；參與嘉年華會的人們往往是身心整體投入在其中，參與者隨著嘉年華的節奏而溶入其中活動，這即是說，參與者是活在嘉年華的生命中。」（節錄自Zappen, James P., 1996: 73）。

根據一份媒體報導<sup>12</sup>，屯門公園內的年長男士，是一班中年女歌者的狂熱愛好者；這家媒體用蔑視的語氣說明，形容這班中年女歌者們人長得「胖」但又要穿「迷你裙」及「緊身衣服」。這報導稱這些年長男士為「阿伯」，聲稱他們與女歌者調情，以暗示這群長者的男女關係紊亂；而這些女歌者與男長者聊天是為了騙取他們的金錢。同份報導中也記錄了某日康文署執法人員為制止表演（由於有歌者違規使用了揚聲器來唱歌）引發衝突事件，惹來超過200位年長人士向工作人員大聲叫囂。據報導所稱，有長者更試圖推撞工作人員。當執法人員在衝突結束、離開現場之後，一名女歌者立即用揚聲器向大家宣佈：「大家都睇到我哋俾人打壓，唔緊要，我哋一齊勇敢向前，好似呢首歌咁：『漫步人生路』（大家都看到我們受人打壓，不要緊，我們一齊勇敢向前，就好像這首歌的名字：『漫步人生路』）！」接著，該被報導稱為「體態豐盈」的女人就開始舞動身體高聲歌唱，一大班男長者就圍著她，熱烈地鼓掌。

陳議員在我們對陳雲生議員的訪問中，表示對草根基層長者需要免費娛樂是無可厚非的，他其實也十分諒解，但他對於眾人混集的場面中出現不正當的活動卻不能苟同。他承認在公園裡群集了那麼大量的「阿伯」，（女）性工作者出現是在所難免的<sup>13</sup>。

由我們所收集的數據中，我們發現屯門公園的曲藝表演具有很多「巴赫汀嘉年華會中出現的踰越（常規的）經驗的特質」（transgressive featur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Bakhtinian carnival, Darren Webb, 2005），我們將這些特徵及屯門公園內的歌舞現象，製作了以下列表，以作比較：

Bakhtin 界定的「嘉年華式踰越性經驗的特質」	屯門公園內的歌舞現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嘉年華會的狂歡氣氛中，人際間之階級的差別及距離會被暫時擱置，由此，所有人都變成平等」。（Bakhtin, 1984: 15,10）</li> <li>● 在嘉年華會中，所謂日常生活要嚴守的種種社會倫理規範會被暫時擱置，由此，人們都盡情去享自由、直接與其他人溝通及融和的節日氣氛。（Bakhtin, 1984: 15,16）</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所有人，無分社會階級背景、年齡大小，都投入去享受歌舞活動，當他們受到氣氛所感染，興之所至就會一起唱歌跳舞。</li> <li>● 人們可隨意跟著大隊學習跳舞；在別の場合碰到其他歌舞常客，又會以公園的節目為題攀談起來。</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嘉年華會舉行期間，人們的生活暫時不會依從社會既定的空間及時間的規範與秩序，在嘉年華會中，人們會用自己的方式來組織其生活規律。（Bakhtin, 1984: 255）</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歌舞活動參與者將公園的空間自行重新組織成為一個表演及觀賞的場地；又用揚聲器來高歌。欣賞者興之所至，又會狂歌熱舞。</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嘉年華會中，所有正規的行為守則、既定的秩序和社會公認的，要共同遵守的律則／真理都被擱置。（Bakhtin, 1984: 10,11）</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歌舞活動中，人人都參與狂歌熱舞，無所謂誰是表演者、誰是觀眾。</li> <li>● 長者參與狂歌熱舞，又與異性打情罵俏，顛覆了社會上視長者為「老弱傷殘、毫無生命力的人」這固有形象。</li> <li>● 參與狂歌熱舞的長者藉由唱歌跳舞解放身體，將自己的能量及欲望釋放出來。</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嘉年華會中，個人的「自我」被融化在群體的狂歡中：個體感到她／他是集體中的不能被分解開的分子。（Bakhtin, 1984: 255）</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參與狂歌熱舞的長者享受一大群人在一起狂歌熱舞，也不會顧及年齡形象，女的化妝、穿上漂亮的衣服、又唱又跳；男的長者更與女歌者們打情罵俏。</li> </ul>

Estes, Biggs, and Philipson (2003)，在他們的文章〈Social theory, social policy and ageing〉<sup>14</sup>中提出，社會對長者（尤其是那些屬於草根階層的一群）形成之固有形象，就是「在寒酸的貧民區中一排排地呆坐的老人」。作者們引用Tulle-Winton的文章，批判性地指出現代社會中有關「高齡」的觀點，皆是來自醫學或科技界別，認定人（作為生物）到了老年，身體就會機能衰退，百病叢生。一個老年的身體就是一個（動物）生命末段、面臨衰亡的「無用的身體」（Estes et al., 2003: 38）。然而，在屯門公園內狂歌熱舞的長者們，完全和這個極端負面的概念相反，她／他們每天都充滿精力，表達生命的歡愉並釋放慾力的能量。載歌載舞的長者顛覆了主流對高齡的那些負面觀念及社會對年長人士不明言的行為規範。上述的新聞報導充滿歧視的語句，斥罵毀謗那些「垂垂老矣」的男長者與中年發胖女性，互相打情罵俏，狂歌共舞。縱然充滿貶斥的意涵，但是卻也證明了社會對長者違反既定行為規範的不安：那些年長男士的「前衛行為」，著實顛覆了社會傳統以「無能的身體」來加諸在年長者身上的固有形象。

Leposky及 Fraser (2002) 以「實演的行動」(performative act) 來重新定義市民的身份／權利 (citizenship)。兩位學者認為，「實演的行動」真正就是行動者進行「空間的生產」之過程中具體實現了其公民的身份及權利 (2002: 128)。從這觀點出發，我們看到把透過狂歌熱舞的身體來把屯門公園轉化為「歌舞天堂」及 (Friedmann所界定的)「生活空間」的長者，其實真正就是以具體行動來進行地方創造 (place-making)，也重新提出人們在城市生活的權利。

## 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藉著屯門公園之個案，把草根階層在城市邊緣的新市鎮爭取生活空間的過程及真相掀開來；我們意圖理解這些歌舞活動，如何成為參與者（表演者及觀眾）持續的空間製造力量，以及建立屬於其群體的社區行為。在本文中，我們首先把香港的城市環境以Friedmann所提出的「核心—邊緣」模式（Core-periphery Model）以及「生活空間與經濟空間」（Life Space and Economic Space Model）理論模式作為視點進行分析。這兩個理論模式有助我們揭示香港政府如何以經濟為主導權力去將城市的草根階層擠壓到城市的邊緣。同時，當一群處於經濟生產力弱勢的民眾，意圖爭取他們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時，政府與大眾媒體便以霸權視野（hegemonic perspective）製造的歧視性的言論將她／他們貶斥為一群應該被「淨化」（sanitized）的「噪音製造者」、「刁民」。再者，我們力圖把研究所發現的，即屯門公園長者「空間的實踐」，放在巴赫汀建構（Bakhtinian sense）之「嘉年華經驗」（carnavalesque）的論點上作出詮釋。

總括而言，屯門公園的個案，是人民與當權者在爭持生活空間產生之矛盾及鬥爭的典型例子。

人民與當權者這兩個對立面都各有其對「公共」及「公共空間」的理解及詮釋，兩者的理解及詮釋通常都是互不相容的。在屯門公園中活動的長者將這個地方以極其動感的方法轉化而成一個「鄰里空間」，並在其中，樂趣無窮的生活得以體現出來。長者們創造了一個容許她／他們表達生命活力的空間；儘管她／他們的表達，有時變得放縱、甚至包含了色情的成份。但是卻正因如此，長者們能夠以行動顛覆了或反駁了一般人，甚至政府對「老年人」既存的負面看法及觀點。屯門公園的歌舞長者身處於城市的邊緣，又屬於草根階層，當權者對她／他們的「打壓」及「排斥」，似乎不會引起太多大眾的關注。但



是她／他們強硬地堅持著唱歌跳舞的行動，反而迫使整個社會不得不對她／他們的活動產生討論。

與歌舞長者立場相反，政府與及媒體卻共同認為公共空間必定是一個有秩序的空間，在公共空間中發生的所有活動——甚至不管是娛樂或是休閒活動，都要在執法者的監控下有秩序地舉行（Mitchell, 1995：125）。政府將屯門公園內的歌舞活動歸類／定義為「滋擾性的噪音」，並且強調大量群眾混集，致使不法勾當在其中滋生，政府由此獲得了合法理據，成立了各項措施以阻止它繼續發生。

屯門公園內頻生的對峙及衝突事件，促使我們將討論的焦點放在「公共空間」之上，並由此基礎反省該如何對公共空間在社會及文化的脈絡中作出適當的定位。

當權者的意識型態，不單壓制了人們對「公共空間」及「鄰里空間」的另類實踐，更監控著人們對「藝術」及「文化」的理解。接下來我們將本文以兩方面總結：長者創造的城市新意義，以及官辦藝術的矛盾與暴力。

## 1. 長者歌舞活動創造了城市新意義

Lepofsky & Fraser指出，城市的文化意義，就是政府與民眾從對「城市是甚麼意思？」與「城市是為誰而建？」這些問題的激辯中產生。有時激辯的形式會具體化成為空間的鬥爭行動，而空間的鬥爭更會具體化為「地方（類型及意義的）創造」（place-making）之過程的鬥爭（2003：129）。兩位學者認為，這種文化鬥爭會集中於人們對「種族」、「性別」、「階級」及「性取向」等概念範疇的詮釋之不同、對立的情況中產生。然而，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發現「年齡」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範疇，其中也會激發出Lepofsky &

Fraser所言「文化—空間—地方創造」之對立詮釋乃至於鬥爭。

在屯門公園歌舞的長者自發地建造了她／他們的社區，並且將「社區」還原到「社區就是人們自然而然地社交互動的基地」的本質意義（Lepofsky & Fraser, 2003：133）。她／他們沒有受到任何組織的指導或指使，以具體的行動實證了其創造及發展社區空間的潛能，更透過實際行為演繹她／他們在都市空間生活的權利，也建立屬於她／他們的鄰里空間。

在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活躍高齡」（active ageing）。世衛將「活躍」解釋為人生在世正是持續地對社會、經濟、文化、精神及公共事務延續及積極的參與（WHO, 2002：12），並同時認為社會應該給年長人士提供足夠的機會及支援，讓她／他們可以獨立自主地過生活；人們在不同年齡階段，也應該有能力維持健康身體，人際關係及精神上保持良好狀態，並且人們應該在社會人際之間——即家人親戚、朋友、鄰里民眾或同事的環境中頤養天年。

由此觀點來看，在屯門公園群起載歌載舞的長者們，不是已經身體力行地實現了世衛所企圖在世界推廣的「活躍高齡」的理想嗎？

長者強力要求能繼續在屯門公園的公共空間自由自在地唱歌跳舞，促成了她／他們對「年長」（ageing）的主流概念的抗爭。她／他們以行動證明了高齡人士也是具有創造力的能動者，即能製造出嶄新的意義及在生命中引發驚喜（Pile, 1996：47）。當歌舞活動一旦舉行，鼓樂喧天，人們便不顧年齡身份形象，放縱地舞動身體、引吭高歌。屯門公園因此也失去了應有規矩、紀律、寧靜、一致性和方向性。公園使用者這種放縱行為，自然被當權者視為不可接受的「失控」和「缺德」行為。

若我們以Lefebvre的「空間實踐」理論去詮釋屯門公園的嘉年華式經驗，我們發覺這「失控」的情形，正好將人們的觀念與身體，從社會當權的主流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換言之，這正是將空間「色情化」（erotized）的力量。這種力量使得長者們充份享受到「肉感」的歡愉。Lefebvre指出，若我們以音樂或（跟主流價值系統有異的）多元價值系統去轉化空間，空間就有可能變成充滿色情的寓意，也呈現了某種多重意義模糊的狀況，由此，它成為欲望和需求的誕生地（1974：91）。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香港政府完全體察不到屯門公園的長者們所創造的社會及文化意義及影響。政府並沒有以友善及諒解的態度，去和這群長者正面溝通如何在聲浪不過份騷擾鄰近居民的情況下，繼續進行這極有益處及意義的活動。相反的，人們赤裸裸所經驗到的只有當權者及執法機構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壓制這群手無寸鐵、只求歌舞娛樂的人。

在屯門公園的案例中，我們深深的體會到香港政府如何對社會上邊緣社群的忽視及歧視，同時，只以中產階層的立場及單純考慮空間的經濟效益來判定空間的使用方法，也強權地監控公共空間成為嚴守規律的地方。

我們發覺，政府禁止那些歌舞活動並不是單純地為了打壓「噪音滋擾」。當權者基本上是為了赤裸裸地彰顯其權力，同時也企圖將其認定為「年紀大」的人那種放縱的——傷風敗德的——欲望嚴加禁制。

## 2. 官辦藝術的矛盾與暴力

全球進步的城市，近年都流行推廣文化藝術來重建市中心、美化市容及增添城市的氣氛。香港當然在推廣文化藝術項目上亦不甘落後。香港政府於2003年在文化藝術政策報告中，即有以下宣言：

文化就是生活，藝術就是生活的方式。我們希望香港市民能以歡愉的心情體驗不同藝術，以欣賞的態度接觸不同文化，以開放的胸襟看待不同社群。這樣，香港的文化發展一定生機無限。（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2003）

在2008－2009施政報告中，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曾蔭權強調要「向社會推廣文化活動，開拓文化消費市場」及承諾「鼓勵文化演藝團體到全港各區演出，將文化活動帶入社區」。

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很明顯是以經濟增益為最終目的：文化是一種「策略」，即為城市建立「品牌」，以吸引旅客及投資的手段<sup>15</sup>。建在市中心的西九龍文化區，正是一個創新的景點。而那些被政府欽點的文化節目／項目（例如每年的香港藝術節），則是用以吸引外來旅客以及本土消費者的（文化）商品。若我們用政府的立場來看屯門這個案，便很容易明白那些公園內的歌舞活動為何被定性為「噪音滋擾」：文化必須要帶來經濟、投資、國際名氣為效益，民眾只能在被控制的情況下，安安靜靜聽話地付費扮演觀眾——即文化商品消費者的角色。但是，屯門公園內的「老年人載歌載舞」，只是鄰里民眾娛己娛人的免費活動，喧嘩嘈吵，完全不能被宣傳為「文化盛事」以廣招旅客觀賞，既然受到鄰近居民投訴，當然要馬上立令禁絕。

康文署是禁制及懲處屯門公園內載歌載舞的老年人們的執法單位，但是很荒謬地，這個單位卻同樣負有推廣香港藝術及文化的任務。2009年冬天政府民政事務局舉辦了的第一屆「藝綻@冬日」大型藝術活動。據報導，此次活動「民政事務局耗費300萬港幣邀請本港四間大學藝術學系，為4個公園設計藝術裝置品，引入藝術氣息」。據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所言，此舉目的是「將藝術帶入社區，同時亦讓市民更貼近藝術」（見民政事務局網頁）。政府更大舉宣傳這件盛事，廣邀全港市民尤其是中小學生到這4個公園參觀；屯門公園即



重重鐵欄圍繞着的公園人工湖心之藝術品：  
「公園不可思議事件簿——沉船」——2009年  
大型藝術活動「藝綻@冬日」在屯門公園其中  
一個展品

為其中一個公園。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的學生在屯門公園各處放上「戲劇性的裝置藝術品」，其中一件裝置在公園的人工湖中之藝術品，名為：「公園不可思議事件簿——沉船」（incomprehensible event—sinking boat）。

這個觀景不尋常之處，不在藝術品本身，而在於周邊被鐵欄重重包圍的人工湖。這是源於2007年9月26日，在一次執法者與歌舞活動參與人士（表演者及觀賞者）對峙的過程中，一位中年男子跳進湖中以示抗議<sup>16</sup>。自此之後，人工湖便被鐵欄重重圍著。然而在此次「藝綻@冬日」的盛會中，一件藝術品「合法地」裝置在湖中。

「合法」之藝術品代替了「違法」的抗議人士。亦即是說，政府以赤裸裸的權力，讓「合法的」藝術品佔據了「不合法的」抗議人士的位置。這現象讓我們更明白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的霸權：所謂藝術，本來是人們對生活／生命的喜悅的戲劇性表達方法（Lefebvre, 1966：148, 157），但在政府眼中，藝術或文化，卻只有作為旅客的消費對象的價值。

McCarthy (2006) 指出，公共藝術實踐目的最主要是推廣、增進市民的社區凝聚力，社群網絡的發展及人們對鄰里環境的歸屬感。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及弱勢社群的聚合，極需要活在公共空間中，當人們主動積極地與民眾互動，參與群體藝術創造時，社區的人氣及活力也會同時衍生。McCarthy 這個對「公共藝術」的定義，正好用來形容屯門公園的歌舞活動。然而，我們見到政府當局對這個實踐的回應，僅是禁制與打壓。同時，更荒謬及諷刺的，就是政府耗費資源將外來的藝術品移進公園裡裝置，並招徠外來的觀眾到屯門公園欣賞，但卻同時間阻止著在地民眾屬於舉行她／他們文化藝術活動：唱歌跳舞。

在這種充滿矛盾及衝突的狀況中，「藝術」變成了霸權：合法的藝術將本地居民在其生活的地方，表達／表現屬於她／他們的藝術的權利，活生生地剝奪了。

陳雲生議員在訪問結束時，總結了構成屯門公園的官民糾紛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一直不成立完善的地區文化政策，也因此，屯門公園的官民對峙雙方欠缺了指引及平台，來作相互調解，並尋出雙贏的方案（即容許歌舞活動以本來方式繼續進行，但同時又不曾發出過高聲浪滋擾附近居民）。陳議員曾經提議過將屯門區內眾多已近乎荒廢的工廠大廈改建為歌舞活動場地，並作完善管理，好讓長者繼續唱下去舞下去；但是這個方案卻不為政府接納——然而，很諷刺地，在另一方面，政府卻推行「活化工廈」的政策，香港藝術發展局明言鼓勵並關注在工廈中發展的創意工業<sup>17</sup>。

香港拚力成為一個在全球化環境中的主要先進都市，然而，對於整體社會的治理，香港政府只奉行經濟發展主義／增長主義，僅考慮經濟效益的增長。在城市空間的管治方面，政府所推行的，正是由上而下的城市規畫，以規範與監控為主要策略。屯門公園的個案讓我們理解到香港對於社會及文化多元發展方面的貧乏及限制。在公共空間、鄰里空間、社區營造及發展、高齡化、以及

文化與藝術的各個課題方面的開放性與民主發展，香港仍然是極之落後的。

雖然亞洲城市的經濟發展異常高速，但Rowe對它們的評價並不正面，他認為「眾多亞洲城市，像樣的公民社會還是鮮見。」（2005：31）

見微知著，以屯門公園觀香港，很不幸，我們還是不得不同意Rowe的負面觀點。

香港政府執法者與歌舞活動參與者之間的衝突	
2005年5月	一對印尼籍夫婦，因為使用揚聲器演唱印尼及西藏民謠，被康文署執法者指控超出噪音分貝限制。
2006年2月	康文署阻止節目表演，康文署執法者及群眾雙方互相指罵，場面一遍混亂。
2006年5月	康文署執法者在公園阻止曲藝表演，驅趕聚集之歌舞活動群眾，兩百多名街坊起哄及四散。其中一名72歲男子被執法者追趕墜地，後送醫院不治。
2007年9月	一名54歲中年人跳入公園的水池，並高聲說：「我會洗定屁股來坐監。」
2009年2月	警察意圖阻止在節目表演中使用揚聲器，超過兩百名人士群集起起，高聲指罵警察。
2009年4月	一名男士被逮捕及被以法律指控他使用揚聲器和用手推車來運送樂器，引發他激動暈倒。

## 注釋

- 1: 「屯門公園唱歌又傳警民衝突」, 東方日報, 2009年4月13日; 「屯門曲藝社成員遭幹預推撞間踭量400街坊群情洶湧圍康文署」, 蘋果日報, 2009年4月13日。
- 2: 「嚴打公園唱歌噪音」, 蘋果日報, 2009年4月13日。
- 3: Friedmann闡明了「生活空間」及「經濟空間」之分別及對立性: 「有兩個地理學概念共同構成了一個對立統一體, 我將它們稱為生活空間 (life space) 和經濟空間 (economic space)。」有關經濟空間, Friedmann視之為全由經濟資本在其中象地運行的空間。在這空間內, 商品、資本、勞動人口及資訊持續地運行, 經濟由此而維持其發展。至於空間本身, 由於各類資源及資本的流聚樣態, 成為(整個空間系統中的)交匯點 (linkage) 或聯繫點 (nodes), 而不是具獨立特質的地方。至於生活空間, 可被看成生活的舞臺, 人們在其中, 自然而然地實踐着具體的生活及成就其意義。生活空間本身, 由於人的活動而成立了具體範圍, 例如: 屬於在地居住的坊眾的鄰里空間, 這個空間提供了個人或社區之日常生活必需設施、服務或物品。人們在其中過着具體並且有內容的生活。儘管生活空間和經濟空間二者對現代社會的運行都是不可或缺, 但它們具有本質上的衝突: 在上兩個世紀, 經濟空間一直在顛覆、入侵和分解着個人和社會的生活空間。Friedmann對生活空間之分析, 使我們理解到屯門公園對在其中進行歌舞活動之長者的意義。
- 4: 請參閱本章第3-4節: 「嘉年華式的狂歡熱舞、高齡人仕的生命歡愉與活力」有關「嘉年華式」經驗 (carnavalesque) 的詳細分析。
- 5: Leung (1986: 277) 指出: 香港新市鎮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以基建 (infrastructure) 為先鋒部隊領導開發; 反而是先建公共屋邨 (即讓人口密集——為公共交通系統儲夠乘客量), 才開發基建。
- 6: 屯門是香港其中一個早期發展的新市鎮。在開拓後, 它覆蓋面積為2,200公頃土地, 坐落於新界的西北部, 離商業市中心 (如尖沙咀) 約22.5公里。於2006年, 人口約有502,035, 是香港總人口的7.3%。這裡有12座公共屋邨。根據2006年的人口普查報告, 屯門居民平均總收入為HK\$15,000, 與香港其他地區比較, 是比較低收入的地區 (香港島: HK\$23,000, 九龍: HK\$15,035, 新界: HK\$17,000)。而老化也是這地區的另一大特徵, 其中65歲以上人口佔了總人口的8.8%。
- 7: 引自「歌女涼水祿招玩殘康文署」, 壹週刊, 第988期, 2009年2月12日。
- 8: 根據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於2006年6月4日在香港立法會的報告, 於2004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接獲89宗投訴。於2005年投訴宗數升至205宗。從2005年11月至2006年2月期間投訴宗數升至418宗。
- 9: 陳議員告訴我們, 監視錄影器的設立, 有部份原因是用以監控公園內非法的未完稅香煙買賣及實淫活動。
- 10: Markova (引自Toomela, 2003: 127) 指出, 巴赫汀認為嘉年華狂歡節慶可被詮釋為從日常生活種種規條、秩序及約束放出來的經驗。在嘉年華氣氛中, 平民大眾透過嘲諷及狂歡, 除了將日常生活規條、秩序及約束隨意嘲笑、通過否定及顛覆, 進一步更 (藉此非常狀態) 表露出想像力及創造力……。巴赫汀以中古時期的法國嘉年華狂歡節慶的研究, 詮釋狂笑 (laughter) 乃是從神聖、禁制、過去傳統及權力解放出來的力量。巴赫汀明言: 「嘉年華狂歡中爆發的狂笑, 成立了自身的世界, 正面地跟正規 (official) 世界對着幹……」。
- 11: 於2007年6月26日, 在一次官、警與民眾對峙衝突的事件中, 一名男子跳進人工湖抗議。從此以後, 有關當局便把人工湖用鐵欄重重圍住, 也禁止了湖畔的樂器練習活動。
- 12: 「歌女涼水祿招玩殘康文署」, 壹週刊, 第988期, 2009年2月12日。
- 13: 在訪問中, 陳議員應該是為表言辭含蓄, 多次以「北孺」來指涉在屯門公園出沒的(女)性工作者, 在此, 我們意會到陳議員所指是那些(女)性工作者是來自中國的中年婦女, 這個稱號其實暗指屯門公園聚集的年長男人沒有財力及能力召用本地的年青的(女)性工作者。
- 14: 中譯(社會理論, 社會政策及老化)。
- 15: 全球管理諮詢公司科爾尼公司、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以及《外交政策》雜誌聯合推出的2010年全球城市指數排名, 香港名列第5, 這個排名乃是根據5個方向25個指標來計算排名高低。其中之第4個方向乃是計算在城市中人們所能獲得的「文化經驗」之多寡。但這裏所言的文化「經驗」, 是以城中來自外國的國際性住客及旅客之經驗為依歸。同時, 所言的「文化」之內容及標準, 是以這城市所能提供的大形體育、文藝娛樂表演的數量、重要表演場館的數量、供應各式各樣佳餚美食的去處數量, 以及和姊妹城市的親善關係來計算的。(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8/18/global\_cities\_index\_methodology 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 相信很大程度是以此「城市文化經驗」排名榜為主要參考。
- 16: 參考香港蘋果日報2007年9月27日報導圖片。
- 17: 在2010年2月20日香港藝術發展局發佈了以《藝發局關注「活化工廈政策」》為標題的 <http://www.hkadc.org.hk/tc/content/web.do?page=press> 新聞公佈: 「近年有不少藝術家及藝團, 都會選擇工廠大廈作為工作/排練室, 進行藝術創作和活動, 香港藝術發展局…認為這對本地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的發展會有裨益…藝發局對於近日政府提出的「活化工廈政策」可能會對文化藝術界帶來影響, 表示關注。藝發局會積極收集藝文界對「活化工廈政策」的意見, 並會向負責文化藝術、土地政策、創意產業的政府部門…反映。」新聞公佈所言提及之影響, 最主要是「活化工廈」的政策推出後, 所引致的工廠大廈單位租金上升的影響。



第2部  
城市空間文化研究個案篇

上海

# 引言： 文化創意之城？邁向全球化之城？ ——上海發展的迷思、虛擬與真實

為了要對上海的城市文化作有根據及基礎的詮釋，讓我們首先簡單陳述上海自80年代政策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政策發展。

於2009年出版的《Shanghai Rising: State Power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in a Global Megacity》，編者Xiangming Chen談及該書結集的主旨，主要是為理解上海作為一個邁向全球化城市的各種特徵及因素，以及認清那些導致上海走向全球化的強大勢力（2009：237）。導論中，「上海高速轉化為全球化城市」或相類似的語句，單在第20頁，就出現了5、6次之多。除了介紹本書收編的各文章內容之外，此導論文幾乎一面倒地強調上海如何高速地轉變為一個全球化城市。

由於Sakia Sassen（1991）是研究全球化城市的「鼻祖」，相信是為了增加此書的權威性，這本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是由Sassen執筆。編者的導論（及結論），每每提及Sassen所訂立的全球化城市的標準；書中並提出很多數據，證明上海在各方面的發展，都一一符合了全球化城市的特質：例如越來越多跨國

公司的地區總部從新加坡或香港等地遷移到上海、大量資金投資進大型基礎建設、傳統的工業例如紡織業走向式微之同時，在浦東開設了很多高科技工業、外國的科研發展機構紛紛進駐上海、服務性行業在上海蓬勃發展……等，作者對全球化城市的理解，委實充滿進步主義的思維及價值取向。

在該書結論中，Xiangming Chen及Anthony Orum一再依據Sassen的標準，列舉了上海的發展趨勢中，所顯示符合此標準之特徵，以證明上海是如假包換的邁向全球化。然而，在以一連串的經濟發展數據，勾劃出上海邁向全球化之圖像的同時，是否如實地展示了上海城市發展的情況？我們參考其他的研究，發現除了經濟發展之外，在社會民生、人們生活素質之提昇、以及文化發展方面，上海的發展，還是有很多有待討論之處。

在其他有關上海近期發展的文獻，讓我們得以掌握較客觀及批判性的論述。例如Peter Rowe（2004）所著〈Privation to Prominence: Shanghai's Recent Rapid Resurgence〉一文，正好針對上海城市近30年的發展，以批判的角度作歷史性的展述。

在1980至1990年間，上海政府大力振興經濟發展，全面發展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其中包括：整頓國有企業及鼓勵私人企業營運，同時也把房地產商業化。1985年，國務院指示上海政府執行「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彙報提綱」，力求把上海建成開放型、多功能、產業結構合理、科學技術先進、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1985至1988年江澤民擔任上海市長期間，則在經濟發展以外，強調上海城市的整體規畫，促成中央政府在1986年審批「上海市城市總規畫方案」，正式確立上海城市整體的發展方向。

在1987年，朱鎔基成為上海市長後，大力遊說中央政府，把發展重點投資在那些已存在的並有發展潛力的經濟領域，作為吸引及刺激經濟繼續發展的

手段，且期望以此吸引外資。

而1991年，黃菊任上海市長時，則特別強調深化企業改革，提出鼓勵企業開發新產品、支持企業加快技術改造、推動企業上市和合併、發展企業集團、進一步落實企業自主權和減輕企業負擔等政策措施，使國有企業逐步走出困境。另外，他以浦東新區開發開放為契機，積極推進上海對內對外開放，實現領導人鄧小平對上海提出「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要求。

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於1986年被中央政府審批通過的「上海城市總體規畫方案」，在1995年作重新訂定，決定上海發展的重要方向。根據Rowe（2004）的描述，此新方案可總括為以下數點：

首先，上海被肯定為「面向世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都市」，它的重建主題，是要成為一個揉合先進科學及技術的多功能城市。第二，將上海城和周邊的衛星城市及鄉郊有系統地進行相配合的發展及聯繫，以杜絕城市雜亂無章地延伸；第三，都市內不同地區功能要配合相符的經濟原則並作有效的分散；第四，希望能持續自清代開始上海作為首批開放通商口岸的傳統優勢，來創造特別經濟區域以吸引外資；第五，把浦東發展為以出口為主導的多功能新區，以保持上海作為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城市；第六，積極發展上海市中心之二元功能：這即是說，將上海建造成為本土產品及服務的展場，同時也是聚焦吸引外資的地區；第七，城市重建發展，不單是建造將來，同時也是尊重歷史的重建發展過程。

Rowe（2004）很清楚地指出，上海的重建發展，主要重點放在「先進科學及技術」及多功能發展（例如：促進第三產業之發展）之上。在此大前題下，基礎建設及房地產的開發自然是走在最前端。在基礎建設發展方面，上海與周邊的城市如南京及杭州等，以緊密的鐵路及公路網連繫起來；同時，

1999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正式通航，標誌著上海成為中國第一個擁有兩大國際機場的城市，2007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貨運排名更躍升為全球第6位<sup>1</sup>。現代化的市內大眾運輸交通網絡也於1995年興建，在2003年已經有3條總長達到80公里的地下鐵路投入服務，預計在交通的系統改善工程完成後，在2020年，上海城市軌道交通網絡（包括地鐵、輕軌和市郊鐵路）將有17條線路貫通上海及市郊地區。

在此過程中，市政府更配合中央的政策，實質地鼓勵企業放棄再也沒有收益的舊工業及垂死的國營企業，這亦同時強化了上海被重新定位為未來的世界性經濟都會的方向。由於改革開放，上海於浦西的重建、浦東的開發，都引來了大量的外國資金投入房地產發展：這使得自80年代開始，上海的城市景觀經歷了戲劇性的改變；摩天大樓一幢接一幢地以高速興建起來。正如所有發展中的城市一樣，政府都熱衷於在市中心區建立超高層大樓，因為眾多發展中的城市，仍一致公認超高層大樓是「現代化」的最直接及最明顯的象徵物。

然而，Rowe（2004）的評論，卻指出由於上海政府有關當局並沒有對上海的城市景觀作出適當的管理，於是上海的摩天大樓，並不是有系統有秩序有規畫地在上海市建立起來，反而是如雨後春筍般，在所有地方雜亂無章地建造。由此，不同形狀、不同顏色及質料、不同風格的高樓在上海市「叢生」。Rowe很嚴苛地用了cacophony（不和諧、不調和）及highly variegated outward expression（高度雜亂的外貌）來形容上海城市的景觀。

他指出，在民生方面，重建其實迫使上海市民付出了很大代價。由於上海市中心，尤其是浦西地段進行了翻天覆地的重建，使很多本來住在市中心的市民都要搬到較遠的市區邊緣去。動遷之後，以往擠迫的生活空間的確大大改善了。但在新的住區，卻要承受從住區回到市中心工作的冗長交通時間，及較昂貴交通費的困難。另一方面，因為浦東要發展為現代化城市，政府對一貫

在那裡耕作的農民進行農地徵收。農民雖然獲得了金錢上的合理補償，但卻要重新適應新的生活方式。Rowe認為，慣常、熟識的生活方式的喪失，並不是那麼容易適應。在這點上，政府也要進行大量的教育、社區及職業輔導工作，去為農民提供支援，好讓他們重新生活。他強調，這項工程並不輕鬆，因為在Rowe文章出版之時（2004年），在浦東將要發展的空間範圍內耕種的農民，至少也還有30萬人。

由小鎮到農地遷拆移平得來的浦東，雖然超高層大廈林立，充滿未來主義、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也有很多評論察覺到，那並不是一個人可以生活的地方。在Rowe（2004）的眼中，那100英碼寬、8條行車線的世紀大道，兩旁矗立地一幢又一幢的超高層大廈，的確是很宏偉，然而，在寬敞的街道地面上，卻連一個賣報紙的攤子也找不到，咖啡店更不用說了。他於是引用了JWT（J Walter Thompson）廣告公司的大中華總裁Tom Doctoroff來對浦東的環境作出的慨嘆：「這個區域正是『可生活環境設計』概念的失敗之作！」

另一邊，上海除了市中心不斷重建舊城及建造新空間，周遭的郊區也隨之動起來。根據薛求理（2009）的報導，在2001年，上海市政府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上海市促進城鎮發展的試點意見》<sup>2</sup>的指引，在郊區開始建造「一城九鎮」（納入「一城九鎮」的十個城鎮是：松江新城和安亭、羅店、朱家角、楓涇、浦江、高橋、周浦、奉城、堡鎮）。

據 Frederik Balfour 在其刊於 2007年2月19日 *Business Week* 的文章〈Shanghai Rising: China struggles to build a livable city inside a world-class business capital〉<sup>3</sup>中，描述了「一城九鎮」的構想，那是一個規畫成為自給自足的小型城市空間，居民無論在工作、休閒娛樂的需求，都可以在居住的區域內獲得。這些新市鎮物業所針對的目標（Targeted）買家、居民，就是那些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他們搬來這裡居住的原因，可能是基於市中心重建的關

係，要紛紛搬離市區，另尋新的居所。但是，這項計畫卻招來許多評論者的反省及批判。據Balfour（2007）的簡述，這些衛星城市的設計，竟奇怪地以外國各民族的城鎮樣貌「依樣畫葫蘆」：如意大利式、德國式、英國式……等等。

儘管在初期，一些中國的專家認為一城九鎮的主導理念是「針對千城一面和缺乏總體規畫的現象」（戴曉玲，2008：92）和「引入國際的先進設計理念，提高城鎮規畫的起點與水準」（孫田、劉群，2001：38），同時，上海市政府更以「借腦建設萬國城鎮」來肯定及大肆宣傳一城九鎮的理念；然而這完全不能解釋，為何位在上海一邊的松江所建起之稱為「泰晤士小鎮」（Thames Town）的仿英式村莊，竟然內置有英國道地的紅色的電話亭，還有一座邱吉爾的立像！

Balfour（2007）很明顯是帶著嘲諷的口吻來描述「一城九鎮」這項建設——他借了Benjamin Wood的說話來總結：「這真滑稽……你為甚麼在假扮一種幻想國度中的生活？」

從不同的資料顯示，中國的文化界學術界其實自一開始便對此「一城九鎮」計畫提出質疑甚至反對。根據戴曉玲的報導，上海同濟大學建築與規畫學院教授張松早於2001年便指出，「一城九鎮」（除朱家角外）計畫過於簡單地模仿異域風格，出發點是想一步到位地創造出自己的個性，但在落實情況上卻出現了忽略文化根基的弊病。戴曉玲在2008年仍然持續批評「一城九鎮」（除朱家角外）捨近求遠的做法——即捨棄中國本土風格和當地的歷史文脈而（表面地）抄襲歐式小鎮建造風格。

而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講師薛求理，身體力行地走訪了這等小鎮。他直接地批評這個計畫其實是「浪費」：

筆者近4年來走訪了多個小鎮，從旅遊角度看，「一城九鎮」確實形象豐富多彩。這裡的房價也在逐步上升。大部分的住宅單位好像賣出去了，卻少有人真正入住。這些落成兩、三年的小鎮，幾乎所有的店面都無人經營，原先設想的沿河沿街咖啡館、街角小店、教堂一律大門緊閉。從一般規畫常識看，即使內裡的住宅住滿人，恐怕也消化或供養不了那麼多的商店。走在這些美侖美奐的小鎮，恍如踏入死城。小鎮的所在地，都是原有舊城鎮附近的高產農地和菜地，被開拓成道路、水網、草地、噴水池和各種房屋，卻沒有真正容納任何人的正常生活，實在是浪費。<sup>4</sup>

戴曉玲（2008）和薛求理（2009）都看出，中國人能接受這些「異形」在中國出現，是因為中國的文化發展跟不上其經濟急速發展之惡果。薛求理認為，「中國人和城市中產階級普遍崇洋，這些異國風情小鎮和住宅也滿足了人們追求『高檔』的心理。」戴曉玲也異口同聲地認為，「當擁有權利和金錢的人群想要展示自己的特殊地位時，當人們試圖追求高尚的環境品質時，都會試圖選擇一種特定的建築風格作為代言」。

然而，如果我們從更深層次去理解，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人們對居住環境尋求改善，對「城市品質孜孜要求」之後果。於此，我們從戴曉玲在其文章內提出的反省，理解到如果老百姓對城市風貌、城市歷史文化都有了基本常識和辨別能力，「一城九鎮」的錯誤，人們是不會接受的。

我們繼續下來對上海城市居住生活文化的討論，正是從這根本的要點出發。上海人如何以目前的現代化城市的環境，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生活文化？我們正是要從批判反省過程中悟出一條出路。

在城市文化方面，很多評論者都意識到，上海極度熱衷於以未來主義來



給予自身一個認同／形象：Wasserstorm（2009）的著作《Global Shanghai, 1850-2010: A History in Fragments》其中一章，就以「在急趕的城市」（a city in a hurry）為題，來描述上海在公元2000年後的發展。同時在書中，作者多次用狂飆（breakneck）來形容上海的變化速度。除了在經濟上高速發展，上海同時使勁爭取成為一個文化中心（cultural hub），據Wasserstorm（2009）的理解，上海在近年不斷舉辦超大型的展覽——由上海藝術雙年展，到2010世界博覽會等等，其目的很明顯是在於向世界展示它向著「未來」邁進的野心。與此同時，上海也向世界炫耀一個無限地神話化、輝煌的過去。就這一點，Marie-Claire Bergère（2004）的文章，有十分精確的分析。浦東明珠塔底層和上海歷史博物館，以主題公園的輕鬆形式，展覽上海城從19世紀中葉到二次大戰前殖民地時代的情況。展覽中所包括的地域範圍，幾乎只涉及當時劃為租界的地方。Marie-Claire Bergère（2004）認為這個展覽，不只展示著有關當局（或整體上海市）如何理解她本身的過去，同時也使人掌握到她如何預示自身的將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意義，以當今的上海的情況來說，已不牽涉到「喪權辱國」方面的負面詮釋，反而將之轉換成一段光輝歷史的代號：現今上海熱衷地神話化的，是上海自開埠以來到二次大戰前那種國際化、經濟繁榮、東西文化交流的十里洋場盛況。上海人無不感到他們的城市自開埠以來便成為中國最現代化及最有文化創意的城市而自豪。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上海的繁榮「盛況」逐漸顯現，上海人肯定認同眼下的現代化乃是20、30年代（自外國輸入的）現代化的延續。（現在上海人普遍以「30年代」這稱號代替那「丟臉」的半殖民地／國民黨統治的時代。）

自90年代開始，上海的懷舊風氣不斷渲染「30年代」為黃金歲月。自上海以至中國各地流行重構30年代的文化論述，到今時今日也還方興未艾。理所當然，「30年代」的事物變成炙手可熱的潮流商品：如石庫門老房子、紅木傢具、衣裝（旗袍）、美女廣告海報、流行歌曲、電影……等。真正的古董當然有龐大市場，在文化界及傳媒的大肆宣傳下，以「30年代」為主題或噱頭

的各式各樣消費品層出不窮，上海浦西舊城更是這個熱潮的主角；它不單重覆出現在電影作品中，成為「過度真實」的浪漫名城；在旅遊業方面，無論東西方或國內外的旅客都趨之若鶩地來到上海，尋找那已失落了，卻又名聞遐邇的「東方巴黎」。由此，歷史被浪漫化、懷舊化，變成消費的理由及目的。

上海近期的發展，似乎讓人們很明顯或容易地下定論：她一方面在文化上是企圖竭力發展創意文化產業，而另一方面在經濟上正努力於邁向全球化。這兩方面的發展，都很深度地影響了上海整個城市的景觀及人民的生活方式。我們以下有關上海的兩篇評論，企圖理解上海的城市在經濟發展的歷程中的城市文化之變易。〈歷史與藝術的商品化——論上海浦西重建所營造的城市文化〉一文，乃是由城市中心的重建策略對該城歷史的挪用，到對人民生活的改變，皆作出描述及批判。我們企圖由此進而分析消費主義帶動的全球化文化對城市本土文化之殖民入侵。再者，在城市文化的討論範圍中，我們嘗試引起一些相關的課題去作討論：甚麼是城市歷史文化？甚麼是城市美感經驗？甚麼是城市生活文化？城市之虛擬設計與其真實的生活實踐之間，有沒有衝突及矛盾？由對上海城市文化的發展的討論，我們企圖在此文中，提升至宏觀的層面，亦即對於消費主義在城市歷史、文化及生活經驗方面進行的破壞作出批判。

另外，現時「全球化城市」的論述，好像鋪天蓋地般控制了有關上海城市的發展的大方向。這種主流——甚至可形容為霸權的論述進路，在中國境外的學術界尤為明顯。由於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冒升，有關學科之西方學者很多都趨之若鶩地討論、預測、評價中國的發展，也迫不及待地由宏觀到微觀各方面打量上海，評定這個城市有沒有資格高攀進入那「全球化城市」的俱樂部。但是這種霸權論述，好像都忽視了中國學者們對上海的發展之討論。我們所寫的〈從上海到全球化〉一文，主旨是將西方學者的代表性言論，跟中國學者們的論點對比，從而獲得對上海，甚至對中國在經濟、政治以及文化上的發展（主流／霸權論述以外）更深入的理解。

## 注釋

- 1: 「浦東機場貨運吞吐量躍升全球第六」。解放日報。2007年03月28日。
- 2: 上海市政府有關籌劃興建發展「一城九鎮」之通知——〈市政府印發關於上海市促進城鎮發展試點意見的通知〉(2001年1月5日)簡錄如下:上海市政府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的精神,以及市委七屆六次全會提出的「中心城區體現繁榮繁華、郊區體現實力水平」的要求,本市將實施以新城和中心鎮為重點的城鎮化戰略,加快郊區城市化步伐。為此,制訂上海市促進城鎮發展的試點意見如下:「十五」期間,根據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將要實施重點突破、有序推進的城鎮發展方針,努力構築特大型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城鎮體系。經研究,市政府決定,本市重點發展「一城九鎮」,即:松江新城,以及朱家角、安亭、高橋、浦江等九個中心鎮。試點工作要立足21世紀,借鑒國際成功經驗,實現高起點規畫、高質量建設、高效率管理,建設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鎮。到2005年,「一城九鎮」開發建設要初具雛形,人口與城鎮規模基本合理,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基本完善,特色經濟與特色風貌基本形成,初步建成若干個規畫科學、結構合理、功能健全、環境良好,並與國際大都市相匹配的國內一流的現代化城鎮。(資料來源:<http://law.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21/20010004/class002100001/hw:562962.htm>)
- 3: Balfour, Frederik. 'Shanghai Rising'. *Business Week*, 2007, Issue 4022, p55. (本文作者翻譯)
- 4: 薛求理,〈一城九鎮 空空如也〉。文匯報。2009年5月20日。

# 歷史與藝術的商品化

## ——論上海浦西重建所營造的城市文化

自90年代開始，一股懷舊風氣襲捲上海。除了市面上出現了大量流行寫作，全力宣揚「老上海」的盛世表象，和衛慧的《上海寶貝》同年出版的重要學術著作：《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李歐梵，1999），更提出了無數有關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參考資料作為佐證，力圖強化上海城市在30年代的繁華、興盛、放蕩、頹廢的形象。

上海「30年代」被不斷渲染為黃金歲月，到近期也還方興未艾：在電影表象上，繼關錦鵬的《阮玲玉》（1991）、《長恨歌》（2005）之後，李安的《色戒》（2007），繼續接捧展現了一個（早期）現代化、驕奢淫逸或放蕩的城市。在2008年，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舉辦的大型展覽「中國設計」中，在「上海」部份中，遊客又再一次遇到那些模式化的「上海30年代」的穿著旗袍、嫵娜多姿、頹廢美、柔弱憂鬱的女性影像……從這些例子觀之，文化及傳媒將歷史遺跡重新組織及美化「30年代的上海」，它不斷重覆出現在電影、潮流寫作、以及各種媒體的旅遊指南中。於是，上海終於成為「過度真實」的浪漫名城。

在全球化大環境底下，世界各大城市都大力發展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Wu, 2004）；各大城市皆積極地重建歷史文化景點及創造休閒空間、舉辦藝術展覽音樂演奏等盛事、推廣精品設計等等，以促進旅遊業及增加本土市民消費。上海期望不單在「硬實力」上積極顯示本身作為金融中心的經濟實力，在「軟實力」——文化方面也很積極地效法世界上的先進城市，把自己裝扮成為合潮流的文化名城。

正如Wu（2004）所言，文化策略是城市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動力。自1990年代開始，上海城市的經濟發展，除了在金融及高科技工業上高速發展外，也同時開展了其文化工業（Wu, 2004：167）。在浦西，特別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發展商紛紛以「30年代」為主題或噱頭，進行文化及保育的重建計畫。上海浦西舊城於是成為這個熱潮的主角，無論東西方或國內外的旅客，都趨之若鶩地來到了上海，尋找那已失落了、卻又名聞遐爾的「東方巴黎」。由此，歷史被浪漫化、懷舊化，變成消費的理由及目的。

除了將歷史傳奇化形象化，上海更刻意將自己展示為一個新潮的創意城市。於2005年，上海創意產業中心參考了首先提出「創意產業」概念的國家——英國的模式，釐定了13個相關行業為創意產業<sup>1</sup>，並且把創意產業的內容擴展及具體化，延伸、涵蓋各項文化藝術、時尚消費和娛樂消費性服務的內容。由此出發，上海創意產業中心將「創意產業融入城市文化與城市建設之中」這藍圖具體化，落實為「創意產業園區」的建造，確認了城市以歷史為美化（策略）的方向。除此以外，再以「創意藝術」為美化的主導方向。自2005年初，上海市創意產業中心成立後，便正式授權建立第一批為數18個的「創意產業園區」。此後，在短短兩年間，全上海便建成了75個「創意產業園區」，散佈在上海市不同的區域。

我們這篇文章，企圖理解及剖析「歷史」及「藝術」兩大文化元素，在

上海舊城重建的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細緻地剖析此兩大元素，於不同重建區的具體表現及其背後策略之同時，我們將更深入去追問及批判，在這城市下呈現的「歷史」及「藝術」，其所組成的意義表象為何？我們企圖以上海為個案，去深入探究這些問題，從而理解現今城市重建背後策略的全球化劃一性；基於掌握了這劃一性而揭示了「本土文化」虛擬歷程，在本文的結論中，我們企圖面對及深究「歷史」及「藝術」這等人文思維向度在城市的空間中的衰落與憂哀。

## 歷史地標還是消費地標？概論城市重建中的上海外灘<sup>2</sup>

「如果『過去』可比喻為某個『異國』，懷舊的情緒正是讓旅遊業在這個異國中充滿生機地蓬勃發展的推動力。」（Lowenthal, 1985）在現今的消費社會，「懷舊」乃是全世界熱捧的主題。而其中上海的懷舊地景，更是中外媒體熱門的渲染、談論對象。

在浦西，尤其是上海外灘，很多有價值的舊建築物都保留了外觀，但把它原來的功能及其室內空間設計全部更改，轉變為收費昂貴的「時尚」消費空間及旅遊景點<sup>3</sup>。上海「新天地」變成了「時尚」消費場所、成為一個成功個案後，1999年商人李景漢就將萬國建築群中的「外灘3號」改造成了「上海最昂貴的聚會場所」。

「外灘3號」原為「有利大樓」（Union Building），該樓於1916年竣工，為英資天祥洋行物業。1914年原來房屋的3層磚木結構都被改建為6層大樓，是公和洋行在上海設計的第一個作品，也是上海第一座採用鋼骨結構的建築。「外灘3號」是在「萬國建築群」內其中一項地標，於2005年所推出的重修計畫的宣傳，乃是希望打造出「真正有品位、有歷史、有文化的頂級消費場

所」。這幢重修後的老房子，原本內在結構及用途完全改變，現已化身成為「上海奢華的消費地標」<sup>4</sup>。

另外，榮獲2006年亞太文化遺產保護獎的「外灘18號」，前身是渣打銀行的亞洲總部，現時也已作全面的內部裝修，同樣改裝為眾多世界一線品牌旗艦店、畫廊及頂級咖啡館餐廳的集中地。根據媒體報導，除了「外灘3號」及「外灘18號」外，今後會陸續有更多的外灘建築被改造；最新消息就是「外灘1號和外灘2號將會以一座空中走廊連成一體，成為新的高檔酒店。」<sup>5</sup>

人所共知，外灘從開埠以來，就一直見證著上海的發展。早期的外灘是一個對外商貿中心。自1845年英國殖民主義者搶佔外灘，建立了英租界後，法國勢力也在1849年在外灘建立了法租界。19世紀後期，外資和華資銀行紛紛在外灘成立，當時已有「萬國建築博覽會」之稱號。直至20世紀40年代初，外灘一直被英法列強所佔據，也就成了租界最早建設和最西化、現代化及繁華之地。

自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經濟急速起飛後，金融中心的地域遷移到浦東，外灘於是轉型，擔當了上海最高級消費場所的角色。在2004年1月，「外灘3號」被收購及重建，改建後的大樓內進駐了世界各大時裝名店（例如：Georgio Armani, Hugo Boss, Chloé, Marni, John Galiano等）、畫廊、高級法國餐廳，以及私人會所等，使之成為風靡上海的頂級豪華消費場所。

上海流行散文作家陳丹燕的《不可能的世界：上海外灘的影像與傳奇中》（2007）一書，強調了現今外灘建築已經成為了上海最時尚、最奢侈的消費地。她透過描述外灘建築的故事及自己的生活軼事，表達外灘由「昔日的輝煌」延續到「今日的奢華」的主題。

在第5章〈煙塵滾滾〉的部分，作者詳細記述了有關外灘3號的發展：包括發展商的成功故事、發展計畫的定位及計畫所帶來的影響等。憑著作者華麗辭藻的包裝，不斷彰顯現今上海城市「發大達」的「架勢」。她認為「這棟大樓（外灘3號）已不光是奢華外灘的地標建築，它還成了中國的環球時尚樣板。」作者毫不猶豫地，重覆使用「著名」、「昂貴」、「奢侈」、「時髦」等字眼來定義這個上海的新消費空間。例如：

「上海最著名也最昂貴的餐館和酒吧開始理所當然地一一向外灘大樓集合」（頁271）

「三樓是一個1000平米的畫廊，是整個中國最奢侈的藝術空間」（頁272）

「他（外灘三號的發展商）要帶領國際著名奢侈品進入外灘」（頁266）

「樓上的JEAN GEORGES的混合式的法國菜，是經濟全球化以後的環球新時髦。JEAN GEORGES VON GERICHTEN一年中會在上海親自下廚燒一兩天菜。能吃到他燒的菜，是一種給客人的榮譽。」（頁270）

作者很正面地而且驕傲地認為，外灘3號「作為外灘的奢侈典範，終日被各種媒體掛在嘴邊」正是上海成功的側寫。在文中，作者記述了一個在外灘3號內舉行盛大派對的情況。她詳細利用了各種具象徵性的人物（例如：時尚雜誌編輯和藝術家）、事件和物件（例如：一夜用去了40萬元人民幣（的派對）、女人的義大利高跟鞋、上海最昂貴的波特曼酒店提供派對上的食物及上海最名貴的酷悅提供香檳等）來營造外灘3號的一個「奢侈的晚會」情況：



「那真是一個奢侈的晚會，一夜用去了40萬元人民幣。盛裝的客人們都站在建築工地用的大塊木板上，木板就直接搭在樓層的舊鋼條上。那夜，有些女人的義大利高跟鞋的細跟站著站著，就往下一滑，卡在木板的縫隙裡。客人們大多數是北京人和上海兩地的外國人，小部分是北京和上海兩地的時尚雜誌編輯和藝術家。所有特意從北京趕來的客人，都有主人提供的往返上海的飛機票。食物是當時上海最昂貴的波特曼酒店提供的，而無限供應的香檳，則是當時上海最名貴的駱悅。」（頁264）

作者完全已忘掉外灘的歷史價值。在迫不及待地顯耀財富和奢華的上海人眼中，「外灘3號」作為奢華消費空間的角色，比它的歷史意義來得重要得多。隨著「外灘3號」成功，其他座落在外灘上，見證昔日租界興衰，富有濃厚歷史意義的25棟西方風格建築，陸續被改建為高級消費娛樂場所及國際品牌旗艦店。

在《全球化上海的懷舊與現代化景觀：跨國菁英與全球城市都市論》一書中，吳幸玲（2007）詳細地對另一個「上海的時尚新指標」——外灘18號作詳細而且批判性的分析。外灘18號為來自台灣的珩意房地產經營公司經營，該公司以營利為目標的私人資本出資，而進行維修的古建築。此項目於2006年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的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因得了此項殊榮，外灘18號聲名大噪，使得企業界驗證了文化是一門好生意，而這此處同樣吸引了紛紛來上海「搶灘」的國際一流精品名牌。吳幸玲認為，在消費主義將空間商品化的大環境中，那具備極獨特歷史地位的上海外灘，現在已被商品化來換取「經濟資本」：

外灘18號……成為與國際流行同步，可以讓具有經濟資本與文化品味的都市菁英直接消費的商品空間。因為外灘特殊的歷史背景與

建築型式，給了國際品牌打造神話與強化品牌形象的素材。在國際資本的投入以及各種的國際「名牌」加持下，外灘再度與國際相連結，轉化了這棟歷史建築原有的空間意涵。……開發商非常懂得如何使用建築保護的論述來迎合跨國菁英，以及正當化消費空間「仕紳化」的事實。（頁173）

同時，作者亦很清晰地批判了文化資本轉換為經濟資本的策略，以及其中浮現的矛盾：

透過Bund18與外灘空間意義轉型的討論中，不難發現文化與經濟之間的共謀與矛盾關係。如果說城市遺產保護目的是保留具有特定意義與價值的建築，以供後人紀念，及強化居民對於地方歷史的記憶與認同，那外灘18號的例子來看，看似極為成功的遺產保存案例，甚至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保存獎的肯定，但是，當這樣的文化保存成為宣傳與行銷語言，轉化為店家品牌升級的要素之刻，這樣的文化意涵究竟為何？（頁174）

除了外灘18號，還有外灘5號底樓將開設頂級男裝品牌旗艦店Classico Italia；外灘6號將引進國際服裝及餐飲品牌；外灘1號和2號將會建成高級酒店；和平飯店底樓則有可能開設 Louis Vuitton 和 Dior 的旗艦店<sup>6</sup>……外灘上一幢幢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已成為上海頂級消費的場所。「世界著名品牌旗艦店+高級餐飲+高級會所」這組合構成的發展策略已成為外灘上「萬國博覽建築群」的未來命運。

於此，在上海，自19世紀中葉開始的半殖民地時期建築物，現在已和它們盛載的事蹟完全脫節，也不再是人民延續集體回憶的空間。歷史已退隱成為某種「藉口」，膚淺化為19世紀殖民地美學的殘餘。現時不斷被強調的，只



外灘18號

為其懷舊情調的舞台效果。每晚華燈初上，外灘便成為時尚奢華消費活動的佈景。據吳幸玲的分析，縱使作為來自中國各地的觀光客聚集的據點，外灘的建築群，卻跟民國時期作為外國商人的佔據地一樣，依舊是充滿排他性的空間：透過文化生產與包裝的手段，外灘那些輝煌高檔的建築物，清楚地「將消費不起『文化』的上海底層百姓與內地觀光客隔絕於外。」（2007：175）

### 1. 上海新天地——販賣最新穎的懷舊

Benjamin Wood\*把笨重的摩托車放置好，帶上頭盔，踏上一輛附有車門的舊式摩托車。這位美國建築師發動引擎，在交通繁忙的時間，馳聘在煩忙的上海市中心，不一會，便到了繁華的新天地區域。

到達後，他很快轉到一條狹窄的街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雖然新天地是所有名店和露天茶座的集中地，但在它周圍卻仍然有居民在生活；他們穿著睡衣在打麻將、在門外的水龍頭洗碗、或把餃子放進沸騰的油鍋內煮食。這樣的生活，已悠悠的經維持了半個世紀。

當摩托車加速的時候，Wood的白色絲綢夾克在風中飄揚。他在上海一些快將消失的庭院內走過，同時，他向正在預備晚飯的居民揮手打招呼。

「在這附近的居民均認識我，因為我常在這裡經過。」他提高聲音，以免被引擎聲所蓋掩。

「但他們不知道」他充滿遺憾的補充道，「我，就是令他們這種生活方式消失的人。」<sup>7</sup>

1990年前總理李鵬到上海南巡，並決定開發浦東新區的同時，城市中心區域浦西亦因應大量的投資及基礎建設專案，展開一連串的都市重建計畫。在上海市中心，大量低矮的舊建築及傳統上海住宅遭到拆除，而空置出來的地方則興建了多層式辦公大樓或摩天大樓。根據Fulong Wu, Jiangxu, and Anthony Gar-On Yeh (2007: 253)的報告，在1991至2000年間，上海有2600萬平方米舊房子被清拆，並有66萬戶被遷移到市郊地區。在龐大的都市重建計畫中，位於上海最繁華的盧灣區太平橋地區的「上海新天地計畫」卻「反其道而行」，宣稱此重建計畫是將傳統的「石庫門」<sup>8</sup>住宅群保存下來。直到現在，此項計畫仍是全上海的焦點。

上海市中心為了促進城市重建及發展，傳統的「石庫門」住宅群於1990年便遭上海市政府大量拆卸，改為興建多層式的辦公大樓或商業中心。上海新天地發展商瑞安房地產有限公司把握機遇，成功向上海市政府申請重建市中心的大片石庫門住宅。上海新天地屬於太平橋地區重建項目，此計畫得到上海市政府全力支援及協助。發展商在佔地3萬平方米的市中心地段進行重建工程，把原址的傳統石庫門住宅改建成為集中餐飲、零售、露天茶座、酒吧和展覽館於一地之旅遊景點。計畫落成後，「新天地」迅即成為上海最炙手可熱的旅遊景點，各媒體更大肆宣傳，聲言市民及遊客在「新天地」遊玩之際，同時能緬懷上海昔日的黃金歲月。

為了虛擬模仿一個「理想中的」上海20、30年代的住宅區，「新天地」的發展商利用嶄新科技，抽取裝設在原本石庫門建築上，具代表性的建築特之的細部（例如門框、門楣、牆、鋪地等），並以及使用舊有建築物料（例如舊磚、舊瓦），重新裝嵌組合；為了營造「舊」的感覺，有部分新的建築物料甚至被刻意「造舊」，以營造舊建築物的情調氣氛。此項以新穎方法裝嵌而成、虛擬過去的建築方案，竟被譽為「保護歷史文物」的重建計畫，並獲得國際多項建築及文物大獎<sup>9</sup>。



上海傳統的石庫門建築都被整體改裝為各式潮流商店、特色餐廳酒吧或國際連鎖店



在原本石庫門建築群根本不會出現的廣場式空間及「露天茶座」

「新天地」除了被定位為「保育計畫」，更成為上海最時尚的休閒旅遊點。它的宣傳口號，就是「上海新天地，昨天，明天，相會在今天」；這宣傳口號籠統地意謂，上海新天地重現過去的歷史文化，也盛載了流行的時尚玩意，今時今日在到此遊覽的遊客眼前展現。

### (1) 遊一趟新天地看一遍上海歷史文化？

#### · 石庫門生活空間的挪用

新天地的正門，豎立了一個地區標誌，那是一幢奪目的新式玻璃建築，明顯地與旁邊低矮的傳統石庫門建築格格不入。遊客進入新天地的範圍後，無論在哪個角落，都可以看到特意為了強調懷舊氣氛而堆砌出來的石庫門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充滿了19到20世紀的歐洲建築和上海傳統的石庫門建築元素拼貼（collage）而成半殖民時期的建築風貌：例如厚實的黑色漆門，門眉的雕刻，「巴羅克風格」的小陽臺等。一到晚上，這些代表性的裝飾均以投射燈照射，在微黃昏暗的燈光下，戲劇性地展現其刻意營造的懷舊氣氛。

遊客們在石庫門的門面上彷彿感受到往日的情調，但是一走入建築物內部，就完全找不到任何歷史痕跡了。因為全部（重建的）石庫門都被整體改裝為各式潮流商店、特色餐廳酒吧或國際連鎖店；其內的星巴克（Starbucks Coffee）、麥當勞（McDonalds）及哈根達斯（Haagen-Dazs）等店面設計及售賣的食物與世界任何地區的分店無異。

「新天地」為了提升旅遊的可能性、應付餐飲業對空間的需求，傳統石庫門巷道的獨有空間佈局徹底更改。原來建築物並排式的傳統格局<sup>10</sup>，已改組成為大小不一的不規則建築，原來狹窄的里弄，則變為寬敞的大道。同時，在原本石庫門建築群根本不會出現的廣場式空間及「露天茶座」，卻在目前的新天地到處可見。在節日時，竟有巴黎紅磨坊式（Moulin Rouge）的歌舞表演。這一切外國輸入的新景觀，在重建後的虛擬石庫門空間中出現。於此，我們可以說，「新天地」已徹底脫離了上海的城市歷史。這種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重建策略，除了隨意挪用本地的文化，更將他者（Other）文化混淆入本地的文化內，成為了虛構摻雜的消費文化空間。這種虛構摻雜的消費文化空間圖像，正重覆出現在上海各處的新消費空間的建構上。

· 虛擬的豪宅：「屋里廂」展覽館

上海「新天地」計畫，明顯是一個斷章取義地抽取上海歷史片段為主題，刻意營造出來的消費空間。但發展商卻宣稱此計畫為古蹟活化工程，其目的為「重新展現過往上海人的弄堂文化」。因要貫徹這項宣傳，發展商在上海新天地範圍內，特意保留了一間石庫門建築，改裝成為展覽館「屋里廂」，展示著上海人以往的生活方式。

「屋里廂」所展出的主題，是上海20、30年代的富貴人家的生活，其內的佈置是依據富戶人家的家居環境而營造。為了增加懷舊氣氛和真實感覺，遊客並非靜靜地遠觀展覽在玻璃箱內的文物，反而像參觀示範單位（或樣品房屋）般，親身走進一個家居環境，自由地觀看各個房間的設計佈局和傢俱擺設。遊客在這虛擬的室內環境漫步，彷彿走入上海20、30年代的時空，一瞥這戶虛擬富戶人家的生活。

屋內各樣的裝配及傢俱均是充滿象徵性的指示物（referent）：昏暗微黃的光線，透過窗戶顏色玻璃滲進屋內，發黃的牆壁上掛滿了一幅幅20、30年代的流行廣告：美麗少女身穿旗袍，手中拿著「花露水」或香菸，又或者是當時著名女影星搔首弄姿的電影海報。屋內放滿了華麗的海派紅木傢俱及其他20、30年上海最流行的日常用品，例如：留聲機，座檯鐘，火水燈，打字機，勝家縫紉機及威斯汀電風扇等。所有的佈置，都展現出上海的20、30年代，是一個物質富饒的「摩登」年代。

整個展覽更配合多媒體的音效及影像，來營造濃郁的懷舊氣氛。當遊客甫踏進主人房，耳邊便會傳來一陣悠揚的「夜上海」音樂，一首首懷舊歌曲此起彼落。地下一個房間則設置了大電視，不斷播放當時富戶人家的生活片段，例如，男人閒暇時喜歡到跑馬場消磨時間，婦人則每天下午與一群上流階級的太太們一起打麻將，年輕人則在書房閱讀由上海商務印書局出版的書刊。





遊客在這虛擬的室內環境漫步，恍惚走入上海20、30年代的時空，一瞥這戶虛擬富戶人家的生活。



在亭子間的書桌上一份書寫中的文章，皆向遊客示意，所看到的生活細節似乎「正在發生」。



屋內放滿了華麗的海派紅木傢俱及其他20、30年上海最流行的日常用品，例如：勝家衣車，以提醒遊客這是上海最先進的時代。



上海新天地——「屋裡廂」展覽館

設計師悉心安排室內各種擺設：在亭子間的書桌上一份書寫中的文章、廚房內打開了蓋子的大水缸，這一切微小的擺設，都向遊客示意著，所看到的生活細節似乎是「正在發生」，而不是在遙遠的過去；這使遊客獲得一種臨場感，彷彿自己只是趁這家人離家時，偷偷走進到他們華麗的家居內窺視一般。透過這種過度真實的展覽手段，「屋里廂」展覽館大大增加遊客對上海20、30年代的懷舊想像。

這個利用城市舊建築文化為基礎的發展大計，似乎被各個地方政府爭相倣效；從撥地、動遷及資金調配，地區政府都提供合作及支援。這種虛擬性質極重的「文化及歷史」地標發展主題，已漸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新天地」的發展商，也因此而成功，並承辦其他城市各個名為「XX天地」的發展項目。

2003年，同一發展商即在杭州開設了「西湖天地」，把各式餐廳和國際品牌也搬到西湖周邊。此集團更在2006年積極開展重慶的舊城改造項目——建築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重慶天地」，原來的舊區被改造後，模樣亦將與「上海新天地」模式相近。除了住宅外，也會有大型餐飲娛樂等商業項目。預計在2008年招商的「武漢天地」亦成為發展商另一重點計畫<sup>11</sup>。

從「新天地」的個案中，我們理解到，現今中國對城市文化的處理，正是Dicks（2003：11）所批判的現今社會對文化發展的態度。Dicks認為，城市文化透過概括（encapsulation），模擬（simulation）及微型化（miniaturization）等手段，被整頓、重組、包裝成為各式景觀，如散步道、公園、微縮景觀、舊城區等。其終極目的，是將歷史文化徹底「過度真實化」而成為可以販賣及獲利的生意策略。歷史被商品化卻以全新的方法演繹；不同的歷史片段被重新選擇、組織、甚至創作，由此，類似「30年代的老上海」模式的舊區重建，就像積木模型一樣在中國不同城市中建造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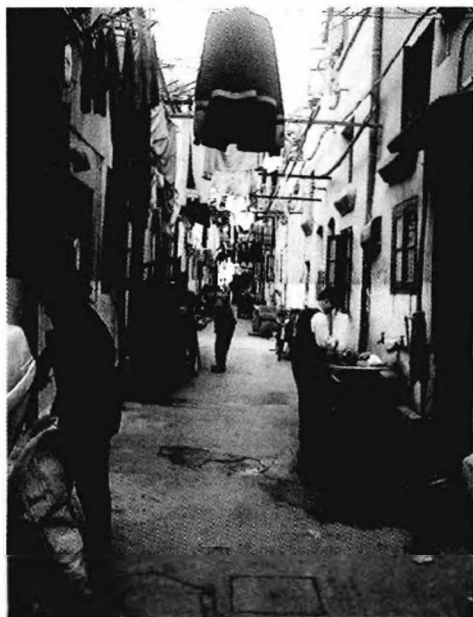
## （2）被忽視的歷史遺址：一大會址

從上海「新天地」的網頁中，發展商清晰地說明「上海新天地計畫不但希望重新恢復傳統石庫門的原來模樣，更希望可恢復石庫門的文化及歷史。」20、30年代石庫門巷道的生活文化，在新天地的脈絡中，被表象為歡愉、寫意及符合現今潮流稱之為品味的生活。然而，上海於20世紀20、30年代時面臨之對外戰爭、國內的政治及社會動盪，卻完全被掩蓋甚至抹煞。上海新天地只是以一種以偏概全的方式講述歷史，藉歷史堆砌懷舊情調的戲劇性感覺，以作為背景來增加遊客的消費樂趣。

當我們環視「新天地」區域範圍時，會發現那座在新天地展覽館旁邊、在中國歷史上—件改朝換代的歷史事件的發生現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遺址（簡稱一大會地址），卻被多數遊客忽略。

翻查多份各式旅遊指南、媒體報導，都甚少詳細地介紹一大會址；但是，這個地方卻為中國現代史揭開重要的一頁。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在此處祕密召開第一次會議，一大會址博物館內也收藏了大量有關此次會議的相片，更配以中、英文的說明；博物館亦公開展示當時的祕密會議室以及一些革命文物及機密文件。但是，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博物館，竟然甚少出現在有關上海旅遊的指南中，就算是上海「新天地」的場地指南，也只是簡單介紹其位置及收費。

若將「屋里廂」和一大會址並排，會讓人覺得諷刺：當時的激進左翼人士，不正是要打倒如「屋里廂」所展現的資產階級腐敗的生活方式嗎？然而「新天地」的「屋里廂」展示著虛構的上海富有家庭的生活環境及生活，卻被各媒體和發展商高度宣傳，遊人也趨之若鶩地湧來參觀；相對地，「一大會址」乃是如實地記錄有關上海1920至1930的重要的政治歷史事件的展覽館，參觀者卻寥寥可數。



在「新天地」附近，建於1924年的尚賢坊（弄堂）內還是  
有「原居民」在其中居住，在此可以看到原來的弄堂建築  
佈局及日常生活文化。

### (3) 被扭曲的弄堂文化：尚賢坊居民的困境

「新天地」雖宣稱為一個保存弄堂文化的計畫，但從以往到現在都存在的弄堂文化，卻無法體現在新天地的設計中，因為「新天地」的設計其實是把一切現實弄堂生活中「不理想的元素」消毒（sanitized）後，轉為以浪漫、有趣但脫離現實的方式呈現的虛擬「弄堂文化」。

「新天地」計畫的展開，使得盧灣區甚至整個城市也有極大的改變，這個重建計畫可說是仕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最明顯的範例。附近日漸破舊的民居（石庫門）通通遭拆除，在空出來的土地上，建起了中產階級的住宅休閒區。原本居住在（石庫門）弄堂的低收入基層市民也隨著重建計畫的開展被大量動遷，由原本的市中心地帶搬到基本設施（例如：交通，醫療等）還未發展完善的偏遠郊區。據報導，其中有3500戶是因為上海新天地的人工湖建造工程需要而配合動遷<sup>12</sup>。就算那些不受搬遷影響、居住在附近地區的居民，也因上海新天地的出現，而使其生活大受影響。

Wai（2006）的評論文章指出，「新天地」雖然宣稱以上海30年代文化為社區重建及地方推廣主題或策略，但其內重建的弄堂則明顯地排拒了舊上海的日常歷史；因為在「新天地」弄堂內，我們看不見在30年代的弄堂內活躍的小人物（例如人力車伕、小販等等）及活動。Wai認為「新天地」是對歷史斷章取義的表象，這批評是對的；但他的論點卻存在兩方面的錯誤：一方面，難道他期望見到有演員在「假扮」人力車伕、小販等人物在「新天地」的弄堂空間中「上演」20、30年代的日常生活嗎？另一方面，上海的弄堂文化，其實還未曾完全變成為「可觀賞」的「歷史肥皂劇」。至2010年為止，上海有些弄堂乃保持著完整的舊貌，還是有「原居民」在其中居住。然而，當「新天地」從天而降時，他們的固有日常生活便漸漸頹毀。

在「新天地」附近即有一個建於1924年的尚賢坊（弄堂），到了本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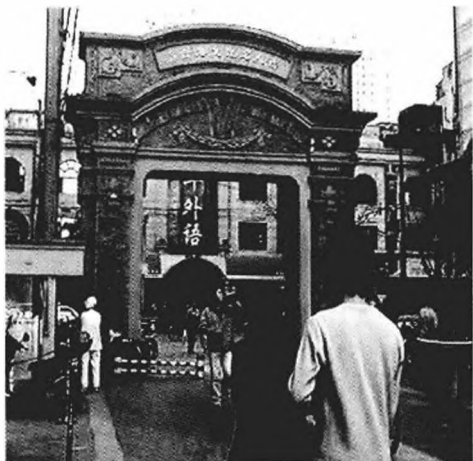
稿之時期（2009至2010年），那裡還是一個住宅區。我們於2005年訪問了居住在尚賢坊達15年之久的居民馬先生，他表示「新天地計畫」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首先，因為「新天地」計畫的帶動，該區的樓價大幅度上漲，生活指數不斷提高。原來在「新天地」附近弄堂開設的食肆已經不復再；取而代之的是高檔的餐廳及國際連鎖店。基層市民根本負擔不起高昂的消費，以往在弄堂小店能買到價值1塊錢人民幣的麵包，但於進行訪問時期，該區範圍只能買到已經漲價到10元的日式麵包。因為實際的經濟因素，基層市民只好離開居住的社區，到鄰近的區域購物及活動。馬先生更表示，「新天地」根本不屬於他們的社區，那是由商業大財團策畫入侵他們社區的旅遊項目。

## 2. 多倫路文化名人街——展示衰落的「老上海」

上海新天地除了在上海獲得空前成功，也成為全中國數一數二最成功的旅遊景點。這使得在中國，似乎普遍都認定利用城市的歷史元素作為空間發展主題就是不二法門。然而，在新天地不遠處，另一個以上海歷史及文化為主題的旅遊景點——「多倫路文化名人街」卻與上海新天地有截然不同的命運。

上海多倫路位於虹口區，是一條L形蜿蜒彎曲的街道。在20、30年代，這條小街吸引了一班中國文壇舉足輕重的「左聯」作家，包括：魯迅、茅盾、郭沫若、葉聖陶、瞿秋白、陳望道、趙世炎、王造時、丁玲、柔石等；他們在此舉行不同類型的文學、政治活動，奠定了此處作為「現代文學重鎮」的重要地位。

在這條街道的兩旁，可見風格各異的小別墅。它們很多是中國現代時期赫赫有名的文化政治人物的公館：例如鴻德堂，孔（祥熙）公館、白（崇禧）公館、湯（恩伯）公館等。除此外，還有著名的歷史事件發生場所如「內山書店」<sup>13</sup>、「公啡咖啡館」<sup>14</sup>等遺址。



多倫路文化名人街以特色拱門顯示這街道之特點



街道的兩旁都掛滿了宣傳的標語及橫額以宣傳多倫路的文化歷史地位。



整條多倫路上都設有文化名人雕塑設計，企圖使遊客想像當時著名文人的生活交往活動狀況。



研究期間（2006/7年），多倫路的街道上滿是地攤售賣廉價字畫、古董、古錢幣、郵票、舊書及有關文革的紀念品。現在可能已被取締。



歷史遺址的門外均豎立金色的指示牌講述該遺址所發生的事蹟。

1997年初，上海市委書記黃菊提出「大力發展都市旅遊」的號召。於是，虹口區文化局便成立專家小組，設立「多倫路文化名人街開發辦公室，正式研究開發多倫路的可行性。專家小組希望利用多倫路豐富的歷史建築及文化資源，大力發展該區作為30年代的重點文化空間。虹口區人民政府決定把多倫路改建為「文化名人街」，並訂立「修舊如初」的復修原則，重現20、30年代上海的人文風情。小街上的古蹟及紀念性建築物不僅免除被拆卸的危機，更被保存及復修至原來樣貌，例如：「內山書店」、「公啡咖啡館」等著名文化景觀。再者，在各重要歷史遺址的門外，皆豎立一塊金色的指示牌講述該遺址的文化意義。

除了這些蘊藏豐富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外，有關單位盡力將多倫路「主題化」，由此而興建並命名了一些旅遊景點，例如：「世紀鐘樓」、「街心花園」、「名人雕塑廣場」等等。與此同時，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政府「多倫路文化名人街開發辦公室」亦積極的進行招商活動，讓文化商品、特色小店進駐具濃厚文化氣息的建築。目前，在多倫路所見的店鋪，大都售賣字畫、古董、古錢幣、郵票及有關文革的紀念品及其他收藏等等文化商品。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政府除了保存及復修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外，為了加深旅客對多倫路的認識及遊覽的趣味，整條多倫路上都設有以「與名人同行」為主題的9組文化名人雕塑設計，供遊客拍照留念。例如魯迅及茅盾銅像以正在討論文學的姿態呈現，旁邊則預留座位供遊人使用；往下不用走幾步路，便可發現丁玲銅像彷彿正坐在長凳上閱讀。另外，地上更設有不同名人的足印刻版並其簽名，供遊客踏在刻板上以懷念各文壇大師的足跡。

於此同時，多項改善及美化工程亦積極展開，例如：鋪設灰色階磚的路面、道路綠化、安裝舊式路燈等。1999年，市政府更加在多倫路兩端設立具有石庫門風格式樣的文化名人街牌樓作為標誌；而上海市虹口區文化局更於



2000年興建多倫現代美術館，為不同的文化及藝術團體提供展覽及表演場地，期望進一步確立及提升多倫路在上海的文化地位。

遊客走進多倫路，街道的兩旁都掛滿了宣傳的標語及橫額，內容不斷提醒遊客不僅可以從多倫路看出上海城市的文化歷史，此路更是上海的文化指標：「一條多倫路，百年上海灘」、「多倫金秋，藝術之旅」等宣傳標語比比皆是。從以上種種建築特色及宣傳，可見虹口區文化局決心以文化歷史作多倫路的定位，全力將之發展成上海的文化旅遊景點。

### (1) 文化名區乏人問津

多倫路蘊藏豐富的文化資源，並得到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政府的支持，強力宣傳為「上海20、30年代的文化發源地」；但一直以來，多倫路卻稱不上成為上海熱門的旅遊景點。在各種旅遊宣傳品當中，甚少著力堆砌多倫路的文化價值，就算是在上海旅遊局的官方宣傳中，多倫路也只是被略略提到<sup>15</sup>；而當中的內容主要僅是介紹多倫路的商店所售賣的產品。另外，上海旅遊局所印製的地圖內，多倫路甚至沒有被標示為旅遊景點。

當我們比較外灘、新天地的成功和多倫路的備受冷落，我們隨即發覺消費文化如何刻意地選擇歷史，將其斷章取義，將某部份無限誇張、虛擬之同時，卻嚴重忽視另外的部份。內部全部改裝的殖民地式建築物聳立的外灘、虛擬民居的新天地，被渲染為往昔風花雪月的生活舞台，不僅成為熱門的旅遊景點，更佔據了有關上海20、30年代的城市文化論述主流。相反的，本身蘊藏豐富歷史資源，處處是「左聯」文人活動遺址的多倫路，卻被媒體、政府冷落。

於此，我們不禁要追問，既然歷史文化是城市發展的好題材，但究竟是什麼因素，使上海新天地與多倫路兩者在知名度及受歡迎程度上，有如此大的差別？由此問題出發深入研究，我們便會觸及在城市發展中，所展示的有關「歷史」的論述之權力本質。

附表1：上海新天地與多倫普之比較

	多倫路文化名人街	上海新天地
宣傳口號	多倫金秋藝術之旅 一條多倫路，百年上海灘	昨天，明天相會在今天
對象 <sup>16</sup>	主要為附近居民及國內遊客為主	國外遊客為主
空間特色	<p><b>賣點</b></p> <p>海派建築露天博物館 「左聯」文人活動的遺址</p> <p><b>街道整體設計</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保留原來的街道規畫</li> <li>● 彎曲的街道兩旁有售賣中式字畫、古錢幣、郵票、古董及有關文革的紀念品的商店及小攤檔</li> <li>● 街道上設有長椅供市民閒坐</li> </ul> <p><b>裝飾</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文化名人雕塑銅像設置在沿街兩旁</li> <li>● 名人足印刻版及其簽名鋪設在街道上</li> </ul>	<p>重現20世紀20、30年代的上海石庫門生活</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整體環境經過重新規畫，改變傳統石庫門的居住用途，成為中西式餐飲及新潮衣物精品銷售場所。</li> <li>● 原來大量的特色狹窄的里弄巷道改建成面積寬闊的露天廣場及表演場地；露天咖啡室</li> </ul> <p>重造模仿20、30年代樣式的石庫門建築，配以各充滿懷舊特色的窗戶及露台</p>
博物館／美術館	<p><b>燈光配置</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有限度的街燈照明</li> <li>● 多倫路內的商店大部分於晚上8時關門</li> <li>● 整條街道沒有任何發光招牌</li> <li>● 區內的照明主要是街燈，照射樹木的綠色燈射以及附近民居的燈火</li> <li>● 商戶的營業時間約由早上9點至晚上8點</li> </ul> <p>市政府開辦的美術館 多倫現代美術館</p> <p>私人開辦的博物館</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金泉古錢幣博物館</li> <li>● 左聯紀念館（十大文化名人展館）</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不同顏色的射燈遍佈新天地</li> <li>● 新天地內的餐飲業大部分均通宵營業。</li> <li>● 各餐廳、酒吧、咖啡店的紅燈招牌使整個區域五光十色</li> </ul> <p>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地址</p> <p>「屋裡兩」石庫門博物館</p>

商店	<p><b>店舖</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公啡咖啡館 (已關閉)</li> <li>● 內山書店 (已改為售賣古錢、銅幣、紀念章等物品的商店)</li> <li>● 售賣中式字畫、古錢幣、郵票、古董及有關文革紀念品及其他收藏的商店</li> </ul> <p><b>店面設計</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大部分商店沒有特別店面設計或裝修</li> <li>● 燈光昏暗</li> <li>● 貨品零亂擺放</li> <li>● 售貨員沒有任何制服</li> </ul> <p><b>小攤檔</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售賣中式字畫、古錢幣、郵票、古董及有關文革的紀念品及其他收藏的商店</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國際連鎖時裝專門店</li> <li>● 戲院</li> <li>● 西式日式餐廳、中式酒家、酒吧、</li> <li>● 露天咖啡茶座</li> <li>● 生活用品店</li> <li>● 精品概念店</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每家商店均有特別設計風格</li> <li>● 店內設有射燈及不同的燈光效果</li> <li>● 貨品整齊擺放</li> <li>● 售貨員/侍應生穿著整齊制服</li> </ul>
管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由發展商裡安房地產有限公司全面管理</li> <li>● 新天地範圍除了主要的馬路外，車輛不可駛入步行區範圍</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現代仿製中式傳統工藝品</li> </ul>
社區生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虹口區附近的居民視多倫路為社區範圍，日間常有長者聚集休憩，黃昏至晚上則有居民散步。</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整個太平洋橋地區的居民都被遷出，附近地區全被發展為商業區，高尚住宅區及旅遊景點。</li> <li>● 新天地沒有任何社區生活</li> </ul>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比對新天地及多倫路的發展策略、設計模式及整體規畫對比，從而對兩者的發展及所牽引的後果作細緻分析。（見頁279、280）

## （2）究竟是為了紀念甚麼？（But remembrance of what？）

Harvey在描述巴黎聖心大教堂的建造史時，曾質問興建這座偉大的教堂，究竟是為了紀念甚麼（But remember of what）？（Harvey, 2003：312）。面對上海的懷舊景觀，同樣的問題也在我們的心中出現：當我們細心探究上海的歷史文化，1920至1940年代是充滿矛盾、衝突的時期。社會上一方面充斥著夜夜笙歌、粉飾太平的景象，另一方面卻是極其動盪不安。當時內外政治局勢都岌岌可危、經濟面臨崩潰危機、社會貧富極度懸殊，一群左派作家，例如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人皆紛紛發表言論，大力批評當時的政治腐敗積弱、頹廢墮落的社會氣氛。他們出版大量諷刺文學，評擊腐敗的當權政府，企圖重整社會氣氛及呼籲群眾齊心抵禦外敵。

然而非常諷刺地，在80、90年後的今天，當時被左派作家猛烈批評為頹廢墮落的生活方式，竟然在現今被大眾傳媒所歌頌，更被定位為上海昔日的日常生活文化的主流表象，而在上海新天地、淮海路、衡山路一帶出現之燈紅酒綠夜生活則被渲染為往昔黃金歲月的延續。當年在多倫路上留下足跡的文人巨匠對當時水深火熱時局的批判，可說是完全過去了；不單如此，在現時的上海歷史主流表象中，這批代表了中國現代文化的文人已幾乎不佔甚麼重要位置。

Chen & Orum（2009）正代表了現今主流以「商業主義」為主導思想對上海歷史於空間之表象的理解。兩位作者在其書的結論中，很一般地說明了城市發展應該尊重其歷史背景：「一個城市發展源自其自身獨特的歷史，及有關該城市的故事，這些獨特的歷史及傳奇故事，可以令該城市保存其獨特性格及特色」（2009：237）。作者繼此開場白之後，隨即展述：「於1920年代的上海，已經有紐約及倫敦的規模——當時的上海，被稱頌為東方巴黎及亞洲的紐

約」。Chen & Orum 所舉的證明乃是於1936年上海所擁有的國內外銀行、錢莊或信託公司，數量佔全中國一半或以上。基於這等對上海歷史過於簡單及單面向的描述，Chen & Orum 在其書的結論中，只是重覆著大多數人對上海的迷思，或迷信：

很肯定，在1930年代，上海已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世界城市（a legitimate world city），在20世紀末上海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城市，正是回覆她過去的光榮。<sup>17</sup>

對於上海各個歷史表象空間的受歡迎／受冷落程度，以及上述之主流的迷思論述，我們可從兩方面去理解：其一，在經濟角度去看，我們十分同意Wu（2000）的見解，他認為許多有關上海都市形象之流行宣傳品，皆以某種「奇怪的語調」（strange tone）（2000：355）表現上海的歷史，來肯定上海由始至終作為中國最重要商埠的延續性：

有關上海的推廣宣傳品，通常都借助上海曾有過一個被譽為「東方巴黎」的光榮過去，來營造上海的城市形象。許多推廣宣傳品都形容上海為中國現代製造業和金融業的發源地。這些推廣宣傳品往往用了某種奇怪的語調去表現上海的歷史：眾所周知，1840年之後，大量以外資營運的工業湧入上海，中國本土的工業也相繼開始發展，中國本土的第一代企業也由此而創生。但是今時今日那些推廣宣傳品總是以模糊的歷史邏輯及中性的立場去形容這段歷史。它們並不會佈導這現象背後的真相——由於外資無限制的入侵，中國本土工業備受嚴重的損害，甚至萎縮。反之，它們竟大肆強調當時在全球活躍的外資進入中國，因而帶動了本土企業之發展（Wu, 2000：12）

其二，從城市文化角度去看，Harvey（1989）的見解很值得借鏡。他在分析後現代城市特質時，清楚地指出現今城市的景觀及建築的建構企圖，皆在於製造類似紀念碑形式的建造物，以具體表現市民的集體回憶。然而正如Harvey所說，人們已不會對歷史採取嚴肅且有深度之態度去理解，歷史反而只是成為當下社會消費文化的再創造：歷史已變成「歷史肥皂／連續劇」了。上海市民的集體回憶並不在於如實地展述歷史、或持批判態度去剖析討論歷史；集體回憶透過各種媒體文本（電影電視、小說文評等等）把歷史轉化、渲染成為「過去時光的不同風格」。由此，這種種五光十色的風格，變成隨時可隨不同場合而調配成為消費的「噱頭」——例如：電影、小說的時代背景、娛樂場所商場餐廳的設計主題等等。現在在學術界、文化界或大眾傳媒中所流行有關「20、30年代」的上海文化論述，無論它們的題材為何以什麼方式展示或報導，都一面倒的宣揚上海過去是著名的「冒險家的樂園」、「東方巴黎」，是擁有十里洋場繁華景象的城市。Harvey很清楚指出，說到底這不外乎一樁（以）文化遺產（作推銷主題）的生意（heritage industry）（1989：85）。

主流的上海社會文化論述過份刻意地摒棄過往歷史中動盪的一面，而努力將歷史接續向繁榮盛世的一面。Lu（2002：170）的分析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策略其實是「肯定目前以及對將來繼續發展的信心之顯示」。將「上海30年代」的歷史重新包裝推出作正面宣傳，以證明上海自從前即已有能力發展成為繁榮進步的都市，我們認為，這等論述手段正是為了替目前邁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野心勃勃地設立一個合法的出發起步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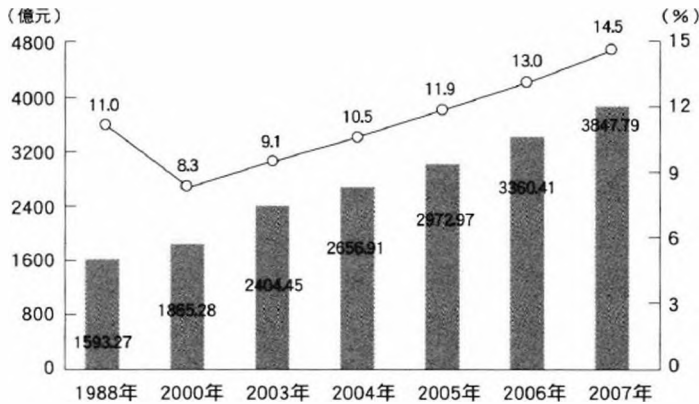
## 品味空間的消費還是藝術空間的創造？泛概論創意產業園區

上海近10年間，城市的經濟在金融、商貿以及旅遊業等行業的帶動下急速成長；這個城市已實踐了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對國家發展的理念：「讓一部

分人先富起來」。上海明顯成為全中國經濟發展的先趨，並同時肩負經濟發展的龍頭角色。根據2008年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上海全市未來5年的生產總值將超過2萬億元，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生產總值將超過10萬元。<sup>18</sup>

在強勁的經濟帶動下，上海市民的經濟收入能力普遍得到改善，他們的消費能力也理所當然地提高。根據上海市統計局於2008年2月4日發表的《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指出，上海商業發展持續增長，市場流通規模也進一步擴大；其中，消費品市場穩步上揚。2007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847.79億元，比往年增長14.5%，增幅連續創新高（見下圖）。

附圖1：2007年上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佈  
資料來源：《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8



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不斷上升外，其中消費品類型，例如轎車、手機、攝影機及抽油煙機等每項也有10%以上的成長幅度<sup>19</sup>。這些數字足以證明上海人的消費能力不斷上升，且消費內容亦已經由基本生活需要擴展到不同範疇的消費品。

Pun (2003) 很清楚地闡明，「要推動經濟發展，消費是最必要的動力。今時今日，人民的價值，不再是其生產能力，而是在於其消費能力。」上海之所以為中國最富裕的城市，理由即在於它是全中國消費能力最強的城市。

當我們走在上海街頭，各式大型商場或名店商廈都掛滿了大大小小的廣告宣傳；街角的報紙攤放滿不同種類的休閒生活及消費雜誌<sup>20</sup>。傳播媒體爭相報導富人們的生活方式，美其名為「時尚生活」；上海電視台的「上海生活時尚頻道」每天播放提供消費情報的節目。Pun認為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的功能是全力推動觀眾成為消費者；媒體的目的在於鼓動人們的消費慾望之同時，更讓人們理解到，在消費的過程中，他們能將自身確立為現代化、合潮流、同時正在竄升的中產階級的其中份子。（Pun, 2003：474）。

Pun對消費主義批判性的揭示，在上海的大眾讀物中獲得了簡直是「直認不諱」的驗證。俞吾金在〈新上海人的生活觀念〉一文中，以所謂「瀟灑意識、時尚意識、寬容意識」界定上海人的「品味」觀念。他認為新上海人特別注重生活的質量，但對所謂「品味」觀念，或生活的質量，其實離不開奢華的消費。在「瀟灑意識」一欄中，前吾金形容上海人「在休閒時也會神閒氣定，一擲千金，盡情地享受」（2002：72）；而在「時尚意識」一欄中，作者更是清晰地指出消費生活就是上海人嚮往的生活：

如果說巴黎是法國的時尚之都，那麼上海就是中國大陸的時尚之都……講究時尚、追求時尚是上海人生活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新上海人的心目中，淮海路是上海的「時尚之街」。也許出於這樣的原因，講究品味的新上海人很少去「南京路步行街」，但卻頻頻光顧淮海路……



當人們置身於淮海路的時候，就會發現，無論是大型超市的裝飾，還是現代櫥窗的佈置；無論是最新時裝的展示，還是各種名牌商品的羅列，絲毫不遜於西方大都市的風格。

新上海人的時尚意識還透過各種製作精良的雜誌、廣告、電視和電台的廣播節目和服裝秀散佈開來……

連青少年也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捲入對時尚的追求……

新上海人對時尚的追求似乎有著一種永不消逝的動力。正是這種動力，使上海人在生活理念上與時俱進，體現出經久不衰的魅力。  
(2002:72)

消費文化 (consumer culture) 明顯已經從四方八面包圍上海，無論走到何處，不同的商業機構及媒體都想盡辦法告訴上海市民表達／顯示富裕就必須消費；再者，更重要的，就是學習怎樣消費。根據俞吾金及與其相類似的言論來看，「有品味」是新上海人的最當時得令的身份認同，而做一個「有品味」的人，最重要是懂得選擇地消費。

在這個中國最富裕的城市，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當然是首項「必需的」消費，再跟著下來就是自用車、國外旅遊及多姿多采的休閒活動等 (Croll, 2006:86)。滿載消費情報的雜誌，不斷向人們推銷，高收入的階級必須以「時尚」的生活方式，亦即昂貴的消費去換取與眾不同的階級身份 (Bourdieu, 1984:283)。同時，媒體不斷向受眾推介新產品，為消費者創造永無休止的欲望。

從俞吾金的陳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上海人對大眾媒體所宣揚之時尚生活的浮誇渲染接受度很高。大眾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將生活全面消費化；除了買

房子，更進一步對室內設計、傢俱、家電、家居裝飾等開始大量需求。再者，擁有自用車等如同擁有敏捷（fast-moving）、獨立、自由的生活方式（Croll, 2006：91），這也正是中國年輕一代富裕階級的象徵。

據Croll（2006：94）的報導，國外旅遊已成為中國中上階層的新興玩意，他們大部份人都肯定旅遊是優質生活的一部份。由1992年到2004年，中國到外國旅遊的遊客由290多萬上升至2800多萬。

### 1. 「週末玩膩了普通娛樂場所的都市消費者」的新去處：創意產業園區

完成了買房子、汽車這些具體的硬體，富裕的人們當然會轉而追求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個細節去享樂、消費。各大媒體也無孔不入地鑽入人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去推銷消費活動。今時今日的海，到處可見到以「創意」、「文化」、「時尚」或「有品位」等字句作廣告宣傳，從宣傳衣飾打扮、周末閒暇作樂，到房地產的廣告推銷，媒體無不以這些潮流術語作招攬。同時，這些術語的使用範圍極度廣泛，對於今天的上海人來說，這些詞彙的意義，大約代表著講求生活素質及追上潮流的意思。這些似是而非的「主題」潮語除了主宰了現今上海人的價值取向及消費模式——任何事物冠上了「創意」、「時尚」的名號就是值得追捧和擁有的；這些形容詞甚至對上海的城市發展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自從於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16次全國代表大會首先提出了先進文化的理念後，中國中央政府開始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並發佈了《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畫綱要》，當中針對過去忽視文化生產力的發展，而特別提出「發展文化產業」這一項新的發展綱領。另外，更重點提出以建設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城市的核心，打造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三大文化產業帶，積極發展西南、西北地區等具有鮮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產業群。

2007年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17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的題目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該報告除了重申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性外，更再次強調國家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其中一項更說明了「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的重要性；它指出發展文化生產力是繁榮文化的必要之路，國家必須要加大力度發展，並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加快文化產業基地和區域性特色。由此可見，中央政府深明文化的經濟價值對現今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在中央政府確立了對文化的定位後，上海市政府亦立刻採取相應措施，加強發展文化發展，並且在兩方面推行文化產業的發展：（1）設立上海創意產業中心，及（2）興建創意園區。

現在於上海或中國的發達城市中所興起的產業正是文化企業（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人們不斷被媒體指導教化，渴求著多姿多彩的生活；政府大搞文化工業，市場則以文化作為主題及口號宣傳，以振興城市／國家經濟，簡直是各安其位地一拍即合。至此，文化已徹底地轉化成為財富來源，其真正價值正是可以直接兌換成現金（Wang, 2001：88）。

2004年由上海市經濟委員會、上海市社團局批准下設立了上海創意產業中心。隨之而起，就是一個接一個的「創意產業園區」建立起來，成為城市的新景觀、新文化，也為上海人繪製生活新版圖。

上海創意產業中心是官方組織，其主要工作為推動上海創意產業發展，配合政府各部門制定創意產業的發展策略，並且落實執行「將創意產業融入城市文化與城市建設之中」。但是當中所指的內容是什麼？又如何可以把「創意」融入上海的城市文化中？我們可以先從創意產業中心對「上海創意產業」作出

的定義，瞭解上海創意產業的實際內容：（引自上海創意產業中心官方網頁）<sup>21</sup>

「上海創意產業具體是指以創新思想、技巧和先進技術等知識和智力密集型要素為核心，通過一系列創造活動，引起生產和消費環節的價值增值，為社會創造財富和提供廣泛就業機會的產業，主要包括研發設計、建築設計、文化藝術、諮詢策劃和時尚消費等幾大類，並涉及諸多行業。」

「由於國情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各個國家或地區對『創意產業』也產生了不同的理解。我們認為，作為新崛起的產業，創意產業既有設計、研究開發、軟體、諮詢、會展策劃、印刷包裝等生產性服務的內容，也有資訊、文化藝術、時尚消費和娛樂等消費性服務的內容。」

從上述的定義看來，「創意產業」涵蓋的行業內容十分廣泛。上海創意產業中心參考了首先提出「創意產業」概念的國家——英國，釐定了13個相關行業為創意產業。再者，更進一步把創意產業的內容擴展及具體化，延伸到涵蓋各項文化藝術、時尚消費和娛樂消費性服務的內容。我們細讀之下，發覺有趣的是，其內容不斷將「時尚消費」及「文化藝術」相提並論。這即是說，文化藝術、時尚消費和娛樂消費成為了同等層次的「行業」。明顯地，政府並不是關心文化藝術的內在價值，而是將它貶為與大眾娛樂、消費沒有分別的東西。在政府的角度來看，這些創意產業的經濟價值或「被消費的可能性」，才是最高的價值。

上海創意產業中心的工作範疇廣泛，除了涉及統計工作、法律諮詢、協調政府各部門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好好的宣傳及管理跟創意相關工業，務求把「創意」發展為一樁收益可觀的生意。因此，我們可定言，上海創意產業中心

的發展目標，並不是單純的「將創意產業融入城市文化與城市建設之中」，而是透過「創意」來替上海塑造一個有市場價值的「身份、形象」，亦即是說，這「身份、形象」，是可以直接翻譯為消費文化，增加經濟增長（例如：增加就業、推廣旅遊等）。

上海創意產業中心將「將創意產業融入城市文化與城市建設之中」這藍圖具體化為創意產業園區的建造，將創意藝術品到處展示，當然是要建造城市形象的具體視覺表象。上海期望不單在「硬實力」上顯示為金融中心的經濟實力，在「軟實力」文化方面，她也很積極地效法世界上先進城市，把自己裝扮成為合潮流的文化城。

以創意或文化為主導的城市發展計畫並非新的構思。根據Miles, S. & Miles, M. (2004) 的《Consuming Cities》<sup>22</sup>中指出，歐美各大城市自1980年代開始已經紛紛設立以藝術、文化、創意為中心的區域，興建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畫廊、藝術家工作室等等。隨著這些文化空間的興起，各相關的行業也隨之而誕生。例如，在博物館旁邊的集中了咖啡館，畫廊、精品店的小店舖等等。Mommaas (2004) 也留意到在最近的10至15年間，很多大城市都以創立／設立「文化密集的空間」(cultural clusters) 為城市規畫的其中一項主流策略。歐美國家紛紛發展這類型的文化密集空間，認為其在於對舊區活化，提升城市形象及旅遊業發展方面具有正面作用。Zukin (1998) 在《Loft Living》一書，專題深入研究紐約城市如何利用空置廠房，建造藝術家工作室的個案。我們從中可以理解，發展城市的創意文化似乎確能有效地解決舊區老化破落的問題，因此也成為了城市發展的新出路。

在歐美，以文化活化舊區，在工廠區尤其奏效。眾所周知，隨著後工業時代 (Post-Industrial) 的來臨，城市經濟不再倚賴工業生產，改以服務性行業為主導。結果，數以百計的工廠結業倒閉，工業區慢慢變成了破舊且人煙罕

見的廢墟。舊區廠房面積龐大並且破舊不堪，並不適合作其他商業用途；然而這些廠房租金相對便宜，漸漸吸引了一大群收入低微但需要寬闊空間進行創作活動的年輕藝術家。他們在這些地方慢慢聚集起來，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裝修或重整破舊廠房的樣貌，使之成為各有特色的文化區域。由此，這些原來已經失去價值的工業區，不但變成了特色的文化區，為廢置廠房注入新的活力，更成為城市新的旅遊景點，也因而創造了經濟效益。現今世界，最著名的活化廠房的例子就是倫敦的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及紐約的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在這些世界一流的博物館旁邊，有大量的藝術家工作室、畫廊、咖啡廳、精品商店，附近的房地產價格也自然水漲船高。由此，世界多個城市也相繼模仿這套文化策略來活化城市的方程式（舊工廠改建＋博物館＋藝術家工作室＋畫廊＋咖啡廳＋商店），倡導以創意文化來發展、活化城市（尤其是舊工業區）。

上海作為中國的先鋒城市，也銳意仿效歐美城市，以創意文化為都市活化的策略。自從1865年上海開辦江南製造局（前江南造船廠）後，上海便成為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源地。全中國第一家的鋼鐵廠（1890）、發電廠，煤氣廠，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在1889年成立）均在上海出現，自此，工業不但支持了上海的主要經濟生產，同時，這些工廠的規模及生產量聞名全國<sup>23</sup>。自1990年代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落實發展浦東，銳意使上海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後，上海的製造工業生產開始走下坡。除了規模較大的工廠進行改革後依然進行生產外，不少工廠相繼結業，只剩下殘舊的老廠房。這些老廠房普遍特色均是面積大、周邊設施配套少。當工廠結業後，實在很難吸引其他租戶，整體拆卸及重建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但有鑒於中央政府釐定了文化發展的策略，上海市政府因利成便，把這些老廠房改建成「創意產業園區」。

自2005年初上海市創意產業中心成立後，便正式授權建立第一批為數18個的「創意產業園區」。自此在短短兩年間，全上海便建成了75個「創意產

業園區」，散佈在上海市不同的區域。這些創意產業園區的主要用途，皆為文化、藝術、設計及廣告等工作室或辦公室聚集場所。同時，也有其他與文化、藝術、創意行業相關聯的商店在其中經營。創意產業園區大部分是透過市場招標制度運作：政府主要扮演引導的角色，邀請發展商參與投資，承包園區的改建、招商、出租及管理經營。根據上海市創意產業中心常務副秘書長潘瑾介表示，這些園區都堅持「三個不變五個變」的原則，不變包括：房屋結構、產權關係、土地性質；以及內容變、管理形式變、產業變、周邊環境變等特色<sup>24</sup>。

上海市創意產業中心在短短2年間興建了75個創意園區，目的是務求讓創意文化的氣氛遍佈整個上海市。這舉措與2010上海世博或許有一定關係——中國要在成千上萬的外國遊客、商家面前展示上海是個能「讓（市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政府並不只是到處設立「講文明語言」來提醒市民，要表現上海是文明及有文化的地方，它更決心在硬體上把上海打造成為創意文化之都。

上海市政府協助興建大量的創意園區，以求在數量上爭取擴展創意文化的空間。此舉既可以用為上海市創造旅遊景點，又可以提升上海的都市形象。如上述，大部分創意園區的前身均是大型倉庫或工廠。上海市政府希望園區內的房屋結構不變，所以原來的建築物的外殼都被保存。但是，裡裡外外的格局及設計，則完全被改變了。

各個園區為了突顯自己為城市的新地標，它們力圖與附近地區甚至是其他園區樹立與眾不同的形象，每個都別出心裁的樹立地標性建築或雕塑。比較著名的如「8號橋」把老廠房翻新，外牆鋪上凹凸不平的磚面，並鑲嵌大型落地玻璃，並以一條橫跨馬路的玻璃天橋（名為創意之橋）連接馬路對面的建築物；還附設噴泉廣場，晚間則以色彩斑斕的燈光增強視覺效果。

總的來說，大部份創意園區都依照同一藍圖規畫：園內空間割切為不同區

域，並且由彎曲迂迴的小徑所接駁。大部分的藝術家、設計師工作室、商店、畫廊及展覽館都並不是直排式呈現，因此遊客要到園區參觀購物或用餐，往往要搜索一番，增加了尋幽探祕的趣味感。在室外空間方面，廠房倉庫門前用作卸貨的空地，現在都被改建為廣場、表演場地或者露天茶座；每逢假期都會舉辦不同類型的免費節目供遊客欣賞。

各個園區除了強調自己是上海新文化的代表外，亦都以演變過程為重點。在他們的網頁內（例如：8號橋官方網頁www.bridge8.com），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記錄舊廠房倉庫的改建歷程。以「新」「舊」對比來點出園區成為了活化城市的新動力，並力證本身對上海城市發展作出了正面的貢獻。

這些園區不但成為了城市的新景點，同時，私人機構及政府部門皆頒發林林種種的獎項予這些園區，來肯定它們存在的價值及發展的方向。例如：8號橋獲得盧灣區經委舉辦的品牌工作會議的「盧灣區品牌發展2004—2005雙年企業獎」；上海M50創意園則榮獲由上海國際時尚聯合會頒發的「06年度十大時尚地標及最高人氣時尚地標」等。

在城市層面上，創意園區成為城市的新象徵形象，這一股創意風潮席捲全城，成為了上海新的城市文化，為「時尚生活」下了新定義。上海證券報記者龍敏莉稱一般的藝術創意園區為「畫家村」，但它們其實跟畫家從事創作之活動無關，反而是一個售賣藝術商品的場所：這等「畫家村」有著「金字塔佈局」即其「底層、畫廊集聚區為中層、藝術時尚地標為頂」<sup>25</sup>。

從概念上看來，創意產業園區均是藝術家設計師埋首從事創作的工作室，或展覽作品的地方。對於藝術設計沒有多大認識或興趣的普羅大眾來說，這些創意產業園區或許與他們的消費活動並無太大相關。但實際上，藝術家設計師的工作室只是這些園區的門面（Façade）；要推銷的其實是藝術文化相關的行



業，例如餐廳、酒吧、畫廊和精品店等。因為這些創意產業園區，不但提供一個可以「搞」藝術文化的工作室，而且更是「賣」藝術文化的市集。這些園區的最終目標是要透過創意文化來建立一種「時尚的生活消費方式」。

由此，要顯出自己是一個富裕、有品味，又有文化的新上海人，就務必到這些「最前衛、最時尚」的創意園區走走。遊覽藝術家設計師的工作室展覽館之餘，也要在露天咖啡屋喝杯咖啡，吃起土蛋糕；在附設的小畫廊或創意商店，購買時尚的時裝精品、工藝品、畫作，又或者在晚上相約朋友到這裡充滿文化氣息的小酒吧內聽聽音樂……這才顯得自己是個有能力消費、更懂得何謂有品味的消費者。

大部分的創意產業園區均由私人開發商所建設和管理，為了要在眾多的園區中突圍而出，每個園區都會定期舉行一系列的市場推廣及宣傳節目，並以最流行的口號去大肆宣傳（見本文章末附表2）。我們參考了較多媒體報導的、比較了5個大型的創意產業園區（包括M50創意園、同樂坊、泰康路、8號橋和1933老場坊等）的宣傳，發現它們無不以「時尚」、「文化」的新地標自居。每園區都大肆宣傳自己是「時尚生活」的指標，而鮮有介紹、詳述當中進行的文化藝術、創意的內容。由此可知，創意產業園區的重點，並不在於如何提供多種類的創意文化活動，或者是讓參觀人士可以認識更多的創意文化內容，以提升參觀者對創意文化的興趣及知識；這些創意產業園區只為參觀人士提供虛仿的文化生活的「氣氛」、「感覺」，從而誘導人們進行消費活動。試以盧灣區8號橋及泰康路田子坊為例，我們可清楚看出文化創意及消費如何被混為一談。

在盧灣區旅遊事業管理局以及盧灣區旅遊協會所出版的《2007上海盧灣旅遊指南》中，便已經把8號橋及泰康路田子坊列入觀光地圖中。對8號橋及泰康路田子坊的介紹，有以下的記載：

「玻璃裡的通透也在不經意間營造出一種時尚的氣氛。」（頁21）

「在這裡，抽象的創意化為更具體可感的實物，身為時尚達人的你豈能錯過？」（頁22）

「田子坊上世紀30年代曾住過可能是上海最早的外企白領——洋工廠打工者；如今，這個經典的老式弄堂裡已經開滿了各色店面，咖啡館、工藝品館、畫廊、唐裝店、家居店……處處洋溢濃鬱的藝術氣息，往往在不經意間，總能有令人驚喜的發現。」（頁26）

對於今時今日上海人，消費力強勁，經濟條件理想，需要更大量的消費選擇及可能性。各個媒體把創意產業園區宣傳為休閒的好去處；例如，在《家居主張》雜誌（2007年11月號）中如此介紹「8號橋創意嘉年華開市」：

「每個週末玩膩了普通娛樂場所的都市消費者，在這個秋天又多了一個新去處。」

這篇報導直截了當的指出創意產業園區的存在理由：這些園區其實是提供了大型購物商場以外的另一種消費場所的選擇。在上海，消費不再只是為了顯示經濟能力，更要包含象徵意義。如果一個人只懂得到傳統高檔商場——如恒隆66或時代廣場，購買昂貴的外國名牌貨品，只能顯示其擁有良好的經濟條件。若要證明自己是個「有品味」的人，就必須進行「有品味」的消費。這些創意園區為上海定義何謂「有品味」的生活方式，為消費者提供一個以「創意文化為主題」的消費空間。對於今天經濟急速起飛的上海。這類以「藝術時尚」自居的地標，正切合了一群在炫耀財富以外，尋求更高一層與眾不同的（文化）身份認同的象徵價值的上海人。

Featherstone (1991) 的研究指出，生活方式 (lifestyle) 這一詞語現在已經被過度濫用。原本，這個詞語在社會學中有嚴謹的定義，它通常被理解為某一社會群體某種獨特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消費社會中，這個詞語的社會意義已經徹底改變。「(時尚) 生活方式」往往被聯想為個人主義 (individuality)、個人的表達 (self-expression) 或是富風格的自覺意識 (stylistic self-consciousness) 的統稱。

更進一步，時尚生活方式是指消費者透過在衣飾、言語、閒暇消遣、飲食上的選擇上，來反映個人的品味及風格。這正符合Bourdieu (1984) 有關人們生活的整個習慣模式 (habitus) 之分析：現今社會人們都清楚意識到，生活方式是個人顯示其社會地位及文化階層的重要指標。正如俞吾金 (2002) 所言，上海人現在熱衷於以時尚生活方式來顯示自身的「品味」。在上海，由大眾媒體以至上海市政府，皆指明「時尚品味生活」正是富裕的人們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是社會共同確認的階級分層的象徵。這套階級分層隱含的象徵意識型態，說明了必須懂得欣賞藝術或參與文化消費才是最高尚的生活品味——然而，這只是附庸風雅地將藝術與娛樂消費混為一談的見解。正如我們以上的分析，在大眾傳媒吹噓宣傳中，藝術文化完全被放進消費主義中，被換算為消費活動來讓人們理解、實踐和演繹：在任何高級消費場所，例如外灘3號或外灘18號，都附設畫廊展覽廳；所謂追上潮流的時尚空間（例如8號橋等），當然大玩展覽及藝術文化活動，還要參雜流行歌手媒體見面會、塗鴉、街舞、DJ秀、網路遊戲發佈會及創意嘉年華等。

由此來看，上海富裕階級對文化的追捧，是否代表他們的日常生活，正漸漸形成有特殊上海風味的本土文化（不管是精緻文化或大眾文化）？對於這點，我們是十分懷疑的。上海不斷的發展文化工業，但這只等同大量製造有利可圖的文化消費符號。無論商業機構或者有關當局，都只想到直接模仿外國的例子，盡速在文化創意園區中展示「現代藝術」及「設計」，希望藉此可以增

加城市的旅遊景點、改變城市形象、賺取與藝術有關的周邊行業的種種利益。但是，這條「文化密集空間」方程式：即是博物館、畫廊、展覽場地＋藝術家工作室＋畫廊＋咖啡廳＋精品商店，是否為百試百靈的城市經濟發展妙方？Mc Carthy（2006）引述Julier（2005）及Miles（2005），清楚地說明所謂文化特色地區（Cultural quarters）的泛濫複製弊端：

「如果只是機械化地以『製造地方形象』策略來發展重建城市，卻沒有邀請本土的社區居民共同參與其中的話，這等策略只會產生相反或抗衡本土文化特色的反效果。現今所謂文化更新活化策略，通常都是『依樣畫葫蘆』，衍生自同一條公式，營造出來的，只是被吹噓為有文化特色的地區（Cultural quarters），多數皆是從同一個模子複製而成。這種發展、重建策略，最後只會使得不同城市的「文化特區」毫無特色，大同小異。」（Mc Carthy, J., 2006：247，本文作者翻譯）。

這段評語，正好用來印證我們對上海那將近70個的創意產業園區的觀察。除了一兩個比較有名氣的創意產業園區在外貌上較為獨特外，我們實在說不清這些創意產業園區的從外貌到內容之分別特色何在。文化創意藝術園區的發展模式過份相同，最後的結果，就是城市成為「失去地方性格」（placelessness）的空間。走進這些創意園區，舉目皆是設計師、藝術家、藝術團體的工作室或展覽館，由園區的規畫、藝術家的作品、展品的內容甚至於精品商店售賣的產品都十分類似，特色欠奉。能夠使人們對一個創意產業園區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許只有媒體的吹捧報導。例如：莫干山路M50創意園只因為王家衛導演的電影《藍梅之夜》在那裡舉行首映而一時沸騰，但是，盛會完結之後，整個空間又回復欠缺性格、欠缺本土文化特色，剩下只是機械化地重覆著「方程式」的空間。

## 結論：在城市中，讓我們重新彰顯「人」的課題

美國總統歐巴馬到中國，第一個到訪的城市即是上海；而於2010年，第41屆世博亦在上海舉行。這個中國最富裕的城市可謂風頭無兩。

上海，尤其是市中心的发展，已十分成功地達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追求標準——高昂消費、紙醉金迷；正當人們都為上海的璀璨及鼎盛狂喜之時，我們冷靜地意識到，上海所展示的歷史、藝術及文化，已在消費主義的龐大動力控制下，全盤「功能化」、「消費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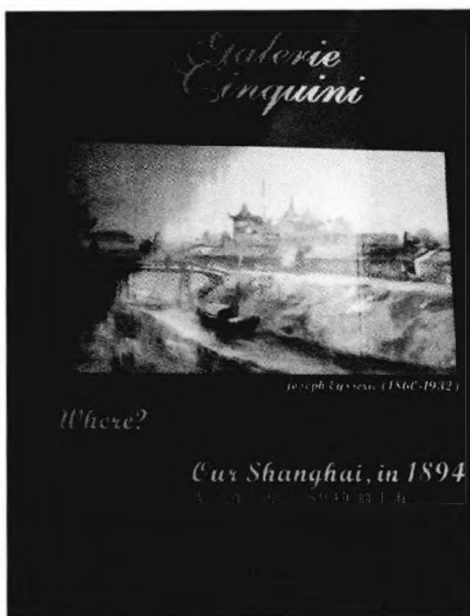
在上海，某些特定的地區營造已被概括成為整個城市的表象。這種表象包含了：（1）被神話化（mythified/mythification）的過去（浦西「租界」）；（2）被美感化（aesthetized）的現在（高檔次藝術、創意、休閒空間）；及（3）被理想（國）（utopianized）化的將來（浦東陸家嘴金融中心）。



田子坊，上海畫廊／藝術展展覽空間，也有咖啡茶座及精品店。



紅坊·包含藝廊空間·咖啡茶座及精品店。



在浦西所營造的上海的表象，是一個全盤被策略性地虛擬及虛構的空間，而營造的動力，就是消費主義。上海整體概念體現了Guy Debord（1983）於《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中所言，歷史、藝術及文化所體現的空間的展示，已轉化成為搜尋異國、懷舊風情的遊客，以及追尋秀異身份認同的國內消費者的尋歡場所。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單迎來外間世界的「硬實力」——經濟投資的資金，更迎來了全球化資本主義，消費主義那對文化進行殖民的力量。

德國哲學家，卡西勒認為歷史遺跡應被視作「過去時代精神的物化」（1990：258），但在今時今日的眾多城市中，歷史建築物已被股龐大的消費主義力量切換成為娛樂場所。他認為藝術乃是「表達人類構形的本性和感情的全域」（卡西勒，1990：219），由此推論，藝術空間應視作觀照及反思人類創作活動的場所，但此等精神空間已被這股龐大的消費主義力量切換為休閒享樂的空間。「消費」全面侵蝕人們的思維、生活方式、人們的私人時間，休憩時間與空間，也入侵了人民的生活節奏的構想及價值取向。自「新天地」改變了上海的公共與住宅空間開始，上海就一直被消化、被改造。由此，視品味消費為身份認同的最高標準的「新上海人」也誕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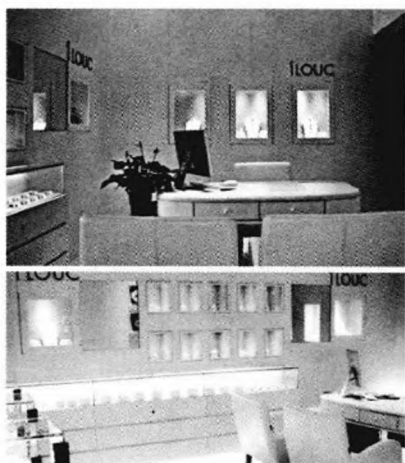
如果硬要把上海與巴黎相比，就讓我們回顧到由奧斯曼（Haussmann）改造之後的巴黎。於上海此刻的盛世，就正如19世紀中葉的巴黎，成為商品拜物教的朝聖之地，以及資本主義文化最高的展示場：

簡言之，奧斯曼試圖推銷的是一個新穎而現代的共同體概念，金錢力量將在當中被讚頌為華麗大道上、百貨公司裡、咖啡館與賽馬以及「商品拜物教的盛大慶典」——萬國博物會中的景觀與展示。





新天地的露天咖啡座



8號橋的藝廊空間、咖啡館及精品店

現代社會中，「全球化」資本的運行及消費主義已完全控制了城市的實體營造，也因而控制及扭曲了城市實體作為時代精神的體現與象徵。本文作為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的反思，其目的正是採取批判的立場，竭力去分析、揭示主流的意識型態，從而理解城市的營造之邏輯與權力，如何控制活在其中的人們的具體文化與生命的實踐。

什麼是城市文化？什麼是歷史？什麼是藝術？在這過度設計的城市環境中，一切的運作及目的都只在乎展示（exhibition），而且其所展示的事物乃是沒有深度、沒有記憶的虛擬景觀；而展示的目的正在於讓資本主義消費文化更暢順地在全球運行。

如此種種，那些被稱為「人類經驗」的體驗，都失去了班雅明所言，那唯有在人類文化的傳統內滋長及承傳之「獨一無二性」及「靈光」（aura）了。

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經訓示過「美」的真諦：

早期的攝影多為人像攝影，並不是偶然的。對已逝或已遠去，深愛的人們的渴望與懷想，在照片中凝聚成為儀式價值（Cult value）。早期攝影所能捕捉的，就是在被攝者臉上彷彿散發的「靈光」的表情（aura）。那是「靈光」的最後一次彰顯，儀式價值最後一次的顯現了。這就是使早期照片瀟灑憂鬱的氣氛（melancholy）的原因。「靈光」令它們散發著無可比擬的美（incomparable beauty）<sup>26</sup>。

在我們的世代，在城市中，那種於歷史遺物中彰顯的、無可比擬的文化之美（incomparable beauty），已經蕩然無存。城市，隨著大量複製影像的充斥、隨著虛擬環境的不斷（再）建造、隨著人們只視文化為消費，將「美感」轉化為「時尚」，已失去所有的「靈光」，已失去所有的「美」。

附表2：部分創意產業園的宣傳

創意產業園	宣傳口號
M50創意園	<p>「營造了蘇州河沿岸濃厚的文化氣息」</p> <p>「成為蘇州河邊獨特的人文景觀，成為上海時尚文化新地標。」</p>
同樂坊	<p>「上海同樂坊時尚社區誕生」</p> <p>「國家和地區的酒吧餐飲、時尚發表、影視創意等商家簽約入駐」</p>
泰康路	<p>「泰康路在這裡藝術家雲集，藝術品薈萃，成為上海的文化心臟」</p>
8號橋	<p>「8號橋同時賦予我們與眾不同的時尚理念」</p> <p>「最IN、最熱的派對活動」</p>
1933老場坊	<p>「歷史遺留建築，融入現代時尚，成為上海的新地標，總體規畫定位，吸納外灘18號的高檔時尚、新天地的人氣活力、田子方的藝術氛圍，結合創意體驗與創意生產，融互動與靈感為一體。」</p>
尚街LOFT	<p>上海首家以打造國際時尚為主題的創意園區</p>

## 注釋

- 1: 英國鑒定的13個創意產業具體包括廣告、建築、藝術品和古玩、工藝品、設計、時裝、電影與錄影、動漫、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體與電腦服務、電視和廣播等。
- 2: 上海外灘，位於黃浦江畔，一般是指從北京東路外白渡橋至金陵東路的黃浦江西岸道路，全長1300公尺（近年向北延伸至黃浦路，稱為北外灘；向南延伸至南浦大橋，稱為南外灘，全長4000公尺）。外灘曾經在20、30年代為上海商業中心地，洋行林立，從事各種各樣的貿易。上海20、30年代的繁榮形象，也是外灘為主要象徵。在殖民租界時期，外灘西面由英美法日等國家的企業及銀行，建成新哥德式、古典式、中西合璧式等52座風格迥異的大樓，被譽為「萬國建築博物館」。
- 3: 外灘大部分的建築物已經被改建為高級的餐廳及國際名牌的集中地。外灘3號首先在2004年重新改造，成為高級時裝、藝術、餐飲及文化的地標。除了世界頂級品牌Giorgio Armani和Emporio Armani專賣店外，外灘三號還有Jean-Georges法國餐廳、三度音樂沙龍、三號品牌專賣店、伊雲水療、馮申畫廊等豪華購物、餐飲與休閒設施。外灘18號也在2004年改建，成為了世界級品牌服裝、配飾及珠寶、餐飲的集中地，其中包括卡地亞、傑尼亞。另外，多家著名的高級餐廳集中在此，包括：法國米芝蓮三星級主廚在中國開的第一家餐廳及頂級粵菜「灘外樓」等。另外，外灘5號一樓是華夏銀行，其他樓層則改建為豪華SPA、著名餐廳及酒吧；外灘6號一樓是Dolce Gabbana的旗艦店及酒吧，二樓則成為了著名的高級日本餐廳；外灘9號前身為美國旗昌洋行，經改建後成為臺灣服飾品牌「夏姿·陳」的旗艦店。旗艦店有760平方米，一樓分為中庭、男裝、女裝、家飾精品部分，售賣高級時裝。
- 4: 現在的「外灘三號」是一個彙集了當代時裝、藝術、餐飲、文化及音樂之都市生活地標。除了世界頂級品牌Giorgio Armani和Emporio Armani專賣店外，外灘三號還有Jean-Georges法國餐廳、三度音樂沙龍、三號品牌專賣店、伊雲水療、馮申畫廊等豪華購物、餐飲與休閒設施。（據新華網「外灘三號」：中國奢侈品牌本，2005年09月28日）
- 5: 據香港大公报新聞網「外灘名廈重新詮釋現代風貌」（2007年1月12日）  
<http://www.takungpao.com:82/news/07/01/12/TK-677361.htm>
- 6: 據香港文匯報「引名牌設旗艦店 外灘群樓大變身」（2005年4月26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05/04/26/AV0504260001.htm>
- 7: Balfour, F, 2007, 'Shanghai Rising', *Business Week*, Issue 4022, 50-55. 中文為本文作者翻譯。
- 8: 石庫門建築自19世紀中葉開始在上海租界出現，是上海傳統的住宅建築。由於其門框採用厚青花崗岩石，門楣上則刻有獨一無二的圖案裝飾，因而命名為「石庫門」。由近百間樓房以連排方式整齊並立的石庫門則組成「弄堂」，當中則有狹窄的過道（稱為里弄）貫穿整個建築群。石庫門是象徵中西合璧、新舊海派文化結合的見證。
- 9: 上海新天地在2002年獲得由美國建築師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 頒發的「文化遺產建築」獎 (AIA Citation for "Heritage")。根據上海新天地的官方網頁的資料說明，該獎項肯定了新天地對歷史建築的創造性改造，認為新天地對石庫門的保護再利用促進了公眾保護古建築的意識，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益。另外，上海新天地在2003年獲得2003年度由美國Urban Land Institute頒發的「國際大獎 (ULI Award for Excellence)」；在2004年，更獲得由中國國家文化部頒發的「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獎。
- 10: 因為要抵禦外敵及容易管理的緣故，石庫門都是並排而設的，每個建築物之間出現一條一條狹窄的巷道。
- 11: 瑞安房地產有限公司官方網頁：業務回顧<http://hk.biz.yahoo.com/p/hk/review/index.html?s=0272.HK>
- 12: Mayhew, B., 2001, *Lonely Planet Shanghai city guide*;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Melbourne, Oakland, London, Paris, p.71.
- 13: 「內山書店」由內山美喜、內山完造創辦，1929年開設現址。魯迅晚年在上海的重要活動場所，魯迅常來內山書店購書、會客，並一度在此避難。「內山書店」現已改為售賣古錢、銅幣、紀念章等物品的商店。
- 14: 「公啡咖啡館」在民初，曾經是魯迅、田美、丁玲、茅盾等民初文人聚首一堂的的咖啡館，現在只剩下門口的招牌，店已經沒了。1929年10月中旬，在公啡咖啡店的二樓，「左聯」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議，魯迅先生也出席了；於1930年2月16日，「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於公啡咖啡館召開。是日《魯迅日記》載：「午後同柔石、雪峰出街飲咖啡。」「公啡咖啡館」現已關閉。
- 15: 上海旅遊局的官方宣傳小冊子中，文字及照片主要介紹多倫路位置及商店所售賣的產品，其中有關部門歷史文化只是略為交代：「多倫路，原名寶樂安路。在修葺翻新後，多倫路的路面用石塊鋪成，女人的高跟鞋走在上面格外的清脆。路兩旁的各式洋樓塗飾一新，門面洞開，皆為雅商，字畫、古董、紅木器具，一路列過去，甚是風雅……這條在地圖上難覓其蹤的小，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卻寫下了濃重的一筆。諸多彪炳史冊的文化名人如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曾在這裡聚會、吶喊、戰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華藝大、上海藝術劇社、公啡咖啡館這些都是他們的戰場。」（上海旅遊局的官方宣傳小冊子—多倫路），2005。

- 16：本文作者之一曾嘉雯曾經於2005年至2007年間進行了一項有關不同遊客對上海旅遊景點的文化表象（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Shanghai）瞭解的研究。作者採用民族誌的研究方法（ethnographical research），親身參與多個上海本地旅遊團，觀察及訪問內地和歐美遊客對上海著名旅遊景點的觀感。其中主要的景點包括以不同：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新上海高科技發展的表象）及上海新天地（老上海風情的表象）等。左頁表簡述她／他們的反應及觀感：從以上的發現我們可以看到，內地遊客熱衷追求新上海的景物，她／他們希望能透過參觀這些景點而看到上海經濟及科技的急速發展。但是歐美旅客對此並不感興趣。相反，她／他們對老上海的異國風情充滿想像及期望，希望到上海新天地體驗及感受老上海的風情。不少內地遊客把上海新天地定義為只供外國遊客參觀的景點，她／他們對所謂的老上海表象沒有強烈的興趣。（詳情請參考本文作者碩士研究論文：Tsang, Ka Man. (2007) Dreaming Shanghai-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Shanghai, Mphil thesis. Hong Kong: School of Desig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景點	反應及觀感	
	內地其他省市遊客	歐美遊客
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及陸家嘴地區	<p>內地遊客對參觀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及陸家嘴地區表現十分興奮。她／他們普遍認為參觀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是上海最重要景點之一。</p> <p>她／他們不介意花一或兩個小時排隊到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內部觀光。對她／他們來說，必須到達電視塔頂觀光，才能體驗「高科技發展」及「祖國的繁榮富強」。</p>	<p>大部分的歐美旅客對參觀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及浦東陸家嘴地區的行程並不熱衷。對歐美旅客而言，浦東陸家嘴地區「不外乎是摩天大廈」。</p>
上海新天地	<p>內地旅客對上海新天地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也沒有什麼興奮的表現。</p> <p>她／他們到達後，均喜歡在那些象徵老上海的景物下拍照留念。略為遊覽後，她／他們大多表示不需要在此景點逗留太久。她／他們普遍認為上海新天地是一個「主要供外國遊客消費的地方」。</p>	<p>歐美旅客透過媒體及不同的旅遊小冊子認識上海新天地，大部分對此景點抱有很高的期望。她／他們希望能夠從中看到上海昔日的風光及面貌，感受上海的懷舊風情。</p> <p>當她／他們到達後，對那些象徵老上海的景物表現雀躍，紛紛拍照留念。但是，在遊覽過後，她／他們大多表示較預期中失望，因為上海新天地內充斥大量國際連鎖店，與老上海沒有太大關係。她／他們認為上海新天地不過是一個「餐廳及酒吧的集中地」。</p>

- 17: Chen, X.M & Orum, A. M., 2009, "Shanghai as a New Global (izing) City: Lessons for and from Shanghai", Chen, XM. (Ed.), *Shanghai rising: State power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in a global megac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239.
- 18: 新京報「各城市以常住人口取代戶籍人口統計人均GDP」。(2008年02月02日)。  
<http://news.big5.anhuinews.com/system/2008/02/02/001944804.shtml>
- 19: 上海市統計局。「2007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8年2月26日)  
<http://www.stats-sh.gov.cn/2005shtj/tjgb/node94/userobject1ai3609.html>
- 20: 國際雜誌在上海創刊年份:《ELLE—世界時裝之苑》(1988)、《時尚COSMOPOLITAN》(2001)、《Marieclaire嘉人》(2002)、《時尚芭莎》(2003)、《VOGUE》(2005)、《生活月刊》(2005)及《Milk》(2006)
- 21: 上海創意產業中心官方網頁。[http://www.scic.gov.cn/creative\\_industry/shgl\\_01.htm](http://www.scic.gov.cn/creative_industry/shgl_01.htm) (2008年3月3日)
- 22: 中文譯《消費城市》。
- 23: 陳鳴華·2003·〈在六分之一處閱讀上海〉載吳辰編:《上海老工業》·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頁4
- 24: 根據上海證券報。「藝術聚集點變身「創意產業園區」成風潮」。(2008年2月22日)。
- 25: 根據上海證券報。「藝術聚集點變身「創意產業園區」成風潮」。(2008年2月22日)。
- 26: Benjamin, Walter.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part IV), (1935:5)*  
<http://design.wishiewashie.com/HT5/WalterBenjaminTheWorkofArt.pdf>

# 從上海到全球化

溫家寶說：那麼我們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呢？……中國這些年經濟雖然發展很快，但是由於城鄉不平衡、地區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們確實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溫家寶介紹說，前不久，就是為了徵求群眾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我到離北京只有150公里的灤平縣。我看到那裡的群眾雖然這些年來生產生活條件有所改變，但依然與北京有很大的差距。這個村子我已經去了3次了，分別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我經常勸記者多到中國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看看，你到那裡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發展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我們要實現小康目標還需要做出艱苦的努力；要建成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至少要到本世紀中期；要真正實現現代化，還要上百年的時間以至更長。

——2010年3月14日報導11屆全國人大3次會議閉幕會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採訪11屆全國人大3次會議的中外記者見面，並回答記者提問（中國網紀錄）。

2007年金融海嘯之後，美國、歐洲甚至日本的經濟都陷入衰退邊緣的困境。全球資金湧進中國，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有的富經濟增長潛力，越來越富有的國家。2010年夏天，上海世博開幕，全球的焦點更集中在上海這個中國境內最富有的城市。很多學者都認定，自從1990年浦東新區開發以來，上海就越來越變成全球矚目的城市。特別是2000年後，上海的建設開始有了規模，很多城市研究的論文都集中焦點討論上海是否符合「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標準，是否可被接納為「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其中一份子；如尚未達標，學者們便進而研究檢視，上海是否是一個（正在邁向）全球化的城市，泛論它得以「晉級」的成因條件為何。當我們細心閱讀西方出版有關上海的發展論著，會發現大部份西方城市研究者皆傾向於預設「上海竭力期望成為世界城市」為前題，提供大量數據來判定上海有否資格被界定為「全球城市」。然而，當我們將那些在英語界學術期刊出版的論文與中國國內學者<sup>1</sup>（部份是和官方機構有關的學者）刊行有關上海發展的評論和報告時，卻會發覺，兩者的論點有很多不同之處。於英語出版的論文，我們從分析得知，西方評論家所建構的「全球化」及「全球城市」的論述（discourse），其實潛藏著深層的論述權力，強勢地以一套詞彙羅列分類範例，並闡述發展邏輯，進而對應分析及評價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轉變。相比之下，中國本土學者對於「全球化」的論述，卻是深入的分析及內省，其總體焦點在於「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威脅及對中國全國經濟的影響。再者，中國學者對上海的發展，當然是採取樂觀的態度，但同時又極務實而且審慎。

本文的目的即是想將上述兩個立場作細微的比較。我們首先會分別檢視在西方英語界以及中國學術界有關上海的發展評論各有關文章內，尤其集中運用的範式（paradigm）：「全球城市」（global city）所引申而來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以及其衍生之各項概念，作比較表述，從而理解上述兩個立場的異同。本研究正是嘗試回答以下問題：中國是否積極期望著上海可被西方世界評定為「全球城市」？



## 西方「全球城市」強勢論述對上海的「分類」及「收編」

若我們整理將近10年來在英語學術期刊中，有關上海城市空間發展之較具代表性的研究，不難發現大部份研究都很順理成章地以「全球化」經濟結構及趨勢作為開場白。這些論文認定，基於「全球化」發展的巨大壓力之下，世界上大部份城市都必須進行城市的重構及重建，以維持其在全球化環境中的經濟競爭力。一些在「發展中的」、新興經濟強國如中國等，其中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也在迎頭趕上，以圖在「全球城市的排行榜」中佔上席位。這篇文章皆以「邁向全球城市發展是硬道理」為主調來討論上海發展；它們不厭其煩地檢視並預測上海的各項條件，描述上海的潛力、已達成的成果、發展趨勢及面臨的限制。總括來說，它們大都依從以下的行文邏輯及組織：

### 1. 全世界經濟正在以「全球化」的模式全速發展

Yehau D. Wei (2004) 的文章，一開始便表明，成為「全球城市」是大多數發展中或轉化中國家的主要城市的首要目標。作者舉出亞洲的主要城市例如首爾、香港、新加坡、台北，以及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城市上海和北京，皆正為竭力為成為「全球城市」而展開激烈的競爭。研究上海全球化的專家學者 Fulong Wu 在更普遍層面上肯定地指出，「全球化」已成為對現今世界論述的新的「後設／基礎論述」(Wu, 2003)。

Fulong Wu 在2000年出版名為〈The Glob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 Remaking Shanghai as a World City〉<sup>2</sup>的文章即指出，儘管上海並非完全沒資格與排榜首的「全球化」城市相比較，但是全球化的經濟運作模式對上海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上海自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越來越多外國資金湧入，浦西開始重建，90年代浦東開發，上海市的土地用途大規模改變為接受外資的房地產市場，上海的地景在極短速時間內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sup>3</sup>

Fulong Wu於同一文章中，清楚指出中國的發展方向及策略正是竭力將上海再次塑造成為龍頭——即一個位於中國的全球化城市；文中提到：使上海「再次全球化」對中國來說是一項重要工程，原因有二。其一，在20世紀90年代，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吳邦國等）皆是從上海的政治權力核心晉升至中央；其二，如果中國要進入及參與全球經濟體系，並扮演重要角色，一定要建立一個全球化城市，以增強在發展中的國際貿易的動力。而上海，基於它在19世紀開埠時期曾是「東亞最大的金融中心」，現在仍是其所處的長江流域中最重要城市，更是整個地域之經濟推動力，故此，中國選擇了上海來承擔這個發展為全球化城市的重任。上海肩負這宏大目標，必須先發展為企業型都市。Fulong Wu很肯定地指出上海的定位即為企業型都市。而所謂企業型都市，就是視城市分身作為一個機器，其功能就是創造財富，推動資本累積、及增強其自身經濟競爭力。自80年代，上海的「對外」「開放」政策，主要是「開放」上海城市，讓外來的資金可進入投資。外來的資金，不單只投放到工業生產的範圍中，此外，還涉及吸引跨國公司來上海設立區域總部。更進一步，就是成立及發展房地產市場，容許外資大量滲進上海的都市空間，成為重建、重構及營造的動力。Fulong Wu強調，上海的改革發展，其實正是整個城市邁向市場化的進程。故此，從此思路脈絡出發，Fulong Wu認為，我們必須以「全球化」加上「市場化」這兩個概念去掌握現今中國之發展（Wu, 2006：xvi）。

在這種強勢的論述環境中，我們發現，很多有關上海的文章的題目，皆以「在全球化進程中」（globalizing）、「正在發展成為世界城市的途中」（pathway to world city）、「在上升軌道上」（rising）去形容、勾劃上海的情勢；另外亦有為數不少的學者，會回溯20世紀20、30年代的海，界定其為當時之世界大都市，或「東亞最大的金融中心」，認為現時的上海乃是重振威風，故此，其文章會以「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再生（regenerating）」或「復興（Renaissance）」來詮釋上海近期的強勢發展。直接稱上海為全球城市來勾劃上海之發展的論文，也為數不少。

## 2. 列舉頂級全球城市的優勢，以及制定全球各大城市的層級／梯隊榜（global urban hierarchy）——再下來，就是問：上海排行第幾？

很多專門研究中國都市的學者都認定，現在擠進「全球都市的層級／梯隊榜」乃是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的首要任務。參與世界經濟的營運、並在其中維持佔有一席位置的競爭，是這等城市不可逃避的重任。Yawei Chen（2007：13）認為面對這激烈的競賽大潮流，各個城市的命運就只有在其中出盡策略（strategies）去「火拚」，而結果，就只有成功或失敗兩條路。失敗者面對的惡果就是在全球都市的層級／梯隊榜中一直往下降——其隱義就是，這「失敗的」城市必然要面對從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被邊緣化或被排擠出外的厄運。

這個被眾多學者皆引用之「全球都市的層級／梯隊榜」的由來，據Peter Hall（2005）之陳述，是80年代 John Friedmann首先提出全球化的進程導致新的城市排行層級出現，他指出，倫敦、紐約及東京這三個頂尖城市組成了「全球化經濟連繫網」（global financial articulations）。Sassen繼1991年的書作：《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之後，於2009年，Sassen寫了一篇文章〈Cities in Today's Global Age〉<sup>4</sup>，更是明正言順地以「全球都市的層級／梯隊榜」作為她進行的城市分析的框架，其主要目的，是展示她在2008年為頂級跨國金融機構——萬事達信用卡世界商業中心所製作的5個城市排行榜<sup>5</sup>。Sassen主要依著經濟上的功能、特質或主題，設立了5個排行榜標準，以100分為滿分，將全世界75個主要的商業城市依名次排列。

從Friedmann到Sassen，都在著作中重覆提出一套城市之「全球化資格」評審標準，並依據這些標準訂立了排行榜。這等由權威學者們所制定，所謂城市之「全球化資格」的「排行榜」，屢屢成為其他（即未夠她／他們那般權威的）城市研究者們經常慣性參考的編排。這些權威的論述尺度，像極了風水師手中的「羅庚」，城市研究者們對著無論世界上哪一個城市，都慣性地引用那些出自權威的標準來檢驗，因而也跟著十分權威性地定奪這個城市的「運

勢」：學者們把這套標準套在城市的各種經濟發展狀況上，針對這個城市各環節的數據表現，並於結論中定奪，究竟這個城市能否被列為「全球化城市的資格」，再給予它一個名次（在哪個城市之前、哪個城市之後）等。當然，假若能入圍，便登上「龍門」，被證明為外資願意進入從事投資的城市。

上海自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惹人注目，自然廣被專門研究中國城市的學者檢視，上海究竟合不合資格、能不能被界定為「全球化城市」。當然，Friedmann以及Sassen所製定的城市「全球化資格」之權威「排行榜」，必定成為定奪這個城市的「運勢」的標準了。

在《Pathways to a World City: Shanghai Rising in an Era of Globalisation》<sup>6</sup>中，作者Yusuf & Wu（2002）引用了Sassen、Friedmann、世界銀行等不同觀點，將紐約、倫敦及東京排在「全球城市」的榜首，繼而以這3個城市的經營運情況作為標準，直接指出一個城市要成為「世界城市」的必備材料（necessary ingredient），他們認為所謂的全球城市必定為：

- （1）金融及文化的重鎮（capital）；
- （2）世界經濟及金融的主要營運地區；
- （3）在位處的國家中佔極優越的地理位置；
- （4）在地域性及國內的交通網絡中扮演中樞的角色；
- （5）專業服務性行業在其中蓬勃發展，並作為這些行業的集中地；
- （6）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力資源、專業菁英人才，創意概念絕對開放及吸引。

這篇文章的作者，除舉出這套標準外，也同時引用了 Douglas 在 2000 年所描述的全球城市的特徵，包括金融中心、跨國公司總部集中地、全球化專業服務行業、國際交通樞紐同時是國際會議、展覽及活動中心。在導論中羅列細數這些標準特徵後，作者Yusuf & Wu 便逐項評審（當時的）上海的各個

環節達標與否。在文章的結論中，作者正面肯定國際城市排行榜的權威性；並認為唯有佔據榜首的那些處於優勢的少數城市，會在全球層面中扮演經濟、文化極具象徵價值的龍頭角色。作者提到，擔任區域中心或全球中心角色的城市數目，必然會隨著經濟正面發展而增加。但有意角逐成為「全球化城市」的城市，必須要達到一些標準及滿足某些條件；而中國若能保持其經濟增長、上海持續其開放政策、保持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發展高科技行業、擴展房地產及基礎建設營造、改善城市的生活素質等，上海便極有優勢發展成一個全球化的東亞城市。

兩本展述上海目前狀況及發展的書籍<sup>7</sup>，都把Sassen的文章置於首個章節，以達擦亮招牌、壯大聲勢之效；而這兩篇文章中，Sassen以間接或直接的手法，審視了上海是否能夠資格稱得上是全球化城市。〈Formation of the Intercity〉一文中，Sassen釐定全世界有40個城市組成了全球化經濟運作的連繫網，她更依著不同基準，樂此不疲地將這些城市依次排列。她首先將一些亞洲城市依其整體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程度分為兩個等級（東京、香港、新加坡、首爾、雪梨、孟買乃是歷史悠久的國際商業中心；上海、北京與貝魯特等則是新晉的份子），其次，她認為其中有些城市是全面性的全球化城市，但其他城市則僅具備全球化城市的某部份功能。文章的其他章節，則分別以全球化金融業之營運、全球化銀行業之營運、全球化外匯市場之營運等主題來為各個城市分配層級。Sassen這篇文章雖然被置在一本討論上海城市景觀營造為主題的文集中作為首章，但文中正式直接提及上海的篇幅很少。這篇文章對上海的「全球化成份」的評價，十分間接，作者只在全球化資本市場即股票市場一節（2004：12）中提及「上海已被連結到不同的全球化運籌網絡」。

在〈The Global City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Shanghai〉文中，Sassen沿用著她自己於2001年出版的《The Global City》所組織之全球化城市的界定，來檢視上海能否擁有晉升為全球化城市的資格。此一界定由7

個假設組成，其中前4個假設，總括來說是演繹資本集結（capital fixity）及資本移動（capital mobility）之關係——跨國公司因其業務及營運分佈在世界各地，因而要向高度專業的機構購買複雜專業的服務（例如不同地方的法律、稅制及會計系統等）。然而，這些跨國公司的總公司地位，卻沒有其高度專業的服務外包給專業的機構處理而導致地位降低；反之，總公司因必須處理組織及協調各項外判工作，由此而變得具有指揮中心式的重要性。因此，正如此模式所列的第5點指出，此類總公司通常是集中於先進城市的商業中心地段。由於全球化投資活動越來越熾熱，一個國家的地理空間，不是被視為生產的資源就是被看成為市場，故此，國家政府的管治功能首要乃是協助跨國全球化業務順暢運作，由此，本土政府的位置越來越被跨國公司的重要性所取代；同時，因跨國公司的業務及營運是面向全世界的，故此，跨國公司的集中地——全球化城市與其地域周邊腹地，甚至本國的經濟網絡及體系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遠。

至於第6點，總括而言就是因為城市的商業中心集中了跨國公司總部及專業的機構，故此也將一群極高收入的精英、專業人士聚集在城市中生活。她／他們的生活素質及方式與一般在地地的平民老百姓實在有雲泥之別，因而社會上出現了明顯的貧富懸殊。而第7點則是描述經濟活動越來越電子資訊化（2009：15）。

在簡列出上述7個假設後，Sassen判定上海還是遠遠地未能稱得上是個「全球化城市」，並直接地指出首3個假設未能應用於分析上海的發展。她認為，排頭位的全球化城市例如紐約或倫敦，會有極多先進專業服務性行業高度集中；但是在上海，這個現象還未見蓬勃。至於其他4個假設，儘管上海的情況與之頗為吻合，但也未必能讓上海稱得上是全球化城市。例如，雖然2002年開始，上海的國際研發中心數目不斷增加，但Sassen卻認為，這是因為在中國沒有其他城市能提供完善的環境及條件給國際研發中心在其中設立，於是在此無競爭情境下，結果上海變得獨大。同時，上海基本上和周邊的腹地的經濟

關係極其密切，這即是說，上海不能擺脫其在本土經濟的角色，而獨立地在經濟上與全球的網絡接軌，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節點」——這情況與上述的7大標準之第5點之要求完全不符。

再者，Sassen很諷刺地指出，在上海，社會經濟不公平之情況日趨嚴重；但就算如此，也與全球化關係不大。這種社會經濟現象的根源乃是上海本身之問題。導致貧富懸殊的原因，當然有部份是源自高薪專業服務或資訊科技行業的出現，但主要原因，則是基於有很多上海人是低薪的製造業及建築工人，或由下崗工人轉職為低薪的侍從工人。

近30年來，上海對外開放及經濟高速發展的強勁勢頭，令人很理所當然地採用在同時期日漸風行的論述範式——「全球化」及「全球化城市」去闡釋上海的發展過程及目標。Fulong Wu以英語在各重要學術期刊，出版多篇文章論述上海在全球化環境中的發展。並且同樣地，自〈The Glob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 Remaking Shanghai as a World City〉<sup>8</sup>（2000）一文以後，Fulong Wu也常引用「全球化城市」這個論述範式去檢視衡量上海的發展進度。但是在2009年所出版的文章〈Globalization, the Changing State,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Shanghai〉<sup>9</sup>中，他卻開始認為以「全球化城市」這個論述範式去闡釋上海的發展過程，只是一廂情願的思維。因為紐約、倫敦等已開發國家的先進城市雖是「全球化城市」的典範，然而「全球化城市」這個理論概念，也只適用於上述那些已發展國家的先進城市。他認為上海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城市」，要高攀這個稱號，是極值得商榷的。

Wu認為，儘管中國的經濟進程越來越融入全球化體系之中，但是，援引Sassen在同書文章所列的「全球化城市」之量化指標，並以這類量化指標去檢視上海的經濟狀況時，便會發覺上海距離「全球化城市」的規模還有很遠的距離。他很清楚地強調上海在全球都市的層級／梯隊榜中名次，乃是連底層的三

分之一那個組別也沾不上；而今日上海以「全球化城市」為其發展方向或目標，其主要原因並不是在經濟方面，其蓬勃狀況也並非全因市政府也從善如流，製造良好開放的開放營商環境，吸引外資不斷湧入。他認為，上海能夠有如此的蓬勃發展，是基於國家中央政府的決策，容許支持上海發展是配合國家參與世界經濟之進程，這亦即是說，上海的發展是國家中央政府的政治決定。

Wu認為，其實中國將上海的發展方向放置在全球化進程中，目的是為顯示中國堅持延續其經濟改革及向世界經濟開放的策略。若此策略能夠成功並獲得成績，中國便可以在整個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大潮流中被承認，並進而創造其自身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乃至國家本身的規範、調節之權力的雙重合法性。故此，上海開展全球化進程，由始至終都是中國的一項政治手段，而不是城市憑著經濟資本之自身運作漸轉化而成的結果。Wu一再舉出Sassen所設定的「全球化城市」指標——在這個指標的涵蓋中，城市的營造及發展，往往主要依從全球經濟資本的集結和移動模式，而國家或地方政府相對只能採取讓步和配合的策略，來順應全球化資本以及高度專業化的生產技術與服務的運作，因為此兩者才是真正促使「全球城市」成立起來的元素<sup>10</sup>。在已開發國家，政府勢必要採納新自由主義的思維，好讓經濟全球化順暢地運作。若從此條件來看「全球化城市」，上海永遠都不會被全球化或（再次）全球化。因為，上海的發展主要是要配合中國的發展。將上海全球化，實則是國家的政治規畫，其方向是實踐國家的本國經濟發展之計畫。

由此，Wu認為既然上海不是「全球化城市」，它以後發展的路可能往兩個方向邁進：其一乃是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更為緊密地連繫在一起；其二則是上海將會與其周邊鄰接腹地的經濟策略，發展出更為緊密的互相依存關係，由此而使周邊鄰接腹地藉著上海的蓬勃發展而與全球市場運作聯繫起來。



## 從中國整體發展出發——中國學者對上海發展的論述

本文參考了Fulong Wu從1999年到2009年所出版之討論上海發展的論文，發覺Wu在這十年間，都以全球化為主線來衡量上海如何以全球化城市為目標而高速發展，以及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等。於2007年，他以其漢名吳縛龍，與李志剛、高向東合著了一篇文章〈「全球城市」極化與上海社會空間分異研究〉，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很明顯地以John Friedmann的世界城市的定義為基準，指出「上海可謂東亞最具潛力的全球城市」。然而，Wu在兩年後，在其以英語撰寫的文章〈Globalization, the Changing State,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Shanghai〉中，卻很肯定地指出，上海並不是一個全球化城市。在這種不穩定的論述情況中，我們該如何理解上海的發展方向？是否如Wu或其他（在英美學術期刊出版論文的）學者所言，上海之所以成為一個對外開放、融入全球經濟中發展的城市，主要是依據中國國家的政治經濟策略所主導，而非由於全球化經濟自身的發展？

假若我們將「全球化城市」及「全球化」等概念，放在中國本土的論述脈絡中去理解，會發現中國本土的學者，對中國整體發展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之觀點及闡釋，的確和西方學者的想法有著明顯分別。對於此等分別的理解，我們企圖首先從中國學者對浦東新區的發展之展述開始作一掌握。

細心研讀中國國內出版、有關浦東發展的書籍（作者通常是和官方有關的學者）<sup>11</sup>會發覺，作者並不常以「全球化城市」來界定上海的現況或其發展方向。2003年出版的《海外學者論浦東開發開放》一書中，主編俞可平每每感性地讚嘆：「浦東使上海恢復自信」、「浦東令上海經濟騰飛」、「浦東是上海的榮耀」、「浦東是21世紀的城市」……等，這些讚賞明顯勾劃出浦東在經濟以外的發展目標：作為國家的富強而且穩定地發展的象徵。俞可平明言，上海為中國其他省市所展示的，正是一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之形象：「中國各

省市在浦東的機構都有置身國際經濟社會中的感覺，從而幫助本省市縮短了和世界的距離」（俞可平，2003：8）在本書序言中，俞可平以三個「更」字來點題：更高、更快、更好——即，其一，上海的發展比深圳發展所定的目標更高；上海不單要成為區域長三角的經濟起飛龍頭，更要成為國家甚至遠東國際經濟和金融中心；其二，上海的發展比其他特區的發展更快；其三，浦東的開發是當代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最大工程。最後，俞可平很野心地預言浦東最終「將使香港黯然失色」。

在此要特別留意的是，俞可平所提出的皆是上海與中國國內其他城市的比較，這明顯表示了作者的焦點仍在於上海相對中國國內整體的城市發展，而不是著眼於檢視上海還欠多少實力才能達到「全球化城市」的標準。

俞可平雖然指出「浦東的開發是當代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最大工程」，但全篇並沒有稱上海為「全球化城市」或「邁向全球化的城市」；而序言的最後，更指出經濟全球化帶來種種不確定的因素。他認為中國金融部門改革還處在初級階段，浦東在這個方向上，採取的實驗步驟最好穩健些，因為中國金融部門的發展將影響到整個中國經濟轉型的進程。（俞可平，2003：13）從此字裡行間去理解，作者縱然感性地誇讚浦東的開發，但對「全球化」仍充滿慎重；他的展述步步為營，並沒有誇耀上海如何成為「全球化城市」或「邁向全球化的城市」。

另一位重要官員：Zhang Xuebing（張學兵），以英語出版了介紹浦東發展的一本書：《Shanghai Pudong》，其序言及終章，涵蓋了浦東的發展歷史背景、現況陳述及開發展望。書中行文重覆地運用「現代的」（modern）來形容整體城市、各項（符合市場經濟運作的）政府管理系統、政策、措施、高科技及物流工業、服務性行業、城市建築基建港口之營造及設施……等。同時，在結論一章中，除了綜合介紹浦東整體發展、個別功能區域的建設營

造之各項主題（包含城市發展、先進工業以及科技之研發、有特色的環境美化工程等）及實踐外，更進一步定言這些建設營造皆以作為中國「展示窗櫺」（showcase）為目標。Yawaei Chen（2007）也指出上海所背負的，是在本國內作為「展示窗櫺」（showcase）的特殊任務：

因為中央政府將浦東宣傳為中國第二次改革的一個「展示窗櫺」，浦東的改變使得其他經濟特區及沿海城市感到極大好奇，這些特區及城市都渴望知道浦東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地方（Yawei Chen, 2007：282）。

張學兵的序言及終章也沒有以「全球化城市」（global city）或「邁向全球化的城市」去形容浦東，他的重點似乎在於浦東如何被建設為一個現代化城市。而所謂現代化，我們可參考顧朝林在《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城市發展——跨世紀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研究》（2001）一書中所提供的界定：「城市現代化就是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方法來裝備和管理城市，使城市在經濟、社會、文化、基礎設施、環境質量等方面以及城市的整體素質上都達到國際水平，城市建設現代化是構成國際化的現實基礎」（顧朝林，2001：42）。從這清晰的界定，我們可理解張學兵所謂之「現代化」的具體含義，同時亦可理解到他的立場是以浦東建設的現實具體成果為出發，來將浦東介紹給外國讀者，並沒有虛浮地稱譽上海如何成為「全球化城市」或「邁向全球化的城市」。

顧朝林的《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城市發展——跨世紀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研究》（2001）一書可以說是以詳盡及清晰的手法，以完備的理論系統建立觀點立場，來討論經濟全球化之背景下，中國城市發展的方向和策略的著作；作者對「經濟、全球化與城市發展」這課題的闡釋，極為全面及詳盡。他根據Peter Hall及John Friedman所提出對「全球化城市」的定義來界定及闡述，繼而將「全球化城市」（或世界城市）與「國際性城市」（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清楚地區分開來：所謂全球化城市 (global cities)，是指「全球經濟運行和管理服務的發達服務業和電訊設施集中的地方，也是公司總部——尤其是跨國公司總部集中的地方」；而所謂國際性城市，即是指「城市的國際化程度未達到世界城市水平的城市」。以此宏觀並且清晰的城市類別為起點，作者開始闡述中國城市的發展。

他很清楚地說明中國以國家的層次作為主導，首先要在國內是要以發展國際性城市為目標：「中國不僅僅要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而且能夠在國際經濟大循環中逐步占有相對重要的地位。為此，中國有必要建立國際性城市和自己的創新中心城市，使之盡快成為連結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新節點，並把中國的各級各類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網絡體系之中。」(2001:19) 若細讀這本深入分析經濟全球化及中國城市發展關係的著作，會發覺它對中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等）分析之細緻及深入程度，跟在歐美的專業學術期刊所出版、討論相關課題的論文相比，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歐美學者的論點通常以檢視上海是否能晉升為「全球化城市」的立論點來視察上海的發展：即首先以各項量化的指標來檢視上海的經濟發展狀況及其發展方向，其次則用上海發展的本質（即說明上海由國家政治決策釐定其發展方向，而不是純由資本經濟運作而促使其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由此證明，上海與「正統的」（即由於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運行而產生的）全球化城市不一樣，來否定上海作為全球化城市的資格。若細心分析比較，我們發覺俞可平、顧朝林等人，跟西方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大同小異，他們同樣建立了各項客觀的定量化指標，去分析及判別中國各個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及國際化水平。所不同的是中國學者們是清楚地解釋了中國建設國際性城市的整體目標（並不是發展單一的城市）、面對的經濟內部困難、潛在的政治危機及所面臨社會、文化問題。

顧朝林指明，中國要努力的是全國整體發展——中國根據中國共產黨17

大所定立的發展目標，乃是到了2020年，務求要達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中等開發國家水平。中國各個城市的發展，必須要配合此整體目標。顧朝林不諱言——在此書出版時（2001年），中國建立國際性城市的計畫才剛起步，亦即「中國的經濟實力最強的大城市剛剛接近世界城市60年代末的水平」，由此觀之，與世界公認的國際性城市相比，中國城市走向世界、發展國際性城市還存在著很多困難和侷限。由此，中國所要處理的是將城市現代化及國際化的任務（2001：50）。相比起西方學者不斷考量討論上海邁向成為「全球化城市」的條件及速度，顧朝林的言論可說是比較具體及平實。

除了理解到中國種種內部具體實況形勢及限制，作者們更清楚了解到中國城市只有提高經濟實力，才能以主動的姿態參與世界經濟循環，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2001：54）。顧朝林很坦白地承認目前中國城市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的困難：「目前中國有40多個大中城市提出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多是自發性地進行建設，缺乏宏觀調控；在建設方向上又趨於綜合性、缺乏特色。建設現代化的國際性城市需要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而中國目前正處於起飛的前期階段，經濟與城市的國際化程度尚低，經濟水平與城市實力不強，又面臨著實現工業化及產業升級、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艱鉅任務」，他因此認為，國家對發展步伐的調控是必須的，各個城市的發展「必須考慮階段性，不可一哄而上，遍地開花。全中國應統一規畫，有重點、分層次、按步驟地建設若干個國際性城市。」（2001：56）。

俞可平在編輯《海外學者論浦東開發開放》（2002）之前，曾於2001年編輯了另一本文集：《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在其導論中，他很清楚地為「全球化」這個概念賦予符合中國國情的詮釋。1990年代，一邊正值蘇聯解體、美蘇冷戰結束；另一邊中國改革開放、熱切企圖與世界接軌。其後，美國一方面開始對冒升中的中國進行遏制及打擊，另一方面卻也藉著全球化的大氣候對中國進行「西化」和「分化」戰略。俞可平認為，全球化的規則是由

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制定，全球化的過程也受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故此，全球化就是整個世界的美國化；他並且引用了王寧的看法，說明「全球化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國為標準的全球範圍的趨同性。」（2001：9）。俞可平提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全球化影響下所衍生的並不單是在經濟方面之巨大的轉變，同時，中國文化及價值觀方面，也受到很大的衝擊。西方的影像文化、傳媒文化、以及消費文化大舉傾注入中國，據他的看法，其影響所及「則已經遠遠超出意識型態領域，涉及政治、經濟、教育、學術、文學、藝術、出版，直至人們的風俗習慣和日常生活。」（2001：2）。

俞可平在本文的言辭雖然明顯地激烈地反美，但是細讀他的行文，我們亦能開始理解中國本土對全球化的全面理解。這並不單止在於作者在普遍層面指出「全球化即美國化」、「西方藉商品輸入同時大舉文化殖民」等這些負面批評，他同時也意識到經濟全球化具體表現為國際性或跨國組織，尤其是財雄勢大之跨國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大」（2001：24）、權力前所未有地在世界上擴充。由俞可平的文章，我們可理解到中國面對全球化而深入嚴肅地關注的有3點：（1）面對頭號勁敵美國的政治經濟戰略；（2）跨國公司日漸強大的背景下，對國家的主權的衝擊；以及（3）西方文化價值觀入侵。他在本篇文章清晰地提出在參與全球化經濟發展之餘，「中國必須保持自己的民族自主性，以及中國決不允許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失去獨立性而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2001：21）。

上述各點概括地分析了西方及中國學者對上海發展的論述，以及中國學者對「全球化」的理解及詮釋，這幫助我們將西方學者（以Sassen，Fulong Wu為代表）對全球化城市所定立的各個主要功能、特點或標準，與中國學者（論點主要見於顧朝林、俞可平等之著作之內）對這些特點或標準所作的理解，作一比較。由此比較加以深入分析，我們便可清晰辨明，一則是究竟上海是否為一個（正在向著）全球化（冒升）的城市，二則，乃是在中國本土的

論述中，上海應否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城市。

以下表列，我們嘗試將西方學者的論點與中國學者對「全球化」及「全球城市」的理解及定位並排表列<sup>12</sup>，由此而掌握兩方面對上述題目之論述。

西方學者於經濟全球化之脈絡上對全球化城市的界定	中國學者對「全球化」及「全球城市」的理解及定位
<p>西方學者主要問題：那一個城市可被入選為全球化城市？上海是否稱得上是全球化城市？</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基本脈絡：「全球化」之定義為「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維持）是兩個互相排斥的概念。</li> <li>● 全球化是一個去國家化的發展歷程。</li> <li>● 跨國組織（經濟、政治、社會服務、環保組織）越來越緊密合作，使得國家對本土的絕對治理權要讓步於跨國組織，因而也削弱了國家對本土的絕對治理權。</li> <li>● 「全球化」要求政府實行企業化治理（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去令新管治的地方更為適宜於企業營商活動：例如實踐優惠政策去發展相應的專業服務及技術支援行業、提供人力資源的培訓、協調大學、研發中心及工商業之間的聯繫。</li> </ul>	<p>中國學者主要問題：「全球化城市」之內涵為何？中國城市之整體發展路向為何？如何發展上海成為國際化城市？</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基本脈絡：「全球化」與國家主權之關係。</li> <li>● 經濟全球化是隨著資本國際化而向廣度及深度發展。</li> <li>● 經濟全球化對開發國家來說，是去不斷的開拓國際市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開發國家利用其資本、技術和產品創造能力及優勢，爭奪世界市場，實現了本國的現代化，同時把一個個尚未開發的國家捲入到世界市場體系中。</li> <li>●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正打破民族國家疆域的侷限，或者削減民族國家的作用，實現生產要素的全球範圍流動和配置，跨越各國的邊界，實現世界經濟更高層的整合。</li> <li>● 國際組織利用了在上世界上擁有自治和權威的地位，為世界分門別類，例如聯合國對難民、世界銀行對農民等的劃分；它們又確定社會化世界的意義；例如世界銀行對對農村發展的定義、冷戰後對安全的定義等。</li> </ul>

全球化城市與跨國公司之關係	
<p>西方學者之觀點</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集中形容跨國公司如何營運：投資貿易分佈在世界各地國際間的主要重點，在全球城市的總公司或區域總部則以中央系統的方式去集結各類型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並處理頂層的金融、法律、會計、管理、行政、策劃等等事務。</li> <li>● 總公司或區域總部的功能是管理及協調全球經濟系統，跨國公司的營運網絡決定了在全球經濟脈絡中哪一個城市有資格或能力處於那個位置，扮演何種角色。</li> <li>● 市政府要主動參與商業市場的活動，具體來說，就是提供各種服務給企業，儘量配合企業及市場的全球營運，以致提供專業訓練予下一代，好使企業及市場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並協調大學、研發中心及企業之間的聯繫。世界上主要的國際商業中心的能力，正是彰顯在其所提供的金融及其他服務的能力上。</li> </ul>	<p>中國學者之觀點</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對跨國公司本質的界定，以及對於國家主權的威脅；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戰略影響著各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投資佈局。</li> <li>● 跨國公司的強大經濟實力和龐大的國際網絡使其獲得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li> <li>● 跨國公司作為一種壓力集團在其祖國各級政府和決策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同時它們的全球生產營運也日益脫離祖國的約束。</li> <li>● 跨國公司對技術轉讓嚴格而有效的控制，使得技術落後的工廠（生產）座落地之東道國處於被動及依賴地位。</li> </ul>

全球城市與周邊腹地之關係	
西方學者之觀點	中國學者之觀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強調全球化的城市網絡。</li> <li>●全球化城市與全球市場及其運籌網絡之聯繫越來越緊密。</li> <li>●各個全球化城市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li> <li>●這些城市的經濟命運越來越和它們的廣大周邊腹地或甚至和它們的本土國家經濟脫勾。</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上海位於中國東部沿海和長江流域兩條經濟發展帶的交匯點——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具有輻射全中國的經濟實力。</li> <li>●上海所依託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又是重要的新興工業基地，上海已經發展成為各種生產要素的高層次集散中心。</li> <li>●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大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是自身及周圍地區甚至全中國提供各種服務的中心，鞏固整個地域的經濟發展。</li> <li>●在中國，大城市需與周邊的腹地融為一體，形成政治經濟影響力巨大的區域。地域劃分為「經濟區域及其都市圈」，其中最著名是號稱「兩江一海」地區即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區和環渤海地區，它們是中國的經濟核心區——城市連綿區，上海、香港、北京充份與其周圍腹地作緊密經濟合作。</li> <li>●中國城市的發展目的：以主動的姿態參與世界經濟循環，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li> <li>●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要主動把自己的經濟發展融進全球經濟，走向現代化。</li> </ul>

評論為跨國公司服務的高收入專業人士集中於全球城市之現象之觀點	
西方學者之觀點	中國學者之觀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全球化城市乃金融估值、保險銀行、電子資訊、科技國際化服務、創意等服務行業的精英及專業人士的集中地。</li> <li>●由於低收入的人群（製造業下崗工人、農民等）湧進或集中在城市謀生，若以其經濟狀況與極高收入的金融界專業人士對比，使會出現社會結構兩端膨脹而中間段減少之現象，因而產生嚴重的貧富懸殊。</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全球精英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商業精英的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階層，不單控制著全球資本流動，更決定國際政治經濟遊戲規則。</li> <li>●至於訊息專業精英，則主導著不斷蓬勃的全球訊息擴散之秩序、左右著全球變異的過程。</li> <li>●中國學者也認為精英豪華的生活對比於低下階層而言，會導致在經濟上出現貧富懸殊的情況。</li> <li>●中國學者的焦點，宏觀地意識到在城鄉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的巨大貧富差異。</li> <li>●中國官方及學者皆認為，發展目的是到達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但這畢竟是一條很長的路。</li> <li>●中國學者認為整個中國的問題可歸結到國有企業經營失效、官員腐敗和資本（尤其是國外資本）對勞動的剝奪三方面。</li> </ul>

對高科技發展之觀點	
西方學者之觀點	中國學者之觀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新式的資訊經濟學正在不斷擴展。</li> <li>●資訊科技使全球經濟更為暢順。</li> <li>●資訊科技使得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擴散加劇。</li> <li>●資訊科技的高速運算功能使經濟活動更為數位化與「去物質化」。</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按城市的經濟實力劃分，在最頂級、經濟實力最強的都市，是國際經濟信息資料積聚與集散中心。</li> <li>●訊息和思想透過電子媒體如電視，尤其是網路在全球傳播。現在電子媒體特別是電視和網路，所把握的權力越來越大，對國家權力構成了極大的制約——全球媒體巨擘的政治影響力更是難以估計。</li> <li>●先進高科技發展使已開發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處於主導地位。已開發國家從國際上吸引了並囤積了大量高素質高科技人材，使其在創新技術上處於超前地位。由此引致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li> </ul>



## 結論：上海是否為一個（邁向）全球化的城市？

當全世界都瞠目咋舌地看著1990年代以來，上海的摩天大廈如雨後春筍、或如西方學者所形容如磨菇般高速繁殖（mushrooming）；以及不斷開放，環球資金大量湧入各項投資及房地產市場的開拓，再者上海已運行得十分成熟的股票交易市場（雖然中國國內的股票市場還不直接對外開放，但上海證券的升跌足以影響全球市場，首當其衝的當然是香港股市），於是大家都不期然認為，上海發展的路向是很明顯地要「從零開始打造成為全球城市」。黃宗儀（2004）從2000年及之前出版的資料裡，推斷出「浦東開放開發的都市計畫論述中，隨處可見全球城市的意象」。儘管她所用的資料僅停留在2000年，但我們發覺，實際上無論在西方或中國，有關上海是否為一個（邁向）全球化的城市的討論，是在2000年之後才大量出現。本文以上環節所紀錄之中國學者（自2000年之後到2009年）有關「全球化」及「全球城市」的論述，都是步步為營地作深入理解及詮釋。她／他們大量引用英美學者的論述，同時也附以各項量化的統計數據，無論是從理論層面的分析到國家實際狀況的表述，都十分細緻；她／他們的意圖，是精確而具體地勾劃中國的發展路向。以我們的觀察，中國學者對「全球化」及「全球化城市」的論述，總括來說有下列三個要點：

1. 中國學者對「全球化」的論述，通常集中於經濟全球化方面，但由此焦點也重點地引申出政治（全球治理）及文化全球化的討論。在她／他們的討論中，經常出現的課題有：資本主義重組全球區域的組織及運行方式、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矛盾及對峙、國際組織及跨國公司的全球營運對國家主權的威脅、於全球及本土空間中人力資源的流游及聚合的慣性形式，還有高科技傳訊如何促使全球化發展等。

2. 中國學者會將本國整體及各個城市的經濟發展階段與國際上已開發以及

發展中的國家或城市作細緻的量化比較。在2001年，顧朝林從比較得出的結果是「中國實力最強的大城市剛剛接近世界城市60年代末的水平」（2001：50）；周漢民在2004年所寫就的文章中，縱使肯定了上海已計畫「於2050年建成核心世界城市」，但其結論卻謹慎地認為於2004年的上海，離國際化都市的標準仍有較大的距離：「若以100作為國際化都市的綜合評價標竿，上海相當於國際化都市高級階段綜合指數的30%左右，相當於國際化都市初級階段綜合指數的60%。」（2004：5）。於2007年，王建軍、吳志強則指出：雖然中國目前處於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但是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城鎮化發展速度並沒有明顯的優勢<sup>13</sup>。

3.不少西方學者在評斷上海是否夠資格加入「全球化城市俱樂部」時，其答案都是否定的；Fulong Wu 更斷然判定上海並不是全球化城市。中國很多學者的著眼點是在於中國如何能整體地平均發展——某個城市或地區過份超離中國其他城市或地區獨自高速發展，反而是中國學者憂慮之處。顧朝林在其著作中曾批評在中國形成的建設國際性城市的新潮流：「有些城市不考慮當地的具體條件，缺乏必要的分析論證，一味追求大工程、大都市、國際化……這種不考慮自身條件，與世界上其它國際化城市盲目攀比、求高求大求全的傾向，不但不能實現城市的國際化與現代化，反而還會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延緩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在顧朝林的理解中，中國內地現有的城市和世界上所公認的全球城市和國際化城市相距甚遠。他認為在中國的範圍內，「可首先將香港作為國際性城市的戰略重點……使其盡快發展為並計僅次於東京的第二級國際性城市；其次，在21世紀初葉將上海建設成為新興的國際性城市……」（2001：66）。任玉玲更是清晰地指出，「外資企業大量投向及集中於中國東部，因而也帶動了內資特別是國企及銀行資金大量在東部投入和密集，這正造成東中西地理區域的經濟發展速度差距擴大，而且也造成生產力畸形佈局，不利於全國均衡發展……。」<sup>14</sup>

謝文蕙則將國際化城市注釋為城市連綿區。她指出上海是長江三角洲的中心，上海唯有緊密地與周邊各個城市連結起來，將經濟結構融為一體，才能發揮其政治影響力<sup>15</sup>。於此，顧朝林早於2001年已提出大都市連綿帶的發展「有利於控制中心城市盲目增長」（2001：92）。

我們若細心閱讀中國學者對於上海的發展路向的分析，會發現西方學者最為熱衷評論的題目：上海是否夠資格加入「全球化城市俱樂部」，可能在中國本土之實際層面上並不是一個確切的問題。在我們參考過的中國學者的論述中，大部份都對「全球化」及「全球化城市」抱著審慎的態度，完全不似西方學者那般逼切地要去判定上海是否為一個全球化城市。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要參與全球化發展，積極開放讓外資進入本土及開發國際市場，才能維持中國在國際間的競爭力，才有效維護本國國民的經濟利益；而城市化是實現小康和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然而，大城市的發展開創要謹慎控制，以獲取整體平衡發展：「在實現城市化過程中，應限制大城市規模，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合理轉移農村過剩動力。」<sup>16</sup>

我們撰寫本篇文章，最初的構想頗為表面：目的是將陸家嘴之超現代化地景，與浦東普通平民老百姓的生活空間作比較分析。但是當深入研究浦東的過程中，卻漸漸發現，若將於「空白書板」之上建成的浦東新區單純視為中國致力參與全球化競賽的具體表達，或陸家嘴的摩天樓即為合法化了上海作為全球化城市的候選資格（Arif Dirlik, 2005：25），我們只是在很膚淺的層面上去將上海的發展與全球化的進程連繫起來。從閱讀在西方學術期刊出版有關上海是否邁向全球城市的論文裡，到追本溯源去理解中國學者如何審視表述中國在「全球化」大環境中的發展路向，我們越漸發現，單單以資本主義邏輯去詮釋或甚至批判上海的發展是並不足夠的。於此，Harvey在《The New Imperialism》（2003／2008）中對「領土邏輯」及「資本主義邏輯」的闡述，大大豐富了我們對上海的發展背後的主導構想及理念。若從Harvey的觀

點去看「全球化城市」的構成質因和特質，比較容易理解中國學者討論的「全球化城市」的發展步步為營的立場。Harvey在此書之「新自由主義霸權」一節中，清晰地指出，美國政府財務部，華爾街、及世界銀行，基本上是一個權力的複合體（2008：54-58），再加上那幾個為學者所稱頌的頂級全球城市如東京、倫敦、法蘭克福等，以金融巨網籠罩世界各地，並以投機觀點描繪世界藍圖，控管了世界的運作（貿易、生產、服務和金融）、逼使全世界的市場開放。Harvey解釋這等金融霸權乃是以奪取式累積的機制進行其全球掠奪。早在2003年Harvey已揭露了類似「次按」的財技之開端：

以美國住宅市場中所謂的「變戲法」（flipping）過程為例，先以極為低廉的價格買下一棟狀況極差的房屋，做了些表面修繕，然後在賣方安排的抵押貸款配套下，以高得過分的價格，賣給期待實現自有住宅夢想的低薪家庭。如果這個家庭未能如期償款，或者無法處理幾乎肯定會出現的嚴重維修問題，那麼房屋將被收回。這並不全然違法，但結果是掠奪低薪家庭，騙他們僅有的微薄積蓄。這就是奪取式積累（2008：119）。

其後在2007年爆發的美國次按風暴，更加證明了Harvey之「奪取式積累」的觀點。據蘇偉文及陳緯豪<sup>17</sup>（香港《信報》，2007年12月21日）之解釋，「市場對次按危機的成因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一派意見把責任歸咎於前聯儲局局長葛林斯潘，認為是美國在2001年科技泡沫化後維持長時間的低息率，引發房市泡沫，最終引致次按問題；亦有市場人士認為是一眾美國銀行及金融機構，在低息、市場資金泛濫、貸款需求弱下等環境，向次級貸款人提出「掠奪性的貸款政策」（Predatory Lending Practices）所引致」。所謂「掠奪性的貸款政策」，是當樓市處於昇軌時，許多次按貸款人（即信貸記錄不良者）會作短期借貸，希望從樓市上昇中獲利並出售物業，以償還貸款及利息。有鑑及此，銀行向次按貸款人更進一步提供短期還款優待，以催借貸，即所謂「掠奪性的貸款政策」。

一旦當美國樓市走下坡，以致次按貸款人不能以出售物業清還貸款，而他們的入息亦不足支付利率上昇後的每月供款時，銀行呆壞賬便會大量出現（蘇偉文、陳緯豪，2007：2），欠款人更會瀕臨破產的絕境。（至於跨國投資機構施出財技，將次按變成結構性投資工具或信貸衍生工具，將風險轉移到全球，最後次按危機隨著樓市調整爆發為全球金融海嘯，那是後話了。）

自目睹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學者一直認為除了要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外，為保持中國經濟安全地運行，強而有力的內部監管是必要的。美國次按風暴所牽引起的金融海嘯，中國是其中一個受影響相對輕微的國家。但是，正如吳敬璉在其文章〈金融海嘯與中國經濟〉中指出：「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和置身事外。於此，面對危機，中國於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在短時期穩住大局，努力保持市場不至於崩盤。」（2009：11）。

在近年接二連三的全球經濟波動及危機狀況來看，中國所採取的自上而下的宏觀調控政策，不論是加快上海的發展步伐，還是目前加強房地產地供應和監管，極力壓抑房地產市場，打擊囤地炒地及樓房炒賣熱潮，都顯示中央政府之決策對維持中國經濟平穩發展，明顯地作出控制。Fulong Wu在其文章〈Globalization, the Chinese State,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Shanghai〉一文中，肯定上海並不是一個全球城市。他指出我們所見到的上海正是一個由中國政府策動的社會政治計畫，其發展的動力來自國內的建制的轉變而不是依靠外國投資（2009：141）。他指出上海的城市政治未曾從宏大的國家政治獨立出來：浦東新區開發之源起，是由於國家自六四事件受到國際孤立，於是開發浦東新區，以證明中國持續改革開放的步伐；甚至上海世博之目的，也是由國家發動：舉辦世博會是國家行為，是上海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契機。<sup>18</sup>

然而，若國家在經濟上介入及實施宏觀調控，則導致在本質界定層面上否定了上海作為全球化城市，又如何呢？經過了金融海嘯，暴露了全球跨國公司

投資金融機構的「史上從未見的大規模瘋狂掠奪與詐騙」，我們的著眼點，不再應該單純地收窄在於回答「上海是否為全球化城市？」這問題。儘管Harvey很批判性地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將中國推得更靠近新自由主義信條，但他也認為，「國家和共產黨的權力（以及他們任意訴諸獨裁作為的能力），以及轉型過程的特殊條件，也構成中國案例某些非常不同的特色。中國的這種配置構造，能否僅憑它在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力，反過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道路發揮強烈影響力，還有待觀察。」中國不僅要與世界接軌，也必須要具體地顧及本土政治經濟情況。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全世界表明，中國並不光是上海或北京。中國，是自東部沿海以致西部與群山相接、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國度。實現小康、建成一個中等開發的國家，才是中國的理想和目標。這實在要經過國人漫長的努力，才會見到實現的一天。

## 注釋

- 1：為了明顯分開主力在英語界出版的學者及中國本土的學者兩個派別，我們以英語稱呼在英語學術界出版的學者的名字（例如John Friedmann, Sakia Sassen, Fulong Wu等）；而以漢語稱呼在中國本土發表的中國學者（例如俞可平、顧朝林等）。
- 2：〈地方營造的全球化及本土向度：重鑿上海成為世界城市〉。
- 3：有關上海的高速發展，吳幸玲在其博士論文中，紀錄了90年代頭5年上海那令人「瞠目結舌」的發展：「以90年代的前5年為例，在城市重大基礎建設方面，上海在這一段時間蓋好3座跨越黃浦江的大橋，修築環城幹道與南北高架橋，開通的地下鐵路交通，翻修外灘與人民廣場，若再加上因為土地批租而翻新改造的舊城區，視覺效果更是驚人；而為了成就這些轉型與發展，5年內共計有兩百多萬人被動遷到城郊居住，這樣小範圍、短時間內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已經創了世界記錄。」（2007：87）
- 4：〈在現今全球化時代的城市〉。
- 5：5個排行榜為：政治及法制框架、便利的營商環境、金融及相關運作、（地理位置及基礎建設所構成的）商業中心地位及相關運作、城市生活舒適度。（Cities in Today's Global Age: SAIS Review vol. 29 number1, 2009）
- 6：《邁向世界城市之途：在全球化時代中上海的冒升》。
- 7：兩書分別為：1., Peter G. Rowe and Seng Kuan. Munich (.Eds) (2004): Prestel Shanghai: Architecture &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2. Chen, X.; Zhou Z. (Eds).(2009), Shanghai Rising : State Power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in a Global Megacity, Londo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8：〈地方營造的全球化及本土向度：重鑿上海成為世界城市〉。
- 9：〈全球化，正在改變的國家政權，以及上海的本土管治〉。
- 10：Sakia Sassen在〈Neither global nor national: novel assemblages of territory, authority and rights〉(2008)一文中，漸漸地提出全球化的定義乃基於「全球化」與「國家主權」乃是兩項彼此排斥的的動力 (the national and the global are two mutually exclusive entities. 2008: 67)
- 11：俞可平，2003年起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現任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等。張學兵，2011年1月任上海市副市長。（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 12：由於圖表中列出的每項比較點，在本文章已作多次引述，並在別處已注明其出處，為免弄至版面混亂，故只將各項比較點登錄，而不附上出處。
- 13：引自：楊宜勇，安家瑋，〈當前中國經濟社 發展階段的國際比較研究〉引自《全球化與現代化》，2009：23。
- 14：〈重視提高中國國 現代化進程的自主性〉引自《全球化與現代化》，2009：50。
- 15：〈現代化進程中的國際城市〉引自《全球化與現代化》，2009：231-232。
- 16：朱慶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20年主要指標的發展目標及2007年實現程度〉，引自《全球化與現代化》，2009：328
- 17：於刊登〈次按風暴是如何形成的？〉之時（2007年12月21日），蘇偉文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碩士課程主任；陳緯豪則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研究助理。
- 18：在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迎來開幕倒計時1000天之際，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於記者招待會之發言（Wu, 2009：139）。

## 結 論

全球化的脈絡中的東亞城市



結論：

## 全球化的脈絡中的東亞城市

從1997／98亞洲金融風暴到2007／08美國次按風暴，全球經濟局勢可說是瞬息萬變。東亞地區在這十多年的巨變過程中，亦成為全球的焦點。在學術界，無論東方或西方，「亞洲的興起」是最熱門的研究課題。其中，地理學、都市研究等對「東亞」時空的研究，可說是對這課題最直接討論的學科。

Yeung & Lin在〈Theorizing Economic Geographies in Asia〉<sup>1</sup>（2003）中提及目前有關亞洲的經濟轉變之研究正在快速增加。在這篇文章裡，兩位學者在理論研究層面上提出了東西方的劃分——他們認為直到目前，主流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仍然是以英美（Anglo-America）學者為主導；但是，亞洲經濟的高速改變，不能直接地應用英、美學術界發展出來的理論詮釋，而應該要以批判的方式來理解這些西方理論，進而透過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進路建構及發展有效的亞洲經濟地理學理論。Yeung & Lin出版這篇文章之際（2003），正好經歷了日本經濟衰退以及亞洲金融風暴，因此兩位作者認為西方學者們對「亞洲奇蹟」已失去好奇；再者，他們認為亞洲國家本土的地理研究者，對經濟地理學範圍內之主流研究課題都沒有甚麼重要的貢獻——在這

篇文章內，作者重覆指出那是因為亞洲的本土學者因語言障礙之故，而無法以英語與英美主流學者討論，或在英語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這篇文章雖然立場清晰地提倡亞洲學者應從亞洲的立場掌握及論釋亞洲的經濟地理，但是對所謂「東亞」的內容及特質的描述或界定，卻主要以四個傾向西方觀點的方向來論述：（1）日本70年代的興起及90年代的衰退；（2）亞洲在1997至98年經歷的金融風暴；（3）金融風暴之後，已沒有很多人嚴肅地對待「亞洲奇蹟」或「亞洲世紀」這種潮流宣傳語。他們發現「日本經濟衰退」這課題只限於在政治學領域，才有較廣泛的討論。在經濟地理學中，有關亞洲所經歷的經濟危機卻是空白的；（4）只有在「全球化經濟」的研究脈絡中，某些西方學者才對亞洲的研究重拾興趣，因為他們視亞洲為比較研究的其中一個環節。

正當Yeung & Lin文章內對「東亞」的空間及時間範圍的勾劃及描述，Tang & Mizuoka 所著的文章〈Thinking East Asia Geographically〉<sup>2</sup> 反對了Yeung & Lin以過份簡單的資本主義發展論立場來釐定亞洲這十多年的演變。Yeung & Lin認為，中國現正擺脫以往的烏托邦或社會主義而進入「以市場為主導的實踐主義」，而中國的政治及經濟也脫離了以往自我隔離政策，而漸演變成了全球化的活躍參與者。Tang & Mizuoka評論此一觀點為「西方市場基礎主義」（Western Market Fundamentalism），認為Yeung & Lin雖然提倡亞洲要向西方學術界進行「理論的回駁」（theorize back），但字裡行間卻完全肯定東西方結構性的劃分，以及亞洲一方乃是從屬於西方理論的定位及詮釋——此即是說，Yeung & Lin文章對東亞的評價，乃是在所謂全球化的地理環境中，西方學者只將東方視為跟西方比較（孰優孰次）的對象，而並不是考量東方（如西方一樣）有其獨立的政、經、社之發展道路。

Yeung & Lin的文章勾劃了一粗略的「西強東弱」的圖像，亦即東方及西方為兩個有著明顯分別的體系，而東亞在經濟發展、學術研究等範疇方面，經比較中顯示為附屬、落後的一方，這個想法，在Rowe的著作《East Asian

Modern》<sup>3</sup>（2005）中，更形明顯。

Rowe在此書中，以獨特的進路界定「東亞」，並企圖由此進路去劃定「東亞」獨有的思想文化模式，進而對此地理區域的現代化進程給予負面評價。他對「東亞」的界定包含兩個取向（2005：9）：其一，地理空間上之界定，即中國、香港、日本、南韓、台灣及新加坡；其二，文化共同性之界定，Rowe認為這些國家或地區，都依從了儒家思想作為其文化基礎。值得一提的是，他對「儒家思想」的理解，並不在於其作為一種道德哲學，反而將之視為在導致東方社會中出現的獨裁的（authoritarian）、中央集權的政治思想，以及集體主義、人民對執政之政權傾向順從的社會行為模式之背後的骨幹思維。

《East Asian Modern》第5章中，對東亞國家／地區從經濟到城市的快速發展大多是負面評價。作者認為東亞地域的社會文化框架為「儒家」思想所構造，因為社會上下皆傾向於奉行集體主義，並尋求共識為主導思想；同時，也由於東亞社會以「前現代」且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為根基，因此人民順從，容許中央集權、獨裁的政府的存在。由此，當政府號令要進行現代化改革時，人民必然會上行下效，致使現代化的城市在東亞地區得以快速建造起來。對此，Rowe認為東亞地區只會採納西方最現成的科技來建構自己的現代化城市，然而其所達到的結果，也只不過是表面上改善城市中的基礎物質環境或條件——例如公眾衛生設施或服務，又或教育制度的改良等。

Rowe於2005年出版這本著作，作者直至這個時期為止都堅持以一種19世紀式的思維去分別東、西方：亦即，東方主導政治思想是「前現代」的獨裁思想，與此對立的，西方社會則是以自由民主的思想發展其文化及社會的組織。西方社會首先以嚴謹的態度反省、批判建構在實證主義世界觀之上的霸權，也由此，西方於二次大戰後進行不斷的演化，不僅在經濟生產上邁進了「後福特主義」，也在政治上反對中央集權，建立了一個多元化、社會共同參與的公民

社會。Rowe認為在西方社會發生的一系列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對社會環境的持續、對歷史環境的保育等各種討論及運動，在東方社會中都是遠遠未成氣候，更枉談「達到目標」。

Yeung & Lin認為亞洲國家本土地理學者，因其英語水平的障礙，無法在英美主流學術期刊中發表，致使這些學者對經濟地理學主流研究的貢獻乏善可陳；而西方學者的研究，也僅止於將亞洲置於次等的地位，只作為比較對象來作探討。平衡著此一看法，Rowe則認為，亞洲雖有強勁的經濟成果，以及亞洲城市以發展主義思維所引發的現代化營造，但卻完全欠缺與西方同步的思想演變，故此他作出十分負面的評價。這種高舉西方乃全方位地比東方優越，尤其是在理論思想或世界觀上絕對高超的觀點，在Harvey對新自由主義及新帝國主義的批判陳述中，盡顯其膚淺及貧乏<sup>4</sup>。

Harvey的理論從資本主義引申至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毫無保留地將世界絕對的不平等地理藍圖赤裸裸地表述出來。據Harvey所言，自1970年代開始，美國所發展的金融業越漸發達，也成為了全球經濟金融中心。更進一步，美國企業憑藉金融業在全球的擴展，支配了全世界。

所謂「新自由主義」，簡單而言，首先是（尤其是政府）將公共資產及服務私有化、公司化——國家政府沿著自由市場的路線，將原本由國家經營或管理的部門（例如運輸、電訊、自然資源、公用設施、公共住宅、教育等）都轉讓給私領域，又或開放自然資源供私人開採利用，並促進外國直接在本國投資和自由貿易，供集中化的資本和壟斷勢力馳騁（2008b：21）。政府實踐各種政策及手段，減低資本跨越邊界移動的障礙；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更嘗試打開全球的商品和貨幣資本的市場，供資本積累的力量在全球無間地運行。

Harvey（2008b：28）指出，在1990年代中期，英美兩國成立了「華盛頓

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sup>5</sup>，其效果是將美國和英國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模型，界定為全球所有問題的答案，藉此對全世界（甚至是日本與歐洲）施加壓力，迫使所有國家走向新自由主義進路。

在《新帝國主義》的第二章〈美國勢力如何擴張〉中，Harvey形容美國是以「華爾街投機式觀點描繪成世界藍圖，並試圖以集中式多邊主義控管」——這個多邊主義逐漸形構了由北美（NAFTA）、歐洲（EU）以及東亞加上東南亞的貿易關係的利益聯盟（2008a：54）。

由此，我們得以理解在新自由主義權力擴張的脈絡中，「東亞」的地域範圍如何被界定／劃定，以及「東亞」的內容如何成形。所謂「東亞」地區，自然是對應華爾街金融中心的擴張雄霸全世界的過程而構成的景象；Harvey扼要地以兩個方向，去描述美國華爾街金融中心對東亞地區的定位及「定性」：

其一，美國有壓倒性的金融力量，還有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也建立了廣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為維持社會安定，大力在國內發展消費主義，也引入了來自全球各地愈來愈便宜的商品，滿足國民無止境的消費欲望。

在美國立場觀之，東亞就是大規模的廉價商品製造區（例如中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台灣以至新加坡等）<sup>6</sup>。

這些全世界「較落後」的地區綿綿不絕地提供廉價商品予美國商人在全球傾銷，或供應美國（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國內市場，美國也因而掌握了這些以製造業為生產模式的國家或地區的命脈。這些國家或地區若要獲得美國商人的訂單，或將其製成品輸入美國，就必須順從美國的意願。Harvey更進一步看出，美國利用了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作為誘餌，「來勸服許多國家沿著新自由主義路線來改革它們的經濟體制，尤其是要開放它們的資本市場，讓美

國金融資本滲透。」（2008b：28）。

其二，於19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我們見到的是，東亞地區的經濟雖然發展起來，卻成為美國金融資本掠奪的對象。

在《新帝國主義》一書中，Harvey 簡要地陳述了美國以「奪取式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來掠奪及破壞東亞的經濟——於1997年，「對沖基金（hedgefund）在IMF蠻橫的通貨緊縮政策撐腰下，對泰國和印尼貨幣大舉進攻，導致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紛紛陷入破產危機，結果是數百萬人因而失業，面臨貧困的絕境。那次危機也造成大量資金湧向美元，進一步確立華爾街的支配權，帶給美國富人驚人的資產價值。」（2008a：53）。

雖然美國金融資本視東亞國家為財富資源掠奪的對象，但是，在東亞地區，資本主義的力量回復到發展的軌道卻極為快速——Rowe將這力量的源頭解釋為東亞人過份接受儒家思想，也因此而過份聽從政府的指使去順從改革發展的方向。然而，Harvey卻在東亞洲從1997／98亞洲金融風暴快速重新崛起的過程中，看到國家權力邏輯如何扶助並控制資本主義邏輯之運作成功。

《新帝國主義》一書中多次提及中國的發展，他指出，中國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成為以吸收過剩資本的地域，也成為了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雖然中國被貶稱為「世界工廠」，但是中國國內市場也同時快速成長。Harvey很清楚，中國內需市場的龐大潛力不可忽視，同時正在長期進行基礎建設以吸收龐大的剩餘勞動力——除了重型工程例如長江至黃河的引水工程外，亦有通往西藏的鐵路幹線，以及連接內陸與經濟活躍的沿海城市的高速鐵路工程，我們也不能忽視在各大城市中進行的重建及動遷工程。Harvey認為雖然在中國所進行的龐大而高速的發展，稍有不慎，便會陷進吞噬中國財政的危機，但他仍然很肯定地指出「這無疑是一個眾所矚目、影響全球的時空修補範

例，不但可以吸收過度積累資本，更將改變政治和經濟均勢，將中國拱上地域霸主地位，甚或可以提升亞洲實力，在中國領導下，站上更能與美國競爭的位置。」（2008a：96）。

於此，我們看到的「東西之分別」，並不是東亞國家骨子裡的儒家前現代的思想，如何以極權引領聽話的國民，二話不說地為國家去拚命發展及得上歐美標準的現代化城市；反而，我們明顯見到東亞洲的「國家權力邏輯」，正在跟以「美國華爾街－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集團」骨幹的「新自由主義邏輯」的激烈角力。Harvey對資本主義在新自由主義力量的推動下如何轉化變成新帝國主義，及其對世界的滲透與（重新）營構世界的佈局及形勢，在《新自由主義的空間》及《新帝國主義》二書中，作了詳細、動態而且宏觀的陳述及詮釋。到目前情勢，東亞於政治經濟層面上與西方幾乎已達相同的均勢，並進行激烈的角力。這種狀況催迫我們（作為東亞人民）要從不同層面反省，東亞的文化如何重新定位。我們要嚴肅地去理解及追問，目前的政治經濟形勢，是否也締造了空間，讓東亞人民可離開西方文化的強大影響，從基本（再）反思何謂東方文化及其演變之路？

如果從「城市文化」這範圍思考問題，Zukin（引自：Castree & Gregory, 2006：103）給予我們的提示，使我們能確立清晰的起步點。Zukin指出，憑著Harvey的指導，我們很深入地了解到，都市空間是整體地被經濟及政治所組織及控制著的。然而，在這個骨幹、架構之上的城市在其視覺與其他感性形象素質上（也即是文化表象上），又應如何理解其演化及進路呢？Zukin認為一個城市的特質，與其他城市不同之處，就在於其感性特質。若從這個脈絡看，我們曾觀察及分析的三個東亞城市——東京、上海及香港，皆因大財團發展商及政府掌握了城市經濟及政治的發展過程，使到其城市文化的發展，有很大程度都還是陷進了將文化變成商品的無底深淵中。

在這一點，Harvey在《新帝國主義》（2008a）、《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2008b）二書簡單但清楚地提出了西方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對發展中的國家的本土文化侵吞的3個進路：（1）宣揚模仿西方（尤其是模仿美國）文化為進步及合潮流的表現；（2）文化商品化；（3）草根文化被娛樂事業、旅遊業等掠奪。東京的六本木、上海的外灘、香港的灣仔區，皆是眾多被嚴重商品化空間之中的幾個具代表性的例子。在這些城市及特殊地區，於城市重建及仕紳化的過程中，單一地以傾向學習西方高檔生活方式之「中產階級的文化品味」及表面的建築美學主義出發，去為城市複製其「感性特質」。城市應該有甚麼「感性特質」？這問題指示我們應該更深層地從「人」的向度出發去找尋答案。在〈The Right to the City〉（Lefebvre, 1996：147-148）一文中，Lefebvre在界定「城市」為何、以及人們在城市生活的一般應有權利之前，他首先以人類學的思考取徑，去釐定人的「社會需要」。

他首先指出「人」在實際的層面，會有以下複雜、甚至是對立的需要：

- （1）同時對安全感與向外開放性的需要；
- （2）對事物有清晰理解的要求，同時又有探求未知的冒險欲望；
- （3）對工作有組織性的要求，同時又會想有玩遊戲般的隨意輕鬆；
- （4）對事物期望能夠有可預知的計算，同時又渴望未可預知的刺激；
- （5）對人與事物，皆期望能參考已知者，對未知者作類比式的比較以增加（對未知者的）熟悉性，但同時又期待未知的事物跟已知者事物間有互不相同的新鮮感；
- （6）期望能有獨立、獨處甚至孤獨的時間，但又期望能與別人相聚及交流；
- （7）對事物期望可作當下完成的計畫，同時又會作長期的預算；
- （8）期望在吃喝及休息中積聚能量，但又會在玩樂中將能量虛耗。



總的來說，人需要去看、去聽、去摸、去品嚐、去感覺，也在思維層面需求資訊、理解象徵的意義，也要求開放思想去幻想及遊戲；人將這些感官融合思維的活動聚合統一成另一個「世界」。

城市如何以作為整體的環境去對上述人類的基本需求作出理解、支援，及作出妥善鼓勵性的組織？Lefebvre從人類的（上述種種）既矛盾又充滿動力的特質出發，批判現代時期當道至今的規畫及建築的專業，往往只硬性地從既定的建制下所訂定的理論（即功能主義、形式主義及結構主義），去理解及論釋城市的功能、形式（即形成過程）、結構（即構造過程）。這等專業及規畫建築建制恆常忽視實際上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她／他們自然地在其生活的空間中創造了她／他們的生活空間的組織，從而具體化成為本身信賴依從的意義系統。人們在某個地方生活，就是將自身的系統漸漸建立起來，也從而適應大社會的運行，在此同時又將自身的系統「傳播」散發到在其中生活的環境。

在同書的另外一篇文章：〈The Specificity of the City〉（引自 Lefebvre, 1996: 100-103），Lefebvre視城市為一複合體，並以兩個架構去理解它的構造：「近距」系統（near order）及「遠距」系統（far order）。所謂「近距」與「遠距」之分，是以「人」作為出發點去理解這系統的遠近。同時，人的整體活動、生活與思維反省，卻又同時融匯在這兩個系統中進行才得以體現。所謂在城市中出現，成「形」的「近距系統」，即是指個人與個人之間聚合的關係。人們聚合在一起，成立了大小小有系統或鬆散的組織。至於「遠距系統」，則是指在大範圍社會層面擁有權力的建制及其運作模式。城市，可說就是這兩層（「近距」與「遠距」的）系統的體現，亦即成為兩者重疊交切而成「形」的空間。城市在具體層面「近距系統」延續地再生產某些生活模式價值取向（例如人們一般通視「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必然的），然而，也同時讓「遠距系統」不斷在「近距系統」的層面彰顯其權力及控制（例如結婚，即是成家立室，即是要找房子建立新家庭，於是房地產的價格運作及壓力，隨即

降臨到經濟能力有限的新婚夫婦的頭上)。上述是Lefebvre對城市基礎性的理解：其一，城市是人類滿足多重矛盾的「社會性需要」，而不斷實踐的場所；其二，城市是「近距系統」及「遠距系統」兩者延續交流、互相切入的複合體。因此，從這個脈絡中，作為在城市存在／生活的人，我們理解到，自身必須作為一個能動的主體，去探求「近距」與「遠距」系統之間的矛盾，以及對人們的控制甚至掠奪，從而努力去實現或甚至抗爭，使城市成為一個可住居（livable）的地方。

日本自90年代後（Sorensen, 2007：271）盛行的「町營造」（町造り）運動，若從Lefebvre的城市詮釋方向去理解，正好給予我們一個思考「城市世界作為可住居（livable）世界之可能性」的方向。「町營造運動」是個極豐富的概念：（1）「町」是一個由開始已涉及具體化的複雜的經濟、社會、生活／人文的空間意涵，但同時又蘊含（町民追尋）理想向度的空間概念；（2）「造る」作為動詞，正強調了「人」作為一能動的主體，具體與親力親為地在已存的具體環境中的（再）營造的行動。

「町營造運動」（町造り）這個複合的名詞，正好平行的支持了Lefebvre對城市的主張。我們從神樂坂這個例子中也見到，町內市民及其組織竭力對抗著將「町」視作單純經濟物質生產的場域的觀點，以及將「町」商品化的過程，而不斷努力將「町」成就為文化、藝術、知識、具體日常生活，以至體現著（所處世代的）文明的實踐過程及場域。

在具體層面而言，日本的「町營造」運動，可說是主要在Lefebvre所言的「近距系統」的範圍內實踐出來，但同時又持續地跟「遠距系統」斡旋及角力。如上述，所謂「町」，其意指那些面積極有限的鄰舍空間。也正是在這範圍有限的空間，人們能夠憑著個人對存在／生活空間的熟悉度及所投入的熱情，去依著一個理想的存在／生活空間想像來對這個具體空間作改造改善。

同時，由於大家都是大概長年居住於此區、互相熟識街坊街里，所以大家能夠屏除貧富、年齡及性別的分別，就公共空間所關注的課題，一起參與及投入討論、改善及管理。在深入層面，「町營造」運動更顯示了宏觀全球化資本主義脈絡中的空間建構，與作為能動主體的「人」兩者之間的「角力」：一方面，資本在全球區間之網絡運行累積的過程中，城市只被視為資本運行與累積的「節點」；但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居住、生活、存在的「人們」的眼中，城市的各個區域，乃是具體有限的地方，人們在此，以個人參與集體作為能動主體，抓緊著並投入這熟悉的生活空間範圍，持續去爭取生活環境改善及管治的權利。夏鑄九在《再造魅力故鄉：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2007）一書的序言中，扼要地道出日本東京大學西村幸夫教授介紹的古蹟保存及造街運動之目的：

西村教授對古蹟保存的關切角度，全然不同於我們過去熟知的，傳統式的，技術取向為主的保存。他總是先關心地方居民的感受，由社區參與的角度，保存地方特色，塑造聚落形式，改善生活環境之品質。這種草根社區參與的過程，表現了日本地方社會的活力與自我組織的能力，是日本市民社會的重要基石。這些「社會鍵結」具體表現在各式各樣的「俱樂部」、「協會」、「組織」、「義團」、「研究會」、「偵探團」、「協議會」……中，是所謂「都市社會運動」動員團結網絡（network）作用的關鍵。本書中的「造街」個案遍佈全日本，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草根社區運動的結果。這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快速經濟發展之後社會反省力量的表現，也是使日本能成為值得人們長居久留之鄉的根本力量。現在，更是經濟全球化力量拉扯下，地方得以求生存、抵制與自主的根源。（2007：7）

政府加上發展商對城市以資本主義的理念進路，由上而下實行的規畫及

建造建築空間的過程中，市民在「町」的小範圍中進行營造，因而與政府及發展商周旋、對峙、討價還價，爭取「町」作為一個存在／生活環境，同時，也向當權政府爭取地區共同管治權（local governance）。在這集體運動中，市民體現了自身作為能動的（active）行動者（agent），同時也經歷了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出現。

由此，我們可借用夏鑄九的看法說明造街運動（町營造運動）的重要性：「西村教授所介紹的『社區營造』，保存了居民的集體記憶，勾勒了人民對明日城市的想像，提出了新專業者的出路與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Sorensen & Funck（2007：277）也認為，在日本，就算現在傳統那種自上而下的城市規畫建制還是處於極主導的地位，「町營造」運動很難在短時間內爭取到將這建制實際地改變；但是「町營造」的理念及由此而推行的運動已普遍被公認為成功地將既有的「典範」（paradigm）漸漸轉移：因著在日本全國各地有大量自願人士及非營利非政府團體積極組織及參與「町營造」運動，市民社會參與公共空間的規畫及管理的可能性有越見增長之勢。

儘管Harvey（1996, 2009）非常批判性地討論過不同的學者、哲學家（如Norberg Schultz、Heidegger等）所給予「地方」正面的價值及意義，但他也在其著作《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sup>7</sup>（2009）中其中一章〈Place, Region, Territory〉中重覆地肯定了「地方」（place）是漸進式的「解放運動」（emancipatory movement）的重要基地。他認為「個人的立足點／情勢」（the personal）唯有透過在特定地方的本土團結組織中實踐，才可發揮其政治行動力量，去達成更大範圍、更具普遍性的爭取人們的生存／生活權利及社會公義的行動。

在〈Place, Region, Territory〉一章，Harvey很謹慎及透徹地討論了「地

方」(place)的整體涵義及價值。透過Harvey的論述我們可找到一個較完備的立場，去認清、反省更掌握我們投入有關「地方」的政治運動的思想路線。

Harvey並不否定「地方」為個人得以抒發其整體思想，以至體現日常生活的場所，也承認「地方」是人們因為長期生活在此而感到熟悉，繼而產生歸屬感及安全感的空間。但若然要投入「地理政治」運動，我們絕不能將眼光及立場膚淺地收窄於此種狹隘的、感性的對「地方」的情懷內。因為當談及微觀的「地方」的空間範圍時，我們不得不小心考慮到「地方」(這概念)背後總會有「界域」(territory)對「地方」的詮釋甚至控制。而一旦談到「界域」，我們一方面必然要面對「社區」作為「絕對空間」的陷阱：很多從事地方政治的社運人士常常誤信只要保衛本土社區不受外來的污染，便可避過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空間強權的侵襲。Harvey認為這與圍欄內社區(gated community)的意識形態無異。

另一方面，我們則要小心，不同地理空間之「界域」的分隔線，是來自資本主義在全球運作、累積時，由經濟力量與政治權力合謀所製造出來。例如西方學者不斷寫文章來衡量、論述上海的全球化素質，又或本結論章節開始之段落所介紹的幾種理論(Yeung & Lin、Rowe等)，對「東亞洲」的界定，歸根究底，皆是資本主義發展至自由主義階段的「界域」意識形態所建構、形成的「西強東弱」空間界域範圍及其內容的構想。

於此，Harvey在承認「地方」對個人以至社群的重要性的同時，他指出應以一種多重複雜但又互相關聯的圖像去理解地理空間。於此，他提出了兩套異別於全球化地理組織之「同心圓」的圖像，去理解漸進式(progressive)的社會組織及空間概念：

第一套，是來自希臘的智者學派(the Stoics)：最接近圓心的第1環，是

「自我」；第2環是近親家庭；第3環是近鄰或街坊社群組織；第4環是同一個城市的市民，同一個國家的國民；最遠的第5當然就是整體人類。

這個古典的「人倫觀」，到了馬克思與恩格斯手上，卻變成另一套構想：第1環是被異化了的個體工人，第2環是集體團結組織的成立，首先是在同一工廠的工人們，繼而再外一環是整個城市的無產階級，再來就是對抗資本主義政權的力量——那當然就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大團結了。

Harvey認為，對於由智者學派的古典單純人倫觀直至馬克思的「工人個體之異化以致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的鬥爭理論，我們皆要清晰掌握一環與一環的關係之間的不協調甚至相衝突的張力。於此點，我們看出Harvey企圖從（經過批判的）古典的人文空間思維，去勾劃對抗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空間架構。我們掌握了「同心圓」的空間概念，更必須要動態地從全球範圍去看資本主義所推動的金融、能源、文化在各種組織、資本在各個系統中的流動，同時掌握到地理政治所生產的不停移位的各種權力關係，也由此再回頭，從而去理解所謂「文化認同」或「自我認同」乃是充滿衝突性的多重意義（即基於階級、性別、地方等）的概念。

我們必須認清，「文化」並不只是將文物（例如古老的建築或傳統習俗）作具體物件式的保存，更不是短視地將文化翻譯為「創意工業」、「休閒娛樂事業」、旅遊景點、或具賣點的設計品；如果以此來定義文化，我們只會任由消費主義吞噬文化，我們將永遠失去文化，也即是失去自身對文化認同、失去作為一個「人」對意義系統的不斷反省及更新的營造能力。

於此，就讓我們由一個離開消費主義的「文化」的定義再開始思考：

文化是關乎人們在漫長時間裡實踐對所存在的土地的孕育、對下一

代的思想薪火相傳的教化、對社群的組織及發展；文化也是關乎某個族群的意義、價值取向的認識、反思，以及這個族群的生活方式的滋長及沉澱（成為傳統習俗）…（Bobock, 1992，引自 Miles & Paddison, 2005：834）。

路漫漫其修遠兮：深入閱讀了西方不斷自我批判的社會學、地理學理論後，一幅清晰的世界地圖顯現在我們眼前。由此批判的進路出發，我們碰見了最重要，但還有待解決的問題：於此複雜的全球局勢及時空，究竟何謂「東方」？「東方思想」如何能成就城市文化之意義及價值？無論如何，如果真的要如 Yeung & Lin所言，要對西方理論，從東方出發作出理論回駁（theorize back），並同時從事東方城市「紮根研究」（grounded study）之餘，我們更必須要先從根底去認識、考慮及重構，東方城市的基本文化涵意。

## 注釋

- 1：〈經濟地理學在亞洲的理論工作進程〉。
- 2：〈從地理學角度思考東亞洲〉，引自：Tang & Mizuoka, 2009：1-16。
- 3：書名中文譯《東亞之現代性狀態》。
- 4：Rowe的論述對東亞城市處處貶斥的評論，但是我們也可在其中很實際地看到東亞城市的特質：一方面我們身處在極豐富歷史文化價值的地域，但同時，現代化的步伐高速地藉著「發展主義」的思維主張，正把許許多多的歷史及生活空間撤減或改造，更將居民大規模動遷，將市中心重建成為超級現代化的高地價的、商品化的城市空間。與此同時，東亞城市通常都是人口稠密及在現代時期建造起來多用途（mixed use）工商住混合的空間（重建前的香港灣仔區正是最佳例子），在其中，人們本來在住家附近總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賺取生活，但是，東亞國家地區（作為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的政府為了經濟持續強勁發展，其政策總是嚴重地向發展規畫傾斜，空間被由上而下的城市規畫重新組織，由此，空間作為資源，極度不均地分配予社會上不同的階級，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現象。
- 5：有關「華盛頓共識」，見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所著之「華盛頓共識的爭論」之摘要（公共經濟評論，2004年第10期，中國人民大學金融EMBA出版電子刊物，<http://www.frc.com.cn/sp/paper/william/speech.doc>），「華盛頓共識」乃是90年為解決拉美經濟危機提出的政策方法，涉及宏觀經濟穩定、開放程度和市場經濟三個重要方面，主要強調財政紀律和公共部門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主張金融、貿易自由化和放鬆利率、匯率及投資管制，是一種典型的經濟自由主義共識。
- 6：近期富士康工人連續跳樓的事件，揭示了中國工人在這大量生產廉價消費品市場中所擔當的慘痛角色。據台灣聯合晚報2010年6月13日的報導：「蘋果、惠普、戴爾等國際知名大廠，壓低委外成本，獲取巨大暴利。以全球熱銷的蘋果iPad為例，每台售價499美元，蘋果電腦就賺約297美元，超過總售價50%，但蘋果電腦支付給鴻海富士康的每台代工費約11美元，僅占總售價大約2.3%，顯見負責研發代工的台灣工程師與生產線上的中國工人代價低廉。」（聯合晚報2010/6/13）
- 7：《世界主義及有關自由的地理學》。



## 後記

這文集終於到了完成一頁了！兩年的編寫時間簡直是長得過份了。這皆是由於研究資金的短缺，以及我的才情能力有限之故。每當書寫至枯腸無可再搜索，筋疲力竭之際，唯有離開案頭，走到街上蹣跚；卻又由身至心體驗到種種城市狀況對人的生活以至生命存在的趨向負面的影響：空氣污濁、人多車擠、無論走到那裡都有廣告催促你買、買、買……還有房價高漲、以及總是以旅遊業發展城市文化……

城市的急功近利，實在令人窒息。然而，又深刻地體驗到人人都是在城市中切切實實地生活著，也同時切切實實地在城市尋取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返回案頭，繼續研讀枯澀的研究報告、理論，期待著更好的生活環境終有一天出現…累極時、有那一首城市之歌，使我感動，使我相信，人應該充滿感覺和情懷，城市也應該是感性和美麗的：

東京にもあったんだ  
こんな綺麗な夕日が  
うれしいな 君に見せたいな  
君は元気かな

東京にもあったんだ  
こんな綺麗な月が  
うれしいな 君も見てるかな  
君に会いたいな

今以上自分以上になりたかったんだよ  
急いで急いで  
勝つために覚えたこと

この街のルールに 少しでも染まったよ  
お互いだ 涙は隠さないでくれ  
お願いだ 心はなくさないでくれ  
ほら ごらん 一緒に探してた明日に  
僕はまだ走ってるんだよ

東京にもあったんだ  
こんな綺麗な夜空が  
おかしいね 涙こぼれてる  
君に会いたいな

時々 忙しすぎて 僕に迷ったり  
君にも怒ったり  
生きるために傷つくこと

この街のルールにもう少し逆らうよ  
お互いだ 涙は隠さないでくれ  
お願いだ 心はなくさないでくれ  
ありがとう 一緒に泣いてくれた君はね  
青春のゴールだったよ

ねえ わかってたんだよ uh...  
ねえ わかってたんだよ  
わかってるんだよ  
東京にもあったんだ  
こんな綺麗な夜明けが  
うれしいな君に見せたいな  
君は元気かな

## 福山雅治／東京にもあったんだ

中文翻譯：伊藤雪彥（引用自<http://blog.yam.com/itoyukiya/article/14305639>）

東京也有啲  
如此絢麗的夕陽  
真令人高興 想讓你一起欣賞  
你過得還好嗎？

東京也有啲  
如此美麗的月色  
真令人高興  
你也看到了嗎？  
好想見你

一直拼了命的渴望超越極限  
倉卒而匆忙  
僅僅牢記著成功  
這城市的運作規則，只稍稍懂了一些  
我們別再隱藏自己的淚水  
請不要再迷惘自己的心  
看哪！那是一起探尋的明日之路  
我仍不斷向前行走

東京也有啲  
如此綺麗的夜空  
好奇怪啊  
漸漸淚流滿面  
好想見你

有時忙過了頭  
我陷入迷惘  
老是惹你生氣  
又為了生存 而受傷

稍微違背這城市的生存法規吧  
我們別再隱藏淚水  
也不要迷失了自己的心  
謝謝 陪我一起哭泣的你  
已經抵達青春的終點

我都懂  
我都懂  
我全都懂的  
東京也有吶  
如此美麗的破曉  
真令人高興  
希望你也能一起欣賞  
你過得好嗎？

## 謝誌

本書所收錄之文章，乃是筆者自2004年以來對城市文化的研究結果。研究經費來自香港理工大學幾項研究經費計劃。

作為研究項目的主持人及本書的主要編寫者，我首先向主要研究員曾嘉雯致謝意。曾君與筆者一起到上海及日本進行觀察及資料搜集；並於屯門公園對進行歌舞活動的長者們作長時間觀察。除此以外，更與本人合著〈歷史與藝術的商品化——論上海浦西重建所營造的城市文化〉及〈「嘉年華式狂歡之軀體」的鬥爭——屯門公園長者之空間創造〉兩篇文章，為此，我必須向曾嘉雯君謹致謝意。

此外，筆者還要對章曉風、馮凱欣、吳天慧、黃可恩四位學生表達謝意。在書寫〈社區營造還是社羣主義——香港灣仔反對利東街拆卸行動的觀察〉的過程中，四位鼎力協助筆者搜集資料，並與筆者深入討論文章所涉及之各個課題及對我的見解提出批判。憑藉她們的熱誠及協助，這篇文章才得以完成。

筆者必須向研究員唐晉濱深表謝意。唐君十分耐心地為本書各篇文章作整理及打字，並編輯所有附圖。筆者實在感激不盡。

最後，本書得以出版，乃承蒙台灣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人陳炳樛先生之不棄及賞識，企劃高小雯小姐及劉佳旻小姐不厭其煩、以最大耐性整理拙文之草稿，美術設計李莉君小姐，對拙文作文稿編排、校對與修改，並且以她的專業，設計、編排了本書的版面，筆者實在感到十分光榮及感謝。

在香港的大學，近年成立了「遊戲規則」，積極鼓勵及重視大學教員，以英語在英美國家中的學術期刊發表文章，或透過該地的出版社出版書籍。對於

以中文出版的文章及書籍，通常不獲重視。然而，當我想到自身作為一個讀書人，母語為中文，畢生之期望，乃是對中華文化作出貢獻。因此之故，自身對文化的研讀及見解，必然要堂堂正正地以中文寫出來，望能對中華文化付出個人渺小責任；也期望能夠「拋磚引玉」，藉拙著之出版來求教於以中文思想的學者們，對本書的課題作出回應及討論。

東亞諸國，其現代文化的進程，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依然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之下摸索著自己的道路。城市的規畫與重建策略，無論在功能或文化方面，皆以西方訂立的指標為主導方向。但是，西方學者在城市發展及文化上前瞻性的反省及批判，卻又未必能影響規畫或重建之機構；或甚至「保育人士」對這些反省性的理論，皆未曾深入理解或重視。怎樣才是一個能彰顯其本身獨特文化的東亞城市？這問題仍是有待探討的。本書的工作，一方面企圖整理西方的城市發展及文化的理論，另一方面則對東亞城市近年所出現的文化現象，作出初步的比較及分析。不足之處，謹望各方有識之士，多加指正。

郭恩慈

識於香港理工大學 2011年4月

## 中文參考書目

1. Alexander, Christopher (王聰度、周序鴻譯), 1994, 《建築模式語言》, 台北: 六合出版社。
2. Bocock, Robert, (張君玟、黃鵬仁譯), 1996, 《消費》, 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
3. 陳丹燕, 2007, 《不可能的世界: 上海外灘的影像與傳奇中》, 香港: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4. 陳偉、張帆及廖志強, 2006, 〈日本東京六本木新城建設對上海城市規劃的啟示〉, 《上海城市規劃》, 第03期2006年。
5. 戴曉玲、侯宇紅, 2008, 〈再談「一城九鎮」〉, 《規劃師》, 第24卷第03期。
6. 德利克著, 張歷君譯, 2005, 〈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 《中外文學》, 第34卷第1期, p.23-44。
7. Havey, David 著 (黃煜文譯), 2007, 《巴黎, 現代性之都》。臺北: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8. Havey, David (王志弘譯), 2008,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 臺北: 群學。
9. H15關注組, 2010,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建立公識」階段之公眾意見總結及展文件》。
10. 顧朝林等著, 2002,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城市發展——跨世紀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研究》, 臺北: 臺北商務。
11. 九鬼周造著, 藤田正勝原注釋, 黃錦容、黃文宏、內田康譯注, 2009, 《「粹」的構造》, 臺北: 聯經。
12. 羅致光、徐永德、黃於唱、李迦密、何麗珊, 2010, 《香港市區更新成就與挑戰摘要最後研究報告》, 香港: 香港大學。
13. 劉細良, 2004, 《大朝聖: 全球旅行狂熱的文化觀察》, 香港: TOM (CupMagazine) Publishing Limited.
14. 李志剛、吳縛龍, 2006, 〈轉型期上海社會空間分異研究〉, 《地理科學》, 第61卷第2期, p.199-211。
15. 李志剛、吳縛龍、高向東, 2007, 〈全球城市極化與上海社會空間分異研究〉, 《地理科學》, 第27卷第3期, p304-316。
16. 李惠斌(編), 2003, 《全球化: 中國道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7. 六本木新城遊客指南, 2006年繁體中文版。
18. 三浦展著 (吳忠思譯), 2006, 《下流社會: 新社會階級的出現》, 臺北: 高寶。
19.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2001, 《尋羊冒險記》, 臺北: 時報。
20. 西村幸夫著, (王惠君譯), 2007, 《再造魅力故鄉: 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1. 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所編, 2004, 《浦東發展報告》,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2. 上海證大研究所編, 2002, 《新上海人》, 北京: 東方出版社。
23. 成美堂: 《東京: 首都圈未來地圖》, 日本成美堂, 2004。
24. 黃宗儀, 2004, 〈都市空間的生產: 全球化的上海〉,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3期, p.61-81。
25. 香港市區重建局, 2008, 《邁向市區更新3.0》刊物。
26. 蘇偉文、陳緯豪, 2007, 〈次按風暴是如何形成的?〉, 《信報》, 2007年12月21日, p38。

27. 孫田、劉群，2001，〈上海「一城九鎮」規劃點滴談〉，《時代建築》，第3期。
28. 薛求理，1989，〈世紀之交看中國建築〉，《建築學報》，第3期，p.22-24。
29. 薛求理：〈一城九鎮 空空如也〉。文匯報。2009年5月20日。  
<http://trans.wenweipo.com/gb/paper.wenweipo.com/2009/05/20/PL0905200003.htm>
30. 郝建興、徐越倩，2004，〈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新角色〉，《中國社會科學》，200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31. Urry, John (國立編譯館主譯，葉浩譯)，2007，《觀光客的凝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32. 吳幸玲，2007，《全球化上海的懷舊與現代化景觀：跨國菁英與全球城市都市論》。博士論文，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臺灣大學。
33. 吳辰編，2007，《上海老工業》，上海文化出版社。
34. 吳敬璉，2009，《金融海嘯與中國經濟》，《上海大學學報》，第16卷第1期，p.5-13。
35. 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屬下文物保育及文康活動工作小組，2007，《技藝行業的危機與轉機：灣仔篇》，香港：社區文化關注。
36. 灣仔區議會，2006，《灣仔街紙：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計劃總結報告書》。香港：灣仔區議會。
37. 衛慧，1999，《上海寶貝》，瀋陽市：春風文藝出版社。
38. 楊瑪利、藍麗娟、陳應欽編，2007，《新東京美學經濟》，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39. 俞可平（編），2002，《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0. 俞可平、田賽男（編），2002，《海外學者論浦東開發開放》，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41. 俞可平等著，2004，《全球化與國家主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2. 周綺薇、杜立基、李維怡編，2007，《黃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香港：影行者有限公司。
43. 周漢民，2004，〈世博會是上海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重要契機〉，《城市規劃匯刊》第2期，p.1-5。
44. 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編），2009，《全球化與現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現代化的戰略選擇》，北京：科學出版社。
45. 《社情》季刊雜誌，2008年3月，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出版  
[http://www.hkcss.org.hk/cm/cc/scenario/download/issue\\_21\\_ebook.pdf](http://www.hkcss.org.hk/cm/cc/scenario/download/issue_21_ebook.pdf)



## 英文參考書目

- Alexander, C., Ishikawa, S. and Silverstein, M.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Towns, Buildings, 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khtin, M (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alfour, Alan & Zheng, Shiling. (2002) *World Cities: Shanghai*. Chichester [England]: Wiley-Academy.
- Baudrillard, Jean. (1983) *Simulations*. Translated by Paul Foss, Paul Patton and Philip Beitchman. New York: Semiotext (e), Inc.
- . (1996) *System of Objects*. New York: Verso. 中譯：《物體系》，林志明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7
- Benjamin, Walter. (1999) *The Arcade Project*.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Tony and Diane Watson (Eds) (2002)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Oxford: Blackwell.
- Bergère, Marie-Claire. (2004) 'Shanghai's urban development: A Remake?' *Shanghai: Architecture &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edited by Kuan, Seng. & Rowe, Peter G., Munich; New York: Prestel, p36-53.
- Bestor, Theodore. (1989) *Neighborhood Tokyo*.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 Borja, Jordi & Castells, Manuel. (1997) *Local and Global: The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Earthscan.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中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 Bourdieu, Pierre, and Alain Darbel with Dominique Schnapper. (1991) *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Bradley, Mayhew. (2001) *Lonely Planet Shanghai City Guide*. Melbourne, Oakland, London, Paris: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 Bridge, G. (2001) '*Bourdieu, Rational Action and the Time-Space Strategy of Gentrific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26, Issue 2, p. 205-216.
- Brower, Sidney. (1996) *Good Neighborhoods: A Study of In-Town and Suburba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 Butler, Tim & Robson, Garry. (2001) 'Social Capital, Gentrification and Neighbourhood Change in London: A Comparison of Three South London Neighbourhoods' in: *Urban Studies*, Vol. 38, No. 12, p. 2145-2162.
- Cassirer, Ernst. (1944)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中譯：《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甘陽譯，臺北：桂冠圖書，1990。
- Certeau, Michel de. (1984) .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 Castells, Manuel. (1998) *End of Millenniu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3,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 Castree, Noel & Gregory, Derek (eds) . (2006)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 Blackwell.

- Chaney, David. (2002) *Cultural Chang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algrave.
- Chen, Xiaoming & Z. Zhou (Eds) . (2009) *Shanghai Rising: State Power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in a Global Megac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en, Yawei. (2007) *Shanghai Pudong : Urban Development in an Era of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Netherlands: IOS Press.
- Croll, Elisabeth. (2006) *China's New Consumer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Demand*.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 Culture and Heritage Commission (CHC) (2003) *Policy Recommendation Report*.
- Debord, Guy. (1983)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 Black & Red,.
- Dicks, Bella. (2003) *Culture on Display: the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Visitability*. Maidenhead :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llin, Nan. (1996) *Postmodern Urbanism*.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Featherstone, Mike.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Newbury Park: Sage.
- Featherstone, Mike. (2007)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 2nd ed. London; Newbury Park: Sage.
- Forrest, R. & Kearns, A. (2001) 'Social Cohesio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Neighbourhood' in: *Urban Studies*, Vol. 38, No. 12, p. 2125-2143.
- Friedmann, John. (2002/2005) *Life Space & Economic Space: Third World Planning*.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Friedmann, John. (1981) *Life Space and Economic Space: Contradiction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Galster, George (2001) 'On the Nature of Neighbourhood' in: *Urban Studies*, Vol. 38, No. 12, p.2111-2124.
- Harvey, David. (2009)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New Left Review*, Vol. 53, Sept Oct 2008, p23-40.
- (2006) *Space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NY: Verso.
-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中譯《巴黎·現代性之都》，黃煜文譯，台北：群學出版，2007。
-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新帝國主義》，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合譯，台北：群學出版，2008。
- (2000)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Berkele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 (1999) *The Limits to Capital* (New ed.) . London: Verso.
-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Cambridge, Mass.:
-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NY, USA: B. Blackwell.
- Blackwell Publishers.
- (1989)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B. Blackwell.
- (1985)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69)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 Douglas, Mike. (1988)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2 (3), p.425-454
- Hall, Peter. (2000) 'The World's Urban Systems: A European Perspective', *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no.1, p.1-12.
- Hatz, Gerhard, 2010 'The city with the best quality of living worldwide. Theorizing and evaluating concepts and Vienna's performances of livability' (Paper presented at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History, Ghent, 1st-4th September 2010) . <http://univie.academia.edu/GerhardHatz/Papers/276689/The-city-with-the-best-quality-of-living-worldwide--Theorizing-and-evaluating-concepts-and-Vienna%E2%80%99s-performances-of-livability->
- Hebbert Michael & Nakai, Norihiro. (1988) 'Deregulation of Japanese Planning in the Nakasone Era',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 59, No. 4, p.383-395.
- Heir, Carola. (2008) 'Machi: Neighborhood and Small Town: the Foundation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Japan' i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5) -1: 75-107
- HullIV, Lam & Vigo. (1994) 'Place Identity: Symbols of Self in the Urban Fabric',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1692046>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8 (2-3) :109-120
- Koskela, Hille. (2003) 'Cam Era' - the contemporary urban panopticon' in: *Surveillance & Society*, No. 1 (3) , p. 292-313.
- Kuan, Seng. & Rowe, Peter G (Eds) . (2004) *Shanghai: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Munich; New York: Prestel
- Lachmann, R. , Eshelman,R. & Davis, M. (1988) 'Bakhtin and Carnival: Culture as Counter-Culture' in: *Cultural Critique*, No. 11, Winter, 1988-1989, p.115-152.
- Laurence, J. C. Ma and Wu, F. (2005) *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City: Diverse Processes and Reconstituted Spaces*, London: Routledge.
- Lees, L, Slater, T. & Wylie, E. (2008) *Gentrif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Lee, O.F. (1999)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Henri. (1991)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n I, London: Verso.
- (2005)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n III, London: Verso.
- (2002)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n II, London: Verso.
- (2001) *Du rural à l'urbain*, Paris: Anthropos.
-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Brunswick, N.J., U.S.A.:
- (1982) *The Sociology of Marx*.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76)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74/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1948) *Le Marxisme, Collection Que sais-je?*, Paris: PUF.
- Lefebvre, Henri, & Levich, Christine. (1987) *The Everyday and Everydayness*, Yale French Studies, No.73, p.7-11
- Lefebvre, Henri, & Catherine Regulier-Lefebvre. (1992) , *Eléments de rythmanalyse: Intro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s Rythmes*. Paris: Syllepse

- Leman, E. (2002) 'Can Shanghai Compete As a Global City?',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p.7-15.
- Lepofsky, J. & Fraser, J.C. (2003) 'Building community citizens: Claiming the right to place-making in the city' in: *Urban Studies*, Vol. 40, No. 1, p.127-143.
- Leung, W. T. (1986) 'The New Towns programme' in: T.N. Chiu and C. L. So (eds.) *A Geograph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y, D. (1994) 'Gentr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 p.53-74.
- , 2003, 'Artists, Aestheticisation and the Field of Gentrification', *Urban Studies*, 40 (12) : p.2527-2544.
- Lowenthal, David. (198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 Hanchao. (1999) 'Nostalgia for the Future: The Resurgence of an Alienated Culture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 75, no. 2, p.169-186.
- Lynch, Kevin, (1990) *City Sense and City Design: Writings and Projects of Kevin Lynch*. (Eds) Tridib Banerjee and Michael Southworth. Cambridge, London: The MIT Press.
- Markova, I. (2003) 'Semiotics of Culture in Scientific and Carivalistic Guises: Michail Bakhtin and Yuri Lotman' in: Toomela, A. (eds) . *Cultural Guid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Mind*. Westport, Conn.: Ablex Pub, p.117-135
- Martin, D. G., 2003, 'Enacting Neighborhood', *Urban Geography*, 24 (5) , p.361-385.
- Marton, A. and Wu, W. (2006) 'Spaces of globalis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Spat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Habitat International*, 30, p.213 - 229.
- McCarthy, J. (2006) 'Regeneration of Cultural Quarters: Public Art for Place Image or Place Identity?'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Vol. 11. No. 2, p.243-262.
- Miles, S. & Miles, M. (2004) *Consuming Cities*. Basingstoke ;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 Mitchell, D. (1995)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People's Park, Definitions of the Public, and Democracy'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5, No. 1 (Mar., 1995) , p.108-133.
- Mommaas, H. (2004) 'Cultural Clusters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Towards the Remapping of Urban Cultural Policy,' *Urban Studies*, Vol.41 (3) , p507-532.
- Newman, K. & Wyly, E.K. (2006) 'The Right To Stay Put, Revisited: Gentr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to Displacement in New York City', in *Urban Studies*, No.43, p23-57
-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1985) *The Concept of Dwelling: On the Way to Figurative Architecture*. Milan: Electa
- Pile, S. (1996) *The body and the city: psychoanalysis, space, and subjectivity*. London: Routledge.
- Pun, Ngai. (2003) '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Nov, 18, 4, p469-492.
- Redfern, P. A., 2003, 'What Makes Gentrification 'Gentrification' ?', *Urban Studies*, 40 (12) : p.2351-2366.
- Rowe, G.. (2004) 'Privation to prominence: Shanghai's recent rapid resurgence', *Shanghai: Architecture &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edited by Kuan, Seng. & Rowe, Peter G. Munich; New York: Prestel. p54-67.
- (2005) *East Asia Modern: Shaping the Contemporary City*, London: Reaktion Books.
- R. Bruce Hull IV, Mark Lam, Gabriela Vigo, 1994, 'Placeidentity: Symbol of self in the Urban Fabric',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8:109-120.
- Rodriguez, Joseph A. (1998) 'Local History, Public Art and Community in an Urbanizing Suburb' in: *Cultural Geographies*, Vol. 5, No. 2, p.218-236
- Saito, Asato. & Thornley, Andy. (2003) 'Shifts in Tokyo's World City Status and the Urban Planning Response',

*Urban Studies*, Vol. 40, No. 4, p.665-685.

- Sassen, Saskia. (2009) 'Cities in Today's Global Age', *SAIS Review*, No. 29, p.3-34.
- (2009) 'The Global City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Shanghai', in: X. Chen, Z. Zhou (Eds) *, Shanghai Rising: State Power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in a Global Megac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3-29.
- (2008) 'Neither Global Nor National: Novel Assemblages of Territory, Authority and Rights', *Ethics & Global Politics*, 1, No. 1-2, 2008, p.61-79
- (2007) Deciphering the Global, in: S. Sassen (Ed) *Deciphering the Global: Its Spaces, Scales and Subjects*, London: Routledge, p.1-18
- (2005) 'Global City: Introducing a Concept',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XI, (2) , p.27-40.
- (2004) 'The Formation of Intercity Geographies of Centrality,' in (Eds) Peter G. Rowe and Seng Kuan. *Shanghai: Architecture &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Munich: Prestel, p.8-23.
-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oenberger, E. (2004) . 'The Spatial Fix Revisited', in: *Antipode*. Vol.36, Issue3, p.427-433.
- Sheppard, E. and McMaster, B. (2004) . *Scale and Geographic Inquiry: Nature, Society, and Method*. Mass.: Blackwell.
- Smith, N. and Williams, P. (1986). *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Boston: Allen & Unwin.
- Smith, N. (2002) New Globalism, *New Urbanism: 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 New York: Antipode: Vol 34, Issue 3, p.427-450.
- Smith, N. & Williams, P. (Eds) (1986) *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Boston, Mass.: Allen & Unwin.
- Soja, E. (1989) .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Sorensen, André and Carolin Funck. (2007) *Living Cities in Japan : Citizens' Movements, Machizukuri and Local Environment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Stevenson, Deborah. (2003) *Cities and urban cultures*. Berkshire ;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Sun, M. (2006) 'China: Unscathed Through the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China & World Economy*, No.17, p.24 - 42.
- Takashi Machimura. (1998) 'Symbolic use of Globalization in Urban Politics in Tokyo,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2, 2 (06) , p.183-194.
- Todorov T., (1998) *Éloge du quotidien: essai sur le peinture hollandaise du XVII<sup>e</sup>me sie`cle* (In praise of the quotidian: study of 17th century Dutch painting). Paris: Adam Biro.
- Tonnis, Ferdinand. (2002)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 Toshio Kitahara. (2003) 'Conserving walkable environments in Japan', inR. Tolley (Ed) *Sustainable Transport: Planning for Walking and Cycling in Urban Environments*, Cambridge: Woodhead Publishing. p.501-510,
- Touraine, Alain (1998) *Beyond Neoliberalism*, trans. David Macey, Cambridge: Polity.
- Tweed, C. & Sutherland, M. (2007) 'Built cultural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83: 62-69.
-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i, W. T. (2006) 'Place Promotion and Iconography in Shanghai's Xintiandi', *Habitat International*, June, Volume 30, Issue 2, p.245-260.
- Wang, J. (2001) 'Culture as Leisure and Culture as Capital', *Positions* 9:1 Spring, p.69-104.

- Waley, Paul. (2002) 'Moving the Margins of Tokyo', *Urban Studies*, 39 (9) :1533-1550.
- 2006, 'Re-scripting the City: Tokyo from Ugly Duckling to Coolcat', *Japan Forum*, 18 (3) :361-380.
- Wasserstrom, J. N. (2009) *Global Shanghai, 1850-2010: A History in Fragment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Wei, Y. D., Leung, C. K. and Luo, J. (2006) 'Globalizing Shanghai: Foreign Investment and Urban Restructuring', *Habitat International*, 30, p.231-244.
- Webb, D. (2005) 'Bakhtin at the Seaside: Utopia, Modernity and the Carnavalesque' i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2, No. 3, p.121-138.
- Wing-Shing Tang and Fujio Mizuoka (Eds) . (2010) *East Asia: A Critical Geography Perspective*, Tokyo: Kokon Shoin.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 Wu, W. P. (2004) 'Cultural Strategies in Shanghai: Regenerating Cosmopolitanism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Progress in Planning* No.61, p.159-180.
- Wasserstrom, J. (2009) *Global Shanghai, 1850-2010: A history in Frag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 Wu, F. (2003a)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 (2003b) 'Globalization, Place Promo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5, p.55 - 78.
- (2003c) 'The (Post-) Socialist Entrepreneurial City as a State Project: Shanghai's Re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Urban Studies*, 40, p.1673 - 1698.
- (2000) 'Place Promotion in Shanghai, PRC', *Cities*, 17, p.349 -361.
- (2000) 'The Glob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 Remaking Shanghai as a World City', *Urban Studies*, 37, p.1359 - 1377.
- (2009) 'Globalization, the Changing State,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Shanghai,' in: X. Chen, Z. Zhou (Eds), *Shanghai Rising: State Power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in a Global Megac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125-144.
- Wu, F. (eds) (2006)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City*.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 Wu, F., and Laurence, J. C. Ma. (2006) 'Transforming China's globalizing cities,' *Habitat International*, 30, p.191-198.
- Wu, F.L., Xu, J. & Yeh, A. G. (2007) *Urban 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State, Market, and Spa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Yeung, Henry Wai-chung and Lin, George C. S. (2003) 'Theorizing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Asia', *Economic Geography* 79 (2) , p.107-128.
- Yusuf, S. and Wu, W. (2002) 'Pathways to a World City: Shanghai Rising in an Era of Globalisation', *Urban Studies*, No. 39, p.1213 - 1240.
- Zappen, James P. (1996) 'Bakhtin's Socrates' in: *Rhetoric Review*, Vol. 15, No.1, Autumn, p.66-83.
- Zukin, S.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Cambridge, MA : Blackwell.
- (1988)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87) 'Gentrification: 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Urban Co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p. 129-147.
- The Policy Address of Hong Kong, 1999-2000.
- The Policy Address of Hong Kong, 2008-2009.

## 日文参考書目

1. HiroSasak, 1999, 〈まちづくりを考える～"まちづくり"ってどんなこと?～〉, 《神戸&SanFrancisco まちづくりって何だろう?》, <http://www.geocities.co.jp/Berkeley-Labo/5472/machidukuri.htm>
2. TEKU. TEKU, 2008, 《まち歩きガイド東京+》, 京都:学藝出版社。
3. 東京中城官方網頁中文版 <http://www.tokyo-midtown.com/cn/about/index.html>
4. 日本建築学会(編集), 2004, 《まちづくり教科書第1巻まちづくりの方法》, 東京:丸善。
5. 戸沼幸市, 1991, 《まちづくりの哲学》, 東京:彰国社。
6. 平松南, 2007, 《神樂坂おとなの散歩マップ》, 東京:けやき舎。
7. 佐川嘉久, 〈都市計画の役割とまちづくり〉, <https://www.machigenki.jp/content/view/234/262>
8. 《季刊まちづくり(8)》2005年9月, 京都:学藝出版社。
9. 永井荷風著, 川本三郎解説, 1999, 《日和下駄》, 東京:講談社。
10. 西村幸夫, 2008, 《路地からのまちづくり》, 京都:学藝出版社。
11. 岩田智也, 2005, 《六本木ヒルズの若手社長たち~21世紀勝ち組企業家たちの新. 哲学》, ブックマン社。
12. 河合隼雄, 《二十一世紀之構想:日本の極限在於日本の内部——以自立及協治來建築新世紀》(21日本の構想:日本のフロンティアは日本の中にある—自立と協治で築く新世紀—) <http://www.kantei.go.jp/jp/21century/houkokusyo/index2.html>
13. 浅原須美, 2007, 《東京六花街藝者さんから教わる和のこころ》, 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
14. 《神樂坂ごあんない帖》2007年8月, 東京:インフォレスト(INFOREST MOOK)。
15. 神樂坂キーワード第2集制作委員会, 2010, 《神樂坂キーワード第2集/粋なまちづくり過去. 現在. 未来》, 東京:神樂坂キーワード第2集制作委員会。
16. 新宿區觀光協會網頁 [http://www.shinjuku-kankou.jp/map\\_movie\\_kagurazaka\\_history.html](http://www.shinjuku-kankou.jp/map_movie_kagurazaka_history.html)